

悲愴的靈魂

張林 著



張林，一個被踩著腦袋的哲人，被戴上腳鐐的武士。

在恐怖囚禁中掙扎奮起，對著漆黑的夜幕瘋狂怒吼：還我大地還我自由！

| 關於作者 |



張林，一九六三年生，中國民運人士，獨立作家。

一九七九年九月 進入清華大學讀書，參加校園民主運動，任「清華大學歷史地理學社」社長。

一九八六年 他辭去公職，在安徽、海南、雲南等地從事專業民運。他多次越境，多次被關押。

一九八九年六月 張林由於組織領導皖北地區民主運動和發表大量演講被判刑二年。

一九九四年五月 他因為在北京參與籌辦「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及其它民運活動，被送回安徽省處勞動教養三年。

一九九七年九月 張林服刑期滿後，獲得赴美簽證來到美國。

一九九八年十月 張林闖關返回中國從事民運，第二天被警察抓獲，處三年勞動教養。張林因參與民主活動，前後被囚禁八年。

二〇〇一年十月 獲釋居住在蚌埠，經常在網路上發表政論文章，批評中國當局，也持續受到當局的迫害和歧視。

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張林前往北京參加悼念趙紫陽活動未果，從北京返回時在安徽蚌埠車站遭拘押。三月十九日張林的妻子方草接獲通知，張林已被正式逮捕，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目前仍被關押中。

WITHDRAWN

No longer the property of the
Boston Public Library.
Sale of this material benefits the Library.

博天出版

悲愴的靈魂

張林 著



張林，一個被踩著腦袋的哲人，被戴上腳鐐的武士。

在恐怖囚禁中掙扎奮起，對著漆黑的夜幕瘋狂怒吼：還我大地還我自由！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2 with funding from
Kahle/Austin Foundation

目 錄

前 言	4
第一章 核桃種子	11
第二章 地獄之旅	41
第三章 如夢如歌	77
第四章 鐵窗歲月	121
第五章 荊棘民運路	151
第六章 水深火熱	175
第七章 激越的心靈	223
第八章 地獄深處	261
第九章 腐惡中國	299
第十章 路漫漫其修遠兮	351
第十一章 新觀念：文明與野蠻	379
第十二章 老核桃樹	403

前 言

1. 嚎哭

我是被扼著喉嚨的歌手，
我是被踩著腦袋的哲人；

我是被銬住雙手的工匠，
我是被戴上腳鐐的武士。

我是被颶風摧殘的鮮花，
我是被狂飆腰斬的松柏；

我是被鐵錘砸碎的鐘鼎，
我是被鐮刀殘害的菁英。

我是所有被搗毀的廟宇，
我是所有被砍光的森林！

我是所有被荼毒的心靈，
我是所有被奴役的生命！

我在恐怖囚禁中掙扎，
我在貧病交加中奮起；

我要對著被毀的家園失聲痛哭，
我要對著漆黑的夜幕瘋狂怒吼：

還我大地還我自由！
還我天空還我自由！

——〈嚎哭〉，二〇〇三年十月

2· 葬花

我永遠也忘不掉那間陰暗潮濕的地下工廠，那些用苦難和血淚製作的，用在葬禮上燒掉，陪葬死人的葬花；像野獸一樣兇惡的「麻髓」隊長，百十個戰戰兢兢的勞教人員。

每天早晨我們五點多鐘就被叫醒，動作慢一慢棍子便會打在身上。我們像一群幽靈沿著狹窄的樓梯擠下去，走在最後面的人會被野豬隊長打上幾棍。所有人都晒得神志不清，走起路來搖搖晃晃。

點名，三百多個人像三百多隻蛤蟆一樣蹲在籃球場上，聽到自己的名字就站起來喊聲「到」，聲音還必須洪亮，否則也要被打一頓。疊被子，翻來覆去地疊，因為疊得不像豆腐塊也要挨打。早飯，半碗餛飩米粥，幾根發臭的鹹菜絲。我嘗試過幾回，太噁心了，實在吃不下去。開工，幹活，不准打瞌睡！

我每天從早晨七點到夜裏十一點，坐在一張骯髒無比的桌子邊，桌子上沾滿了令人噁心的膠水，地上也是。那是一種有毒的廉價膠水，我們用它把塑膠泡沫片黏起來，做成葬花。我的手上

和衣服上總是沾滿了膠水，搓也搓不掉，開始我還起雞皮疙瘩，後來就麻木了。但那種噁心的感覺從未淡化，直至現在，一想到那些噁心的膠水我還是想嘔吐。

那間簡陋的地下工廠的鐵皮屋頂，從每年四月到十一月半年多的時間裏，都像烤箱一樣烘烤著我們，我們汗如雨下，口乾舌燥，渾身冒火，卻沒有水喝。

「麻體」隊長認為，喝水會讓人小便多，浪費時間，耽誤幹活。有時碰到陰天，要解小便，就必須像蛤蟆一樣蹲在「麻體」隊長面前報告。麻體隊長會用它那雙邪惡的豬眼盯著你，多半會讓你回去憋著。久而久之，許多人也不敢再喝水。我的腎在上一次三年勞教時就已經嚴重受損，身體內水循環能力特差，總是感到口渴。我只有付錢向組長買水喝，我還得另外付給組長一份上廁所許可費，乘「麻體」隊長不在時彎著腰偷偷地跑去上廁所。

「麻體」隊長來了，每天最恐怖的一幕展開了，一長串人像蛤蟆一樣蹲在那裏，等待「麻體」隊長毆打。棍棍入肉，撲撲聲響，伴隨著聲聲悲咽求饒：「求求您隊長，求求您隊長，我不敢慢了，我不敢再做次品了，我明天一定完成任務，饒了我吧，饒了我吧，饒了我吧！」那好像是從地獄深處發出的哀嚎，只要是人類，聽了都會心裏發顫。

「麻體」隊長不然，依然一棍接著一棍，棍棍入肉，撲撲聲響。「麻體」隊長要的就是這種感覺，要的就是這種效果，其餘沒挨打的人才會加緊幹活，給他帶來更多獎金。讓他可以去豪賭，讓他可以去找更多女人，在絕對專制制度的掩護下，充分體驗皇帝般的感覺。

我們是活的死人，我們被關在墓穴般的地下工廠裏，終年累

月牛馬般勞作。但是吃得比牛馬還差，睡得比牛馬還少，挨的鞭打比牛馬還多。

我們並沒有罪，和我們手裏做的葬花一樣，我們也是殉葬品，我們是極權暴政的殉葬品，殉葬我們的自由、青春、健康。

每個小時我們都難熬無比，那滋味就像你坐在擁擠的火車上，一天、兩天、三天、要三年以後火車才能到達下一站。痛苦的感覺時刻相伴，真的是度日如年。

尤其到了晚上，疲憊不堪，睏得要死，上眼皮直往下耷拉。你得拚命掙扎，不能讓眼皮闔上，否則來回巡邏的組長就會過來給你一頓痛打，讓你徹底清醒。兩隻手還得機械地操作，拚命幹出活來，明天還要面對猙獰的「麻體」皇帝。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年就是一千零九十五天，天天比坐在擁擠的火車上還難受，天天度日如年。

擁擠的、恐怖的、罪惡的共產主義列車！何年才能停下？何月才能解體？何日我們才能下車？

3·經典鏡頭：極左＋極右

大操場上黑壓壓地坐著幾千個衣著整齊劃一的人，主席台上紅旗招展，擴音器裏樂聲震天，各大隊教導員帶領大家唱歌，歌聲此起彼伏。「共產黨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五大隊唱得好不好？」六大隊教導員大聲問。「好——！」六大隊三百人齊聲回答。「再來一個要不要？」教導員又大聲問。「要——！」三百人又齊聲回答。

五大隊又唱起來：「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唱完之後，五大隊教導員領著大家高喊：「六大隊，」「來一個！」

「六大隊，」「來一個！」

這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共產黨幹部在開鬥地主搶財產大會？這是延安革命根據地的共產黨幹部在開發動內戰動員大會？還是北京的共產黨幹部在開慶祝武裝奪取政權勝利大會？

不，都不是。雖然內容和形式完全一模一樣，但這是廣州勞教隊、勞教人員在開一年一度的國慶大會。

我一直夢想把這一鏡頭拍給好萊塢，放給全世界人民看，作為經典鏡頭。不過這必須是一個分立式鏡頭，以上畫面只能占全景的一半，左邊一半，令全世界左派為之著迷的左邊的一半。

另一半，同時進行的右邊那一半，紅旗掩蓋下極右的那一半，鐵幕後面令人噁心、令人嘔吐的那一半，是這樣的：

同是那數千個人，衣衫襤褸，像一群鬼，在幾個陰暗潮濕的地下工廠裏奴隸般地幹活。「老臭蟲」教導員持一根高壓電棍，「麻髒」隊長和「飛毛腿」隊長每人持一根膠木大棍，正在瘋狂地電擊毆打他們腳下蹲著的一排勞教人員，就像毆打一群蛤蟆一樣。到處是鬼哭狼嚎的聲音，彷彿是從十八層地獄傳出的蛤蟆尖叫。其餘沒有被打的人個個毛骨悚然，渾身顫抖，面無人色。

這些蛤蟆都是未經任何法庭審判的中國公民，每天被強迫勞動十六至二十二個小時，從來沒有星期天。

他們反覆毆打的那些奴隸都是因為體弱、有病、年老因而完不成生產任務，給他們掙錢較少的弱勢群體。這個時候，這些隊長，都成了最殘酷的奴隸主，比現在世界上左派所能看到的最右的右派還要右一百倍，邪惡和殘暴比納粹有過之而無不及。

口哨聲響，全體奴隸換上乾淨整齊的衣服，排好隊去參加國慶大會之前，「老臭蟲」教導員窮兇極惡地訓話：「他媽的，

都聽清楚了，等下開大會的時候，統統給我作出笑臉，大聲呼喊革命口號，大聲歌唱革命歌曲。他媽的，這是革命任務，必須完成。他媽的，如果有誰像家裏死了人似地哭喪著臉，或者像快死了的人只動嘴唇發不出聲音，回頭我就叫他真死一回！」

「他媽的，各值班員、各組組長、勞教積極分子，都給我提高革命警惕，嚴密監視前後左右的人。發現有敢於違反黨和政府的命令，違反所規隊紀，做不出笑臉的抗改分子，回來後必須向我報告。我絕不輕饒，按照共產黨的一貫政策，打殘他！打死他！」

這是一個在前蘇聯連續播放了七十三年、這是一個在中國已經播放了五十四年、還在繼續播放的現實鏡頭。在近代史上，這應該是一個表現二十世紀人類苦難的永恆鏡頭。

左面是虛偽的面具，右面是殘酷的地獄。



第一章 核桃種子

神州迴盪著海嘯般呼喊：
真正的人，從羊群中站起來！

愛情像彩霞一樣燦爛，
為自由和尊嚴而戰！

不屬於任何領袖，
也不屬於任何主義。

我傲然獨立在原野，
內心沉著而堅毅。

——〈真正的人〉一九八八年十月主辦雲夢沙龍時期

世界上有幾千種花，幾千種樹。細分起來，僅僅菊花就有四千多類，松柏也有幾千類。植物的種類之和，可能有幾千萬幾億之多。與之相應，人類生命也是千姿百態的，表面上看起來差不多的人，其思想、品格、性情是千差萬別的。

我是一顆核桃樹種，生來就堅硬、頑強，無論環境多麼惡劣，無論氣候多麼冷酷，無論山地多麼貧瘠，我都能頑強生長，我都能刻苦思考，只要有一點陽光和一點雨露。

生性堅硬的性格，使我能抵禦共產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襲。我從來沒有出於利益的考慮，浪費光陰去學習馬克思主義歪理邪說，或去向掌握政權、控制一切資源的共產黨人諂媚。不管共產

黨多麼強大，多麼可怕！我寧肯失去一切，甚至生命，也要堅持真理。

專政奴役改變不了我，毒打虐待改變不了我，窮困潦倒也改變不了我。我像一枚堅硬的核桃，只要我的腦袋還沒被鐵錘砸碎，我的喉嚨還沒被鐮刀割斷，不管什麼時候，我還是我！

我常常回憶往事，分析我反共觀念的來源，是怎樣逐步形成的，我究竟為什麼會走上這個方向，走到這種地步。究竟是不對？還是共產黨錯了。

每一株植物，每一個生命，從誕生到成長，都經歷了獨特的道路。當我回憶往事，總有歷盡滄桑的感覺。

4·紅色恐怖的故事

記得八歲那年，我養了一條小狗。有一天我正在逗狗玩，打狗隊的幾個大隊民兵圍過來，竟然用三股鋼叉叉進小狗身體，舉在頭上開心取樂！

小狗的鮮血順著鋼叉往下淌，眼淚滴在我臉上。共產黨民兵們開懷大笑，舉著玩著走了很遠，小狗都沒有死，一直眼淚汪汪地看著我！

那幕情景我終生難忘。

一個人到商店裏買毛澤東的石膏像，那時候不准說買，因為已有很多人在這個字上栽了跟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這個人小心翼翼地用著新的革命辭彙對營業員說：「同志，我想請一尊毛主席塑像。」

「沒有了，同志，已經請完了。」營業員回答。顧客有點

奇怪，他明明看見那邊還有一尊。「同志，那邊不是還有一尊嗎？」

「呵，那個是壞的。」營業員隨口答道。

「打倒反革命分子，堅決保衛毛主席！」旁邊一個人突然喊起口號來，大家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於是店裏的所有顧客和營業員都爭先恐後的喊起革命口號來。

只有那個營業員面色蒼白，她已經意識到自己徹底完蛋了，儘管她一向特別小心。她立刻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用繩子捆起來，送到勞改隊喝稀飯去了。

南郊燕山鄉一個老農，有一天到市裏賣了一挑子菜，想到最近造反派天天到各家檢查，催促大家供毛澤東像，除了畫像之外，還得有塑像，否則就要拉去批鬥。老農咬咬牙，用賣菜得來的幾毛錢買了一尊石膏像。

那玩意兒挺大，回家的路又遠，老在手裏捧著又怕不小心掉在地上摔壞了。老農靈機一動，便用捆菜的繩子繫在石膏像的脖子上，拴在扁擔上，挑在背後，晃晃悠悠抄小路回家。

誰知剛到村口，就被造反派發現了，那幫傢伙一邊高呼口號，一邊圍過來抓老農。竟敢把尾大領袖毛主席拴著脖子吊起來！老農後來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送到勞改隊喝稀飯去了。

記得我十歲那年，我妹妹在學校裏被派出所民警帶走了，她只有八歲，才上小學一年級，我父母得知後當然很擔心。媽媽說紡織廠宿舍一帶出現反動標語，廠裏正在全面調查，人人都要過關。聽說那反動標語是有人用粉筆寫在廁所牆上的，已經調查一個星期了。爸爸聽完就愣了，他放下筷子就問，不會是我們女兒

寫的吧？

爸爸告訴我們他親眼目睹的一件事。那時他在駐蚌埠陸軍第36師南營房做木工，有一天也是發現了一句反動標語：「打倒毛主席」。全師追查，人人過關，個個驚魂。

後來有人揭發是團長六歲的兒子寫的，審訊時小男孩給嚇懵了，一會兒承認一會兒又否認，於是師部專案組便認定有人教唆，那當然應該是他父親。反覆進行車輪戰審訊之後，父子倆都被押去批鬥，團長當場幾乎就被打死，後被定為教唆進行現行反革命惡毒攻擊罪。

我們等了很久，妹妹才被送回來，看到她滿臉淚痕，父母十分驚慌，急忙問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妹妹抽抽噎噎地說，他們要她承認寫了反動標語，說已經有人看到是她寫的，筆跡鑑定證明也是她寫的，承認了就可以回家，不承認就要打她，還要關起來，永遠也別想回家了。為了回家，她承認了。

我母親特別害怕，急忙問：「那你到底有沒有寫？」妹妹低頭大哭起來。那天夜裏，我父母一直嘀嘀咕咕唉聲歎氣的，我也朦朦朧朧地感到大禍就要臨頭了。

一段日子沒有動靜。後來聽說有好多小女孩被迫承認是自己寫的，我已記不得後來專案組怎麼定的案，但那些日子給我和父母帶來的驚恐，大概會伴隨我們一生。

還有那些幼小的女孩，幾歲就被抓去審訊，沒有父母陪伴，威脅利誘，什麼供詞拿不出來？這種恐嚇對這些女孩心靈的傷害，怎麼可以估計？

紅色恐怖！惡夢般的紅色恐怖！多麼可怕！

初中時，我有一個要好的同學，有一天得意地對我說：「你的底細我最清楚，我從我媽媽那裏看過職工檔案，你媽媽是地主出身，你也算地主羔子，全班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哼哼！」

我頓時如五雷轟頂，回家就問媽媽，答案是肯定的。至少有一年之久，我一想到這一點就心驚膽戰。他從來不知道，那一句話給了我多大的傷害。從那以後，我就處處躲著他，再也不敢和他來往。其實他是個很好的人，他從來也沒有跟別同學說過這個秘密。

5 · 少年的記憶

在初中的最後一年，伴隨著身體的發育，我的頭腦也在急速變化，我開始對周圍的一切留意起來，鄰居、夥伴、同學、老師都成了我的觀察對象，我想知道他們每天都怎樣生活，為什麼活著？

我家住在紡織廠宿舍東大院老四樓，那本是一棟簡易的兩層集體宿舍樓，後來分給有兩個以上孩子的雙親家庭居住。每間屋十四點六平方米，一般人家都是四到七口人，平均每人只有二到三平方米，既沒有廚房，也沒有衛生間，連自來水都沒有。

那樣擁擠，各家的鍋都是支在走廊，煤也堆在走廊，又沒有燈，長長的走廊就變成了黑洞洞的地獄，大白天經過都會膽戰心驚，稍不小心就會一腳踢翻一堆東西。我們住樓下的，索性就在窗外蓋一間油毛氈棚子，既當廚房又當臥室又當餐廳，讓二樓的住戶羨慕不已，但是我們無論老小每天都要翻越窗戶過來過去，成了翻窗族，不知有多少次被摔傷！

那樣擁擠，大家幾乎天天可以聽到吵架聲，不是這家吵，就是那家打，一鬧鬧到深夜，煩死人了。

我們還不算最擠的，北面相鄰有一排簡易工房，每間只有九平方米，也是住一家人。那裏有我兩個朋友，我經常去他們的家，屋裏全是床，沒有櫃子，連一張吃飯的桌子也擺不下。他們全家人都是端著碗坐在床上吃飯，在門口支一口鍋燒飯，所有衣物日用品都是塞在床底下。

後來到清華大學唸書，聽我們的化學教授周忻說，他家老少三代七口人，年齡最小的都二十歲了，一起住在一間十二平方米的宿舍裏，我才知道，各個地方都差不多一樣擠。

後來認識幾個上海朋友，到他們家裏一看，那才叫擠，有的一間六平方米的宿舍竟然住了六口人，而且都是成年人，三對夫婦，平均每人一平方米！

我成天捧一本書看，看完後再對照周圍人們的生活，發現牛頭不對馬嘴，什麼黨的陽光沐浴下幸福的工人階級，幾乎全是謊言。我還記得許多名家的一些噁心文章，全是對共產黨的無恥歌頌，我就認定這些人是壞蛋，後來從不看他們寫的書，免得中毒。

對農民生活的描繪更離譜。我老家在五十里外的懷遠縣張大廟，我小時候在那裏過了好幾年，長大後每個暑假都要去過一兩個月，村民們家家戶戶都窮的要死。

記得有一次，我抓了一個白麵饅頭邊吃邊去找小夥伴玩，那三個小夥伴卻緊緊盯住我手裏的饅頭。我不知道怎麼回事，有點慌，就問誰想吃？結果三隻手一齊伸過來，饅頭被抓成碎塊，很

多掉在地上。三個人彎腰繼續搶，兩個腦袋碰在一起，後來兩個人打起架來，就為了一口饅頭！

後來我問奶奶，奶奶叫我以後不要在門外吃東西，她說只有城裏人才能吃得上白麵饅頭，鄉里人連黑麵饅頭都吃不上，有芋頭乾麵餅子吃就不錯了。北邊大老東家五個孩子，一年到頭只能喝芋頭稀飯，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吃一頓芋頭乾麵餅子，有個孩子吃得太猛，噎過去了，差點死掉，後來過年都不給他餅子吃了。

從來沒有一本書說過這些事情，開頭我很納悶，難道別的地方都像書裏說得那麼好，只有我們這個地方這麼差嗎？於是我就問父親，我父親是個遊方木匠，見多識廣，他說我們這地方還算好的，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

後來我又問老師，我的幾個老師都是下放農場勞動改造十來年才回校教書的，他們說各地都是這樣。安徽西北阜陽地區、皖南山區、大別山區比我們這裏還窮。大別山區的很多人家，大姑娘都沒有褲子穿，全家只有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

我對此有點半信半疑，那不是亂套了嗎？直到幾年後我去北京的路上和一個清華同學同行，他家是金寨縣的，我問他，他才向我證實，的確如此，他小時候親眼目睹的。很多人家裏只有一些爛棉胎，堆在上炕上，有外人來，家人便一起坐在爛棉胎裏遮羞。連吃飯的碗都沒有，全家只有一口鍋，燒上一鍋芋頭，一家人先圍著鍋吃，然後再牽豬來吃。

一頭豬、一口鍋，一條褲子，就是一家七、八口人的全部財產，真是可怕！

我看歷史書，好像人類幾千年，從來沒有這樣窮困潦倒過，而且能持續幾十年，共產黨真「尾大」！

那時我經常與政治課老師抬槓，一般高中老師都是老大學畢業生，唯有政治課李老師只是中學畢業，水平低下，而且蠻不講理。我團結我們重點班四個成績最好的同學經常與他辯論，有一次講不過我們他竟然要打我們！

我們就一齊到教務處告狀。後來他一上課，就問我們想不想聽，我們當然不想聽他胡說，他就把我們四個人統統趕出教室，罰我們站在門口，我們理都不理他，跑到陰涼地玩去了。

高中快畢業了，政治教師還說我們四個最優秀的學生思想反動，要送我們到學校在小黃山的農場去勞動改造三個月，雖然最後沒去，那幾個月裏我們還是提心吊膽的，不敢再隨便說話了。

一九七九年高考時，我剛滿十六周歲，還是在蚌埠考區萬名考生一舉勝出，奪得高考總分第一。儘管我的政治科目不及格。這可以證明我對共產黨的一套說教極端反感，我寧可犧牲分數，也不肯昧著良心胡說。

中國人所謂人生快事就是：金榜題名時，洞房花燭夜。在中國社會裏，考場如戰場，那可是人生的大關口。尤其是七十年代末，高考剛剛恢復不久，考場決定你是上大學當國家幹部，還是下放農村做農民的分界線，而我高考三天裏卻有很多波折。

第一天下午考物理，我一口氣就做完了題目，看看時間還沒過去一半，檢查兩遍也沒發現一點問題。出考場後別同學都說考題太難，沒法入手，我便暗暗得意。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一九七九年的物理高考題是最刁鑽古怪的，而我輕輕鬆鬆全

對了。

那天特別熱，晚上我就拿一張涼席，去長青公社衛生院宿舍二樓頂上乘涼睡覺。先是被熱樓板燙得睡不著，後來一時興起，我就與朋友講起故事來。一直講到深夜，我才想到第二天還要高考，必須睡一會兒。躺下來卻怎麼也睡不著了，耽心第二天的考試，我只得叫朋友跟我一起去紡織廠衛生所裏要點安眠藥吃。

但是大門門衛以夜深為由堅持不准我們入內，我們只得從別的地方翻牆頭進去，一看鐘已經凌晨四點了，醫務所阿姨挺好，給了我一片安眠藥。擔心早晨起不來，我就著自來水只吃了半片藥，再翻牆頭回去，睡了一個多小時就起來了。

沒睡好覺，麻煩就來了，趕到了考場怎麼也找不到准考證了。沒有准考證根本進不了考場，那是沒有一點通融餘地的，急得我一頭汗。

記得早晨父親親手把它塞進我褲子口袋的，我猜可能是丟在公共汽車上了，就打電話給汽車公司，那邊一聽說我丟了准考證就問我的名字，我報上名字，她讓我到馬路對面的車站等著。

我站在車站眼巴巴的看著公交車駛來駛去，直到一個售票員向我揮舞准考證，我感激地向她連連致謝，然後抓住准考證轉身跑向考場，考試鈴聲已響起來。

數學考題我也是一口氣做完，感到很暈，就想趴在桌上睡一會兒再檢查，誰知一下睡到交卷鈴聲響。後來與數學老師對題，才意識到有一大題的第二小題被我匆匆漏掉了，白白丟了五分，否則我的數學也是滿分。

6·西單民主牆

一九七九年八月底，我開始了清華大學的學生生活。很快，在新鮮感過去之後，我就對死氣沉沉的校園感到厭惡。那個時期，最讓我興奮的就是西單民主牆。

我懷念在西單民主牆前流連忘返的日子，我懷念校園民主運動時期貼滿清華三院圍欄的文章，那些充滿智慧火花的思想和觀點曾經令我渾身顫慄，不能自制。

記得那時每個星期天我一大早就乘331路公共汽車到平安裏再轉車去西單，從民主牆西頭看到東頭，再從東頭看到西頭，一直到下午肚子餓得咕咕叫才戀戀不捨地離開，大腦像雲海一樣翻騰，興奮之極，我常常要去喝一杯白酒。差不多就在那個時期，我的思想基本形成了，後來就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人的思想和觀念是在十三歲到十七歲之間基本成型的，和身體的發育同步。讓這個年齡階段的少年去死記硬背多半沒用的知識，實在是太大的浪費，這是一個人一生中思想最活躍，腦海翻騰最激烈，萬千問題都能湧上心頭的時候，應該讓他們去思辯，去博覽群書，去遨遊天下！

只可惜西單民主牆在一九八〇年春天就被取締了，當局說是遷往地壇公園，經登記後仍可自由張貼文章，真是鬼話。我沒有去過地壇公園，相信那裏也不能繼承西單民主牆。

那時許多人熱中於發明永動機，我也有過這種夢想，可惜找不到知音，還是在西單民主牆上看到一個永動機發明者的詩：「如果這個世界不可以永動，那麼是誰在推著月亮圍繞地球轉

動？又是誰在推著地球圍繞太陽運動？」

西單民主牆的歷史意義是巨大的，那是共產黨三十年黑暗統治之後的第一道曙光，預示著即將重新崛起一股嶄新的民主力量。民主牆啟迪了一大批人，影響了一大批人，並直接導致了幾個月後的校園競選運動和建立社團運動。

一九七九年秋天，在清華大學主樓前右側草坪上，小松樹叢邊。我穿了一件毛衣，左手緊緊握著一把未出鞘的匕首，右手拿著三本雜誌，那是當時中國最好的雜誌，是我每個星期天到西單民主牆看壁報時買的。記得雜誌裏有兩句詩：我哭豺狼笑，揚眉劍出鞘！我常想，總有一天我的劍也要出鞘。我以不同身姿照了三張這樣的照片。

先知教導我們，要一手拿著真理，一手拿著寶劍。

那三本手刻油印、紙質低劣的雜誌裏有一本名《百花》的雜誌，封面的各色花朵竟然是手工直接繪出的，可見那時出版民間地下刊物的人何其刻苦，何其堅韌！這樣手工畫每一本封面的雜誌恐怕全世界都絕無僅有。我把它推薦給同學們閱讀，但是他們沒有多大興趣。

記得雜誌裏有一篇寓意深刻的小說〈13號大院〉，說一個人因為好奇爬到附近的樹上看那個神秘的大院，之後便失蹤了。他的親戚，記者方成，到處找他。在到轄區派出所報案的時候，所長告訴他，這個所的破案率達到135%，那35%都是未遂案件，僅僅停留在腦子裏的，因此這一帶絕對不會有什麼失蹤案，不予立案。

方成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最後得出結論，親人失蹤於神秘的

13號大院。方成終於忍無可忍，鋌而走險也去看那個大院。結果發現裏面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但是當他轉身下來，那個派出所所長便帶人抓走了他，他也失蹤了。

我想作者暗示的，這個戒備森嚴的、神秘的13號大院，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共產主義殿堂。

幾天以後，班主任老師突然找我，問那些雜誌和照片在哪裏？我在中學時已受過幾回政治打擊，所以警惕性很高，我說丟了，我自己發現不好就丟了。

其實那些照片和那些雜誌我一直保存了好多年，直到雲夢沙龍時期還在，八九之後可能被抄家抄走了。

7·校園競選運動

西單民主牆被查封幾個月之後，校園民主運動開始了。一天晚上主樓後廳有一個演講會，名震一時的人才學家雷禎孝遲遲未到，學生們焦躁起哄之時，一位英雄跳上講台，大聲宣布：

「我的名字叫吳潮光，我準備競選學生會主席，結束歷屆學生會主席被任命的歷史。我希望每個同學都能從今天開始，珍惜自己手中珍貴的一票，把它投給能真正為你服務、為你效勞的人！」

「我希望很多同學能勇敢地站出來與我競爭，我們共同開創一個民主競選的時代，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現在是通過民主選舉落實每個人的權利的時候了，現在讓我們首先為我們自己選舉一位學生會主席！謝謝大家！」

熱烈的掌聲響起來，掌聲引來了大批學生和老師，大廳裏盛

況空前，門口和走廊裏都站滿了人，每個人都在使勁地鼓掌，直到另一位英雄跳上講壇。

「我叫趙國傑，我欽佩吳潮光同學的競選聲明，我回應他的號召，也站出來競選本屆學生會主席，接受同學們的挑選。明天早上，我會在三院貼出我的競選宣言。謝謝大家！」大廳又一次歡騰起來。我看到站在我旁邊不遠的走道的一位數學教授眼睛濕潤了。

第二天趙國傑果然貼出了長達七頁的競選宣言，大家紛紛跑去觀看，我擠了半天才擠到跟前看了一遍又一遍。整個校園沸騰了，第三天又有二十位候選人挺身而出，除了競選學生會主席，還競選海澱區人大代表，一時熱鬧非凡。

那時候我還到北大去串聯，可惜我的北大朋友是學共運史的，對民主運動毫無興趣，與活躍的競選勇士們毫無交往。當時王軍濤是競選勇將，一馬當先；胡平被稱為雙錘大將，一錘為民主，一錘為自由。相對比而言，當時北大的競選水平比清華高多了。

當時清華最有名的三位候選人有兩名出於我們工程物理系，吳潮光和林炎志。林炎志在文革時期是聯動的後勤部長，很有衝擊力的一個造反派頭目。林的口才很好，又有校方大力支持，作為官方推出的候選人，他有四十多人的競選班子，半夜兩點鐘了還到我們宿舍與我們辯論，為他拉選票。

我是堅決支援民主派吳潮光的，我組織幾個同學寫了一篇聲明，貼在食堂。但是後來，隨著校方的壓力越來越大，民主派退縮了，吳潮光竟然退出了競選，林炎志當選了校學生會主席，顧

立基當選了人大代表。

那場競選運動也意義非凡，也是共產黨三十年黑暗統治時期的第一次民主競選，從內容到形式真的跟民主國家競選領導人一樣，大家都很投入。我幾乎聽了每一場競選演講答辯會，學到了很多東西，也就在這場競選運動中，我的政治思想基本形成了。

可惜的是，整個社會沒有任何回應，競選運動只局限於校園，而且只進行了一次，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看到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有真正的競選，有一九八〇年秋北大清華那樣高水準的競選活動。

8·校園社團運動

競選運動剛告一段落，校園民主運動又轉向建立社團。經過西單民主牆的啟迪、競選運動的學習和觀摩，看到民主派的軟弱和退縮，我按捺不住要出擊了。

繼顧立基創建經濟管理愛好者協會，吳潮光創建書畫學社之後，我創建了歷史地理學社。我先物色了六名骨幹，然後就在校園內廣貼招收社員廣告，竟然有一百三十多位同學報名參加，我們組成了社委會。作為社長，我又任命了副社長、聯絡部長和組織部長，有模有樣地幹起來了。

因為我特別愛讀歷史，我的祖父祖母都是「講古」迷，「講古」在江淮地區的意思就是講述古代歷史故事。我幾歲的時候就聽過無數古代英烈的故事，像岳飛、呼家將、楊家將、荊軻刺秦王、隋唐演義等故事。我一向認為我們真正的知識來源於歷史，而共產黨卻硬把我們與歷史斷裂隔絕開來，肆意誣衊古烈先賢，

胡編亂造人類歷史。

我們那時候的理科生，從高一開始竟然就不再學習歷史地理知識，而專學理科。在我看來，這是對我們莫大的損害，所以清華學生在民運事業上的無為，與這種文理分科的做法有關。

那時我認為當務之急，就是彌補這些缺憾，大家應該多花點時間在文史哲方面，這是一個理智健全的知識分子根本不能省略的必修課，我們要做有頭腦的「人才」，而不是做工具式的「人材」。

大家有了歷史知識，自然有能力鑑別孰優孰劣，對於荒謬的共產主義理論，自然會有清醒的認識，無需別人教導。其實只要認真讀讀《論語》，就能夠看出儒家思想多麼恢弘，多麼深遠，比共產主義理論強得太多了。我高二時就在我二爹爹家裏讀了《論語》，而且從那以後每年讀一遍。

我們拒絕接受校黨委學生處和學生會的領導，堅持獨立自治。組織過幾次活動之後，校方覺得我們根本不受控制，就處處找我們麻煩。

幾個月之後形勢又變了，上面要求取締不聽話的社團，校方開始用力打壓我們。我當然全力抗拒，堅持自治原則，毫不退讓。校方便實行分化瓦解戰術，通過各系黨委學生組長、班主任找每個骨幹談話，施加壓力，最終拉攏過去幾個社委會成員，致使社團內部分成兩派，趨於分裂。

後來校方居然以我的成績不好為由，要撤掉我的社長職務。以共產黨員宋耀祖為首的親官方派也主張，為了社團能夠生存下去，我應該引退。那時我畢竟只有十七歲，書生意氣太多，各方

面都不成熟，無力與之相抗。我氣憤極了，只得辭職，最後乾脆要退學，在家人勸阻之下才改為休學一年。

後來我在大學裏認識的幾個不滿共產黨統治的異端分子下場都很悲慘。吳潮光後來被分到南京，專業不對口，鬱鬱多年，後來聽王軍濤說他到美國去了，還算走運；姜訊生最膽大，是當時最敢言、最堅定的民主派幹將，聽說後來被送到內蒙古勞教三年；佟永俊也被迫休學，返校後跟我一樣精神頹廢；成林和其他人都是慢慢走向死亡般的沉默。

9 · 螞蟻部落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清華大學，完全是一座工程師強化訓練營，每天從早到晚，都是密密麻麻的上課、自習、實驗，每個人都像工蟻一樣在教室、食堂、宿舍這三點一線裏周而復始地運作。整個大學就像一個螞蟻部落，其實當時整個中國也就像一個螞蟻王國。

按照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到毛澤東思想越來越精密的共產主義理論，每個人都是而且僅僅是一顆螺絲釘，比一隻螞蟻還要卑賤。因為螞蟻還是活物，還有七情六慾。而每個中國人只是一顆不合格的螺絲釘，所以要每天鬥私批修，爭取成為一顆合格的共產主義螺絲釘。

我實在不願做一顆螺絲釘，那跟死亡有什麼區別？我從小生長在工廠區，看到我的鄰居們每天像工蟻一樣操勞不止，上班、下班、做飯、吃飯、睡覺，感到無聊已極，空虛已極。看看現在校園的三點一線生活，何嘗不是同樣？

我實在不願做一隻螞蟻。我喜歡讀書，特別是歷史和人物傳記，清華大學圖書館閱覽室裏的每一本人物傳記我都讀過。那時大學裏的書很有限，尤其是文史哲方面的書很少，想看的書怎麼也找不到，令人苦惱。

但是即便如此，那些爛書還是讓我跟這個世界，整個人類，建立了聯繫。而且能夠對比分析，判斷優劣。我越來越認為，這個國家的一切都是反常的，違反基本人性的，比如我明明不願再學物理，想讀文科，卻怎麼申請也沒有結果。這個制度根本不允許每個人有選擇權，只要你成為一顆無生命的共產主義螺絲釘。

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溫情、熱愛、人性、良心，在這個國家，都是共產主義螺絲釘表面的鐵渣，必須清除或磨掉。

我恨這個制度，生命本來應該多姿多彩，如大海游魚，自由自在；如長空雄鷹，鳴傳千里；如湖畔仙鶴，悠然自得。我們卻為什麼非要做共產主義螺絲釘，一生都被死死地釘在一個地方，否則連飯都吃不上，只有餓死掉！

我恨這個社會，把斑斕五彩的生命，弄得都像灰狐一樣灰溜溜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還要千年不變！慢慢的我不再有興趣與這個世界的任何人聯繫，我特立獨行，走在荒無人煙，荊棘叢生的原野裏。

我對這座學校，對我的功課越來越厭倦，後來簡直是憎恨！尤其在西單民主牆被中共取締之後，整個國家、全體人民被迫停止了對前途的思索，我理想的前途頓時黯淡。

可憐可悲的螞蟻部落，可憐可悲的螞蟻生活，我必須擺脫掉！

我把美國詩人塞利納寫的一首詩抄寫在我的床頭，那是我大學歲月心境的最佳寫照。

我們的一生像是旅行，
在隆冬與黑夜之中。
我們在尋找自己的道路，
天空漆黑一片毫無光明！

10· 一次征招並指揮解放軍的經歷

一九八四年暑假，因為有點事耽擱，我沒有訂集體票，只好自己去買火車票。對於買票難我是深以為懼的，便託家住人民大學的同學查楊在人大售票點幫我排隊。他四點鐘去排隊，我六點鐘趕到，已是人山人海，到八點鐘售票窗口才開始售票，可見這些售票員老爺老娘多麼傲慢，從來不考慮幾千人在露天已站了幾個小時，而且成年累月如此。

八點鐘，附近已積聚了五千以上的購票者，本來由四個窗口延伸的單列隊伍這時已演變成四、五個人擠在一排的粗壯隊伍，就像細繩變成了粗麻繩，沿馬路拐向路邊，足有幾百米長。另外至少還有上千人眼看排隊買票無望，憑著身強力壯，索性不再排隊，硬往前擠，在窗口附近形成一大群。

幾個售票員見此情景，索性拒絕賣票，除非人群排好隊。幾個戴紅袖章的人，拿著喇叭筒呼喊，試圖維持秩序，但是人太多了，幾次嘗試失敗之後，他們就退回售票室了。已經八點半了，人群每時每刻都在增加，售票員更擔心擠出事來，甚至擠死人，堅決不賣票了。

我站在越來越粗的隊伍裏氣急敗壞，白等了幾個小時，渾身臭汗不說，明天後天恐怕還是這樣。我考慮了一下，決定檢驗一下我的威力。正好旁邊不遠有幾塊半人高的大石頭，我爬了上去，大聲喊叫起來：

「大家聽著！」所有人都驚訝地看著我，「這樣僵持下去我們誰也買不到票，我們從四點鐘就來排隊，我們已經白白站一個早上，還要白白站一天，甚至站到晚上也買不到票。現在沒有人能解決我們的問題，現在只有我們自己整理好隊伍，售票員才肯賣票！」

「我是清華大學學生，如果你們真的想買到票，就聽我指揮，規規矩矩排隊，我可以保證，大家最後都能買到票，就是晚一點也比白白站在這裏強！」

我吃驚地發現，在我說話時，幾千人居然鴉雀無聲，幾千雙目光緊盯著我。我激動起來，衝人群大吼：「你們願不願意聽我指揮？」「願意！願意！」人群幾乎齊聲高喊。

「那麼，我必須先組織一支維持秩序的隊伍，強制把隊伍整理整齊，那些服從我的指揮，帮助大家維持秩序的人，將優先獲得買票的權利。大家同意嗎？」我高聲問。

「同意！同意！」大家齊聲答應。

我站在大石塊上，可以清楚地看見有二十來個身穿軍服的軍人也擠在隊伍裏，有穿兩個上衣口袋的士兵，也有穿四個口袋上衣的幹部。「好！現在，我要求，所有軍人到我面前集合，組成糾察隊！」

那些軍人竟然毫不猶豫地從各自的位置走過來，站在我的面

前，我突然成了指揮他們的「將軍」！我要求他們自報身分，居然有一個營長，幾個連長，我讓他們每個人帶幾個低級官兵組成四個糾察隊，先清理窗口周圍，再分別整理四個隊伍。

看到這種場面，大部分擁擠在窗口附近的人就自動散開退後，或去後面排隊了。

有兩個軍人糾察隊工作很賣力，隊伍很快就整理得像個樣子了，售票員見此情景，已開始賣票。一個糾察隊動作很慢，而另一個隊伍碰到阻力，三個流里流氣的北京流氓死活不服從，軍人這邊把他們從窗口附近拉開，轉身拉別人時，他們又擠過去，幾個軍人差點跟他們打起來。

我知道我們不能真的動手打人，於是我就命令解放軍把那三個流氓帶過來，然後我溫和地問他們怎麼回事，為什麼堅持搗亂？他們似乎很委屈地說，他們三點鐘就來排隊了，剛才出去吃早餐了，他們必須買到下午三點多鐘的一班車票。我靈機一動，要求他們組成特別糾察隊，專門清理售票窗口附近想加塞的人，而我保證在十二點鐘讓他們買到票。

他們欣然同意了，而且比那些解放軍更賣力，也更有威力，三個流氓咋咋呼呼，連抓帶嚇，幾分鐘就把窗口附近清理得乾乾淨淨，我從此得出經驗，流氓更機靈，在動盪時期比解放軍更有用處。

後來順利得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解放軍官兵認真巡邏，禁止加塞。我幾乎沒有事做，便走下指揮台，問他們每個人的情況，逐個安排他們優先買票，他們都對我感激不盡。我再從隊伍後方補充新的糾察隊員入伙，軍人優先，流氓也用。沒有任何一

悲愴的靈魂

個人對我的權威表示懷疑，我第一次發現，原來中國人是不容易管理！而最聽話的，還是解放軍！

到十二點半左右，我去排一個丁大兵的連隊又等我繼續幹工作，然後我買了票就走了。但是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令我思考了很久很久。

我幾乎可以由此得出結論，共產黨是最無能的當權者，總是把一切都搞得亂七八糟。那些時勢性的領導和需要週以天應轉的上級領導機關，那些解放軍官員，那些曾六次在重慶帶領導的幾百個革命幹部，統統都是一群吃老飯的廢物。他們確實需要這樣的人去領導他們，才能解決最基本的問題，儘管我是一個二十一歲、戴著眼鏡、文弱的在校學生。

這段經驗對我以後在八九民運時期領導群眾學生鬥爭，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時候，我總是發出十分清楚的指示。我知道大家肯定會服從。事實上，指揮一群人，遠比指揮一個人容易得多，而且人越多，越容易指揮。因為那個時候，人群都失去了判斷力，在群體語言而產生的「神祕感覺」控制下，不得不受一個人指揮，只要指揮者稍加用心，從多不這，會動腦筋。

11·圓明園廢墟

無數個夜晚，我輾轉難眠，起身下床，出門散步。無數個黃昏，我獨自徘徊，在圓明園廢墟，荒蕪田園小徑，沉思著生命究竟有何意義？

春天，我走在雜草叢中；冬天，我在冰上漫步。失去春

來，一年復一年，我千百次地叩問天空，天空無言；我千百次地叩問大地，大地無語。

生命究竟有何意義？

我不能一走了之，去漫遊天下。我既沒有錢，也沒有自由。我只有份口糧，只能每天晚上睡在集體宿舍，一張雙人床的下舖。離開這裏，就再也找不到吃飯睡覺的地方。

我和這個學校裏的所有學生一樣，只是一個奴隸，一個可憐的共產主義奴隸。必須循規蹈矩，必須服從毛主席的教導，全心全意做一顆共產主義螺絲釘。否則就是叛徒，就是敗類，就會為同學朋友，乃至全體中國人民所不容，死無葬身之地。

那是一種青春的痛苦。我們沒有愛，愛是有罪的。我們只能愛毛主席，我們只能愛共產黨。我們不能熱愛真理，甚至也不能去愛一個女子。

那是一種生命的痛苦。特別是在閱讀的時候。想像著古代的英雄可以做一番事業，可以名垂千古，可以力挽狂瀾，而我們生在這個時代，注定了只能苟且偷生，蠅營狗苟，像一隻螞蟻一樣，為食物而活著。

那是一種思想的痛苦。特別是在思考的時候。因為我們的思想不能馳騁，不能自由地探索真理，否則後果難測。

那是一種靈魂的痛苦。周圍的人都麻木不仁，我是如此孤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生亦何懼？死亦何懼？

看來唯有將禍福置之度外，唯有將生死置之度外，或許可以

開闢一片燦爛的天空！我期待著，自己終有一天下定決心，把自己獻給正義事業，再也無所顧慮！

12·痛苦的思想歷程

那些年裏我和這個國家一樣徘徊迷惘，好像大海中失去了方向的航船。現實更令我迷惘，我找不到想要讀的書，我找不到能夠交流的朋友，我只能獨自思考。

後來，我好像看破了紅塵，覺得一切都空虛無比，人生就是一場悠悠忽忽的夢。尤其對於我們這些生在中國的人，注定了必須當共產主義螺絲釘，否則就會被無情排斥。那幾年裏我就像一隻孤魂野鬼，形容枯槁，每天都去圓明園廢墟的小樹林裏轉來轉去，思索著生命究竟有何意義？

沉重的思索和冷酷的現實壓垮了我的神經，我常常徹夜無眠。我不能聽課，只要一到教室，就漸漸沉睡，直到下課才醒。彷彿我的生命，還有我的思索將到盡頭。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所以那時支持我活著的理由僅僅是為了思考。因為我已厭惡生活，厭惡生存，尤其這種蠅營狗苟的生存。

我的大學時代幾乎都是在冥冥沉思中度過的，對我的專業——核子物理學越來越厭惡，因為它妨礙了我的沉思，甚至我一聽到開飯、上課、睡覺的鈴聲就頭疼。

我寄託希望的校園民主運動也被當局遏止了。我的哲學與政治思考離中國現實的距離使我越來越感到痛苦，後來就自然地滑入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思想裏，叔本華說：生命本身就是悲慘的，毫無意義的，我們注定是痛苦的。

的確如此，生命的局限性本來就令人類悲傷，現在我們又被加上共產主義枷鎖，我覺得生活在這樣一個思想極端專制的社會裏更痛苦更無意義。

後來我對一切都失去了興趣。一切都是荒誕的可有可無的。一切都沒有意義。活著或死亡也沒有多大區別。我就這樣渾渾噩噩地一過就是許多年。

我撰寫了一副對聯，寫在我的枕頭上：

「願將身懸九天外，
日曬雪沁三百載。」

一九八五年學校給我們這些厭倦專業的學生一個生存的機會，申請提前畢業，給大專文憑待遇，分配工作。

我感覺這是一個扭轉人生的機會，立刻申請並獲准。我選擇了回家鄉蚌埠，在分配工作委員會辦公室，我拒絕了到電大職大類學校教書，堅持到一家紡織單位，後來到了針織廠。因為我從小生活在紡織工人區，深深同情我母親和她的同事們的苦難生活，我想去搞經濟管理，通過一番作為改變她們的命運。

令我失望的是，廠裏隨便打發我到生產技術科，幾乎沒有任何事情給我做，連一張辦公桌，一把椅子都不給我。僅僅每月給我一份工資，僅僅要求我在辦公室裏東坐坐西坐坐耗上一天光陰。

後來在工廠待的時間長了，我才知道，這家工廠有一千名職工，廠部幹部、車間幹部加起來超過一半，幹活的人沒有坐辦公室的人多，所以大家很少事情幹，想幹也不讓你幹。這裏的大部分人為了不幹活，能夠坐進辦公室，都耗費了一生的才智，或

者靠送禮拉關係走後門，或者耍橫使潑靠資格。有學歷的人不到百分之五，而且被視為異類。

在工廠裏待久了自然更厭煩，在大學畢竟還可以找到一些像樣的書看，偶爾還可以有個朋友談談，在廠裏簡直沒有我待的角落，與任何人都找不到任何共同語言。這裏的人似乎都習慣了做共產主義螺絲釘，而且也願意一千年不變。

除了每月可憐的生活費，和全家人擠在一起的一間小屋子，工人階級幾乎一無所有，但是比起悲慘的農民兄弟，他們還是相對好得多。因為農民兄弟自解放以來已經悲慘到衣不蔽體，窮困到食不果腹的地步。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後，農民能夠吃飽肚子了，但也僅此而已。

工人還有布票可以買布做衣服穿，而農民按照計劃經濟理論，就該赤身裸體受凍挨餓饑寒交迫，所以工人階級也就感到不錯了。加上一場接一場的迫害運動，所有工人的膽子都給嚇破了，脊樑骨也都給嚇軟了，大家都是一副得過且過的心態。

確切地說所有中國人都被毛澤東和共產黨剝奪了一切，不僅物質上赤貧，精神上更赤貧。簡直就像一群赤裸裸的動物一樣赤貧。

僅僅赤貧還沒什麼，可怕的是道德上的墮落，很少有人去思考和關切其他人的命運，更少有人真正關心整個社會的命運，更沒有人願意在這方面付出代價進行努力，為大家指出一條改變命運的方向。幾乎所有人都是為了活命而活著。

而我寧肯餓死掉，或者受盡任何折磨也不願這樣活一輩子。僅僅一年後我終於離職而去，不再做共產黨的奴才，不再做共產

主義螺絲釘，從此與共產黨一刀兩斷。

而那樣一份工作，那樣一種幹部身分在一九八六年卻是中國的工人農民夢寐以求的，尤其是在安徽那個貧窮的省份。我父母氣得發瘋並與我決裂，所有的同學朋友也都認為我不可理喻。

12·雲夢沙龍

雲夢沙龍最早建立於一九八六年二月，創建人丁其彬是一個有著落魄王子風度的詩人，他辭去了捲煙廠待遇優厚的職位，用所有的積蓄在鬧市區租了一間門面房，開辦了雲夢沙龍。他迷戀歐洲文化，迷戀莎士比亞，尤其是十八世紀巴黎的沙龍文化。他一直夢想建立一個文化沙龍，為那些熱愛文學藝術和哲學思想的青年提供一個結識交流的陣地。

雲夢之名來源：安徽在戰國時期屬於楚，楚國有雲夢澤，最後一位楚王便消逝於雲夢澤，不知所終。所以此名有復楚復國復興之意。

雲夢沙龍很快成為蚌埠市前衛青年的聚會中心，我經朋友介紹給丁其彬，很快成為莫逆之交。從第二次聚會開始，我就自然的成為雲夢沙龍的主持人，招呼新朋友，介紹老朋友，主持討論。

本來我們打算一星期聚會兩次，但是天天都有許多人慕名而來，丁其彬又特別熱情好客，來者不拒，而且獻上一杯香氣撲鼻的咖啡。很少有人付錢，久而久之沙龍陷入了經濟危機，丁其彬咬牙支援，不改初衷，結果負債累累。

那時西單民主牆已過七年，校園民主運動也過五年，整個社

會新積累起一種煩躁不安的情緒。大家熱烈地討論著各自所見所聞的事，我們對於鄧小平的有限改革已感到失望。共產黨人總是說我們是猴子變來的，可是我們畢竟不是猴子。我們會思想，我們渴望真理，我們需要信仰。我們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活著？應該怎樣活著？這是一種精神的饑渴，人們吃飽肚子之後必然的追求。

共產黨人已經把人類幾千年來辛辛苦苦建立的精神文明徹底摧毀了，又拿不出任何可以令人信服的東西，只能把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已經腐朽的共產主義理論來糊弄別人。

雲夢沙龍的出現給了我新的希望，一到聚會的日子，我就興高采烈地主持活動，在嚴酷的社會環境下，我也調整了我的交友標準，稍微現實一點了。我一心一意想把雲夢沙龍往政治方面引導，我們逐漸建立了一個範圍很大的朋友圈子，至少有上千個青年參加過雲夢沙龍的活動。儘管後來迫於經濟壓力，沙龍關閉了，但由雲夢沙龍延伸的幾個政治性社團一直存在多年。很像西單民主牆時期的那些社團，以各種方式演化生存到現在。

記得一九八六年底合肥學潮的時候，我們雲夢沙龍的四個代表去參加一次蚌埠市各社團代表聚會，我們驚訝地發現，這些社團的領導和骨幹竟然都是沙龍的成員。大家都在議論這場學潮。有的人竟然贊成政府的觀點，認為鬧學潮耽誤了功課，造成了交通堵塞，影響了市民生活。我便起身發言：

「我們國家由於政治制度不合理，各級幹部瞎指揮所造成的浪費，足以抵上一億次學潮帶來的損失，有誰承擔責任了？中國人這麼窮是誰的錯？現在由於整個領導階層不負責任，年輕學生

不得不暫時放下課本，挺身而出，走上街頭，呼籲民主變革，能浪費什麼東西？」

「即使你寫一篇作文，還要浪費紙和筆墨呢！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大家該走上街頭討論了！只要能弄清正確的方向，不再糊里糊塗地走彎路，不再摸著石頭過河，再多的代價也值得！……」

此次活動的組織者擔心我把大家引向政治動亂，自己連帶承擔責任，便指派秘書長竭力打斷了我準備了一天而剛剛展開的演講，宣布聯歡舞會開始。這令我非常憤恨，那天原本可能動員學生回應合肥學潮的！

雲夢沙龍的高潮是在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那時候丁其彬又承包了一家大型酒店，有好幾個大廳，其中一個大廳被闢為雲夢大廳，擺滿了大沙發，迎接各方朋友。除了老雲夢沙龍的成員，又來了許多新朋友，也有大學教授和一些部隊軍官慕名而來，氣氛一天比一天熱烈。甚至有幾個美女也以到那裏坐一坐為時尚。

當地政府後來很清楚雲夢沙龍的作用，「六四」之後蚌埠市被抓被審的幾十個人，大部分都是雲夢沙龍的成員。學生只有一個被抓，被關了一個多月就放了。



第二章 地獄之旅

墓穴裏黑暗潮濕，
射不進一星亮光。

十億人躺在裏頭，
抱怨連連等待死亡。

我無法忍受窒息，
舉頭撞擊墓牆。

只是發出一聲尖叫，
灑下一片腦漿。

——〈墓中尖叫〉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於蛇口海灘

13 · 寧可餓死荒野

一九八六年七月，我再也忍受不了家鄉沉悶的、動物般空虛麻木的生活，就在辦公室裏留下一個條子：我決定辭去我的工作。

我發誓從此與共產黨正式決裂，一刀兩斷，然後就飄然而去。哪怕以後流落街頭當乞丐，寧可餓死在荒郊野外，我也絕不再做共產主義螺絲釘！

我不知道，拒絕做共產主義奴隸的下場竟然那麼悲慘，我竟然由此踏上了惡夢般的地獄之旅，比乞丐還悲慘，連做乞丐的權

利都沒有了！

我和張雷等三個朋友到了廣州，在三元里租了一間房子。為了立足，我們到處找工作，兩隻腳都跑腫了，也沒有一點影子。然後才明白，廣州也和內地差不多，幾乎沒有多少自由生存的空間。國營集體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內地一樣，另外的走私經濟是與政府官員有關係的當地人幹的，這兩個體系都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

眼看囊中日緊，無可奈何之下，我們只好去建築工地暫時棲身。工頭看我們身體單薄，好像沒幹過體力活，還不願要我們，後來勉強才同意留下我們試一試。那些建築工人都來自汕頭農村，看起來瘦瘦小小，肌肉卻比我們發達二倍以上。我們的任務是夜間清除建築垃圾，從晚上六點幹到凌晨七點，每天四塊錢，管吃，白天在工棚地上鋪一張草蓆睡覺。

我們把爛泥挖出來扔到手推車上，然後把手推車沿著小巷推到馬路上，最後一關：推車加速奔跑，衝鋒上斜板，衝上卡車，把爛泥倒在卡車裏。這一關很難過，特別是在連幹幾個小時之後，筋疲力盡，腰痠背痛，我低吼著衝鋒，眼看要到盡頭了，卻再也推不動了。那斜板細細長長的，如果用勁不勻，稍微歪一點，連人帶車摔下去，是很危險的。

第一個夜晚，我堅持住了；第二個夜晚，我也堅持住了，但是快到天亮的時候，我的腳被釘子扎破了。這根本不是一個知識分子能幹的活，我只好離開那裏，去找我大舅另想辦法。他是留日學生，五十年代就在廣東省煤炭廳當處長，但由於始終不肯加入共產黨，快退休了，還是處長。他被共產黨歷次運動搞得膽戰

心驚，一聽說我隨便辭了職就催我快點回單位，寫個檢查還可以保住公職，保住國家幹部身分。

但我決心已定，堅決不肯再做共產黨的奴才，即使餓死。我只好再到深圳碰碰運氣，我輾轉找到在蛇口當董事長的校友顧立基，他告訴我：深圳市政府已下令一年之內不得調用內地幹部。他請我吃了一頓飯，說聲對不起，我就走了。我連住旅館的錢都沒有了，只能坐在海灘上度夜。廣州的三個朋友還在等待我的救援，而我現在已走投無路，四顧茫然。

我坐在蛇口海灘，遙望對面的香港，浮想聯翩。我多麼渴望自由的生活方式，多麼渴望能夠有一份自由職業，不再做共產主義螺絲釘，不再做共產主義奴隸。可以自由地探索真理，可以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可以遨遊世界。

我徹夜與滿天繁星相伴。宇宙如此深邃遼闊，給我啟迪。生命是上帝所造，神聖不可褻瀆，凜然不可侵犯！我豈可忍氣吞聲，蠅營狗苟，甘願一生受共產黨奴役？

在曙光到來的時候，我終於打定主意：即使有淹死的危險，也要游泳到自由世界去看一看，有沒有擺脫共產黨奴役、自由生活的機會？何況我還有一個期待已久的願望，尋找並加入到一個反共救國組織裏去，使我的思想能有著落、能有結果，使我的生命能有意義。

我不知道深圳灣有沒有鯊魚，也不知道今夜有沒有大風大浪，更不知道我的體力是否可以支撐我游過去。我只是感到做共產主義奴才的屈辱，我已為此苦惱了十幾年，只要可以獲得自由，我什麼代價都可以付！

14· 逃出鐵幕

我走遍了那個漁村的大街小巷每一個雜貨店，就是見不到賣救生圈的。直到後來我壯著膽子問一個雜貨店主，他才告訴我：上級不准賣，怕有人偷渡！我的兩條腿都白白累瘦了。這難不倒我，找一塊木板不就行了。我在海邊找來找去，一塊木板也沒找到，倒是發現許多裝飲料的塑膠瓶子。

我回到漁村裏，吃飽肚子，買了一把橡皮筋，兩雙球鞋帶子。挨到天黑，我小心翼翼地走到海邊，揀了一些塑膠瓶子，然後用球鞋帶子紮成一排，再用橡皮筋接上，一個有彈性的救生圈就做成了。確信周圍無人之後，我扔掉一些東西，只穿一條合身的西裝短褲，套上救生圈，背上背包就下水了。

海上一片漆黑，確定了前面的標誌燈和後面的標誌燈，我盡量保持自己在這條直線上游。我慢慢的游動，警惕著四周。我不知道要游多遠，從地圖上看，大約七公里；也不知道要游多久，才可以達到彼岸。

不知道游了多久，我看到了深圳灣水電站一排耀眼的燈光，再看看對面的香港，好像還是那麼遙遠。我有點著急，便加快了速度。

又過了很久很久，抬頭前後左右看看，好像我的位置沒有變化。我感到迷惑，難道我正趕上漲潮？潮水推得我位置沒動？如果潮水這樣漲一夜，那我豈不是天亮了還在海上？

我更加用力，但是我自製的救生圈卻老是向後滑，我停下來解開橡皮筋扔掉，又緊了緊鞋帶子，繼續向前游，但救生圈向後

滑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我想了一下，我用力划水的時候，必定要收腹，身體直徑變小，這個問題不可能解決了，我只能以站立式慢慢向前游。

我感到很疲勞了，為了減少阻力，提高速度，就把背包裏特別重要的大學文憑取出來放進褲襠裏，又取出一雙拖鞋當划水板，然後扔掉了背包。再踩水立身看看四周，我的位置好像還是沒動。

又過了很久，再看看四周，我的位置好像還是沒變。我估計這樣慢慢游下去，到天亮也游不到香港。我終於下定決心，丟掉了礙事的救生圈，它已被灌進許多水，沒什麼用處了。這下可以游得很快了，我鼓足餘勇，奮力划水，這雙拖鞋竟然如此有用！以前游泳可從沒想到過。

又過了很久很久，我的兩臂痠軟，對面的香港還是遙不可及。而且我感覺肚子也空了，好像前胸貼在後背上，划水的動作也越來越慢。又過了很久很久，我感到自己快要不行了，實在沒有一點力氣了，自由世界依然遙遠，我開始後悔扔掉救生圈，沒有它眼看著自己就會被淹死。

我多次嘗試仰泳，這樣省力，但是不能避開海浪，一個浪打過來就可能灌我一口水，連灌幾口水之後，我只有改變姿勢。而且仰泳難以控制方向，使我最後不得不放棄這種姿勢，恢復以前的蛙泳姿勢，迷迷糊糊地向前游著。

好像有一根竹竿立在前方，我像遇到救命稻草，趕緊游過去抱住它，我不明白為什麼這裏會插著一根竹竿，幹什麼用的呢？我嘗試拔掉這根竹竿助我前行，結果是白費力氣。

一會兒我就感到冷，越來越冷，冷得我渾身發抖。真是奇怪，八月份的蛇口海灣，怎麼會這麼冷呢？可能是我的體能耗盡了，又停下不動了，所以才這麼冷。不行，還得向前游！既然這裏有竹竿，說明對岸不遠了。

又游了很久很久，又沒勁了，但是再也找不著竹竿了，我開始產生幻覺。我好像和中學同學在一起，他們大笑我怎麼只穿了一條短褲就來上學，噯，不對，是大學同學，是在頤和園，五一春遊，我一時興起，跳進湖裏游泳。現在我累了，可是我的同學們呢？他們坐的船呢？我的腦海裏閃過一些我曾經歷的生活片段，就像電影末尾的重播鏡頭一樣，我看到了我的媽媽、爸爸，我的大學，我的單位，雲夢沙龍。

亢！亢！亢！連噙幾口水使我驚醒，不知什麼時候我的手臂停止了划動。我看看四周，但已看不明白我究竟在哪裏。我絕望了，再也沒有一點力氣了，兩隻手臂像兩根麵條無力地滑動，甚至都不能保持頭腦清醒了，彼岸還有多遠啊？

迷迷糊糊中，我好像看到一條大船向我駛來，我得救了，管他是哪裏的船，大陸的也好，都比淹死在這裏強！

果真是一條高高的船！我游過去摸到了它！我伸手想抓住上面的船舷，用力一出水卻感到身體沉重無比，像面口袋一樣撲通一聲掉下來。接著就聽到亂棍敲擊船舷聲，然後幾把手電筒指向了我，我大喊救命，我多希望他們放一條繩子下來把我拉上去，我馬上就可以鑽進熱乎乎的被窩裏，再喝一杯熱水，還有熱乎乎的食物！

但是我撲騰了許久才有一隻黑救生圈扔下來。

這也是救命之恩，但是我恐怕永遠也不知道恩人是誰。然後我就趴在救生圈上慢慢的滑水，不知道什麼時候就睡著了。

醒來時天已大亮，我停在泥灘旁，定了定神，起身上岸。泥灘有齊腰深，而且泥裏不知有什麼東西老是劃得我兩條腿疼，也許是貝殼什麼的。我慢慢地上了岸，走到一個池塘裏洗了洗身上的泥污和海鹽，然後繼續往前走，我知道已到香港了。

這是我五次越境中最危險的一次。

15 · 難民的遭遇

我在海灘旁看見一個紅衣女子，便問她這是什麼地方？去九龍怎麼走？她只是看了我兩眼，一句話也沒說轉身就走了。我看見附近有條公路，就信步走去。沿著公路，我看到兩家小工廠，就問可不可以找份工作？一個老闆只是搖了搖頭，另一個老闆則耐心地告訴我，他不能僱傭我，因為香港政府已通過法令：凡僱用大陸偷渡者做工的老闆，一律罰款十萬元。

後來我碰到兩個小青年，一見到我就好奇地問我是不是偷渡過來的，當然是的，我還光著上身。他們立刻請我到一個涼棚下面坐，但是我們對話好像有困難，一個青年去喊了一個會說普通話的人過來問我話，我把我的情況告訴了他，他又用廣東話說給別人聽。

一個小青年拎來一些食品給我吃，好像是幾塊形狀不同的馬蹄糕，又給我打開一大瓶可口可樂。對於既渴又餓的我，這些東西真是美味已極。他們還送給我一件印有「英國石油」字樣的汗衫，並告訴我如果警察看見我光著上身會抓我的，最後他們又湊

了許多零錢給我坐車吃飯就送我走了。

我感到香港人是善良的，樂於助人的，在大陸，不可能有這種情況。經常出門的人都知道，假如你在地碰碰到一夥年輕人，首先你就要擔心他們來搶你的錢或者欺負你。

我喜歡聽台灣廣播和美國之音，以前是危險的，可能帶來麻煩的。我記下了一些香港的聯繫地址，與那裏聯繫上就可以參加反共救國工作，我把那些地址分散記在我的筆記本上，只有我自己才能看懂。但是我在海裏游泳，昏頭漲腦的時候，只想到快點游過去，把整個背包都丟了。

後來我想，至少應該留下那本筆記，而且我在下海之前，已經把它和畢業證書分別用塑膠紙包好了。另外還應該留下一件汗衫，否則一上岸就可能被警察懷疑盤問。那些地址丟了太可惜了，我努力回憶，終於想起來一個地址，是在港島皇后大道多少號多少樓B座。

於是我一路坐車，坐輪渡過去，好容易找到那個地方，問來問去卻沒有那個地址。我又打聽《星島日報》在哪裏，我記得那是反共報紙，最後總算找到了，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坐在裏面，我好不容易才向他說明我的意圖，他卻搖了搖頭，說他什麼也不知道，我只得非常失望地離開了。

找不到工作，又找不到反共救國組織，我一籌莫展，在街頭瞎逛，晚上就睡在公園的長椅上。我以前聽說如果跑到建築工地可以打黑工，但是一想到建築工地那麼費力的活，我有點害怕。畢竟我是一個知識分子，讓我成年累月地幹建築活，工資再高我也不幹，我的思想，我的頭腦不就全沒用了嗎？

我痛苦地感到，香港的繁華、香港的自由屬於受英王庇護的香港人，不屬於我們大陸人，我們即使逃到香港，也沒有獲得自由的機會。在大陸報紙雜誌上，根本找不到這方面的消息，絲毫不瞭解這種狀況。愚民政策害得成百萬上千萬大陸青年冒著生命危險偷渡香港，最後只是被遣返回去。

看來我們真想獲得自由，只有在我們的家鄉，只有與共產黨鬥爭，奪回上天賦予我們的、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

我的雙腿在海灘深泥中被劃傷多處，現在慢慢發炎腫脹起來，這樣拖下去得不到治療也不行。天亮時我無奈地決定，還是回大陸吧。我在廣州建築工地聽說，從香港遣返只要一天時間，送過深圳就放了，所以我就去找香港警察，讓他們送我回去。我在街上遇到兩個警察，便攔住他們說我是偷渡的，現在想回去。但是那兩個警察卻向我擺擺手，說他們已經下班了，讓我找別人。真奇怪！

後來我看見一個警署門口站著一個警察，便走過去跟他說，他聽完就一把抓住我，把我帶了進去。最好玩的是，一個小個兒，還有點對眼的警察問完我的偷渡經歷之後，跟我商量，「你找反共救國組織這一段我給你刪掉，免得你回大陸之後有麻煩，但是你也幫幫我的忙，說你是被我在大街上抓住的，好不好？」我只有答應。同時感到自己太誠實，竟然這麼相信香港警察，以為他們會幫我，結果差點惹上大麻煩。香港警察確實也夠狡猾的！

16 · 香港難民營

後來我被送到新屋嶺難民遣送站，那是用鐵絲網和木板搭建的幾排簡陋牢房，位於邊界山區裏。我被反覆詢問好幾次，有一個年紀很大的官員對我很熱情。後來我仔細回想，本來我可能有機會留在香港生活的。

一個英國人帶一個翻譯反覆問我一些核子物理方面的問題時，我很不耐煩，我估計他們是情報人員。一來我的大學專業雖是核子物理，我卻沒學多少專業知識，更沒有從事這個專業的工作；二來我已經不信任香港警察了，他們太狡猾了；第三我也覺得恐怕牽涉到我是否愛國的問題，如果他們把材料轉交共產黨，我就說不清了。

後來回到國內我才知道，當時香港當局特別關注大亞灣核電站，我猜測他們很想找幾個這方面的專業人員做情報員。

當天大雨，夜裏我們突然被驚醒，幾十個人渾身濕漉漉的被押進來，點名時許多人還被警察用腳踢。等到警察走了，我就問一個年長者怎麼回事，他說他本是越南華僑，還是小學校長。

北方共產黨一過來，就把他的家產全給沒收了。兩個兒子都去乘船逃亡，一個在海邊被越南共匪軍打死，一個出海後杳無音訊。大女兒被越南共匪軍輪姦後自殺，老夫妻不得不帶著剩下的小女兒也逃亡。總算逃出越南，逃到中國大陸。開始每人每月還能領到五十塊錢生活費，後來分了一點甘蔗地，就讓他們自力更生了。他教了一輩子書，哪會種甘蔗？想去學校教書當局又不准，後來只有組織一幫人再逃亡，想逃到一個沒有共產黨的地方。

大家集資兩萬元買了一條舊船，船開了兩天之後，發動機壞

了，怎麼也修不好，只有順水漂流，結果漂到香港海面上。本來他主張以他越南難民的身分去與香港當局談判，要求對方提供食物和淡水，幫他們修理好發動機，他們再走。但是那幫大陸人卻說到香港也不錯，往南去還不知道會到哪個國家，如果半路上發動機再壞了，大家就死定了。

最後八十多人決定偷渡香港，剛上岸就被圍堵抓捕，有一個人鑽進草叢裏，大腿都被警犬咬爛了。那邊的確有一個人是被抬進來的，腿上綁著很多繃帶，渾身是血，看來香港警察對待大陸同胞也夠兇狠的。

以前在大學裏，我受姜訊生影響，加上我的一個姨兄在越南戰場上雙眼被打瞎了，我是反對越南戰爭的。現在聽到這位老華僑的敘述，我感到這場戰爭該打，血濃於水。越南共產黨人完全是一夥畜生，統統打死也是應該的，罪惡太深重了！

這段經歷對我的打擊很大，看來這個地球上最大的民族——華夏民族，在世界上的處境實在太悲慘了，無論在哪裏都是受迫害、遭屠殺、受奴役；受排擠、受排斥、根本沒有一塊自由的家園。

我頭腦裏就產生了一個念頭，只要有一點機會，就不惜一切代價建立一塊華人自由家園，用大陸不堪忍受共產黨奴役的青年的熱血，和海外華僑的資金建立一塊華人自由家園。

所以兩年後我那麼熱切地與台灣人陳賜麟合作，提出瑞麗計劃，想在中緬邊界地帶的狹縫裏，武裝建立這樣一塊華人自由家園，作為復興華夏民族的根據地。

第二天，我們一起被送回深圳。

17·地獄驚魂

一九八六年八月中旬，我們大約一百個人，乘坐兩輛囚車，被押入深圳市民政局收容審查中轉站。我們先是像蛤蟆一樣蹲在大院裏接受搜身、分組，然後被帶進囚室。陰暗可怖的大囚室裏七、八十個剃著光頭的囚徒站在走道兩邊，看著我們十來個新囚徒，我們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隨著鐵門鏗噓一聲關上，有人命令我們排好隊準備過堂。然後四個人開始對站在最前的第一個人開打，那人還沒弄清怎麼回事便被打倒在地；接著是第二個，那人只挨了幾拳便唉喲一聲倒在地上，「這個傢伙裝熊」，有人喊道，「起來」，幾隻腳猛踢過去；第三個看起來身體最壯，他不敢躺倒，被打了很久。

第四個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只挨了幾巴掌；然後就輪到了我，我還沒有從驚恐中反應過來，便感到拳腳齊下，特別有一腳踢中了我的腿襠，令我疼痛難忍，不由雙手捂著，蹲了下來，我又挨了幾腳，總算過了關。

等到所有新來的人都被打了一遍，那個打人最兇的傢伙，大概是個頭目，大聲宣布：「所有人把你們藏的錢統統掏出來，否則要是被我們搜出來，至少得脫層皮！」果然有兩個人掏出了錢，都是藏在衣角或鞋墊下面沒有被政府幹部搜刮到的。

沒人膽敢抵抗，旁邊還有幾十個人虎視眈眈地站在那裏，誰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一起衝上來把你撕成碎片。後來那兩個拿出錢的人被安排了睡覺的地方，我們其餘的人被安排坐在廁所門口。

我這才仔細打量這間囚室，大約有六十平方米大，中間一條走廊，一端通向廁所，兩邊是水泥平台，不管怎麼睡，肯定睡不下這一百號人。我們只能挨邊沿坐著，看來夜裏也只能坐著睡覺。我向身邊的人打聽我們會在這裏關多久，旁邊一個眉清目秀的小青年告訴我：「可能一天，也可能一個星期。」他對我笑了笑：「這是我第六次到這裏。」我吃了一驚：「為什麼？」「四次因為到香港打工，兩次因為到深圳打工。」

他叫阿吉，汕頭人，家鄉很窮，從小出門到處打工，主要是幹建築活。一般幾個月就會被抓一次，收容遣送回家。他問我的經歷，我說：「因為我上次從蛇口游泳去香港差點淹死，實在不敢再去游泳回來，就去找香港警察遣送我回家。唉，早知道會關在這個鬼地方，還不如去游泳回來。」

「你可真有膽。」阿吉說，「蛇口那裏可淹死不少人。前幾年碰上大風大雨的夜晚，第二天能在海灘上見到幾百具屍體。」

我們在廁所門口不知道坐了多久，突然大家起身向門口湧，原來是開飯了，兩個幹部站在門口，手裏舞著棍子大喊：「排好隊！」「排好隊！」擔心吃不上飯的人在後面拚命擠，前面的人立腳不住，再被棍子打回來。也有從隊伍裏被擠出去挨打的。最後我總算領到一份糙米飯，上面有兩根小拇指頭大的鹹蘿蔔乾，實在難以下嚥，我只吃了幾口就丟下了。

天氣炎熱，我感到特別口渴，便問阿吉哪裏可以找到水喝，現在已經是下午四點多鐘，一整天我還沒喝過水。阿吉衝我搖搖頭小聲說：「在這裏別說話，會挨打的。」回到牢房他才告訴我：「這裏從不供應水，不管天氣多麼熱。等一會兒我去找找老

鄉，看看能不能弄點水喝。」

那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夜晚，我們擠坐在一起小聲說話，阿吉安慰我：「坐著睡比躺著睡要好，水泥台潮氣太大，直接睡上去會得風濕病。」他說，「在這裏第一件要緊事是盡量少挨打，這裏有許多精神病人和變態狂。坐在廁所裏的幾個人便是精神病人，他們老是挨打，睡在最前面的幾個人就是變態狂。」

怪不得我老是看見幾個人輪番去廁所打人，打得鬼叫，皮帶抽壞了再從別人那裏搶一根。「真奇怪，一般人都害怕精神病人，這裏怎麼反過來？」我忍不住問阿吉。「這裏是人吃人的世界，要麼打人要麼被打。精神病人多少有點智障，既孤立反應又慢，自然成了墊底的。」阿吉回答。

我看那幾個打人狂，每人占有一張床位置的地盤，鋪著很多衣服，他們有煙抽，有麵包吃，居然還有酒喝。阿吉說：「如果走運，他們一天就能搶到幾千塊錢。送給幹部一些，馬上就能走人。」「這樣打人搶錢不犯法嗎？」我懵懂地問。「犯法？犯誰的法？這是中國政府機構！打死人都不犯法，打傷打殘搶錢當然無所謂。最多關幾天禁閉，家裏拿些錢來就擺平了。」

阿吉說得對，後來我見得多了，慢慢體會，仔細想想，的確如此。我們的國家制度也根本上類似。虐待狂+受難者+心驚膽戰的群眾=中國。

但是有一個問題阿吉說不清楚。就是為什麼那些人老是打人。難道僅僅是為把拳頭練硬嗎？或者是發洩一般情況下不能發洩的對人類的仇恨？

直到很多年以後，在勞教隊磨練幾年以後我才明白：那是一

種擔心被別人取代的恐懼；那是一種沒有任何合法性從而需要時刻證明的權威；那是一種一開始就違法而且始終違法的權威。不這樣做不足以構成對群眾的威懾。

再回想歷史上，為什麼共產黨要搞一場接著一場沒完沒了的運動，始終不斷地把大批人抓進去，關在監獄裏無休止地殘酷折磨，我才豁然明白過來。本質完全一樣，只是加上了共產主義理論。

18·水深火熱

第二天我們就被轉押到樟木頭，樟木頭收容站構造和深圳的相似，伙食也一樣，每天兩頓糙米飯加鹹蘿蔔乾。只是這裏的血腥氣味更濃，我們幾個人被押入牢房的當天，就有一個東北人在過堂時不堪毒打，英勇反抗，被打倒在地，再也沒有爬起來。即使已經爬不起來，那幾個河南人仍然時而去踢他幾腳。第二天他就被抬走了，後來再也沒有他的消息。有人說他死了，有人說送他去醫院了，我更加膽戰心驚。

阿吉告訴我，他在樟木頭收容站認識一個幹部，馬上會給他老鄉打電話來接他。他去香港之前就把一筆錢、一張沒填日期的派出所介紹信給了老鄉。到了樟木頭我們就被分開了，晚上我才看見他被安排睡在鐵絲網牆另一邊大院裏做大差。他託人遞給我一瓶水，我和剛認識的貴州阿文分享了。感覺好極了，怪不得有人形容水是甘露，儘管這瓶甘露還帶點泥。這裏根本就沒有自來水。

我和阿文背靠背共度艱難。阿文是貴州遵義市百貨公司的

職工，因為指責領導貪污被停職檢查，連工資也不發，他到處告狀，一直告到省會貴陽。去商業廳、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協，都跑斷了腿，一點用也沒有。絕望之下，也想到香港謀生，在邊境上就被逮住了。

他愁眉苦臉的，一個勁地說他被押回去之後肯定很慘。離開家去貴陽告狀之前，就聽到風聲，單位要送他去勞動教養。他的母親受不了這份打擊已經病倒在床，他的母親沒有工作，他還是頂替他病故的父親才有這份工作。現在工作丟定了，怎麼吃飯？女朋友也告吹了。一切都完蛋了，想死又怕死，也不知道怎麼去死。

我簡直不知道怎樣去安慰阿文，我自己對前途甚至生死都很茫然。我的腰被踢腫了，動一動就疼得要命。也不知道內臟是否受傷，明天能否再站起來，一晚上只能僵坐著。

我開始懷念大學的生活，雖然精神上苦悶，但沒有肉體上的折磨，飯菜也可口，宿舍也乾淨，許多事還可以商量，老師同學都很和藹。哪像這裏，什麼都沒得說，只能像條狗蜷縮在臭氣熏天的角落裏，連水都喝不上，純粹是人間地獄。

這難道就是這些人的命運？我開始後悔自己整天沉湎於哲學與政治思考，總認為這個社會制度不好，人民太貧困，應該實行民主制度，或者至少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我從沒聽說，更沒想過中國社會還有這麼黑暗這麼恐怖的地方，而且是民政局！這就是人民的政府為人民辦的政務嗎？

中午陽光透過鐵窗射在牆壁上，布滿血污的牆壁，骯髒而令人噁心。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經在這裏被打傷打殘，血濺四壁，甚

至被活活打死，永無聲息。

我讀過索爾仁尼琴的一本描繪一個勞改犯一天生活的書，印象中西伯利亞勞改營只是有點冷、有點餓、有點孤寒，哪裏能跟這裏的殘暴與苦難相比，這裏才真正讓靈魂悲愴！

每天只有開飯的時候我們才可以短暫地走出牢房，在大院裏集合。我看到將近一千個人，像一千隻蛤蟆一樣蹲在地上，幹部們拎著棍子走來走去。中國有將近三千個縣市，每個縣市都有一座民政局收容所，每天都有人被押進來，贖出去，像做蛤蟆生意一樣。

我感到由衷的悲哀！這些人，真的被當作人嗎？這裏完全是赤裸裸的野獸世界啊，人類文明的所有痕跡都蕩然無存。這些共產黨幹部，幹著這樣的醜惡勾當，他們的人性呢？我們的處境比豬都不如！豬還可以吃飽睡足，有水喝，不用挨打。可憐的中國人啊！只是共產黨幹部腳下苟延殘喘的螞蟻！隨時可以一腳踩死你！

此後的一個星期裏，毆打和哭嚎聲時時衝擊耳膜，我每天都像在油鍋裏受煎。在廣東炎熱的夏天，在擁擠不堪的牢房裏，沒有水喝是特別難過的，口乾舌燥，胃裏像火燒。三天以後頭就懵了，渾身無力，加上傷痛，簡直像但丁《神曲》描寫的地獄。現代中國的人間地獄啊，殘害了多少生靈！

胡錦濤、溫家寶能夠果斷地結束收容制度，其意義只有幾十年來數千萬受過它傷害的人才會明白。但是我們不要高興得太早，可能很快又會變相恢復。

大家也許記得，在喬石當人大委員長的時候，中國結束了公

安局的收容制度，公安局收容站變成了刑事拘留所。刑事拘留法定只有七天關押期限，但是現在只要你被關進去，儘管你沒有罪沒受逮捕，三、六、九個月能出來就是幸運的，許多人甚至被拘留兩年、三年、四年。

你必須承受這無端折磨，因為辦案人員需要較長的時間勒索錢財，哪能輕易把肉票放了或交給檢察院。一切都是為了使人民群眾永遠保持貧困，永遠保持恐懼之心，使紅色江山代代相傳，永不褪血色。

19·廣州收容站

我們從樟木頭收容站被轉押到廣州民政局沙河收容站，這個院子很大，還有一棟兩層樓。可能由於我是偷越國境被遣返的，把我關在小囚室，裏面只有五個人，破例沒有人打我。號長是一位老先生，身材十分魁梧，他遞給我一張草蓆，一個飯盆和一雙筷子，然後與我攀談起來。

老先生已經八十五歲了，本是胡宗南的部下，一位老班長。後來在一九四七年遭共軍打傷後受俘，被迫成了解放軍。他對共軍的一套歪理邪說很厭惡，尋機逃跑了，一直跑到河南才找到國軍，重新加入。後來又到山東作戰，大腿上挨了一槍，在傷兵隊又成了俘虜。他年齡大又傷得很重，就放他回家了。

誰知傷還沒好，當地政府又把他抓了，以叛徒加兵痞的罪名判他無期徒刑。他不服，連連上書抗議，引用的都是共軍以前的宣傳說法，後來倒成了永不減刑的抗改罪證。一直關到一九八四年因為年齡太大才給放了，回家後才知道，老婆孩子早給當地政

府整死了。

他實在不服氣，硬要到聯合國去告狀。於是一路乞討，從家鄉河南步行去香港找聯合國機構。在深圳特區檢查站就被攔住，押到收容站，一路轉押到廣州大尖山收容勞改隊，勞改隊一間八十四歲了，無親無故，又榨不出油水，所以堅決不要。只好轉押他回河南家鄉當地公安局，公安局也不願再關押。他一出門又往香港去了，當然又被抓進收容站，這回已經是第四次了。

每天早晨起床後他就叫我們做體操，說是練好身體將來跟共軍作戰，然後就唱國軍軍歌，國民黨黨歌。我們都怕得不行，一個廣東青年勸他別唱，別給大家添麻煩，找打。他勃然大怒，起身晃動雙拳：「想堵我的嘴，來來來，先與我血戰一場。」

有時他唱得太響亮，收容所幹部也過來罵他：「老不死的，關了你三十多年都關不好你，你就死在這間牢房裏吧。」他就騰身而起，雙手抓住鐵門，高聲回罵，喊打喊殺。說實話，在我前後斷續八年的囚徒生涯中，再沒有碰到過比他更勇敢的反抗暴政的英雄！

廣東的蚊子太多，咬得人又痛又癢，我們又沒有任何防護，忍不住癢，只有用手抓，然後就會起膿包。幾十個膿包慢慢變大，更痛更癢，越抓越毀，最後全身潰爛。

有的膿瘡要持續幾個月流膿流血，怎麼都治不好，現在我腿上幾個銅錢大的黑斑就是那時留下的。收容站根本不給治療，理都不理你。我第一次碰到這種病，很憂愁。老先生勸我，沒事，死不掉，打幾針青黴素就好了，這裏不會給你打，到了勞改隊也許會給你打。

我實在無顏給父母寫信讓他們拿錢來贖我，只有硬撐下去。另一方面，我也確實想切身體會一下這些人的命運。從十三歲上高中開始，我就關注周圍人的命運，我在異常擁擠的紡織廠宿舍區長大，對勞累過度的紡織工人特別同情，她們一年到頭三班倒，發燒到三十九度領導都不會批准去看病。不僅沒有假期，還要無償加班。

以前只知道工人很苦，也知道農民更慘，現在才知道，不肯做馴服的奴隸，不堪地方官員壓力出門謀生的人才最悲慘！

戶籍制度其實是一種現代化的奴隸制度，每個中國人都像勞改犯一樣生活，僅僅是吃的好壞不同形成階級而已。每個人都必須在各級黨委的安排下艱苦奮鬥，永遠貧困。

你還必須與你的同事鄰居幾十年相處在一起，而我們知道，相互排斥相互厭惡是人類生命本能之一，人們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整個社會也必須保持一定的流動性，所謂「流水不腐」。否則人們相互之間日積月累的摩擦，就會演變成不共戴天的仇恨，最後鄰居之間彼此全是恨之入骨。

由於中共這種奴隸社會管理模式加上挑撥離間，煽動仇恨的馬克思主義；挑起鬥爭、殘酷鬥爭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以及脅迫多數人殘酷鬥爭少數人的不斷革命的毛澤東思想（廬山會議是最好的註腳）。形成了滾滾洪流，淹沒了中華大地，弄到家家反目、人人自危、個個膽寒的程度。

中共中央委員會更是充當全國人民的楷模，毛澤東、張國燾、王明、劉少奇、林彪這些「親密戰友」幾十年如一日鬥得你死我活。全中國的幹部群眾雖然被迫嘴裏喊著學雷鋒王傑的口

號，心裏卻在琢磨中央領導的鬥爭經驗和鬥爭手段，怎樣說謊騙人以及怎樣誣陷他人可以置其於死地。自古言教豈如身教？

收容站關押的人本來都是中國社會矛盾的受害者，這些人寧願迴避矛盾鬥爭而另尋生存之道，卻被民政局關進監獄，而且是異常擁擠地關押在一起，其必然相互仇恨相互殘害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因為所有人都被逼到了生存底線，僅僅為了能夠在晚上睡覺時可以平躺下身體就得年年鬥月月鬥天天鬥。

蚊子、傷痛和膿瘡折磨著我，比這更痛苦的是靈魂的痛苦。我們究竟傷害了誰？攻擊了誰？犯了什麼罪要受這種折磨，這種虐待？沒有，我們沒有傷害任何人，沒有犯任何罪。我們只是不想做奴隸，只是不願參加共產黨的革命隊伍，去幹傷天害理的事情。我們只想自由地工作，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尋找真理，自由地選擇信仰，盡人道天壽而已。

有天上午，我們看見幾個大差抬著一個滿頭滿臉血的人過去，中午打飯時大差告訴我們，一個東北人被幾個幹部打急了，從二樓上跳下來，正好摔到頭，死了。

老國軍大怒：「又是一筆血債！早晚要還過來！」我急忙插嘴問：「這裏也和樟木頭一樣無法無天嗎？」那個大差鄙夷地看了我一眼：「哪個收容站一年不打死幾個人？你以為廣州會例外，哼！過幾天就要送你們到大尖山了，到那裏去長長見識吧。」

後來我看到孫志剛被打死的新聞一點也不驚訝，因為十七年前我已切身體會了收容站的一切。幾十年來在收容站被打死的人不計其數，誰也沒法統計。當人們驚歎中國出口加工業的快速增

長時，只有很少人意識到，這個社會在很多方面是原始社會。

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都是現代文明不可缺少的載體，幾乎和鐵路公路航空水運一樣重要，都是人類文明的大動脈。人民需要這些交流平台討論和解決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從高深的宗教哲學問題，到什麼樣的青菜農藥激素含量太大不能吃的問題，千千萬萬的問題，都必須討論交流。而中國動脈傳輸的幾乎都是謊言和有毒垃圾，毒害和欺騙著一代又一代人。這些人又怎麼可能建立文明社會？

我們每個中國人都生活在原始沙漠裏，我們什麼也不知道。幾十年來沒有人知道收容站裏的任何事情，除非你在那裏生活過。我們也不知道我們這個圍牆社會裏每一座圍牆裏的任何事情，即使在你身邊的幾個院子也如此。因為各級政府和每個單位都是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價使用專政工具刻意封鎖真實的消息。一切真相都被蓄意隱瞞，一切都是國家和單位的機密。膽敢洩密，隨時可以把你痛打一頓或者投進監獄。

所以我們愚昧和野蠻是必然的，積累下去還有更苦難的深淵在等著我們。

20· 人間地獄

在沙河收容站的最後幾天裏，因為老是睡在水泥地上，受了涼，我犯了急性支氣管炎，發燒咳嗽哮喘，難受極了。這種病拖長了可能轉為慢性支氣管炎，可能一輩子都好不了。我每天數次報告要求治病，老國軍也幫我吶喊，根本沒人理我。忍無可忍，我絕食抗議。絕食兩天以後，幹部喊我出去，我以為是給我看

病，卻被一車押到了大尖山收容隊。

生命是脆弱的。一般人即使在自由狀態下想保持健康都不容易，何況在失去自由，生存條件極其惡劣，以及被蓄意虐待的情況下。關押你的機構毫不承擔責任，甚至根本不給你治病。你留下病根，留下殘疾，乃至死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每一次被關押都在我身體上留下一種惡疾，而且終生不癒。

孫志剛在收容站醫院裏被打死，其實相對而言，醫院的生存條件還是最好的，幾乎是收容人員的天堂。最壞的還是收容隊，即收容人員勞改隊。

人們甚至還不知道這是什麼概念，就是附屬於收容站的勞改隊，在收容人員的家屬沒有及時交納贖金的情況下，就把你送去勞改，掙的錢好夠押你回老家的路費。名義上是這樣，其實錢都讓幹部私分了，路費最後再向政府報銷。一般要勞改三個月、六個月甚至一年。不管白貓黑貓，榨出錢來就是好貓。

根據我的體驗，在司法系統勞改局、勞教局；公安系統收審站、看守所、戒毒所；民政局工讀學校、收容隊三類七種勞改系統中，民政局收容勞改隊是最黑暗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它毫無任何規範，甚至是完全違反中國法律的。

但是無論你在那裏受過怎樣的虐待，你都不可能提起訴訟。到中國任何一家法院裏打聽一下就知道：法院根本無權受理這些部門以及計劃生育委員會等等政府部門訴訟案件，除非中央領導特別批准的個案。

孫志剛被打死案，家屬多方控告無門，全世界都知道了，全世界都譴責也沒用。後來還是在一個政治局常委，兩個政治局委

員的批示下法院才受理。也還是關起門來黑箱作業，找幾個替死鬼而已。

廣州市民政局收容勞改隊的對外名稱是「廣州市民政局大尖山茶場」，一九八六年時有六個中隊。每天從天明到天黑不是採茶除草就是挖溝施肥，帶隊管理人員拎著棍棒和鞭子轉來轉去，發現誰的動作慢一慢就毒打一頓，回去還要剋扣米飯。

本來我們的定量是早晨二兩米稀飯，中午晚上四兩米乾飯加一點鹹菜，幹活慢的人只有一天三頓稀飯，鹹菜都不給一點。我是讀書人，哪裏能幹得快，隊長看我是大學生，倒少打我，但讓我天天喝稀飯。從來沒有一天吃飽過，整天餓得心慌慌。

我們六中隊有個汕頭小孩的胳膊被打斷了，既不給治療也不釋放。隊長勒令他，不准跟任何人講話，否則再打斷他另一隻胳膊。我在廁所裏聽到他說這件事都驚呆了，問他怎麼辦，他說只有殘廢了，他只有十五歲啊！以後的日子怎麼辦呢？將近二十年過去了我還清晰地記得那個男孩的模樣，蒼白秀氣，很像中國民主黨領袖王有才。

汕頭小孩膽子太小，我讓他去找場長告狀他都不敢。後來我找機會告訴了場長，場長把他叫去說，胳膊打斷一個多月了，現在放你回去也沒法治了，這裏打死人都沒事，沒打死你就不錯了。場長答應跟隊長說一聲，讓他不用幹活了，每天也拎著棍子看守別人幹活，防止有人逃跑，表現好的話一個月後放他回家。

他後來居然也拎著棍子，吆五喝六地要人趕快點幹活，簡直把我活活氣死！愚民政策多麼可怕的後果！打死孫志剛的收容站醫院的八個病人，個個都挨過幾頓打，但他們轉身就去打別人，

這就是中國特色！

每天在茶園裏看著這幅悲慘的奴隸勞動景象，就會讓我想起中學政治課本的一頁，一個奴隸主拎著鞭子站在一邊，一群奴隸在彎腰幹活。

按照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奴隸社會是人類擺脫原始愚昧狀態之後的第一個社會形態，然後是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可是眼前的情景卻比任何理論都更加雄辯地證明：這是一個奴隸社會，我們已經被拖回到奴隸社會！

饑餓、毆打、虐待，這一切強烈的刺痛了我，深深地激怒了我。把我從以前虛無縹緲的冥想世界裏猛烈地擊回殘酷的現實世界中。而到了這個時候，我似乎突然看到了黑暗夜空中的一道閃電，使我能夠把我以前所有空洞的思想與現實世界緊密地結合起來。

生命的確本無意義，完全在於每個人自己的定義，現在我終於找到了我的定義：徹底投身於反抗奴隸制度的鬥爭中去！用頭顱去頂住倒退的歷史車輪！用眼淚用汗水用鮮血去寫一首爭取自由之歌！

像俄羅斯民族英雄丹柯那樣用手把自己的心臟掏出來，舉在頭頂，變成火炬，為黑暗中苦難的人民照亮前進的道路！

化身為愛和勇氣，抵死捍衛人類的良心！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主旋律在我腦海裏轟然迴盪，向黑暗勢力宣戰，與黑暗勢力抗爭到底！

從那天起，我就徹底改變了。但我沒有想到，這條道路這麼

然迎面碰上兩個巡邏隊員攔住我們。狹路相逢勇者勝！我的頭一懵，氣急敗壞就舉著鋤頭衝過去，兩個巡邏隊員嚇壞了，他們只有木棍。他們稍稍遲疑了一下，我和山東人就衝了過去。跟在我們後邊的河北大漢沒有武器，被巡邏隊員一棍打翻在地。我們顧不上了，拚命向南面的山區跑去。

山東人的體力好，跑到我前面，而且把我越拉越遠。我看看後面，四個人窮追不捨，離我越來越近。我本是書生，又天天挨餓連連生病，越跑越慢。那個中隊長一馬當先，離我只有十幾米了，眼看要抓住我了，我羞憤交加，索性跳進了路邊的湖裏。他們從四面圍住我，但誰也不敢下水，對峙了一會兒，場長也帶人趕到了。

他們要我丟掉鋤頭上岸投降，可以不打我，若等到他們下水來捉我，我就死定了。我考慮了一下，四面被圍，確實逃不出去了。山東人已經跑遠了，他們已經放棄了追趕。我把鋤頭丟給他們，慢慢走上岸去。

我上岸剛站穩，幾根棍子便打過來。我大怒：「講過上來不打的，要不然我在湖裏就跟你們拚命了！」他們哈哈大笑起來，中隊長大叫：「大學生就是特別！挨打還有話講，告訴你這叫痛打落水狗。」場長說：「算了算了別打殘了，這些知識分子不經打，以後還會沒完沒了告我們的狀。」

他們把我押到全隊人面前，那個河北人已被打得滿臉是血，跪在地上。他們命令我跪下，我昂起頭：「打死我也不跪！」我又挨了幾棍，但終於堅持沒跪。

我和河北大漢被關進了禁閉室，穿過兩道鐵門，進入黑乎

乎的小房間，好像只有走廊那麼寬，正方形的，反正除非你個子特別小，橫豎躺下來你伸不直腿。河北大漢被打得夠嗆，蜷曲在地上一言不發。我也感到抱歉，都是我的主意。我的頭也被打腫了，鼓起一個腫塊。不過我們最擔心的是，還會受到什麼樣的懲罰？

我們蜷曲在地上，一直到隔天上午聽到鐵門響才爬起來。走廊裏進來很多人，其中有兩個人被塞進我們號。一問得知，他們也是因為逃跑。夜裏他們六個人輪流在床下用鐵釘挖牆洞，挖下來的牆灰裝進衣兜扔到廁所裏。挖了兩夜都沒被發覺，不知今天被誰出賣了，剛出工一會兒就被帶回來關進禁閉室。

他們是湖北沙市人，在深圳打工，幾個老鄉一起喝酒喝多了，坐在路邊的草地上聊天。一個民警帶著四個保安過來查他們的身分證，有兩個人沒帶，又查暫住證，又查工作證，結果沒一個人帶全的，統統帶到派出所。讓他們給家裏打電話，拿錢和證明過來贖人。結果有兩個人湊不齊證件，沒被贖出去，一路押到這裏來。寫信給家人沒回音，就設法逃跑。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們越談越投機。他們對這樣莫名其妙被抓來異常憤慨，尤其是深圳警察，經常亂抓人，純粹是為了敲詐錢。等幾個月之後放回去，工作肯定丟了，鋪蓋恐怕都沒了，而且一路押回家，父母能活活氣死，鄰居同學還不知道我們犯了什麼事，丟盡人了。

再重新回來工作，又要花幾百塊辦邊防證，還要交幾百塊工作介紹費；還要花錢辦暫住證、工作證，還要買車票，還有贖金，逃跑過的還要再加倍。辛辛苦苦幹二年活掙的工錢，還

不夠這麼一折騰，中國人真是命苦！他們在沙市高中畢業都兩年了，一直在家待業。父母又不當官，哪能分配工作？沒想到深圳更可怕，早知就不會來了。

我們一起痛斥這個社會太黑暗，簡直沒一點道理可講。只要落到共產黨手裏，立刻就變成了動物，實際上比動物還慘。

又過了一天我們分別被帶出去提審，兩個湖北人各挨了一頓打，小個子的耳朵也被打爛了，腫得老厚。大個子只被踢了幾腳，傷得還沒我重。幾乎沒法睡覺，四個人坐在四角都腿碰腿，實在熬不住了就靠牆打會盹。後來聊多了就沒話說了，只好默默對望著發呆。

禁閉室也有好處，不用幹活，光聊天，或者唱歌。隔壁又唱起歌來，先是唱鄧麗君的「小城故事」，我們喊：「再來一個！」又唱「香港之夜」。然後各號輪流唱，幾乎人人會唱鄧麗君的歌。我也有特別貢獻，我在家時愛聽短波收音機，特別是台灣的節目。有一次鄧麗君到金門慰問國軍，清唱了一首歌曲，叫「中華民國頌」，特別好聽。這首歌以前張明敏唱過，我很熟悉曲調，他只是把中華民國改成了中華民族，所以我一聽就會了。

「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馬拉雅山，高聳入雲到天邊！古烈和先賢，在這裏建家園！風吹雨打中，聳立五千年。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經得起考驗！只要黃河長江的水不斷，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千秋萬世，直到永遠！」

我們後來還唱改編的國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用我們的血肉築起我們新的長城，大家朋友到了，最絕望的時刻！每個人都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

心，迎著隊長的棍棒，逃跑！逃跑！再逃跑！」

我們還改編了國際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中國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自由而鬥爭！這是剛開始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自由平等博愛就一定要實現！」

每當大院裏的人都出工以後，我們便進行合唱，有多大勁使多大勁。一遍又一遍地唱，一直唱到聲嘶力竭，一直唱到滿臉淚水！

我們像瘋子一樣歌唱，我們也的確被虐待瘋了，被禁閉瘋了。中華大地，江山如此遼闊，我們卻無辜被關在斗室折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22 · 地獄掙扎

我們在暗無天日的禁閉室被關押幾天後，被戴上手銬拖去參加反逃跑批鬥大會。一出門見到強烈的陽光我幾乎睜不開眼睛，只能迷迷糊糊被推著走。近千名衣衫襤褸、面黃肌瘦、剃著光頭、目光呆滯的收容人員，像一大群蛤蟆一樣蹲在大院裏，聽幾個幹部在聲色俱厲地威脅恐嚇。我們幾個逃跑者蹲在最後一排，每人後面有兩個打手按住我們。

場長在主席台上大叫：「你們都是不好好在家務工務農而到處流竄的盲流，盲流還想怎麼樣？到了這裏就得給我好好幹活，否則就別想吃飯。馬克思講得很清楚，不勞動者不得食，幹得少就只能喝稀飯。想逃跑，沒門！先打你個半死，再關你到禁閉室。你們現在看看那些逃跑者，都快變成鬼了！押過來示眾，哼！」

我們被按著脖子推著遊行了一圈，又被押回了禁閉室。後來別人都放了，就剩我一個逃跑組織者沒放。我忍受不了長期的禁閉，絕食抗議。三天以後，場長把我叫去談了一次話，先問了我的情況，然後說他也是大學畢業，這裏環境這麼差，不是也照樣服從國家分配。

他說我不該輕易辭掉工作，應該老老實實服從黨和政府的安排。中國人這麼多，盲流是很慘的，沒人會把你當人，反抗逃跑是沒有出路的。我跟你們中隊長說一聲，叫他別再打你，再過一個多月我們要遣送一批人回北方，只要你別再鬧事，我就會讓你走。

我又回到了六中隊，不過中隊長不再過問我每天幹多少活，只要別再組織逃跑，什麼都好說。我的身體已越來越壞，也沒有力氣跑了。白天在茶園幹一天活，晚上回來還要受蚊子和臭蟲的折磨。我以前在北方從沒聽說過臭蟲，現在才知道它的可怕。

臭蟲是爬蟲，爬起來很快，體積像麥粒大，黑亮黑亮的，咬人又疼又癢，比蚊子厲害得多，按住它得使勁才能掐死。囚室裏到處都是臭蟲，床板下面、蓆子下面、床板縫裏，不過最多的還是在牆壁縫裏，那布滿血跡污穢的牆壁上坑坑窪窪都是孔隙。

被臭蟲咬多了全身會起板疙瘩，從肩膀到大腿全部紅腫起來、疼癢無比，令我整夜不能入睡，不停揉搓以緩解鑽心之癢，鑽心之痛。根本不敢用指甲抓，否則就會發炎，我已嘗夠膿瘡之苦。

收容隊沒有自來水，近千個收容人員只能使用一個水池喝水、洗臉，那水始終髒兮兮的，但我們別無選擇。廣東很炎熱，

夏天必須天天洗澡，但是我們根本沒水洗澡，幾乎所有人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像一群牲口，大部分人也根本沒有牙刷和毛巾。

我開始還洗了幾次臉，很快眼睛就紅腫起來，跟隊長要眼藥水很困難，好容易要到一瓶氯黴素眼藥水點完了也沒好，結果給我留下了後遺症：慢性結膜炎、慢性角膜炎，到現在十七年了怎麼治也治不好。後來一個多月裏我再也不敢洗臉了。

共產黨動輒抓人，任意關押人，但從來不考慮被關押者的最基本生存需要。甚至不給你水喝，讓臭蟲咬你，讓你們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病了殘了又不管你。長期置身於這種環境，大部分人會產生對他人、對人類極端仇恨的情緒。

許多類似北京「撲頭黨」一類的罪犯之所以窮兇極惡，我可以斷定他們在共產黨專政機關裏被長期教育過，那些隊長們用他們的殘忍、冷酷、麻木、嗜血，言傳身教，培養了無數變態惡魔，他們必定要利用一切機會報復這個社會。等著瞧吧！

吸毒者在吸第一口鴉片的時候，既不會想到他會上癮，也不會想到他會傾家蕩產。第一口煙無疑令他感到刺激、感到興奮，他想，人生苦短，煩人事多，偶爾抽上一口倒也不壞。開始也許是偶爾抽一口，然後是每天抽一口，那樣每天也就花費幾塊錢，沒什麼的。

但是接著就要抽兩口、三口、四口，幾乎是不可遏止地增加，否則就會感到生活索然無味，甚至無所適從。我在勞教隊見過大批吸毒者，幾乎無一例外是這樣逐漸上癮的。口吸已不能滿足需要了，只有拍針注射，而且劑量不斷增加，直到傾家蕩產，直到毀掉一個生命。

權力也是如此。收容隊在剛開始建立的時候，肯定是不會很黑暗的，但是日積月累，每幹一件壞事都不會受到懲罰，到了最後什麼壞事都敢幹，都無所謂。到了隨心所欲地打死一個人，只要篡改一下記錄就可以的程度，成千上萬的孫志剛就這樣被打死了。

僅僅打死孫志剛的那家收容救治站，前一年就打死一百多個人，完全成了殺人機器，地方管理集團迄今並沒有受到懲處，一切都捂著蓋著。貪官污吏既然不用負責，那自然一切都歸共產黨的責任了。

權力，尤其是專制權力，是比海洛因、可卡因、大麻更毒更烈的毒品，是毒品之王！而且更容易上癮，不知不覺中就成了癮君子，而為了維持這種感覺，什麼邪惡的事都能做得出。

我在收容隊勞改近三個月之後，和百十個安徽人被遣送到下一站。我們被戴上手銬，那是一種用鐵棍打製的上銬，口徑不能調整，可以致人殘廢的。剛戴上我就覺得銬子太小、太緊，十分鐘之後我就向一位從未見過的民政局幹部提出，換一個大一點的銬子，否則我的手會殘廢。

他睜開肥胖臉上的--對豬眼：「反正你又不能再給我們的勞改隊幹活了，殘廢了就殘廢了吧，這樣一路上你這個逃跑者就不會逃跑了。」我的雙手很快就腫起來，感覺被勒得更緊，後來就麻木了，直到武漢收容站才被解開，已經沒有知覺。

雖然幾個星期以後消腫了，但從那以後我的手指就不靈活了，寫字都驚扭，寫不下去。用電腦打字只能使用一個指頭慢慢地打，速度慢得我好多年不願碰鍵盤。直到現在，我也只能用左

手中指打字。

十一月初，我們四十多人被轉到安徽省安慶收容站。那是一個半地下院子，牆很高，成直角形的一排監舍。東頭有兩間牢房鐵柵欄門始終都是鎖上的，原來那裏關押的人都是說不清家庭住址，或不願說家庭住址的人，其中一些是精神病人。

他們有二十人左右，都光著身體，沒穿任何衣服，一天只給他們一頓飯吃，不給水喝。我走到他們門口，看到裏面只有一排水泥炕，沒有任何被子、褥子、蓆子。

按照收容所規定，這些沒有犯罪，享有完全公民權利的人除非說出自己的家庭住址，否則將永遠這樣被關押下去，一直到死。每天給他們一碗飯吃還算仁慈的，因為按照共產黨宣言，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些人就應該活活餓死才對。

我估計那些人唯一的命運就是病死、凍死或餓死在那裏，除非家人碰巧到這裏找到他們，把他們贖回家。

安慶十一月份的天氣已經很冷，我們還是穿著夏天的衣服，白天凍得直哆嗦，晚上更冷，二十個人只有兩床被子。經過一場打鬥，有八個人搶到兩床被子，四個人蓋一床。

白天我們到院子北面收割大白菜，我看清了周圍的地形，那時我已有左膀右臂，兩個人都強壯無比。他們構成了對號子裏所有人的威脅，所以當我們白天用揀來的棍子撬鎖環的時候，大家都站在門口掩護我們，沒人敢告密。鎖環終於被我們弄壞了，但是還沒有斷掉，不仔細還看不出裂縫來。

當天深夜，我們三個人合力撬斷了鎖環，立刻衝到大門口，搭人梯爬上大門，翻越圍牆。守夜門衛只是狂吹口哨，卻不敢過

來阻攔。我們跳下圍牆，在田野裏死命狂奔，我至少摔了六、七個跟頭，但終於跑了出去。

自由的感覺真好。自由比什麼都重要。



第三章 如夢如歌

雪山獵鷹的高昂詠唱，
呼嘯高原的蒼涼清風，
蒼翠藍天的粼粼餘波，
西藏靈歌；

悲慘生命的無奈長歎，
清潔靈魂的凜冽甘泉，
透徹心靈的千年仙藥，
西藏靈歌；

垂緞般圍繞拉薩的高山雪帶，
沒有被塵世污染的潔白哈達；
飄蕩在郊野的靈幡，
西藏靈歌。

——〈西藏靈歌〉一九八七年二月

23 · 流浪青藏高原

回到蚌埠，那段收容經歷給我帶來的心靈之痛始終沒有得到緩解，我對共產黨，對這個社會的憤慨和絕望也與日俱增。周圍的人們依然螞蟻般活著，沒有一點靈性。

為了排解過於強烈的怨憤，為了尋求一種精神寄託，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我踏上了西去的列車，我身上的錢

只夠買單程車票，但我渴望看到青海的草原，西藏的天空。

在大學失魂落魄的歲月裏，我曾以一首詩表達我內心的悲愴：

我願赤腳走遍天涯，
只帶一把吉他，
沿途攀吃樹上的果子，
在曠野裏大聲歌唱。

唱出我心底的憂傷，
唱出我靈魂的悲愴。
然後長眠在喜馬拉雅雪峰，
和她一起永恆。

——〈渴望流浪〉一九八一年六月

青海的草原，蒼茫遼闊，意境深遠。我憑窗遠望，覺頭腦開闊，心胸寬廣，遐思無限。五千年歷史，似乎在心中漸漸閃現；八千里山河，彷彿從眼前依依掠過。

車速很慢，在一個小站，只有一家藏人下車。男人背著一個高過頭頂的巨大背囊，胸挎大包，左手拉著一個孩子，右手拉著一個孩子；女人背著一個嬰兒，也拉著一個孩子。他們向茫茫草原深處走去，視線所及，看不到任何房舍、樹木，只有遠處連綿的山峰隱約可見，恍如夢境。

列車已走了很遠，我還在看著那家藏人，慢慢走向草原深處。天蒼蒼野茫茫，不見道路不見牛羊。我問旁邊的一個鐵路工

人，這家藏人要走多遠才會到家，他說至少要走一百里，也許要走三百里。他們每次出門要採購一年用的生活必需品。

從格爾木轉長途汽車到拉薩，沿途大山林立、形狀各異、色彩也不同，甚至有完全暗紅色的大山，我猜想《西遊記》裏的火焰山真實原型就是這樣的。國人有「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見岳」之說，實在是井底之蛙眼裏的天空，僅僅青藏之間的群山之千姿百態，已足抵十個黃山加五嶽！

月藏北草原的草也令我吃驚，只有幾厘米高，而兩根草之間的距離倒有十幾厘米，所以遠看是草原，近看是荒坡。也許這些草到了夏天會長高，但是恐怕難以稠密，很難養活羊群。中途休息，唐古喇山口強風陣陣，我一下車幾乎摔倒。我跌跌撞撞地跑進一家回民飯館，喝一碗滾熱的羊肉湯，感覺好得不得了。

終於到了拉薩，我夢中神秘的佛國。

我在一家餐館裏吃飯的時候，進來幾個西方人，他們好像是想吃點餃子，但是老闆卻一點也不明白，比劃了半天也不行，他們只好失望地走了。

我便問老闆為什麼不準備一份英文菜譜，老闆說他們都是四川農民，連一個英語單詞都沒學過，哪裏懂英文。我馬上建議，只要他付給我五十塊錢，我就給他翻譯一份菜譜。他立刻答應了。

想到密布拉薩街頭的四川餐館和大量的西方遊客，我突然想出一個賺更多錢的辦法：去給每間餐館翻譯一份功能表。當天下午我就去新華書店買了一本《漢英詞典》，意外地發現竟然還有一本《菜名英漢對照》，真是太好了。從第二天起，我就到各餐

館兜攬生意，賺了一筆錢。

八廓街是一條呈八角形的街，中心便是大昭寺。大昭寺門口，終年有善男信女膜拜，那不是磕頭，而是全身俯倒在地上，再起來，再俯身。那也不是三跪九磕總有數的，而是一直做下去，從天明做到天黑，從周一做到周末，從月初做到月底，據說最虔誠的可以連續做一年。為了臂肘和膝蓋不受傷害，有的人在這些部位帶著木製護板。

我最喜歡去色拉寺，在拉薩北郊山坡上，廟宇相連，足有千間；香煙繚繞，四季不絕。喇嘛們滿臉透著真誠、透著善良、透著愛心，令我感慨。與他們相比，我的漢族同胞們則是滿臉晦氣、滿臉怨氣、滿臉警惕。如果能夠，我願一生住在色拉寺，那會讓我傷痛的心靈感到永恆的溫暖。

我愛喝西藏的犛牛奶綿羊奶駱駝奶混合而製的奶茶，愛吃桔黃色的藏族奶酪，尤其是色拉寺門口那些藏族姑娘賣的酸溜溜的青稞黃酒，飲後回味無窮。

我愛聽藏族靈歌，這是我給藏族民歌起的名字，因為那不是一般的民歌。

在我到過的世界各地，唯有西藏，天—地—人如此絕妙地渾然成為一體。

有一天我西出拉薩，信步走向哲蚌寺，走了很遠也沒到，只好折回頭。我又渴又餓，又找不到商店飯舖，只好敲開一戶藏人家的大門。儘管有人告誡我說漢人單獨活動在藏人區十分危險，藏人可能背後一刀結果我的生命，但我就是不信這個虔誠信佛的民族，會野蠻對待一個孤零零來自遠方的無辜遊子。一個藏族女

人打開了門，稍微有點吃驚。我說想買點水喝，買點食物吃。她似乎聽懂了我的話，但沒有說話，只是請我進去。

院子裏有一個四方小桌，女人請我坐在小板凳上，然後從屋裏端出半碗炒麵，又拎一隻暖水瓶過來給我倒了一碗飲料，我想那就是酥油茶了。我以前一直以為糌粑是類似鍋巴的一種食品，那時才知道原是炒麵，不過是鹹味的，很好吃。那炒麵也沒有糊味，我估計是先把青稞麥子炒熟，在和鹽一起磨成粉的。

那女人的丈夫和孩子都過來向我微笑示意，但沒有說話。吃完之後，我掏出錢來，他們一再擺手拒絕，我只好滿懷感激的告辭了。

自從到過西藏以後，我對這個宗教民族的命運就充滿了同情。

在歷史上，藏人曾經十分強壯，唐時的吐蕃，與大唐帝國曾雙雄並立，遠比後來被擊潰，逃到小亞細亞建立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突厥人強大。後來我到美國，發現藏人仍自稱這個名字，英語即Tibet。

清帝國雖亡於辛亥革命，其衰落卻是因為大小金川七年之戰，耗盡了康乾盛世積累的豐盈國庫，八旗銳氣、綠營鋒芒也盡喪於此，而且從此一蹶不振。大小金川那些東方史上異常頑強的抵抗戰士，便是藏人。

歷史上漢人武裝首次進入西藏便是毛澤東指揮的解放軍，我在西藏一個多月裏聽到很多戰爭故事。從一九五九年開始，二十年裏藏人起義不斷，兩三年暴動一次。汽車不能安全進入藏南藏西，那裏數十萬解放軍的後勤補給，主要靠人力和畜力運送，這

種原始運輸方式不知耗費了多少民脂民膏。孫子兵法說，十萬軍隊在千里之外作戰，就得有百萬勞力運送補給，千萬勞力在後方生產。

這是一場巨大的悲劇，無論對於漢人還是對於藏人。那時我甚至認為，除了美國人在朝鮮戰場給毛澤東當頭棒喝，西藏人的頑強抵抗也使共產黨傷透了腦筋，陷入泥潭從而躊躇不前。否則很難解釋毛澤東究竟為什麼不去席捲東南亞，他一直有這個野心的。直到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去美國，胡耀邦去西藏才以和談結束了曠日持久的西藏戰爭。

我衷心希望漢藏兩個民族以後能兄弟相處、平等相待、互敬互愛。也許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但是我願意跪在這個民族面前謝罪，請求他們慈悲為懷，寬恕我們漢人給他們帶來的苦難和污染。

對於道德淪喪的漢民族，西藏是一塊純淨的聖地，應該成為我們的精神家園，應該是我們寄託靈魂的地方。

24·投奔反共救國

回到家鄉之後，我再次試圖建立秘密組織，重建「三楚事務所」。《史記》有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但是大家都三心二意的，幾番努力都沒有搞出任何名堂，令我很失望。我幾乎每天收聽台灣與美國廣播，但是聽久了也感覺乏味，都是簡單的新聞，反覆滾動播報，沒有深刻的文章，也沒有大量有用的知識。

不在沉默中奮起，便在沉默中湮滅。與其蠅營狗苟，不如躍

身一擊。苦悶之餘，我又下決心，這次偷渡台灣，去參加反共救國軍！

我吸取上次蛇口偷渡差點淹死的教訓，特意在家鄉買了一個分成三節氣囊，相互不通氣的保險救生圈。然後坐火車到了廈門，住在廈門大學招待所。我仔細研究了地圖，在何厝一帶下水最好，離金門大膽二膽最近。鼓浪嶼遊人太多，警戒恐怕也嚴。

第二天下午我先去偵察，我沿公路向何厝走去，兩邊都是農田農舍，路上很少有人，我看中一片樹林之後就回去了。第三天下午我準備好可維持兩天的水和食物，又買了一份報紙，確認兩天內沒有大風大雨，就背著背包出發了。

我在那個海邊的小樹林深處等待天黑再下水，當我點燃第二根香煙的時候，兩個農民突然從我身後冒出來。我想也許是巧合，便對他們點點頭笑了一下，那個年長一點的農民便問我：「幹什麼來了？」「來旅遊。看到這兒的景色很優美，我又走累了，所以在這裏歇一歇。」我竭力裝著若無其事。

「那可不可以讓我們看看你的包，我們是村民聯防隊的。」看我有點猶豫，他又補充道：「否則就跟我們到隊部走一趟。」我只好同意讓他看包。他拉開我的包，一把抓出那件保險救生圈：「我們這裏規定遊人不准帶這個，你跟我們走一趟，去隊部解釋一下吧。」我還想再說什麼，兩人已緊緊架住了我的雙臂。看來他們是老手。

走出小樹林，走上一段土路，一輛標有種子公司字樣的車開過來，把我帶到了邊防派出所，隨後就開始審訊。我堅持表示我是旅遊者，由於戀愛失敗對這個世界已感到絕望，因此想來看看

大海，想找到一個僻靜的地方最後思考決定是否自殺。

「那你帶一個這麼保險的救生圈幹什麼用？」審訊者問。

「假如我最後決定自殺，我想死在大海深處，也許在那裏我的靈魂能得到安慰。」我慢悠悠地回答，我實在不能坦白，只能幽默一點。「一派胡言！」審訊者終於被激怒：「站起來！站到牆邊去！」那些審訊者全是年輕武警，輪番過來逼問我。

我突然想出一個逃跑辦法。我在走進小樹林之前，曾經分別把兩袋東西藏在附近石縫裏，一袋是衣服，不要了；一袋是我的幾個筆記本，打算下海之前再取回裝進包裹。現在乘半夜時分，如果到那裏去，也許可以有機會逃跑掉，沒有機會也不可怕，把那袋衣服找到給他們就是了。

於是在他們一陣怒吼之後，我假裝被嚇破了膽，小聲地說我還藏了一些東西在海邊，他們十分高興地立刻帶我去取，但是卻去了四個人，還給我戴上了手銬。我真是自找麻煩，哪裏有機會跑掉？

他們卻如獲至寶，仔細研究我的衣服，後來還來了一個四槓一星的老警官帶來一個放大鏡仔細看。可能想找密寫的文字，當然什麼也沒有看到。

從下午四點一直審訊到凌晨四點，整整十二個小時，十幾個人輪番審訊，我始終堅持第一次的說法，最後他們只好失望地把我押到公安局收容審查站。

這次受審為我以後對抗審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所以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我才能從容應對，不像當時的大多數被捕者，初出茅廬、驚慌失措、互相抵賴，最後只好一錯再錯、

徹底交待，甚至一些根本無須交代的事也交代出來。

而「六四」後中共中央決定的審訊政策是共產黨統治幾十年來最溫和守法的，沒聽說有車輪戰，遠及不上我在廈門邊防派出所面對的審訊嚴厲。

我對廈門收審站裏被關押兩個月的記憶就是饑餓和恐懼。那是連續兩個月的饑餓，從來沒有吃飽過。早晨是半碗餛飩稀飯，中午晚上是三兩糙米乾飯，或者有幾根鹹菜，或者有兩葉蔬菜。沒有油，沒有肉，沒有其他副食品，每天還要糊藥盒子。毫無辦法，只有忍饑挨餓。

整天就想吃東西，饅頭、米飯、麵條，所有以前厭煩的食物現在都變得充滿魅力，經常夢見我獨自面對一大鍋米飯，高興得又蹦又跳，找不到筷子，伸手就抓來吃，好過癮啊！

記得一回過節加餐，是麵條，開始給得很少，但是後來又補給一次，大家一聽就趕緊撲到那方狗洞跟前，伸出自己的飯鉢，人人都想能加一點飯。一般看守所的窺視兼打飯窗口有齊胸高，廈門收審站的打飯窗口例外，完全是一個狗洞，緊靠地面。我們打飯打水都必須像狗一樣蹲下來，趴下去。

大家久等沒來，一個福州人便轉身去解手，誰知他剛走，送飯車就到了我們門口。幾個趴在前頭的人打完一遍，也不退下來，又把兩個飯鉢的麵條倒在一起，騰出空碗來再伸出去打飯，同時把福州人的碗推在一邊。我勃然大怒，指責那個幹得最歡的西安慣竊，那慣竊反駁說：「看守所就是這樣！你餓死你倒楣，我可不想餓死。」

又吵了幾句我們就打起來了，幾個回合下來，未分勝負，但

那個被我幫助的福州人卻袖手旁觀。而我之所以為他鳴不平，是因為他也是偷渡的，也想投奔國民黨，每天也和我一樣餓得心裏發慌。

25 · 第三次越獄

在那裏被關押兩個月之後，我感到前途渺茫，無法估計要關押多久，有人說可能要判刑五年，而在以前毛澤東活著的時候，至少要判刑十五年。在絕望中我決定以絕食絕水來爭取自由。

那是我第三次絕食，那是一次慘烈的絕食，因為還絕水。開頭五天沒人理我，好像很樂意我這樣死去。第六天我已經快不行了，他們把我抬到醫療室。

他們先往我嘴裏灌米湯，我咬緊牙關拒絕。然後他們按住我，往我鼻子裏插管子，我拚命抗拒，最後他們七、八個人死死按住我，幾乎把我的腿按斷，醫生終於把一個粗管子插進了我的鼻子裏。鼻子疼得要命。灌過米湯之後，我的鼻子又腫又疼，還流血，很久都沒有恢復，後來我的鼻腔通氣一直不順。

然而更嚴重的傷害還是大腦，混混沌沌的，很長時間都不好使。所以從那以後的十幾次絕食中，我再也不敢絕水了，絕水對大腦和內臟器官傷害太大。

一個星期之後，邊防派出所通知我，他們已結束了對我的審查。又過了一個星期，審查站把我送到廈門收容中轉站。由於上午剛送了一批人到閩北的收容勞改隊，收容站裏空蕩蕩的，只有我們四個人。根據我以前在廣州和安慶收容站兩次逃跑的經驗，我意識到這是大好的逃跑機會。白天我把周圍的環境仔細看了，

夜裏就和另外三個人研究逃跑方案。

那個十幾歲的孩子不敢跑。柳州人則是和我一起從看守所裏送來的，而且我們原來就被關在一個號子，關係也一直很好，我倆十分害怕被送到收容勞改隊。

另一個老江湖是從外省一路遣送過來的，再過兩天家裏人就該來贖他了，不需要跑，但是他願意幫助我們設計逃跑方案，他已經在這裏被關了一個星期，非常熟悉周圍環境，他提醒我們不能翻大門逃跑，因為外面還有一個更大的院子，還有一道大門。

第二天中午放風時，我發現看守我們的人拎著熱水瓶離開了大門值班室。這真是太好了！我立刻喊柳州人跟我一起把大院一角的一張長桌子抬過來，再墊上一個破木箱。我爬上去扶牆蹲下，柳州人踩著我的肩膀，我用盡吃奶的力氣才站起來，柳州人爬上了房頂，轉身再來拉我。幸虧柳州人確實有勁，幾乎是把我硬拉上去。

我們順著遮蔽二樓走廊的粗鐵絲網爬上三樓，這時喊聲已起，我們順著走廊往北跑，走廊上幾個家屬心驚膽戰地看著我們兩個瘋狂的傢伙，沒人敢阻攔。我們從走廊盡頭跳下去，下面是一間與圍牆相連的平台，跑過平台，圍牆只有齊胸高，上面插滿了密密麻麻的碎玻璃片。後面已經有幾個人喊著追過來，我們咬牙爬上圍牆，我的手和膝蓋都被碎玻璃劃破了。上了牆再看地下，才知道這圍牆太高了，硬跳下去肯定要摔斷腿。

幸而不遠處有一個搭牆建的簡易棚子，我們不管追兵將近，小心翼翼的走過這段碎玻璃半圓牆頭，然後蹲跪下來用手扒住牆頭，讓身體先落下去、再放手、以減少所跳的高度。我們的身體

砸壞了那件棚子，我幾乎落到地上，然後爬起來就跑，感覺骨頭沒有受傷。

我們跑過一段居民區，居民們都用驚訝的目光看著我們。那間棚子說明：從來沒有人這樣逃出來過！然後，為了不被追上一個，另一個也跑不掉，我與柳州人分手了。

跑到一個僻靜的建築工地，我實在跑不動了，就鑽進去躲了起來。這才發現我的手、腿、膝蓋和腳多處受傷，衣服上血跡斑斑，我害怕被人當作殺人犯追捕，也不敢出去了。我找水搓洗掉血跡，一直躲到天黑才離開那裏。

雖然有點僥倖，我們畢竟成功了。

也許有人認為收容站不是監獄，與看守所比較，防守要鬆得多。但那裏至少是地獄，如果孫志剛能跑掉，他肯定不願意被打死在裏面。許許多多被打死在裏面的人，可能是沒有機會，更可能是沒有勇氣逃跑。逆來順受，懼怕強權，苟且偷生的中國人太多了！

我雖是病弱書生，但只要有機可乘，會像尉遲敬德一樣勇猛，敢敵萬人。

26·海南民主夢

一九八八年初，趙紫陽在一次講話中，宣布要在海南建省並把它辦成一個政治特區。各地有政治抱負的年輕人開始注意這個海島，我們雲夢沙龍立即成立了海南委員會，收集有關情況，籌集資金並派張雷前往實地考察。

四月份，我把我承包的一家飯店轉讓給他人，然後與友人一

道出發了，我決心趕上這次推進民主政治的機會。我們坐火車到湛江，轉汽車到海安，渡過瓊州海峽，直達海口。

我們在北京路租了一座小樓，然後天天奔走尋求機會。每天晚上，我們都在海口公園對面的港務局門前，當時有名的大陸角，結識各地來的朋友。那時第一波海南潮正在消退，但是仍有大批的大陸知識青年趕往那裏。

很多早些時候過來又不肯撤退的人仍然滯留在那裏，許多人已經不名一文，白天靠賣報紙掙幾塊錢吃飯，晚上就睡在公園裏。人多的時候，公園裏睡滿了人，夜裏起來稍不小心就會踩到一個人。那幾個月裏，至少有幾十萬青年知識分子奔向海南，最後沮喪而歸。

我們在大陸角認識了大量朋友，一個湖南大學教師把我推薦到海南大學丁鐘琦教授辦的公司裏當助理總經理。但是我的主要心思還是放在政治上，我先和二十幾個安徽人一起建立了安徽同鄉會。我們實行三權分立，我任執事長，蕪湖人王德漢任判事長，陳大威任會議長。

我們忙了許多天，才召開成立大會，我正在講話的時候，警察包圍了我們，並且首先抓走了我。王德漢和陳大威越窗而逃，其他人一哄而散。

警察記下了我的身分證件號碼，勒令我停止建立非法組織的活動，警告我如果不聽勸告，後果自負。這當頭一棒令我目瞪口呆：不是要建立政治特區嗎？怎麼連一個同鄉會都要強行驅散？我不服氣，第二天就去海南省籌備委員會討個說法，但是在傳達室磨了半天也沒有見到一名負責官員。看來我們上當了！

後來我們又去三亞活動，經地質大學的武野和達木兩位朋友介紹，我認識了台灣民進黨左派精英陳賜麟。我和陳賜麟談了整整一夜，決定合作建立秘密的海南青年會，推動海南民主化建設。

陳賜麟從小反對國民黨，十四歲開始收聽大陸的海峽之聲廣播電台徐曼小姐主持的節目，並按照徐曼給的地址十多次寫信要求加入共產黨。這些信都落到了情治單位手裏，到他十六歲時，便請他去政治學習班學習半年。但是他沒有改變思想，依然無限嚮往共產主義。

陳賜麟後來到台北大學讀書，並狂熱地投身於反對國民黨，推進民主的運動。一九八七年台灣解除戒嚴，陳賜麟第一個經日本轉到大陸，去找徐曼。中聯部和統戰部都對他十分重視，先後安排他到暨南大學讀書，到中央社會科學院工作，另外還受一些特別訓練，因為他哥哥是中華民國總統府護衛摩托車隊隊長。

陳賜麟卻寫了一本書，指導中共如何實行民主變革，與國民黨競爭，以獲得台灣民心，最後解放台灣。很自然的，他被打入冷宮，中聯部統戰部都不再理他。陳賜麟就自費到大陸各地考察，人民的貧困愚昧和政府的專制震撼了他，使他回過頭來要建立秘密組織，反對中共專制政權。他開始物色合作者，正好找到了我。

我們返回海口，開始秘密地組織活動。我先把成都人曾遠和蕪湖人王德漢推薦給他，曾遠欣然加盟，王德漢上次受驚一回，這次又擔心陳賜麟是台灣特務，不敢入伙。我們到處招兵買馬，與人約談，但多半是貪圖利益的。

有一天我和陳賜麟到海口的秀英海濱浴場游泳，我們兩個都是爭強好勝的人，便打賭看誰能游到遠處的遠洋貨輪上，我們不知道那有多遠，但以我曾在深圳灣徹夜游泳的經驗看來不成問題。游了大約二公里之後，由於爭先恐後，我們都已經筋疲力盡。

這時海上起了風浪，我們有點驚慌，只好趕緊回頭。我還是盡量勻著勁用，但是陳賜麟一條腿不便，可能也缺乏遠遊經驗，力氣過早耗盡了，現在面色發紫，有點危險。我就緊緊跟在他後面，考慮著萬一發生危險如何援救他。以前我聽人說過、在書上看到過的水中救人辦法肯定不行，只會使我們兩人統統溺斃。

我一邊游一邊頻頻回頭，以掌握海浪的節奏。我被噲了幾次水之後就明白不能與海浪對抗，那是可能把人噲昏迷的。陳賜麟也噲了好幾次水，我大聲告訴他關鍵是要保持鎮定，要控制呼吸節奏以避開海浪的衝擊。

風浪越來越大。突然陳賜麟被一個大浪打了下去，浪過之後，他竟然猛烈噲水，胡亂掙扎，浮不起來了。我大驚失色，奮力游到他的身邊，低頭鑽入水中，抓住他就往上舉。感覺他的頭部已露出水面，我就騰出一隻手來托住他的臀部，另一隻手向上滑水，以把他舉得更高。

我意識到，使他不被淹死的唯一辦法就是使他從噲水造成的昏亂中清醒過來，恢復鎮定，然後主要還是依靠他自己的力量游上陸地。我只能給他有限支援，絕無能力拖他上岸。海岸至少還有一公里之遙，風浪還在增大。

就在我感到已憋不住氣了的時候，他伸手推開了我，我浮出

水面，看他果然恢復了鎮定。然後每游幾十米，我就潛入水中托他臀部一會兒，或者一手托他腋窩，一手划水游十來米。使他節省體力，獲得短暫休息，保持頭腦清醒。雖然風浪越來越大，我們還是歷經艱難，終於游到岸邊。

感謝上帝給我急智。並且希望我這個經驗能被別人利用，拯救在大海裏游泳遇險的同伴。

一個月以後的一天晚上我們回到住處，發現房間一片狼藉，但是檢查物品，卻沒有丟失一件，陳賜麟母親和嫂嫂幾天前送來的五千美元活動經費和一箱手錶也沒丟一點。大陸竟然還有這樣品位的小偷？

第二天我們驚魂還未定，警察又上門帶走了我。我被帶到派出所，先問姓名，查證件，然後問我到海南來究竟想幹什麼？我只好說來做生意。旁邊一個便衣警察笑笑：「我們很瞭解你和陳賜麟，海南正在建省，很忙。我們也很開明，不想抓你們，但也絕不允許有人搗亂，建立非法組織。依我看你還是早點回家吧，別弄出事來，到時候吃不了兜著走！今天就談到這裏，明天下午你再來一趟。」

我們哪裏還會等到明天下午，當天晚上就撤退了，海南青年會胎死腹中。三人跑到廣州，我們又驚又怒，看來共產黨決心抗拒民主潮流了。

我因此構思了一個瘋狂的計劃！

27·暴動計劃

我們住在暨南大學招待所，一方面想在大學裏發展新成員，

另一方面商討下一步計劃。

北京的情況我和陳賜麟都知道，雖然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幾乎都集中在北京，但那裏控制太嚴密，幾乎所有人都領共產黨的工資，靠共產黨吃飯，住在單位的房子裏。北京完全像一個巨大的軍營，進哪一座營房都要登記姓名單位，幾乎沒有自由活動的空間。

我們之所以不約而同地從各地奔赴海南，就是想尋找一塊不同於北京，不同於安徽，不同於內地任何一座城市的自由空間，可以實踐我們的政治理想，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示範區，再向各省推廣。但是這個希望現在已完全破滅。

大家一籌莫展，萬般無奈之下我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既然中共不允許和平變革，堅決壓制民主自由，而且羅網密布全國。我們這樣幹不了多久，一旦進入行動階段，就會突破中共容忍的底線，把我們抓入大牢，把我們廢了，一切就都完蛋了。

與其如此，我們不如走傳統革命路線，在邊境建立一個自由戰士根據地，先站穩腳跟，再向國內滲透，開展邊境游擊戰爭。我們可以從海外籌集資金，從內地招募自由戰士，從而建立一塊自由陣地，逐漸實現我們的政治理想。南美洲的革命者，雖然目的和我們正好相反，但也都是這樣幹的。

這個自由根據地的首選目標是緬甸。在中國的周圍，北方是強大的蘇聯共產黨；西方被崇山峻嶺隔斷，中國人與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幾乎沒有交流交往，還沒有我們與美國英國的關係密切；朝鮮越南老撾都是共產黨國家，更不是我們應該考慮的地方。

中國現代史上最慘烈的人民抵抗戰爭，曾經讓共產黨領導人驚訝萬分，百思不得其解。

在美軍解放伊拉克的戰爭中，西歐和中歐一些老牌自由國家出於利益考慮，反對這場給伊拉克人民帶來自由的正義戰爭，但是東歐那些前共產黨國家卻無一例外地，不計利害地與法國德國對立，堅決支援美國！堅決支援人類自由事業！就是和井岡山頑抗戰一樣生動的例子。

越戰之所以失敗，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軍事上無法利用先進武器，美軍不得不手執卡賓槍在高山叢林裏與越軍對射，進行政治消耗戰，傷亡太大，超過了美國人民為人類自由事業做貢獻的底線，應該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緬甸的崇山密林勝過越南，所以是我們建立自由根據地，長期開展游擊戰爭唯一的選擇。

我的計劃經反覆討論後獲得一致通過。並且做了初步分工：陳賜麟負責籌集海外資金，我負責創建自由根據地，曾遠負責秘密採購武器及招募自由戰士。首先我們同去雲南，實地考察研究一番，再做最後決定以及詳細的計劃。第二天，我們就悄然出發了。

28·準備建立武裝根據地

我們在昆明逗留了幾天，打聽邊境情況。因為在中國，報紙雜誌和圖書館都是中共的宣傳工具，收集不到多少有用的資訊，要想瞭解一個地方，非得人跑去不可。從嘴巴聽到的消息雖然零亂，謬誤也多，但卻是收集可靠情況的唯一渠道。

我們在昆明瞭解到，去邊境要經過許多檢查站，而陳賜麟持台灣人回鄉證件，顯然比較麻煩。加上他一條腿不便，也不宜在邊境山區奔走，所以我們決定，陳賜麟去北京建立與國外的關係，我和曾遠去瑞麗考察。

我們在瑞麗電影院租了一間房子，然後分頭打聽情況。我們得知在鄧小平執政之後，停止了對緬甸人民軍的支援，人民軍連戰連敗，已基本潰散。在解散和逃跑之時，他們匆匆地埋藏了武器彈藥，大部分都在邊境一帶。所以我們重點尋找前人民軍官兵，準備付錢給他們，帶我們去尋找掩藏武器的地點。

我們廣交朋友物色自由戰士，認識了許多緬甸華僑商人，當時的瑞麗，本地人只有八千，外地人卻有四萬，僅緬甸人即有數千。他們大部分人表面上從事玉石貿易，暗地裏洽談毒品生意，但是普遍對政治毫無興趣。

我聽說騰衝一帶有大批前人民軍官兵，許多官兵把武器帶回國埋藏起來，伺機待價而沽，便跑去偵察，可是我在騰衝街頭轉了幾天也沒有一點眉目。倒是留在瑞麗的曾遠找到一個修手錶的，自稱是前人民軍營長，開口就問我們要二十萬，保證帶我們去一個武器埋藏地，那裏有數百枝衝鋒鎗，還有重武器。

但是我們後來又認識了一個前人民軍軍官，他說那是騙局，大批的武器當時就被賣掉了，當時賣不掉的這些年下來也給別人賣掉了，絕對不可能有一大批的武器埋在一個地點，許多部隊攜帶武器投奔販毒武裝了，成建制的部隊回國時把武器交給中國邊防軍隊了。

在奔走打聽一個多月之後，我們的心也漸漸冷了，不可能在

當地找到願意為中國人民自由事業獻身的自由戰士，我們一個也沒有找到。所有人都是忙於掙錢吃飯，哪有別的想法。陳賜麟在北京也感到，到哪裏去籌集那樣大筆的經費？時代不同了，共產黨如此可怕，海外華僑不可能大筆捐資於這項事業。

即使稍微多一點的資金進入大陸到達我們手裏，也幾乎不可能不被蜘蛛網般密布全國的共產黨組織察覺，很可能我們就跟著第一批資金掉進共產黨的大口袋，連開第一槍的機會都沒有。

這個狂熱的計劃雖然前景誘人，卻沒有實現的現實可能。就在我們對這個計劃感到懷疑，越來越悲觀的時候，當地警方已有所察覺，在與我們交談的人中可能有線人向警方報告：我們想買武器。

警察開始對我們調查，一個友善的鄰居告訴了我們這個消息。而北京傳來的消息是北京警方也有所察覺，開始對陳賜麟調查，陳賜麟急忙逃到國外，我也只好連夜逃出瑞麗，終止了這個瘋狂的計劃。

儘管這個計劃終止了，並沒有進入行動階段，但是十個月之後，蚌埠公安機關卻開始了大規模的調查，曾遠為此被關押在蚌埠市公安局收審站7個月，反覆被審訊，受盡折磨虐待。

那時我已經因為八九民運系獄，在我被指控的五項罪名中，我因為曾經制定這個計劃被公安局定性為陰謀組織反革命集團罪。不是反革命組織而是反革命集團啊，多麼嚴重！幸虧後來拖延時久，證據不足，難以定罪，檢察院沒有正式起訴。

29 · 北京串聯

逃回家鄉之後，我就全力以赴，重建雲夢沙龍，並且使它越來越政治化。那個時期，我還寫了許多詩和短劇，加上我在海南寫的許多詩，都是政治性的，我很想出一本集子。但在當時的大陸，怎麼可能？八九之後，抄的抄了，丟的丟了，幾乎遺失殆盡。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我想「一二·九」快到了，北京學生可能會有點行動，就與丁其彬、張雷北上，住在新華社招待所裏打聽情況。我又到清華北大跑了跑，通過兩個安徽老鄉大致瞭解了兩個學校的情況。

我還參加了北大未來學會成立大會，聽了王軍濤、金觀濤等人的演講，特別是戈楊的演講，意思很明白，改革派要行動了！我很激動，終於快有機會把民運向前推一大步了！我的母校則令我很失望，一點動靜都沒有。

我回到蚌埠，把北京的情況報告給大家，並建立未來學會蚌埠分會，我們摩拳擦掌，積極準備大幹一場。為密切合作，我們還建立了骨幹每周例會制度，輪流做東，地點在姚冰家裏。

三月初，我又到北京活動，並且準備住在那裏。我找到了主持「民主沙龍」活動的王丹，還有他的夥伴楊濤、高超群。每周一次的沙龍活動人並不多，一般是在32號樓四樓西頭的活動室裏，有一次只有六、七個人，但王丹始終堅持舉行。只有一次在唐吉珂德銅像前的集會參加者眾，很多人講話，我也做了即興發言，論述實行民主乃是我們國家走向富強的必由之路，中國除此之外別無出路。

演講結束後，有幾個人問我要聯繫方法，《紐約時報》的駐

京記者武潔芳也把她的名片給我，要我打電話約她。幾天後我應約到了她的家裏，她的丈夫紀思道也是《紐約時報》記者，好像還是駐北京分社社長，我們談了一個鐘頭。

我當時特別想見的人是方勵之，後來總算通過沈彤介紹，與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單獨談了一個小時。她很為我擔憂，說像我這種活動方式特別危險，會默默無聞地被投入監獄，從此不見天日，外界也永遠不知道。而在那個時代，共產黨對於地下民運的打擊是異常嚴厲的，常常是胡亂捏造一個很重的罪名，反正又不用擔心受到國際社會的批評。

「就在幾天前還有一個很年輕的女子找到我，手裏拿著證件和結婚證書，訴說她的剛結婚的丈夫多麼優秀，名牌大學畢業，就是因為人品太正直，參加了一些地下組織活動，突然失蹤了，幾個月沒有任何消息。」

李淑嫻接著又說她和丈夫都受到嚴密監視，衛生間裏有時都能找到竊聽器，天天都擔驚受怕的，在美國的兒子每個月都會打電話來問安。她勸我還是多保重，來日方長，千萬別一下子就撲進監獄。

可能就是那次演講及會見美國記者給我帶來了麻煩，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我正在和清華的一位同學對弈，一個女老師突然推門而入，慌慌張張地問他：「看見張林了沒有？保衛處正在到處找他。」

我強自鎮定，盯住圍棋盤，沒有回頭，怕被認出。誰知我的同學被嚇壞了，竟然指著我說：「這不就是張林嗎？」我猛回頭，那個女老師像見到鬼一樣嚇退兩步，轉身拉開門就跑。我也

感到恐慌，急忙起身逃走。

當我快跑到我住的地方時，一個黑影從暗中閃出來，差點把我嚇暈，我定神一看，原來是我的另一位同學。他急急忙忙地告訴我，不能回去了，剛才幾個人去抓我撲了空，現正在傳達室裏等著我。

他到這裏來截我，就是告訴我必須趕快逃走。他還把身上僅有的錢都給了我，並告訴我，如果我還想要背包和衣服，就在這裏等，一會他讓女朋友送過來。他告誡我出校千萬別走大門，要翻牆頭。

我從他女朋友手裏接過行李，不知如何感謝他們，就急忙轉身走了。我先到東圍牆，太高了，根本爬不上去。又順著圍牆往北走，總算找到一棵樹緊靠圍牆，我先爬樹，再上圍牆。

上去一看，我頓時叫苦不疊。原來我離開清華多年，不知何時北面修了一座變電所。至少還要再翻一道圍牆！而且變電所的燈光異常明亮，難以隱蔽。但騎坐高牆，容易被人看見，沒時間選擇，我硬著頭皮跳了下去。

終於逃到馬路上，我又不知該往何方，躊躇了一會我決定還是闖進北大，跟他們商量一下。我先去找王丹、楊濤，都不在宿舍，我又去找沈彤，和他談了很久，他也不知如何是好，然後他出去晚鍛煉長跑去了。我再次去找王丹，見到了高超群，說王丹和楊濤可能印傳單去了，帶我找了一圈也沒找著。

最後，我只有逃離北大，記得那天是四月八日。已經很接近學潮爆發了，我卻不得不逃出北京城，以致我後來後悔多年。後來我在美國遇到沈彤，他一再向我致歉，並送給我一本他寫的

書，那本書裏有一章專門談到「六四」之前我的地下民運活動經歷，但是因為擔心我受到共產黨的迫害而沒有寫我的名字。

我先是準備逃到東北去，我以前聽說黑龍江地域遼闊，人煙稀少，容易生存，可惜那裏沒有一個熟人。香港我是不想再去了，去台灣太困難，我口袋裏只有幾十塊錢，肯定不夠用。環顧茫茫大地，何處才是我的自由家園，可以安身立命之地？想來想去我還只有潛回家鄉，再作決定。

回到家鄉我住到一處隱蔽的地方，立即召集雲夢沙龍的骨幹開會，向他們通報情況。他們很為我擔憂，但表示會繼續辦好沙龍，觀察動靜。

30·發動蚌埠民運

僅僅一周之後，胡耀邦突然去世的消息傳來，震驚之餘，我感到必須利用這個機會攻擊保守派。我不再隱藏，到處奔走，鼓動人心，幾乎拜訪了每一個朋友。同時我頻頻召集骨幹開會，醞釀策動一場有規模的群眾運動。

四月十七日，在姚冰家裏，我們未來學會的骨幹領導經過反覆討論，決定寫出大量標語，在全市範圍內張貼。我們號召全市人民在四月二十日（星期天）下午四點在蚌埠市中心角園集會，悼念胡耀邦逝世，抗議保守派主政。那時候，我們一點都不知道北京和別的城市的情況，當時的中國就是這樣閉塞。

我們幾個人在姚冰家裏忙了一個晚上寫標語，總共有十幾個人參加，大家都熱情洋溢，幹勁十足。十八日夜，我和陶建寧、盧猛、王勳武、姚冰五人分騎三輛自行車去貼標語，沿蚌埠市從

東到西的重要路口、機關單位全都貼了標語。忙到半夜才貼完大量標語，有兩輛自行車都累垮爆胎了。

十九號晚上雲夢沙龍八名骨幹再次開會，有人帶來可怕的消息，說公安局正在全市追查搜捕貼標語者，已經定性為反革命案。他們一致認為我已暴露，必須離開蚌埠市，免得被捕後可能連累大家。

當天晚上陶建寧就把我送上了火車。我自己也不願意被抓進監獄，也覺得這樣下去早晚會被抓進去。我已被關押過幾次，深知囚徒生活的苦難和無望，所以我想最好還是逃到境外去才比較安全。

我一車坐到廈門，轉到石獅，在那裏停了下來。總結上次偷渡台灣失敗的教訓，我計劃先結交朋友，以熟悉當地情況。錢用光了，我就到小商品批發市場賣報紙。直到五月上旬，我才從報紙上看到北京學生已大規模遊行的消息，聽說泉州華僑大學規模很大，我暫停了偷渡台灣的計劃，去泉州看看。

那裏一點動靜都沒有，幸虧我在車上與人談論學潮的時候認識了一個泉大的預科生，他把我帶到學校，找到另一個同志，然後我們就策劃啟動這裏的學潮。我與他們討論了一個晚上之後，第二天就起草了一份支援北京學潮的呼籲書，準備列印散發。

後來我們又到研究生宿舍去宣傳，誰知遇到了研究生會的主席，一個反動的傢伙，先是與我辯論，理屈詞窮之後竟然追問我是哪裏來的，要看我證件。我只好說在招待所裏，然後我藉口去拿溜走了。我們又到招待所去拜訪一位台灣來的教授，那位教授可能是個台灣赤色分子，胡說什麼廈門的生活水平和台灣差不

多，治安比台灣還好。我們話不投機，匆匆告辭了。

我們又到大禮堂看情況，那裏正在上演電影「真假豬八戒」，這麼惡劣的影片竟然引來陣陣笑聲，而且又是在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要關口，我氣得七竅生煙，斷定這個學校的學生都是廢物，儘管有一半是海外來的學生。

我決定回到蚌埠，那裏有現成的隊伍，我可以呼風喚雨，幹它一場。但我沒有路費，又過了幾天，我總算碰到一位阜陽人武海雷，以前組織過「反革命集團」，被判過勞改三年，我們一見如故，他當即幫我買了車票，並同我乘車回蚌埠。

車上很擠，我看到一位抱著孩子的婦女站了很久沒有座位，就把自己的座位讓給她坐，武海雷大為不滿：「幹大事者不拘小節，你坐一夜車才能到家，明天就要馬不停蹄發動學潮，是民運重要還是讓座位重要？」說我有婦人之仁，成不了大事，所以回到蚌埠之後，他就與我分道揚鑣了。

我一回去立刻召集骨幹開會，才得知四·二〇角園集會竟然有五千人參加，汪挺和另外兩個人發表了演講，迄今沒人被捕，說明當局摸不清政治方向，並不敢輕易動手抓人。看來形勢已經變化得對我們有利了，我要求大家立即行動起來，分頭到各院校串聯發動學生，三天之內上街。我立即把臨時指揮部設在姚冰家裏，聯絡各方。大家也覺拖延太久，耽誤了時機，所以馬上大幹起來，四處出擊。

第二天我又組織了五人演講團，到各院校巡迴演講。我們幾乎橫衝直撞，先到安徽省商業管理幹部學校演講，吸引了大批學生過來聽講，並向我們提出問題，我一一給予回答。接著我們又

到糧校，在學生宿舍樓頂召集同學，五人進行輪番轟炸式演講。晚上則回到指揮部徹夜工作，找來更多的人寫標語、做旗幟，並派出一波波的人出去貼標語。到了第三天，浩浩蕩蕩的學生隊伍終於上街了。

我們立即把指揮部遷往雲夢大廳，努力把各學校聯合起來。學生那邊也在自己搞串聯，幾方面很快就聯起手來。與此同時，大批雲夢沙龍成員趕上來，雲夢大廳一時熱鬧非凡，盛況空前。我在雲夢大廳建立了蚌埠民運總指揮部，任命了一大堆幹部，協調全市的運動，同時組建工自聯和市民敢死隊，為不斷升級的民主運動提前做好組織上的準備。

蚌埠市規模雖然不大，蚌埠民運卻很有特色。與其他城市以學生為主不同，蚌埠民運始終以雲夢沙龍為策動和領導力量，其組織性在全國是最好的，民運參與者也以市民比例為多。大部分中國城市的民運力量都是臨時出現的、分散的，只有蚌埠擁有統一的、規模足夠大的民運領導力量，這就是民運沙龍。

31· 激情燃燒

五月十九日，傳來北京戒嚴的消息，大家驚慌失措，很多人都看不見了，找都找不著。雲夢大廳缺乏防衛力量，為了防備軍警突然來搜捕，我只得帶著幾個骨幹，連夜轉移到醫學院繼續領導運動。我徹夜未睡，收聽廣播消息，並聯絡各方。

二十日上午，在學生們人心恐慌、意志動搖的緊急關頭，為了重新恢復大家的信心，把蚌埠民運進行下去，我決定在醫學院階梯教室發表演講。

當學生們在呼喚下陸續進入教室，我的演講開始之前，十幾個學校領導，彷彿從地下冒出來似的，突然走進教室。他們說我不是該校學生，不應該進來攪亂學校秩序，現在北京已經戒嚴，他們也不允許外人進校搗亂。

我針鋒相對，首先說明了這場運動的正義性，然後反守為攻，責問他們究竟站在哪一邊？是不是站在李鵬一邊，堅決要鎮壓學生？他們支支吾吾，不敢回答，終於激起全體學生的憤怒，齊聲怒吼：「李鵬走狗，滾出去！」從這次事件以後，學校領導層再也不敢公然干預我們的活動了。

我在這次演講中，揭露了共產黨長期黑暗專制給民眾帶來的巨大災難，闡述了這場民主運動的深刻意義，要求大家克服恐懼情緒，拿出奉獻精神，繼續堅持下去，就有可能結束中國的黑暗專政，迎來一個自由民主的新時代！

我的演講結束之後，大家情緒激動，隨後就湧到操場上集合，揮舞旗子，高呼口號，上街遊行了。

從五月二十一日起，我們幾乎每天都遊行示威，我既是總指揮，又是排頭兵。遊行的規模一天比一天大，我們努力鞏固這種趨勢，同時衝擊本市各大單位，引發他們也參加進來，壯大我們的力量。

蚌埠火車站是京滬鐵路樞紐，中轉大站。一天晚上，我們得到報告，有大批外地進京增援的學生被軍警攔截。我立刻在醫學院動員兩千餘名學生去火車站營救，沿途不斷傳來壞消息，說有幾百名學生被軍警強行拖下火車，我下令全體跑步前進。我們像打仗一樣衝進火車站內，徒手直撲大隊軍警。

列隊在月台上的那些軍警驚慌失措，狼狽逃竄，被拖下車的外地學生們又回到車上。直到列車徐徐離站，駛向北京，我們才收隊撤出。從此蚌埠火車站再也不敢以任何藉口攔截進京學生，大批外地學生得以順利北上，增援天安門廣場。

我們還向附近的縣城派出工作組，發動當地的學生，懷遠縣和鳳陽縣的學生也開始上街遊行，甚至長途步行趕到蚌埠參加大遊行。我們還用募捐得來的錢，製作大量宣傳品到處散發，同時竭盡全力資助大批學生北上，因為畢竟北京是主陣地。

我們在醫學院站穩腳跟之後，為了在市中心占領一塊陣地，打亂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機制，我在五月二十五日數萬人大遊行之後宣布在市政府門口絕食抗議，並且組建絕食團。隨後王興全、趙鳳榮等大批人參加進來，我任命姚冰、盧猛擔任現場正副總指揮，協調各路人馬。我們終於占領了這個城市最重要的陣地，可以更好地向蚌埠市民宣傳我們的主張，把運動引向深入。

任何憤怒都不能使我，
願意傷害一棵小草，
所以我絕食。

在熱烈的期望中，
淒然微笑著哀求正義。

用青春和生命的熱力，
融化掉镣铐。

——〈絕食者〉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絕食現場。

蚌埠市委市政府對此十分憂慮，首先他們不得不將辦公地點轉移到南郊的海軍學校，他們擔心局勢發展下去，我們可能占領市委大院。

全市的交通都被斷絕了，各主要公交車都被迫停止運行，大部分工廠也被迫停工，在白天，人群從四面八方趕來聽我們的演講，許多人加入示威隊伍，普通市民更加瞭解這場運動的重要意義。

蚌埠當局坐臥不安，企圖瓦解我們。五月二十六日深夜，大批軍警在附近集合，企圖衝擊我們，我們緊急動員，嚴密防守，終於挫敗了他們。但是，蚌埠市畢竟只是一個五十萬人口的中等城市，各校學生加起來不過一萬人，一部分同學在北京，加上南方空校罷課浪潮的錯誤影響，各校又已宣布放假，我們的力量開始衰弱，大家也漸露疲態，夜晚的人就少了，這使當局有機可乘。

五月二十七日夜，附近醫院派出救護隊給絕食者檢查身體，他們說我們已極度衰弱，給我們每人注射了一針強心劑。我一會兒就昏迷過去了，而且一直都是迷迷糊糊的。

後來我意識到他們給我打了催眠劑，依稀聽到現場很混亂，當局動員絕食者家屬來吵鬧，要把絕食者帶走。我想阻止可怎麼也說不出話來，他們把我抬到擔架上，我急怒交加張嘴要喊，竟然有人用手堵住了我的嘴，我拚盡力氣在那隻手上咬了一口，然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直到兩年之後，我才知道，我咬的是我母

親的手，傷痕猶在。

當我醒來已是次日清晨，我發現自己睡在學生宿舍裏，四個面孔陌生的學生守護著我。我問他們一些問題，他們支支吾吾的，我感到不對勁，我知道當局在幕後的拉攏腐蝕一直沒停。我起身上廁所，要求那個跟著我的人回去給我拿點手紙，然後走到窗前一一看，這是醫學院學生宿舍的二樓。

我立刻爬出窗子，抱著下水管道下去，然後一口氣跑出了校園。當時是凌晨，校園內外都沒有人，在大街上我看到一騎自行車的，就請他把我帶去市政府。

當局的工作很有成效，我們的陣地幾乎被瓦解了，只剩下工自聯領導人王興權帶著幾十個人還在那裏苦守。我感到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大家實在太疲勞了，連我自己都快撐不住了。我要求他們立即結束絕食，放棄這個陣地，回去休息一下，然後整頓組織，再作打算。

蚌埠當局已經確定我是主要的對手，開始加大對學生領袖的拉攏力度，許多人動搖了。財貿學院的情況更令我擔憂，學生們一連罷免了三任「學自聯」主席，我決定前往穩定人心。我帶了九個學生護衛趕去，立即在校中心路口舉行演講，隨後我又到學生宿舍與幾位學生領袖座談，鼓勵他們搞好團結。趙強和呂倫都是原雲夢沙龍成員，一向勇敢堅定，最後被推選為領導骨幹。

那時我離開大學已經四年了，但我仍然是蚌埠市高自聯、工自聯、市民敢死隊、絕食團、雲夢沙龍唯一公認的運動總指揮，每天我必須指揮全市的學生工人和市民遊行、演講、開會、寫標語。各種消息不斷傳來，有時還要整夜開會。

記得有一個星期裏，我住在醫學院學生宿舍裏，每天狂熱的奮鬥二十三個半小時，只有凌晨七點，在布置好一切工作，至七點半遊行隊伍出發之前，我才可以趴在桌子上睡半小時。

那一個星期裏我也沒吃食物，也不感到餓，只是每天要喝十幾瓶果糖汽水。我感到這是一個千載難逢推進民主的機會，所以豁出命來大幹一場！什麼都顧不上了。

六月一日，南京學生計劃長征到北京支援學運的消息傳來，我們十分高興，迅速做好了準備接應的工作。我們準備動員數千學生市民加入長征大軍，直奔北京。遺憾的是，長征隊伍在滁州地區就被軍警攔住了。

空校罷課肯定是一些民運內奸想出來的主意，一下子就把這場民主運動的主力——學生隊伍給瓦解了。雖然有很多民間小團體也正在應運而生，發展成員，積極聯絡，但工人和市民有組織的隊伍短時間內還不能形成，大家還在相互觀望，雲夢沙龍內部也是搖擺不定，中國人太患得患失了。

我後來總結教訓，就是我們這些骨幹，尤其是我自己，把絕大部分精力用來衝鋒，而用於系統組織建設的時間和精力太少了。

所以在「六四」之前的那幾天裏，大家都有一種筋疲力盡、等待新生力量出現、等待全社會民眾跟進的感覺。

32·「六四」之後

六月四日夜，北京血腥鎮壓的消息傳來，我們怒不可遏，徹夜總動員。五日上午，我帶領數千人衝進市委大院，我下令把大

花圈掛在主樓正中央，然後在主樓廣場召開追悼「六四」英烈的大會。我和汪挺發表了演講，我在演講中指出：「李鵬一夥已經表明他們的頑固立場，未來的鬥爭將是殘酷的和持久的，我們不能束手待斃，必須加緊建立有戰鬥力的自衛組織，在敵人把槍口對準我們開火之前，擁有足夠的自衛能力。」

然後我們高呼口號：「血債要用血來還！」，「組織起來，以武力自衛！」隨後我便把工作重心放到籌備武裝暴動上。

六月七日，被大屠殺激怒的毛條動力廠車間主任魏輝下令停工停產，然後動員帶領大批工人和學生占領了市中心各交通樞紐。我中午時分趕到，我們驅趕了交通局警亭交警，用他們的大喇叭指揮斷絕交通，緊急招募市民敢死隊隊員。但是我們的戰線拉得太長，衝擊力度不夠。

到了下午，見我們疲態已露，大批警察手持電警棍，排成方陣，逼近我們的交通局陣地。我走過去命令他們離開，他們竟敢不從，我一揮手，瞬間便爆發了一場混戰。

我們雖然人多勢眾，但沒有系統組織，還是被打敗了。我站在警察包圍圈中，但是他們沒人敢動我。警察也害怕我們再次進攻，倉皇撤退了。我明白這樣赤手空拳幹是不行的，沒有紀律嚴明的組織也是不行的。

目前敵強我弱，必須組織精幹力量突襲敵人，一舉占領敵指揮中心，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我把秘密指揮部設在張公山一處民宅裏，不斷派人去聯絡各方，刺探敵情，籌備武裝起義。

但是敵人更狡猾，早在半年前就派特務周廣同潛入雲夢沙龍，而且漸漸取得了我的信任。我曾派姚冰調查這個人的底細，

姚冰沒發現問題。在關鍵時刻，周廣同表現得異常勇敢堅定，我竟然委派他去偵察淮河鐵路橋地形準備炸橋，他七號晚上還把手繪的圖紙交給我，後來還因此給我加上了一條反革命破壞罪（未遂）。

天安門民主運動遭鎮壓之後，各地民運都被鎮壓，蚌埠市也不例外，大部分同志和戰友都匆匆逃走了。而我連逃跑的念頭都沒有，心裏燃燒著復仇的烈焰，我決心組織大家抵抗到底。

六月八日那天上午，我剛派一個人去聯絡同志，又派了一個人去偵察駐蚌舟橋部隊軍火庫，然後我坐下來起草一篇〈討共檄文〉。剛寫了一半，聽到輕輕的敲門聲，我以為是來向我匯報情況的。我一扭開門鎖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倒，我企圖站起來，幾條大漢已湧進來，為首的一拳擊中我的肚子，其他幾個人就把我按倒在地。後面又有幾個人衝進來，衝往裏面的房間。

他們用一根繩子把我的雙手捆在背後，又抓了一條毛巾塞進我嘴裏，然後給我披上一件西服，把我架到門口，塞進正好停在門口的一輛吉普車裏，飛快地開走了，後面還有一輛小轎車掩護。從頭到尾都像是精心設計的綁架。

到了郊區，他們掏出我嘴裏的毛巾，我鎮定下來，問他們是幹什麼的？為什麼要綁架我？為首的喝道：「不准說話，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我被捕之時，身上只有兩元錢，桌上只有一個饅頭和一根黃瓜，那就是我的午餐，可惜我還沒來得及吃，我正在緊張地起草一篇討共檄文：

「李鵬一夥終於撕下了偽善的面具，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出動坦克，揮舞刺刀，大打出手了。北京數千學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現在到了我們拔劍而起，挺身捍衛正義的時候了！再不能猶猶豫豫，坐以待斃，我們已經被壓迫奴役了四十年！全蚌埠人民，全安徽人民，全中國人民都要積極行動起來，武裝起來，向李鵬一夥討還公道！」

這篇沒寫完的檄文後來被市委書記楊道德在全市千餘名縣團級以上黨政軍幹部大會上高聲朗讀，然後怒問：「對這種極端瘋狂的，反動透頂的反革命頭子，我們能不堅決鎮壓嗎？」

我遠在五十里以外的祖父也聽我表弟維方說，我被抓住了，肯定要被槍斃了。我祖父痛不欲生，他找了一條結實的麻繩繫在腰間，告訴大家，只要他一聽到孫子被槍斃的消息就上吊自殺，因為再也沒有活下去的理由！

在八九民運期間，我曾掌管了大筆捐款，我總是安排兩個人以上共同記帳，我自己從來不碰一分錢。那段時間所有的花費我都是自掏腰包，我也不允許任何部下花費捐款，全部派人送到北京，送到天安門廣場。所以連那些審訊者都不得不佩服，八九蚌埠民運在財政方面太純潔了。

我也不允許大家損壞任何公私物品，一切財富都來之不易，我一再提醒大家要愛護一草一木。我從中的體會是：只要領導人廉潔，部下也絕對廉潔。

領導人不貪污，部下誰敢貪污？那會被當成賊一樣打！所以任何腐敗都是自上而下的，腐敗的根源永遠在領導上頭。

那個階段我每天發表數次演講，蚌埠醫學院、安徽財貿學院、安徽省管理幹部學校、安徽省糧食學校，從市政府門口到交

通局，到捲煙廠那一段蚌埠市中心區域，幾乎每一個路口都留下了我慷慨激昂的聲音。

每到我演講，周圍數千人就會鴉雀無聲，屏息傾聽我的怒吼，我的悲鳴；我發自肺腑，發自靈魂深處的聲音。那是這片土地已久違了四十年的自由吶喊。

那時我有如神助，我的的確確感到一種神性，感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驅使著我，自由女神在引導著我，向前！向前！向前！我感到我積累了十幾年的思想、激情、悲憤現在都如火山熔岩一樣怒噴怒放！

我願意用我這枝生命，像默默期待一生的禮花爆竹那樣，衝向天空，即使粉身碎骨，只要有片刻輝煌，能照亮黑暗大地，給心靈已枯乾麻木的中共奴隸們一點自由的希望！

33 · 歷史資料

【資料1】《中國地方志·蚌埠志》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摘要）：

捕獲動亂首要分子張林。

……張林以「雲夢沙龍」、「未來學會」、「三楚學校」為名「廣結良友」，在蚌組建「中國民主黨」，並在合肥、屯溪、安慶、滁州、蕪湖、阜陽、蚌埠等地區設了下屬組織，公開鼓吹「政治民主化、經濟私有化、文化自由化」的政治綱領，企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張林往返於蚌埠北京之間進行反革命串聯，兩次至王丹主持的北京大學「民主沙龍」進行「必由之路」、「壟斷與競

爭」的反動演說，並密謀策劃成立「蚌埠各界青年聲援團」，張貼「啟事」，散布謠言；集會角園，煽動糧校、蚌埠醫學院、安徽財貿學院、商幹院成立「自治會」、「高自聯」，宣讀〈蚌埠市人民聲援書〉，號召罷課、遊行示威、靜坐絕食，聲援北京動亂活動。

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張林親往蚌埠各大、中專院校遊說，先後幾次指揮學生遊行、衝擊火車站和煙廠、散發反動傳單、播放「美國之音」。……

五月二十五日，張林又帶頭在市委、市政府門前絕食，兩次造成勝利路交通癱瘓；

六月四日，張林得知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隨即在「民主政治中心」、「人權辦公室」基地和蚌埠醫學院布置「應變計劃」，指使「工自聯」、「高自聯」化整為零，分頭組織「敢死隊」上街遊行，衝擊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一中、印染廠等處，強占交通崗亭，並在市政府門前召開所謂死難學生的「追悼大會」，叫囂「血債要用血來還」，煽動「全市暴動」。……

【資料2】《蚌埠日報》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第一版（摘要）：

蓄意製造我市動亂的首要犯罪分子，蚌埠市「高自聯總指揮」張林，六月八日中午被公安機關依法逮捕。

據蚌埠公安局負責同志介紹，自四月以來，張林在蚌埠犯下了大量的反革命罪行。

……五月三十日，張林再次到蚌埠醫學院、安徽財貿學院演講，煽動學生繼續罷課，揚言要把蚌埠醫學院建成「民主政治中

心」，在蚌埠醫學院設立「人權辦公室」。

六月五日，張林等人帶領在他們組織下成立的「敢死隊」上街遊行，衝擊市委、市政府大院。

六月七日，張林等人策動、指揮受矇騙的學生，在天橋、交通局等地段設置路障，堵塞交通。在交通局路口，張林手持電喇叭，瘋狂叫囂「暴動！暴動！全市暴動！」

……在公安機關收穫張林大量的來往函件中，滿篇都是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仇恨語言。

……在廣州公安機關押送安徽途中，從安慶逃跑。一九八七年八月，張林又企圖偷渡台灣，在海邊實施偷渡時，再次被抓獲。

【資料3】安徽省蚌埠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90）蚌檢刑字14號（摘要）：

被告人張林，……。因擾亂社會秩序和聚眾堵塞交通秩序一案經本院批准逮捕。蚌埠市公安局偵查終結，以陰謀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煽動罪、反革命破壞罪（未遂）移送本院審查起訴。

……張林……組織了「蚌埠各界青年聲援團」，指派學生進京對北京地區動亂進行聲援。並寫信給方勵之、李淑嫻，要求「立即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黨，將風起雲湧的民主力量團結在一面旗幟下」。還編製了組織機構。被告人張林在給王丹等人的信中稱：「……你們開始英勇的絕食鬥爭……這是關鍵的階段，……從而將民主革命推向高潮，持續的時間越長越好，……你們結束的日子應該是中國民主黨宣布誕生的日子。」

張林……煽動說：「要以無限期地靜坐來抗議，……我們這個民族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打倒專制的XX集團，他們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黑暗的犯罪集團，……」

……當戒嚴部隊奉命平息北京的反革命暴亂後，被告人張林帶領學生衝進市委開追悼會並發表演講。又讓人把花圈掛在市政府辦公樓上，帶頭呼喊反動口號「血債要用血來還！」「絞死XX！」

「……我們這個民族已到了災難崩潰的邊緣，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這樣繼續下去，我們只有死路一條。」「必須行動起來，才能把我們這個民族……從災難中、黑暗中解放出來，……」

34 · 驚慌失措的中共

「六四」之前的幾天，真正的民運力量，其實已經筋疲力盡。大家只有無奈的等待，中間分子全力在堅持有一個結果。但是共產黨絲毫不知道這一點，反而認為威脅越來越大，必須下狠心出動大軍和坦克開火了。這就是老人專制的可悲性，鄧小平幾乎不能理性地判斷局勢。

共產黨根本沒有認識到，這場運動的主力，是一年級大學生。他們沒有一點政治經驗積累，政治能力也極為有限。無論鎮壓與否，這個民運主力團隊，早晚要一哄而散的。而當時中共認定的黑手，劉曉波、陳子明、王軍濤、方勵之都沒有直接參與政治領導和組織工作，只是在思想上影響學生，何況他們手下也根本沒有可以運作的政治團隊，每個人只能發揮個人影響。

真正投入這場運動的知識分子，只占全國「知識分子」的千分之一。而立場堅決、行動果斷的知識分子比例，可能只有萬分之一。這些人從來沒有機會交流合作，匆匆湊在一起，早晚也要吵個不休的。那段時間我最頭疼的就是開會，十幾二十幾個人爭來吵去，一個晚上甚至整整一夜都解決不了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後來我幾乎不願再參加會議，寧可思考或發出指示。

城市工人出於習慣性思維，又看不到現實利益，幾乎不可能大批加入進去。至於占中國人口三分之二的農民，更不可能加入這場民主運動。

所以這場運動根本沒有真正威脅共產黨政權。

但是中共統治集團太腐朽、太無能了，根本想不清楚，根本反應不過來。其實只要同意高自聯的兩項要求，即承認高自聯和承認這是一場民主運動，學生隊伍就會撤出天安門廣場，滿天的烏雲就會散去。回過頭來一看，這也就是一場耽誤了談判時間，但最終還是通過談判解決了的學潮而已。

因為學生畢竟還要回到學校上學的，其他少量的知識分子，也只能用其他方式，繼續宣傳民主理念，逐步建立民主政團。而無論學生還是知識分子，一旦面臨如何組織與長期存在問題，就會吵成一團，根本不可能再對共產黨構成多大的壓力。只要此後共產黨舉措稍微得當一些，就可以從容調控。

當時其他方面的亂象，包括軍隊的不穩定，各級政府機關和官員的動搖，都是一種假像，全是由於中共領導人的猶豫不決和喪失管理造成的。幾個講話、幾篇社論和一些電報電話就可以穩定局勢，根本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我們不得不悲哀地承認，其實就在「六四」前幾天，新生的民運力量意氣已盡，隊伍已出現渙散跡象，而且誰也沒有辦法挽救頹勢。大家必須回家休息了，太累了。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

真正堅決留在大街上和廣場上的民運骨幹，為數寥寥，也就不會堅持多久。他們也必須與群眾在一起，否則毫無力量。

與中國相比，東歐共產黨國家的工業化程度高得多，宗教力量也強大，文化水平也高得多，與西方文明在地緣上和文化傳統上也更接近。而沒有這些條件的中國，當時並不可能迅速出現一股強大的力量，去推翻共產黨政權。

鄧小平等人，更沒有考慮到，由於共產黨四十年前，毛澤東幾乎血洗了民主力量，以及連續四十年的黑暗極權專制，一波又一波的清洗運動，中國人的素質已經降到了人類最低點，愚昧和野蠻導致中國人根本沒有多少公平合作、建立民主政黨的可能性。一個能夠威脅共產黨政權的、強大的、協調的反對黨陣營，即使中共允許生存發展，沒有十年二十年的時間，也幾乎沒法形成。

解放軍向學生市民開火的結果，形成了一個死結，把扭轉中國人苦難命運的一次機會，把中國引向自由民主前途的一次機會，就這樣可悲的葬送掉了。

而共產黨也就只有沿著野蠻專制的黑暗道路，繼續摸著石頭過河。



第四章 鐵窗歲月

我們從容的走上祭壇，
躺下來閉上眼睛，

我們是自覺自願的犧牲品。
最聰明的頭腦最挺拔的身軀，

一層層疊上去，
構築民主大廈高聳入雲！

——〈祭祀〉一九九一年八月

35· 生死考驗

那夥綁架者在路上把綁我雙手的繩子換成手銬，把我雙手銬在背後。到了一百里以外的五河看守所，我才確信他們是便衣警察。他們慌亂中把手銬鑰匙弄丟了，怎麼也打不開手銬，撬也撬不開，最後只好找一把鋼鋸來鋸開，折騰得夠嗆。看守所長突然想起來搜搜我的身體，竟然搜出一個厚厚的筆記本，他們如獲至寶。這個所長實在多事，原來那夥綁匪忙亂緊張已極，根本沒想到搜查我。

那間大囚室連我只有四個人，我估計另外三個人都是監視我的。在裏面一點消息也聽不到，審訊者以死威脅我交代問題。我幹的事也實在太多了，實在無法估計共產黨怎麼收拾我。預感到前途兇險，生死莫測，我便把一首前人作的囚詩寫在牆上：

慷慨過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頸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四天以後，鐵門突然大開，四名武警站在門外，兩名過來架住我，兩名持槍在後面警戒。這種很不尋常的陣勢，蹲過看守所的人都知道，有些類似處決死囚的陣勢。

平常審訊都是一個幹部過來喊你出去，武警只負責看守大門，在屋頂巡邏警戒，不與囚犯近距離接觸的，因為他們擔心手裏的槍被搶奪。號子裏監視我的三名囚犯都用生死訣別的善良眼神看著我。我不明白敵人要幹什麼，有點緊張，但是想到寫在牆上的詩，想到士可殺不可辱，便勇敢地昂起頭顱，挺起胸膛，慷慨迎接一切！

兩個武警的個子都沒我高，這更襯托了我的英雄氣概。他們架著我走到大院盡頭，又走進一個巷子，好像是武警宿舍，走著走著，怎麼又走回大院了。然後有人命令他們再走一圈，我迷惑不解，但把頭昂得更高了。

最後他們竟然又把我架回牢房。多年以後，許多認識我的人告訴我，他們從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裏看到過這個鏡頭，我一副大義凜然、英勇無畏的樣子。原來他們是為了拍電視新聞鏡頭以恐嚇人民，效果卻適得其反。

一周後他們把我轉押到蚌埠看守所，竟然只有三個人押我，我才感到形勢不妙。途中我看到馬路兩邊農房十分低矮，茅屋居多，就歎息道：「你們看看，幾十年來你們把農民弄得多窮？不感到有罪嗎？」後來一直主審我的陳炎林冷冷地說：「農民就是農民！永遠都是農民！」

多麼可怕的觀念，共產黨人驅使農民為他們流血打下紅色江山，卻認為農民應該永遠貧困，而他們自己反倒高人一等了！

36 · 漫長的審訊

漫長的審訊開始了。因為與我有關的人和事特別多，所以他們的問題也多如牛毛。在99%的問題後面，我的回答都是這幾句話：「我不知道。」「我忘了。」「我想不起來了。」「無可奉告。」或者乾脆沉默。

只有我感興趣，認為可以乘機開導他們的問題我才侃侃而談，引經據典，說明道理，試圖轉化他們，把他們的死腦筋弄活。陳炎林則稱我在反審訊。他們也從各種角度軟言勸我，識時務者為俊傑，不要一條道走到黑，我還這麼年輕。反覆較量多次以後，他們忍不住問我，究竟是什麼力量使我如此頑抗到底，死不交代任何問題？

我說：「自古以來邪不壓正，真理終將戰勝謬誤，邪惡不可能永遠橫行，正義力量最後一定會勝利！鄧小平快死了，李鵬一夥也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

陳炎林死死地盯住我，陰森森地說：「恐怕是白髮人給黑髮人送行！」然後他們把以上那些話都做成筆錄，讓我簽字。我又不是傻瓜，硬要給自己增添罪名，當然拒絕簽字。而且從那以後，我就幾乎不在審訊記錄上簽字了，除非我確認對我有利。開頭幾回他們還暴跳如雷，後來也就無所謂了，我估計他們另外還有錄音。

據說陳炎林是蚌埠市最厲害的辦案人，有一次他很認真地勸

我：「自從一九五六年開始，蚌埠市的所有反革命大案要案都是我負責偵辦的，所有人後來都坦白交代了，像你這樣頑抗到底的我也碰到過一個，是一個蔣特，經過我長期的嚴審，他最後還是坦白了。」

「坦白以後呢？」我忍不住問。「從寬判處無期徒刑，送到改造場所去了。」陳炎林答。「哈哈哈哈哈！」我狂笑起來，「哈哈哈哈哈！你以為我會去蹲無期徒刑嗎？我寧可被槍斃也不願去受那個罪！哈哈哈哈哈！所以你們以後不要再來煩我了！」

「放肆！」陳炎林猛拍桌子，「我們會弄清一切的！你會罪有應得的。」陳炎林的兩個部下，洪彥民和另一個壞蛋，伸手要來抓我打我，被老闆制止了：「我們依法辦事。」所以在那數十次審訊中，我並沒有挨過打。

後來我聽說了陳炎林的經歷，很滑稽。他的確是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專辦反革命大案要案，但是一九五九年，他們預審科裏有個人到百里之外的蒙城辦案，抓了一個反革命，用繩子捆住手，拴到自行車後架上拖著跑回來。

可能是太累了，也可能是一路上受到那個反革命的影響，這個科員回到辦公室就跟同事描述沿途路邊的樹皮都被啃得光光的，誰知那個人轉身就去報告科長，檢舉同事思想反動。

科長張朝陽叫來陳炎林，兩個人一起審訊那個被告發的科員：誰把路邊的樹皮啃光了？說這話什麼意思？為什麼要這樣說？立場站在那裏？那位科員一頭冷汗反應過來，想起當時並沒有第三人在場，所以一口咬定被誣告了，他什麼也沒有說。此案沒有旁證，不好立即定論，加上工作繁忙，他倆把這件事暫時放

在一邊幹別的事去了。

幾天以後，局長把他倆叫去執行一項任務：把那個被告發的同事送去勞教三年。他倆估計那個告發者又去找局長告狀了，局長另外安排人審理結了案，也就沒想太多。兩人匆匆地把那個倒楣蛋送到勞教所，遞上漆封的公函，交接過人，轉身要走的時候卻被攔住了。勞教所管教股長冷冷地說明：「謝謝你們送人來，但是這封公函說得很清楚，你倆階級立場不鮮明，對右傾分子鬥爭不堅決，所以也得留下勞教三年。帶進去！」兩人氣得幾乎要互相撞頭而死！

所以我猜想陳炎林堅持不准打我可能與他這段慘痛的經歷有關，無論我多麼猖狂。

那時候號子裏做火柴盒，一般每人一天的任務是一千個，我們十八號特別優待，每人做四百個，對我最優待，每天做一百個。到了夜裏我就悄悄的爬起來，在做好的火柴盒上寫傳單：「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正義必勝！」「暴政必亡！」然後摻在大堆裏。

後來有一天看守所余所長把我叫去說：「我們並沒有額外苛待你，你卻老是給我們添亂，煽動囚犯反對我們，過去這可都是現行反革命罪行。你還老是在火柴盒上寫傳單，害得我們天天檢查每個火柴盒，累得要死！難道你真想死嗎？現在我們停止你們號子的勞動生產，看你還怎麼搗亂？聽聽我們的勸，好漢不吃眼前虧！你還這麼年輕，我們都替你惋惜！」

說句老實話，在我的八年被囚禁生涯裏，那一年對我是最客氣的。也可能因為我在家鄉有點名氣，我十六歲就去參加高考，

得當地最高分去讀清華。地方省市報紙多次報導過我的事跡，這次八九民運更使我在當地大名鼎鼎，至少公安局裏沒一個不知道我的。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八九年時，民眾內心裏支援我們，普遍同情我們。九〇年以後人們對此的感覺就淡漠了，看守對我也兇起來。從我嘴裏掏不出任何有用的東西，審訊者就很少來找我了，但由於末梢神經炎，我的日子越來越難熬了。

後來蚌埠市公安局先後以擾亂社會秩序罪，破壞交通秩序罪逮捕我，後來又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反革命破壞罪（未遂），陰謀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向檢察院提出訴訟意見。用他們的話來說，我是一個五毒俱全的、五項全能反革命，如果當時就審判，簡直可以判我死刑。

幸虧我的案子太複雜牽扯太多，我又拒絕交代任何問題，迫使專案組必須進行大量調查，遠赴雲南北京，遍及安徽各地，收集大量材料。結果此案一直拖到一九九一年二月政治形勢轉變之後才正式審判，匆匆把我按照學生領袖的判罪標準結案。許多指控被檢察院依照新的政策撤銷掉了，僅僅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我兩年徒刑，法院判決之後我也因病得要死提前三個月出獄了。

我特別自豪的是，在那長達一年半之久的審訊中，在我並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甚至連生死都無法估計的情況下，我保護了所有的同志和戰友，甚至一些解放軍軍官。

我沒有出賣任何一個人，沒有給任何人帶來一點點麻煩，而是恰恰相反，我掩護了他們數百個人。在他們被審訊的時候，無論他們怎麼說，公安局都必須相信，因為我幾乎什麼都不肯交

代，我非常害怕說的不一樣會給他們帶來麻煩。這樣就導致所有的責任，所有的罪過都被加在我的頭上。也罷，反正我是死豬不怕開水燙！罪名多少無所謂了。

整個皖北民運的所有領導罪責，最後都被套到我的頭上，儘管有些我並沒參與，甚至都不知道。比如「中國青年先鋒黨」，「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這兩個反革命組織，我就毫無所聞，但是《蚌埠日報》卻一口咬定是我領導建立的。

只有到最後，主審法官陳山海告訴我，只要我對我自己的確鑿「罪證」，也就是那些演講錄音不否認，不給他們的審判工作添麻煩，就算合作，就算有認罪悔改態度。如果判決後十天不提上訴，他們就會釋放我，他們不想讓我病死在監獄裏。

因為我的許多演講是在市中心，而且由於成千上萬聽眾鴉雀無聲，屏息聽我演講，所以公安局的錄音特別清晰、完整。在法庭上播放那些錄音時，當那遙遠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聲音迴盪在我耳畔時，我雖病勢沉重，渾身顫抖，還是忍不住熱淚奪眶而出，終至淚流滿面。

我的聲音竟然那樣激越！我的聲音曾經那樣激昂！如金石交錯，如陣陣雷鳴！那也許就是我青春的證明，那也許就是我一生的價值所在，我怎麼肯否認？

37· 日夜煎熬

自古以來，被監禁本身就是做人最大的痛苦。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坐牢，即使天天可以吃美味佳餚。所以人類普遍採用這種方式懲罰罪犯，威懾犯罪。

但是在中國，監禁卻變成了維持黑暗專制的專政工具，經常用來打擊好人。在監禁時還要加給你羞辱和嚴重的虐待，令你度日如年，痛苦不堪。所以很少有人願意回憶這種痛苦經歷，寫下這種屈辱經歷，尤其是熱愛面子的中國人。

我在回憶並寫下這些經歷的時候，心情沉重，眼中常噙淚水，夜裏常做惡夢。還有恐懼，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幾個人闖進來再把我抓走，再投入人間地獄，再過生不如死的生活，並且沒收我的電腦和寫在裏面尚未發表的文章。

被釋放以來我始終受到嚴密監控，就在幾天前，公安局還威脅我別出遠門，否則後果莫測。剛才有個人敲門找人，令我坐立不安、疑竇叢生：會不會是公安局偵察員？看看我是否確實在家，一會兒好來抓走我？

好久我才定下心來繼續寫作。命運自有上帝安排，上帝注視著每一個人。

上帝保佑我吧！

看守所裏最可怕的是擁擠。晚上睡覺，每個人連平躺下的寬度都沒有，地下都睡滿了人。大部分情況下只能側身睡覺，也不能隨便翻身，有時動一動都不行，會碰醒兩邊緊緊挨著你的人，那就可能導致一場激戰。

小便憋得再急，也要盡量忍住，否則等你回來，就再也找不到睡覺的地方了。這樣睡久了會令人渾身骨疼，感覺就像被捆綁起來，就像四肢被釘在牆上的蝙蝠，或夾在書裏的標本，而且是活的標本。我在看守所的時候，最大的夢想就是能獨自擁有一張床，可以展開四肢，可以翻身，不會碰到別人。

這是一種異常難熬的苦難，就像長年累月坐在擁擠不堪的火車上。每次一想到那種情景，我就不由得感到悲憤，萬物之靈長的人類竟然會如同一堆貨物一樣堆在這裏，受如此屈辱，受如此煎迫，受如此磨難，給我一千個一萬個理由反對共產黨！

他們太荒謬了，他們太野蠻了，他們背離正常人性太遠了！僅僅他們這樣折辱人類就是不可饒恕的罪行，何況還有其他一千樣一萬樣！

過度擁擠也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矛盾的主要原因，大部分鬥毆與此有關，哪怕手指頭寬的地方都要長期爭奪，國與國之間說寸土必爭是過於誇張，只有在看守所裏才是真正的寸地必爭，你必須時時刻刻向你的左鄰右舍表明，你將浴血捍衛那厘米之距。牢頭獄霸建立恐怖統治的原因之一也是為了能每天晚上自己睡得寬敞點，不挨擠，不被擠醒無法入睡。

人像刺蝟，相距太遠了會彼此思念，相距太近了會彼此厭惡，如果成年累月每天二十四小時近在咫尺，聲息相聞，腿腳相碰，會彼此厭惡，而且與日俱增，到隨時可能爆炸的程度。

所以儘管只要打架就會被幹部拖出去踩在腳下用竹片痛打一頓，再戴上背銬，許多人還是忍不住仇恨要痛打一架。我在蚌埠看守所每天都會聽到「砰砰砰砰」的聲音，那是有人在鋪板上打架，如果聲音特別雜亂，那就是在打群架。

看守所懲罰打架還有一種酷刑，叫「蘇琴背劍」，就是把人一隻手從脖子上拉到背後，把另一隻手從脅下拉到背後，然後用銬子把兩隻手拉銬在一起。一會兒你的上半身就全麻木了，晚上根本無法入睡。帶鐐也是很痛苦的，換衣服洗澡上廁所都很困

難。不過最恐怖的刑罰還是「花起來」，就是用細麻繩把人五花大綁，綁的人喘不過氣來，細麻繩會勒進肉裏，痛苦不堪，還會給人留下殘疾。

還有可怕的半夜襲擊。有一天晚上我被嚎叫聲驚醒，起身看到吳好正揮動一塊鋪板痛打相鄰而睡的四川人，四川人已經滿頭滿臉的血，失去抵抗能力，抱頭嚎叫。

吳好還在痛打，被驚醒的人都退向一邊觀看，我知道吳好幾天前接到無期徒刑的判決書，之後多次揚言：反正要在勞改隊待一輩子了，不能老是側著身子睡，至少要平躺下來睡覺，即使他再挖掉一個人的眼珠子加上七年刑也還是無期徒刑。他要打人立威，而且往死裏打，看誰還敢擠他！現在慘劇終於發生了，所有人都感到害怕。在看守所，碰上這樣瘋狂的死刑犯或無期徒刑犯真讓你沒辦法。

眼看著吳好要把四川人打殘打死了，下一個不知要輪到誰，吳好完全瘋狂了。我推開大家喊道：「必須制止他，否則要出人命，後面就會輪到我們每一個人！」然後我率先衝上去奪鋪板，吳好放棄鋪板猛擊我一拳，我扔掉鋪板回擊，這時大家才一擁而上，圍擊吳好，終於把吳好打倒在地按住。

要是白天，幹部早開鐵門進來了，但是夜裏幹部輕易不敢開門，我們只得死死地按住吳好。拖了很久，值班幹部才睡眼惺忪地帶著五、六個二勞改和一個持槍武警打開鐵門，把吳好拖出去銬起來調到別的號子。

到了夏天更難熬。看守所的牆又厚又高，沒有窗戶，鐵門緊閉，又擁擠不堪，熱得你頭昏腦漲。在蚌埠看守所，每年夏天從

五月初到九月底，我的頭都是昏沉沉的，好像夏天坐在火爐上，不停地流汗，又無處可避。

沒有任何辦法，大家只有脫光衣服來減少暑熱。白天不行，必須穿一條內褲，否則幹部要打。到了晚上，所有人都會脫光衣服，像一群動物一樣喘著粗氣，苦熬時光，牢房裏完全成了動物世界！

全看守所都不例外，包括隔壁十九號，那是唯一的女號，夏天也只有脫光衣服避暑。有好多次，我們聽見女看守在臨下班前站在天窗走廊上厲聲斥罵女囚們：

「你們這些不要臉的聽清楚，今天晚上誰再敢脫光衣服睡覺，明天我一定給她上背銬，看她還怎麼脫衣服？太不要臉了，脫得光光的，害的值班的幹部武警都來看。有的更不要臉的還站起來走來走去，想跳裸體舞啊，有人還向武警討東西吃！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機關，不是脫衣舞場！有的武警也不巡邏放哨了，趴在這裏一看就是幾個小時，如果有人越獄了也是你們造成的，要判你們刑！」

38 · 吃豬食

小時候聽大人談到鄰居張化武因偷聽台灣廣播節目被判十五年徒刑，我爸爸就會歎一口氣：「要喝十五年的稀飯啊，還要幹重活，那日子比六〇年還苦，哪能熬過來？」

我家還有一個鄰居在文化大革命時是革命派領袖，每天開大會領著革命群眾喊口號，有一回實在喊累了，舌頭髮麻，把「打倒劉少奇保衛毛主席」喊顛倒成「打倒毛主席保衛劉少奇」，立

刻被打翻到台下，打成現行反革命，送去喝稀飯了。

所以老百姓一談起勞改隊，就說喝稀飯去了。直到現在，囚犯的糧食定量雖然在一斤左右，但是經管人剋扣，又沒有副食品，身體需要的許多營養都缺乏，至少一半人還是長期挨餓。不挨餓的人也是靠家裏送錢買速食麵補充，但每個月只賣一回，吃完了還得挨餓。

人在長期饑餓的情況下頭腦會變得異常空虛，整天光想吃東西，整天回憶曾經吃過的東西的滋味，幻想著有一天可以再吃到。別的想法都從腦海裏出去了，被饑餓感驅走了。彷彿整個世界存在的問題僅僅是有什麼東西可以吃，可以填飽肚子。

記得有一回一個二勞改送給一個在我們號子的朋友一盆豬油，大約有一斤多重，這傢伙居然餓得一口氣吃了，使我們目瞪口呆。然後他拉了一天肚子。剛抓來的人一般當天吃不下粗劣無比的飯菜，往往瞬間就被別人搶去吃光。

我那時候也常在夢中抓住白花花的饅頭死命地往嘴裏塞，結果嚼到的卻是自己的舌頭。幾乎各種食物都在夢中吃過，那時的胃口，恨不得一次吃掉一頭羊。

除了逢年過節有些魚肉，每周一次加餐有幾片肥肉，平時都是鹹菜湯加米飯。鹹菜湯鹹的不能再鹹，根本喝不下去，只能挑幾片老白菜根吃。或是蘿蔔片，一吃就是幾個月不變。我經常想：這些飯菜給豬吃，豬都可能不吃，為什麼會給人吃？

當然在饑餓面前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但是那些做飯的二勞改也是人，督工的幹部也是人，為什麼要長年累月地做這樣的飯菜給人吃？所以每當管號幹部找我談話時我都提出這個問題，但

是從無改進。

其實這正是專制制度的典型特徵：被統治被管理者沒有任何權利，提意見白提，敢反對就打擊你。連續幾十年退化下來，給人吃的飯菜還比不上豬食。我深信，人類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那麼難吃的食物，而中國的囚徒已吃了四十年，還在繼續吃下去。

有一段時間突然改吃饅頭了，說是標準麵粉，可是比芋頭面窩窩頭的顏色還黑，而且有一股難聞的氣味。在糧食倉庫裏工作過的人說，這是垃圾麵，是麵粉倉庫裏因為麵粉口袋破了，或口子沒軋嚴實而漏到地上的麵粉，一段時間清掃一次，再裝起來幾分錢一斤賣給養豬場。如果發霉了豬都不肯吃，而我們現在吃的正是這種發霉麵粉做的饅頭。

開始我們還忍住，以為過一段時間會換好一點的麵粉，或者習慣了也就無所謂了，這裏黑心的人、黑心的事太多了，我們只能逆來順受。但是有一天饅頭特別黑，味道特別難聞，我抓了一個放到鼻子跟前，簡直想嘔吐，我看看別人，個個愁眉苦臉的，我覺得反抗的機會來了。

我站在鋪板上用力地把饅頭扔到地上，對大家說：「我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這批麵粉霉的太厲害了，吃下去肯定會生病，甚至會得癌症。如果我們今天吃了，明天還得吃，後天還得吃，非把我們吃死不可，我寧可餓死，也不願被毒死！如果你們願意相信我，大家一起絕食，要求不吃霉麵饅頭，看守所一定會重視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你們有誰願意吃這種饅頭，並且吃得下的，請舉手！」

沒有一個人舉手。我趁熱打鐵：「那麼想吃乾淨麵粉饅頭的請舉手！」所有人都舉起手來，包括那幾個監視我的囚徒。「好！現在大家把饅頭集中起來，誰吃一口就是孬種！」我先把意志薄弱者的退路斷絕。

我端著霉麵饅頭猛搥鐵門，一會兒就跑來一個二勞改，我讓他快去報告幹部，我們18號全體絕食了！只幾分鐘，鐵門大開，指導員帶了兩個幹部和七、八個拿著手銬腳鐐的二勞改站在門外：「誰在帶頭鬧事？誰要絕食？站出來！」

我端著饅頭走到門口：「這批麵粉霉的太厲害了，吃下去會生病的，不信你們聞聞！」指導員大怒：「不准造謠！全所各號子的人都能吃，唯獨你們不能吃？」

我舉起饅頭：「指導員，假如你能吃下這一個饅頭，或者半個也行，我們馬上停止絕食開飯！」指導員終於抓了一個饅頭用鼻子聞了聞，然後放下來說：「你們給我安靜地坐著別動，不准再鬧事，我們去伙房調查一下，看看哪個二勞改在搗亂。」

他們關上鐵門走了。半小時之後，二勞改抬來一大鍋麵條，給每個人盛了一鉢子。而且之後我們再也沒吃那種聞一聞都噁心的霉麵饅頭。

39 · 末梢神經炎

長期營養不良會導致抵抗力下降，所以很多人都生各種怪病，不可能得到認真治療。

其中有一種病，被關一年以上都會得，甚至得幾次，那就是疥瘡。先是手指縫奇癢，抓抓揉揉就會起小白疙瘩，抓破了會流

清水，這水被指甲沾到哪裏，哪裏會跟著癢，最後布滿全身，奇癢無比。這還是乾疥，到發展成膿疥的時候，全身腫脹流膿，嚴重的有生命危險，而且極難治療。那兩年裏我得了三次疥瘡。

看守所極度惡劣的生存條件還會使健康的牙爛掉，沒人會帶你去拔牙或補牙。爛牙根腫脹的時候很痛苦，吃飯都困難，有幾次我的爛牙根不幸被米粒卡住，劇痛使得半個腦袋都麻木了。

我還得過一種怪病，末梢神經炎，先是手指尖、腳趾尖麻木疼痛，然後整個手足皮膚麻木，後來逐漸蔓延全身，最嚴重的時候自嘴唇以下，全都失去正常觸覺，感覺異樣酸麻，摸起來好像那不是我的皮肉，或是穿了一層厚襪子。

這還可以忍受，真正痛苦的是，腳趾尖和手指尖會抽搐疼痛，彷彿有幾根針在不停的扎我，每天會犯幾次，每次幾個小時，疼得我像電動玩具一樣亂蹦亂跳，一直要疼到這些部位失去知覺才算結束一個回合。那是一種可怕的病痛，其痛苦程度相當於食物中毒引起的腹絞痛，或腫脹的爛牙根不幸被一粒米卡住。

我在獄中生過很多病，但末梢神經炎是我一生曾經歷的最長久最痛苦最可怕的病，我估計人世間再沒有比那更痛苦的病。這是共產黨給我的特別禮物，讓我刻骨銘心，透徹神經，貫穿一生。

有幾個月我疼得實在受不了，只有像電動玩具一樣跳來跳去，天天踢打鐵門要求治療，他們就扔給我止痛片。止痛片吃多了就無效了，就打止痛針。有天深夜，我又疼得亂蹦亂跳，死撞牢房鐵門求助。

指導員兼獄醫張勇大怒，把我帶到治療室，按照看守所檢察

重症病人的一貫辦法，用高壓電警棍先電我的兩隻手，沒反應；又讓我脫掉襪子電我的兩隻腳，別人早就鬼哭狼嚎，我過了十來分鐘也沒有反應，他才確信我病得快要死了。

第二天他就把我帶到當地最好的蚌埠醫學院附屬醫院治療去了，並且給我做了當時十分昂貴的心臟試驗。由於神經系統嚴重病變，植物神經功能全面紊亂，有時我會全身麻痺，心臟亂跳，很是危險。最後他寫報告要求上級批准我保外就醫，否則我隨時可能因心臟麻痺斃命於看守所。

這場病過之後，所有人都說我老了十歲，事實也如此，面對鏡子裏我未老早衰的臉，我只有悲歎。直到現在，十三年過去了，就在我寫這行字的時候，我的右腳大拇指還在抽搐疼痛，而且看來我也只有忍痛此生了。

40·貧窮啲

「貧窮啲——，貧窮把咱壓彎了腰——，你還說能忍受——？難道不想窮變富？難道永遠一無所有！歐歐歐歐歐歐歐！」

這是八十年代末曾經流行的一首歌，我曾經多次聽一個人唱這首歌。這個人名叫大江，長得英俊威武，身高一米八五，比香港明星古天樂還要氣質軒昂。

幾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唱這首歌，悲愴、憂傷，彷彿在訴說千年的幽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聽他唱，歌聲攫住了每一個人的心。歌聲過後，大家都盯著牆壁，久久地，不再有任何聲音。據說一首妙曲可以繞樑三日，但是大江唱的這首歌卻在我腦海裏盤旋了十四年，他那種絕望、淒楚的感情我永遠不會忘記。

大江即將走向刑場，他會在一個清晨，被突然撲進牢房的武警拖出去，按在地上，砸掉鐐銬，再用細麻繩捆成粽子，扔到法官腳下聽終審死刑判決。

然後被大隊武警押著穿過城市，到黑虎山坡下，在那裏，一顆尖端被特意磨平的子彈會在十米內準確地擊中他的後腦勺，撕裂他的後半腦。然後還有一個軍法醫走過去用鐵鉤插進大江的腦袋，攪一攪，以確保大江死亡。

中共有一個十分僵硬的規定，一槍擊斃囚犯的執行武警，馬上就可以入黨，記二等功，復員回家安排工作。如果兩槍才擊斃，那就算未完成任務，算是事故。所以各地共軍為了立功，想出了許多方式不同、但都同樣殘忍的絕招。

大江將留下他的新婚妻子和未出世的胎兒，以及他的歌聲走進地獄，他僅僅在這個世界上活了二十年。

大江的父母在六十年代因為出身地主家庭，被迫從城市下放農村，後來在八十年代平反回城。但是既沒有工作，又沒有住房，真正是徹底的一無所有，只能在淮河邊西大壩旁和幾百戶類似情況的回城難民一樣搭簡易棚子住。那是蚌埠市的赤貧區，政府認為他們有礙觀瞻，有損城市形象，不斷威脅要清除他們，把他們趕到淮河裏去。

有一位美麗的姑娘不顧父母的反對愛上了大江，他們秘密同居了，姑娘懷孕了，必須結婚了。但是結婚需要住房家具，大江便鋌而走險，偷了政府機關的幾輛摩托車。熱鬧的婚禮接近尾聲的時候，大江被捕了。

那是一九八九年底，大江來到蚌埠看守所18號牢房，他很聰

明，我們經常談話。他每天晚上唱歌，除了這首貧窮喲之外，他還喜歡唱一首特別優美的死囚之歌：

「寒冬的梅花呀夢中的酒，看不見我流淚的女朋友；
只見天邊孤雁飛，大雪呀飄落到牢房門口。」

馬克思有一句經典名言：貧窮是萬惡之源，大江似乎也是一個註腳。為了解決貧窮問題，馬克思建立了共產主義學說。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這個事實：共產主義所到之處，不管是東方西方，南方北方，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都是絕對的製造貧窮，製造絕對的貧窮。絕不例外！

一百年的人類實踐足以證明：先製造貧窮，再製造罪惡，正是馬克思主義顛撲不破的絕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準！

大江之死，誰之過？

41 · 韓戰老兵

老隆是在看守所的朋友，因為揭露腐敗，反而被腐敗集團胡亂找個藉口抓進監獄。他經常跟我談他當「志願」軍的經歷。

一九五一年秋，蘇北地區老隆家鄉的村民一大早就發現，他們被解放軍包圍了。大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按說鬥地主抓特務都不需要這麼多解放軍。土改正在進行，村民都驚恐不安，各家都在努力完成共產黨強行攤派給他們的，繁重的支援前線生產任務。

解放軍一來，反正肯定沒有什麼好事。大家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按照貧農協會挨家挨戶的通知，到大場上集合。現場氣氛緊張，解放軍包圍了村民，步槍上的刺刀散著冷光，令人膽寒。

解放軍先宣布紀律：「不准說話，不准隨意走動。」然後命令他們一個接一個走向另一個大場，途中的一些青壯年被挑出來站在一邊，這些人都心驚膽戰，不知道會有什麼災難降臨頭上。

隨後解放軍下令：「其他村民解散回家，不准亂跑。」最後又仔細地從那幾十個青壯年裏挑出二十八個人，那年十六歲的老隆也在其中。然後老隆他們被帶到貧農協會，關押起來。首長這才向他們宣布：「美帝國主義要侵略我們，前線緊張，必須大規模徵兵，要求大家為了黨國，立即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然後逐個提出去談話，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同時也找這些人的家屬談話，要求他們配合。

一天過去了，好說歹說，沒有一個人願意當「志願」軍，首長下令停止給他們吃飯。二天過去了，還是沒有一個人願意當「志願」軍，首長大怒，下令停止給他們喝水。外面家屬提著水和食物，哭成一片，但是解放軍的刺刀和步槍隔絕了他們。第三天傍晚，二十八個人又渴又餓，深感絕望，大家議論紛紛，與其這樣餓死渴死，還不如去當兵，也許還能撿一條命回來。他們終於屈服了。

第四天早晨，大家吃過早飯，穿上軍裝，外面已敲鑼打鼓，然後他們魚貫走出牢房，每人胸前被戴上一朵大紅花。鞭炮聲聲，他們立即踏上征程。悶罐車裏擠得要死，站起來去門口小便，回來就找不到坐下的地方了。火車走走停停，一個星期才到丹東，他們在火車上完成編隊。由於擔心他們在前線逃跑投敵，所以把他們編入一個後勤連。

一下火車，就是敲鑼打鼓的歡迎隊伍，大紅花別到胸前，每

人還領到一個慰問袋，裏面有香煙、餅乾、牙膏、牙刷、毛巾、肥皂。在軍營裏，僅僅進行了三天的列隊訓練，他們就被驅趕上前方了。

每人背兩發炮彈，一發大約四十斤重，他們深夜走過鴨綠江浮冰，冰很滑，個個膽戰心驚，一不小心就會摔一個大跟頭，很多人的胳膊和腿都摔壞了。連長指導員都拎著槍大喊：「走好！」「跟上！」進入朝鮮，他們晝伏夜行，把炮彈送往前線，再把傷員抬回來，儘管他們是後勤部隊，但是傷亡也很大。美國人的飛機二十四小時轟炸，到最後停戰，從他們那個村裏來的二十八個人只剩兩個人還活著。

那時候最難過的是暈乏，軍情緊急，經常連續晝夜行軍運炮彈，吃炒麵時都不准停步，沒有水喝，只能抓雪吃。其次是幾個月光吃炒麵，嘴巴喉嚨全是大火泡，火燎燎的，碰一碰都疼得要命。還有大便根本解不下來，只能用手摳，摳得肛門血淋淋的。

一年多沒洗過一次澡，伸手入懷就可以抓到蚤子，那是他們除炒麵以外的奢侈食品。

最讓老隆憤憤不平的是，那二十六個死了的人，只有兩個人被承認是烈士，其餘二十四個人，多半連檔案都沒有，要麼就說下落不明，讓家屬提供證據。後來每次回鄉探親，鄉親們都來找他。要他作證，寫上訪材料，爭取烈士家屬待遇，但是幾十年都沒有結果。真是白死！

老隆倒是後來一路升到連長，轉業後又慢慢升到縣處級幹部，快退休了又被關進牢房。老隆歎道：「我是共產黨抓去的奴隸，我當了一輩子戰戰兢兢的奴隸，最後還是奴隸，而且又被抓

進這裏，成了最悲慘的奴隸。」

每當我抱怨看守所日子太苦太難熬時，老隆就說現在比他們那時當「志願」軍還是好多了，而且同樣是被抓去的奴隸。老隆接著說，在部隊裏每當他們抱怨的時候，老紅軍就跟他們說，當紅軍那會兒才最苦。長征的時候，每過一次草地就要餓死一大批人，但是中共中央硬要工農紅軍六過草地，非要餓死他們一大半不可，而且他們同樣地也是被抓去的奴隸。中國人命苦啊！中國人命不值錢啊！

我始終對抗美援朝「志願」軍的死亡數字有懷疑，聽了老隆的話，我才明白，那將永遠是一個謎。也許幾百萬中國青年死在那裏，連個檔案記錄都沒有，當然更沒有墓碑了。假如沒有異常慘重的傷亡，怎能擋住毛澤東解放全世界的步伐，至少解放軍會席捲亞洲大陸。

如果是保家衛國，或者是為維護人類正義，可以強迫徵兵，比如抗擊日寇，抗擊俄寇。即使美國有時也是強行徵兵，因為拒絕當兵支援自由越南，拳王阿里都被判刑。但是幾百萬被迫送死的「志願」軍幹了些什麼呢？血流成河、屍橫遍野卻僅僅是為了維護金家父子的邪惡統治，維護人類歷史上最殘酷、最血腥、最邪惡的金共政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金家父子根本不感謝為他們犧牲的幾百萬中國青年，反而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回報。因為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國共兩軍在東北決戰，共軍筋疲力盡，多次面臨崩潰。金日成先後派出的二十五萬援軍最終扭轉了戰局，為中共贏得了最後的勝利。因為那二十五萬軍人基本上都是以前參加侵華

戰爭，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朝鮮籍日本兵，由於嗜血成性，戰鬥力極強，相當於百萬共軍。

42· 黑暗社會

在看守所裏能知道公安局、法院和檢察院有多黑，因為大家談論起各自的案情來都是直言不諱，一般刑事案不用擔心別人舉報，所以我們能聽到許多內幕。

有個固鎮縣公安局刑警隊員，有一天到曹老集找一個派出所治安員和團委書記喝酒，在飯店裏看到一個女孩特別美麗，就打賭看誰能把她搞到手，一會兒又聽到那女孩買東西與服務員講話是外地口音，刑警隊員立刻走過去宣布，那個女孩涉嫌拐賣人口，必須跟他們走一趟。

三人把那女孩帶到鄉政府文體活動室，開始還裝模作樣地審問幾句，後來便直截了當地提出卑劣要求，並進行威脅。那女孩出來買東西，親戚還等著她回去吃晚飯呢，當然不從。三人按照共產共妻的習慣，瘋狂地輪暴了這個十七歲的女孩。那女孩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此番受到如此奇恥大辱，便哭著發誓要控告他們三個惡棍。三人頓起殺意，他們用棒球棍毒打少女，一直到活活打死。

這位刑警隊員和我在一起關了半年，他得意地對我說，那少女實在太美麗了，那天要不是酒衝的，怎麼也捨不得打死掉。後來屍檢發現少女被打斷十七根骨頭，他們力道之猛，把堅固的乒乓球桌子都打了一個大洞。三個人全是當地幹部子弟，所以儘管此案有喬石親筆批示：民憤太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最後他們

也還是被腐敗的法官從輕判處徒刑，僅僅關押一年之後，三個人就做假證明保外就醫出獄了。

有段時間蚌埠的女流氓流行扒竊。一個女流氓在公共汽車上偷錢包，被一個正直的青年看到了，青年便提醒了受害者，女扒手沒有得逞。青年下車後，顧自回了家，沒注意女扒手一直在偷偷地跟著他。其實女扒手家裏很有錢，他們的父親是一個國營糧油部門的經理，姐弟倆從小養成了享樂揮霍的習慣，當家人試圖約束他們時，就另想辦法。父親偷糧站的，他們就偷別人的，後來嘗到甜頭，索性就天天到公共汽車上作案。

女扒手回到家中立即對弟弟說起此事，姐弟倆便去找姐姐的男朋友，正好這人的弟弟也在，四個人便帶著傢伙去那青年家鬧事。那青年正和母親在院裏吃飯，幾個人氣勢洶洶地辱罵他並要他出來，母親嚇壞了，剛聽兒子說過那件事，還教訓兒子以後不要多管閒事，免得賊人報復。話音才落，扒手們竟然就打上門來了。

青年大怒：「我看你是女的，並沒有抓你到派出所，你倒找我算帳，這是什麼世道，壞人竟敢如此猖狂！」四人要衝進去打那青年，母親用身體死死地頂住門。那青年被正義感驅使，拿了一根竹竿從前門跑出去迎戰，四人立刻猛撲過去，用鐵棍磚頭木棒一口氣打死了青年。

這類事要在一個民主國家，或者有一點新聞自由的國家裏會激起巨大的民憤，但在黑暗的中國，那個見義勇為、阻止犯罪、品行正直的青年白死了！

四個流氓統統被抓，但是糧油站經理有的是錢，總共花了

五十萬之多，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看守所關關買通，女扒手是主犯，卻立刻放了，她弟弟也寫假肝炎證明保外就醫了。另外兄弟倆竟然能關在一間號子，天天練習對口供，這是犯大忌的。但是在中國，有錢能讓鬼推磨。最後四名兇手反倒被認為是「正當防衛，傷害對方致死」，判刑畸輕，一年之後四個流氓都回家繼續作案去了。

以後誰還敢見義勇為呢？能怪現在的中國人那麼冷漠，總是見死不救嗎？

現在中國，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除了貪官污吏之外，就是遍布全國各地的黑社會犯罪集團了，他們普遍與黨政法機關相勾結，魚肉人民，稱霸一方。

只要能拿出大紅包，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到任何部門、任何級別的保護傘，黑社會已經完全行業化、職業化了。犯罪利潤遠遠高於任何正常的生意，安全性也提高了，所以導致罪犯越來越多，整個社會也越來越黑，每個人都在身不由己地墮落、變壞變黑。

43· 美麗的女死囚

王國翠是個人見人愛的美人兒，在蚌埠看守所，人們經常談論她，她就被關在我們隔壁的19號牢房。凡是偶爾見過她一面的人，談起她來總是兩眼放光。

每當隔壁的鐵門一響，再聽到叮叮鈴鈴的腳鐐聲，大家就會瘋狂地衝到門口，最幸運的人可以透過窺視孔縫隙看到王國翠，她總是先捋一捋長髮，看看四周，嬌笑一聲再跟看守走去審訊

室。許多看過她的人都說她確實太美了，那窈窕的身材，那含情脈脈的雙眼。

可惜我從來沒有看過她，但我聽過她的歌聲，每天放風的時候，我們只有一牆之隔。放風間上面是鐵絲網，兩個號子可以互扔紙條，我們會要求她唱一首歌，她唱歌的時候從來沒遇到喝止。她的嗓音有點像程琳，她也特別愛唱程琳的歌，「酒甘倘賣沒」、「風雨兼程」。

有時候她還邊唱邊跳，用腳鏢聲伴奏，叮叮鈴鈴特別好聽，我們估計她戴的是六斤小鏢。有時晚上值班的看守喝多了，也會為她歎息，這麼美麗的美人兒，太可惜了。至於持槍執勤的武警，更是夜夜趴在天窗上看王國翠，跟她聊天，挑逗她。

王國翠是蚌埠糧校的學生，才十九歲。在學校裏，她能歌善舞，是個明星式的人物，受到男生們暗中的熱烈追求。終於名花有主，她如癡如狂地愛上了一個男生。她們十個女生住一間宿舍，有一天她和男友乘室內沒有別人，忘乎所以地擁在一起。

自古紅顏多薄命。一雙冷冷的眼睛早就發現他們倆溜進宿舍，那是王國翠的室友，那麼擁擠的住在一起，天長日久，不可能沒有矛盾。現在修理王國翠的機會來了。

正當王國翠和男友忘情地捲在一起時，門被粗暴地推開了，沒有人敲門，甚至也沒聽到開鎖聲，十來個人就一擁而入，校長、副校長、保衛科長、副科長、一群科員，最後是那個告密者。大家都貪婪地盯著王國翠赤裸的身體，終於逮個正著。校務會議立刻決定：開除兩人學籍。

王國翠的父母都在農村，幾十年面朝黃土背朝天，過夠了

饑寒交迫的生活。只盼望自己美麗聰明的女兒能夠不再像自己一輩子吃苦受罪，甩掉農村戶口，到城市裏生活。王國翠也不負眾望，考上了糧校，畢業就會成為國家幹部，每月就會領到工資了。

但是現在，她被開除了，她只有回到農村，和她的父母一樣，面朝黃土背朝天，在農村黨員幹部的野蠻統治下，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苦難掙扎一輩子。她的家鄉還特別窮。她聽說被開除，痛哭失聲，直至昏厥。醒來後她已判若兩人，目光呆滯，不思茶飯，自言自語。

她一會兒跑到校長室，跪在門口失聲痛哭哀求別開除她；一會兒跑到保衛科躺在地上嚎啕大哭，指天發誓她並沒有發生性關係，僅僅是脫衣擁抱，要他們實地檢查一下。當然誰也不理她，校方只是發電報催她家人快來領走她。

王國翠似乎明白命運已注定，不可逆轉了。明天父母就要來了，他們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將是她最後一天留在這座學校，最後一晚睡在這間寢室。

淚水已經流乾，王國翠無顏面對她那可憐巴巴的，聽說真相後必將悲傷欲絕的父母。她握緊了那把小斧頭，那是她中午溜到木工房裏偷來的，看著那個告密者香甜的睡容。為什麼要這樣害我？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你，你要這樣斷送我一生的幸福？

既然我們是冤家，那就讓我們一起走上黃泉路吧！王國翠終於瘋狂地揮斧砍去，一下、二下、整整砍了十九下。

王國翠很快被判死刑。行刑那天早晨，史大來悄悄把我喊醒，大約只有五點多鐘，他估計那天有六個人要被槍決。所有的

看守都有一種特別本領，就是能無聲無息地打開大鐵鎖，然後猛地拉開門，兩個武警便會跳進去抓住死刑犯的雙臂，倒拖出去。與此同時，天窗上會突然冒出兩名持槍武警，槍口直指下方，院子裏也全是持槍武警。

死刑犯拖出去之後，武警先用腳踩住，砸掉鐵鐐，換上細麻繩捆結實。捆得你呼吸困難，根本沒力氣喊叫。所謂臨刑前的最後一餐，也只是二勞改用筷子叉著幾個肉包子，遞到你嘴邊。

王國翠被拖到門外，嬌笑了一聲：「我的高跟鞋，我的高跟鞋被你們拖掉了。」我們都知道，那是她臨死以前對這個世界，對她家人唯一的要求：給她買一雙她羨慕了很多年，但是從來沒有穿過的，最最便宜的高跟鞋。

擔心看起來像一個鄉下人，被人瞧不起，所以她渴望穿著高跟鞋到另一個世界去。臨行前一夜她就始終穿在腳上不敢脫。兩個武警也知道這件事，狼狽地放下她，回去給她撿高跟鞋。

據說她死得很從容，不像別的死刑犯那樣面色如土，身體抖得像篩糠。臨刑前幾天，她扔給我們的最後一張紙條上寫道：

「我寧願死，也不願像我父母那樣，當一輩子饑寒交迫的貧窮農民，活受一輩子罪。在我十歲以前，我從來沒有吃飽過飯。農村實在太難過了，我相信地獄裏也不會那樣悲慘、那樣可怕。我要走了，祝你們這些命好的城裏人早日獲得自由，好好生活。

——王國翠。」

我們難過了很久。她是被逼死的。那個陰險的告密者，那個學校裏道貌岸然的領導，那些設計讓那麼多人住在一個小房間的教育部領導，那些把農民變成農奴，造成他們貧困苦難的黨和國

家領導人，都有責任。

毫無任何隱私，必然會產生矛盾和仇恨的集體宿舍，壓抑了多少正常的人性，使多少人性格扭曲變態，凡是在中國住過集體宿舍的人都深有體會。雙人床、五六個人、七八個人長年累月地同住在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裏，對於自由世界的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但在中國，你必須長期忍受這一切。

在毛澤東時代，黨政幹部可以令手下的女性就範，因為他們的權力是無限的，連你上廁所都要管。吃喝拉撒睡，看病休息報銷帳單，樣樣都得聽從領導安排。那不算強姦。但是老百姓談戀愛都要經過領導批准，否則就是有資產階級思想，要批鬥你。

改革開放以後，黨政官員們都有了大把的花不完用不盡的錢，去觀察一下就知道，中國所有地方的高級俱樂部，高級酒樓包房，高級浴池包房，卡拉OK包房，大酒店豪華房間，90%以上的客人都是黨政軍領導幹部。一般的平民百姓過日子都緊巴巴的，哪有多餘的錢花在那裏。就是精打細算的商人，如果不是應酬官員，也捨不得那樣消費。

黨政官員們貪婪吞噬中國少女的青春，卻不允許男女青年偶爾幽會一次，否則就要斷送你一生的幸福，如王國翠。只許黨政官員放火，不准平民百姓點燈。

我想起歷朝歷代在這方面的政策：孤苦百姓，在外從軍的士兵或他鄉經商的商人，可以到妓院尋求一點安慰，但是嚴禁各級官員狎妓。因為朝廷知道，那是無底洞。天下美女無限，官員貪婪無比，會使朝政迅速腐朽，而且不可救藥。

即使美國，對於普通人的性生活也予以尊重，魔術師約翰遜

在自傳裏承認自己一生與三千多個異性有過關係，最後還患了艾滋病，美國人民還是照樣喜歡他。但是總統就是不行，克林頓為此傷透了腦筋，怎麼也想不通。

共產黨正好反過來，在所有方面都與正常的社會相反。

王國翠死了，又一枝嬌豔的花朵，被共產主義巨輪無情地碾碎。



第五章 荊棘民運路

茫茫征途上布滿荊棘，
我的雙腳鮮血淋漓，
自由之夢給我不竭的勇氣！

喧囂的歌聲早已沉寂，
我還在流著眼淚，
吹著那支柳笛。

我的喉嚨早已嘶啞，
只有靈魂顫動的旋律，
穿透層層烏雲直達天際！

——〈新陋室銘〉二十八歲自勉

44 · 楚雖三戶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日，我終於搖搖晃晃地出獄了，母親和妹妹扶著我回到家中。我一邊治病休養，一邊與過去的同道們恢復聯繫，瞭解我坐牢期間發生的事情和民運現狀。

我依然停留在「六四」之前的精神狀態，獻身的熱誠燃燒著我的心，使我像一團火一樣四處奔波，企圖燎原。但是我的同道們多半心灰意冷，共產黨看起來實在太強大了，他們不願白白送死。

記得那時我寫過一個短篇，描繪僥倖掙脫鎖鏈下山，回到人

間的普羅米修斯，發現大地仍是一片黑暗，便決心自造火焰。他滿腔熱誠尋找過去的合作夥伴，結果到處碰壁，越來越失望。到最後完全絕望，自己又跑回山巔，自己給自己重新戴上鐐銬。

六月二日，我以過生日為名請了幾十位雲夢沙龍骨幹聚會，我還寫了上面這首詩明志。

我決心孤身獨戰這個專制制度，哪怕像瘦瘦的唐·吉訶德那樣可憐可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點點金光，照耀四方。我決心一切從頭做起，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我開辦三楚學校，藉以積蓄力量，培訓民運骨幹，以圖捲土重來。我甚至創作了校歌並譜曲，還設計了校徽和校旗。

我還作了一幅「三楚武士」畫，一個頂天立地的武士端著一枝方天畫戟站在曠野裏。他剃著光頭，目光如炬，幾乎赤身裸體。他的腳如樹根般深入大地，他的背後是犬牙交錯的群山，他的頭上雲彩之間是古烈先賢。

那個孤身挑戰數百萬共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威猛武士當然就是我。

不幸的是三楚學校開課第一天，三個警察就來抓走了我。他們把我帶到派出所，公安局法制科的人正在那裏等著我。他們勒令我立即停辦，否則就到監獄裏去。他們詭稱我還另外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不得進行任何未經政府批准的非法活動。

合肥的兩位民運人士田煬和黃玉明來找我，後來我便經常去合肥活動，認識了許多合肥的民運人士。他們打算建立一個合肥—蚌埠民運聯合委員會，作為安徽民運的領導機構，推我為領導人。但是不久之後，合肥那邊在一次散發傳單之後全軍覆沒，差

點把我也帶進去。

當時蚌埠民運也正有起色，成立了三個小集團。一個以我為首，一個以魏輝為首，財貿學院以趙強、呂倫為首的民運小團體也始終存在。我們經常開會，討論民運的前途和面臨的問題，公安局也虎視眈眈嚴密監控我們。吸取合肥的教訓，我們不敢輕舉妄動。

有一天我在勝利路市政府對面的南山小吃部吃餛飩，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服務員，突然端來一籠包子，送到我面前，對我說：「送給你。請你慢慢吃，等一會兒我有件事要告訴你。」

我直覺到她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說。直到半個小時之後，小吃店裏的員工差不多都下班了，那個女服務員才過來坐在我跟前，小聲地說起來。

「你是張林吧？我肯定你是。我認得你，我以前多次聽過你的演講。」她頓了頓，見我點點頭，繼續說：「六月五日夜晚十二點左右，我正和另一名員工睡在小吃部裏值夜班，一陣敲門聲驚醒了我們。我打開門一看，是四個學生模樣的人，其中一個人渾身是血。我嚇得直發抖，直覺到他們是在天安門廣場被解放軍打傷的學生。」

「他們進來後告訴我們，他們是合肥的大學生，「六四」之夜在西單一帶堵截進城的解放軍，沒想到他們突然開槍，彈如雨後春筍，無法躲避。一個人肩膀上挨了一槍，另一個人大腿上挨了兩槍，四人互相攙扶，輾轉逃到蚌埠，等待轉去合肥的車。大腿中槍的同學多次昏迷，血流不止，衣服全被血浸透了，他們擔心被車站和車上盤查的軍警發現，所以不敢停留在車站等車。重傷員

的體溫極低，擔心他半途死掉，因此他們冒險尋人求助，發現這裏有燈光，便敲門了。

「我的同事嚇得幾乎站不住了。我趕緊捅開爐子，燒熱水給他們擦洗血跡，又找出了兩件工作服給他們換上。我想起家裏還有一瓶雲南白藥，於是便央求同事幫我照顧他們。她卻嚇壞了，拉我到一邊小聲說，我們不能自找麻煩，跟著完蛋。那時的政治形勢確實太恐怖了，誰也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但是我不能見死不救。我告訴她，一切責任由我來付，絕不會損害她一點點。然後我急忙跑回家叫醒丈夫，他立刻起身，我們拿了一大包衣服、藥品，和家裏所有的錢，趕回小吃部。誰知走到半路上，正好碰到一支巡邏隊，我丈夫急忙帶我躲進一條小巷。一直到巡邏隊走了很遠，我和丈夫才敢出巷子。

「我們為傷員擦洗了傷口，抹上雲南白藥，再穿上棉襖棉褲，才由我丈夫推自行車送傷員和他們另外三個人去火車站。

「誰知後來，長工資的時候，那個同事為了抵我，把我揭發出來，害得我天天寫檢查，工資降了一級，還差點把我開除。」

我難過地低下頭，沉默了許久，最後告訴她：「真理終將戰勝謬誤，正義終將戰勝邪惡，我們終會有獲得公正對待的那一天。現在，我們只有忍一忍，先不去計較個人得失。」

我估計，「六四」究竟打死打傷了多少人，恐怕誰也無法統計。死難者家人不敢說，而受傷者更不敢聲張，絕大部分只有趕緊帶傷逃走，逃到外地躲藏治療。

這更使我下定決心，即使只剩我一個人，也要堅持捍衛正義，堅持鬥爭到底，才能對得起那些默默無聞的受難者！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45 · 越境爭取外援

長期從事組織活動使我痛苦地認識到：在中國社會裏，一個組織，一個政治團體要想得以維持，必須兩樣東西，一個是暴力，一個是利益。民運組織不太可能像黑社會那樣以暴力或暴力威脅來籌集經費，維持組織運作。所以特別需要以錢來維持，而一般中國人又是極端自私自利，對於公益事業幾乎是一毛不拔的。

與正常社會的商業階層不同，當代中國大部分有錢的商人都是文化素質極差的、唯利是圖的投機暴發戶，而最有錢的階層還是與貪官污吏勾結在一起的紅色資本家，所以幾乎不可能從他們身上籌集到成批的經費。這方面我經過了長期而徒勞的努力，最多只能找到三、四個欣賞你這個人，願意給你個人一點幫助的朋友。

在大筆經費沒有到來之前，在中國人沒有直接看到現實利益之前，當年中共的第二號黨魁張國燾曾奉中共創始人陳獨秀之命，帶了六百塊大洋到武漢發展共產黨組織，忙了六個月卻連一個共產黨員也沒發展到。

一直到國共合作之後，在蘇俄的大量經費支援下，中共才有機會把大批人誘入組織，中共才突然崛起成為一股政治力量。一九二七年八一武裝暴亂遭到鎮壓後，中共為了生存，便開始走恐怖路線。但是直到一九四六年以後，中共才有機會，依靠蘇共轉交的日本關東軍的軍用物質，和蘇共韓共的大量人力支援才打

敗了孤立無援的國民黨軍隊。

如果沒有西方的經濟支援，沒有天主教的雄厚財力支援，波蘭團結工會早就像中國八九民運一樣瓦解了，根本不可能堅持十幾年，並最終把共產黨趕下台。

當年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歷次武裝起義，幾乎全是靠海外華僑提供經濟支援。

外來的經費支援對於當代中國民運是異常重要的。沒有經費幾乎幹不成任何事，就不會形成任何團體行動，就沒有任何力量可言。當時我們極端缺乏經費，我們寄希望於國外。為了建立與境外反共力量的聯繫，獲得經費支援，我和女友高君決定偷渡香港，與港支聯建立聯繫。

十月份，我倆到了深圳，在上步租了一間民房，住下來慢慢瞭解情況。後來我們結交了揭西人阿華，送給他很多財物。他把我們介紹給走私者阿西。阿西帶我們坐車到蓮塘，然後穿過小鎮，到了北面的後山，才看到那裏密密麻麻的幾百間簡易棚子。至少有幾千個走私者住在那裏，他們靠從香港背走私貨入境謀生。

阿西那間屋裏住著四個走私者，他們的眼光死死地盯住我的女友，令我們倆心驚膽戰。我不得不從背包裏拿出一把進口的大老虎鉗在手裏把玩以威懾他們。那幾個小時真是難熬。

晚上七點鐘，阿西帶我們走上邊界附近的公路。他回去之前，告訴我們往前走到蘆葦叢中躲起來，晚上九點公路戒嚴以後慢慢往前爬，爬到鐵絲網跟前，快速剪斷鐵絲網鑽過去就進入香港了。

我們在公路邊的蘆葦叢中埋伏到十點鐘，確信周圍沒有任何動靜之後才往前挪動。那一帶的樹叢都被鏟掉了，我們只有耐著性子慢慢爬過一片開闊地。後來終於有了一些小樹叢，我們便彎腰小跑起來。

跑到一面鐵絲網圍牆前，我拿出進口的大老虎鉗，「喀喀喀喀」剪出一條長縫，我倆輕鬆地鑽了過去，以為已經越界成功。然後淌過一條小水溝，穿過一片小樹叢，才發現前面居然還有一道鐵絲網！我拿出老虎鉗，可是連一根鐵絲也剪不斷，我這才注意到這道鐵絲網與剛才的不同，鐵絲又粗又硬，而且是斜編織成的。

放哨的高君已聽到搜索的腳步聲，我急得滿頭是汗，反覆磨剪一處地方，想把它磨斷。最後我用盡吃奶的力氣終於剪斷了一根鐵絲，但我明白，我已沒有力氣再剪斷第二根了。我急中生智，從斷鐵絲兩端解開它，終於解出一條縫。我把頭使勁往裏拱，拱進去了，身體也拱了進去。高君隨後也拱過來了。

就在我們慶幸穿過鬼門關的時候，口哨聲大起，十幾個人從草叢中跳出來抓我們，他們揮舞棍子大喊：「站住！站住！」我們拚命往草叢裏鑽，但一個也沒逃掉，我的背上還挨了幾棍。他們用橡膠繩子把我們的雙手捆在背後，然後互相擊掌祝賀。

在把我們押到一間屋子裏以後，我才得出結論：他們是皇家香港警察。得知我們是民運人士之後，他們客氣了一點，解開了捆我們的繩子，又遞給我們一杯茶。

他們告訴我們：晚上八點之前，他們通過「夜冷」，就看到兩個人鑽進了蘆葦叢，其中一個女的。然後他們就背著睡袋，到

對面等候抓我們。我問他們「夜冷」是什麼，是不是紅外線夜視鏡，他們說是更高級的夜視儀器，但原理他們沒說。

他們又說：「你們太走運了，就在你們剪第一道鐵絲網的時候，五名共軍走出崗樓，端著長槍過去搜查。幸虧你們的動作快，在你們鑽過第二道鐵絲網的時候，共軍離你們只有幾米遠。我們曾目睹過很多人這時被共軍抓住，男的只是挨打，女的可就慘了。」

我們先被送到一個審訊中心，接著被送到新屋嶺難民營。在一排用鐵絲網隔成的房間裏只關了一個人，我和高君被分在兩個房間。我們很快瞭解到，這裏是專門關押大陸政治犯的，那個人名叫石星健，山東人，僅僅因為給美國之音打電話，「六四」後就被判六年徒刑，後保外就醫，兩個月前跑到香港，一直關押在這裏。

他告訴我們，這裏很可怕，大部分民運人士會迅速被遣返。幾天前，一個西安的歷史反革命被遣返，在過境時就被武警半途押走了。香港總督衛奕信是個腐敗的親共分子。五天後又有三個貴州的民運人士被送進這裏，一個是貴州人民廣播電台的記者劉松林，一個是貴州高級人民法院的法官，一個是《貴州口報》的編輯。

七天後我和高君被喊出去，還沒弄清怎麼回事，便被塞進一輛大囚車，裏面塞滿了被遣返的偷渡者。我們在深圳收容中轉站被關了一天後又被送到樟木頭收容站。

那裏給錢和派出所介紹信就可以釋放，在我和高君被釋放的前一天，那三個貴州人也跟著進來了。為了營救那三個貴州人，

我讓高君先回家。我在那裏認識了幾個弟兄，但我們冒了很大風險，想盡了辦法也沒有營救出他們，後來我只好給他們家人打電話求助。

46 · 不甘沉淪

回到蚌埠，因越境香港，高君被工商銀行開除了，我們也結婚了。面臨生活壓力，我們不得不做生意以維持生活，高君在九州大廈租了兩節櫃檯賣服裝，我開了一家小型服裝加工廠。

但是我一做生意就特別煩惱，除了政治活動，我對別的事都很煩，都感到痛苦。特別是面對狡猾的商業同行，我十分反感，簡直不知道怎樣跟他們打交道。

我做生意的另一個主要困難是，我思考任何問題都是從我的政治理念出發，而不是像一般商人那樣僅僅從個人的利益角度出發，所以我總結出來的經驗幾乎都是通用的遊戲規則類的，而不是供個人用的投機取巧營利性的。不久我們的生意都結束了，我們開始產生矛盾。

偶爾做生意賺的錢不夠維持長期的生存，很多時候都是靠朋友資助，我的兩位至交王德春和陶建寧，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裏給了我真誠而長期的幫助。王德春是個溫文爾雅的儒商，長期同情和支援民運；陶建寧是八九蚌埠民運的領導人之一，「六四」後也被捕關押了兩個月。

差不多從八六年以來，我就探索以各種方式從事民運，幾乎所有的辦法都嘗試了，幾乎所有的路都走到盡頭了。作為一個職業革命家，我一直過著赤貧的生活，經常是有個饅頭就對付一頓

飯。加上坐牢，我的健康狀況越來越糟，幾乎看不到好轉的希望了。我的心情惡劣到了極點。

我對民運的前途越來越懷疑，這個民族確實太墮落了，從秦始皇滅六國、修長城開始就墮落了。項羽起兵反抗，企圖恢復周文明，再現春秋輝煌，最後卻被劉邦一夥販夫走卒、市井無賴打敗，中國從此陷入綿延兩千年的黑暗專制，一直到現在。依我看長城就是專制的象徵，我以一首詩表達了對長城的憎恨：

《長城吟》一九九二年六月四日

你果真是中華文明的象徵嗎？
秦始皇暗暗地冷笑。
以抵禦外侮的名義，
砌一座監獄圍牆。
男奴給我做工，
女奴供我玩鬧。
在建造長城之前，
沒有一個民族比炎黃子孫強壯，
沒有一種文明比華夏文明輝煌！
自從造起長城，
炎黃子孫墮落如囚徒，
匈奴入侵、五胡亂華，
蒙古鐵騎橫行、滿清八旗揚威，
華人受盡奴役。
長城啊，

你從未阻擋異族入侵，
從未消彌災難降臨。
只是斷絕了中華龍脈，
捆住了後人手腳。
二千年啊，
國人修築大大小小圍牆，
彼此隔離封鎖，
禁錮了中華二十二個世紀。
再沒有坦蕩的心靈，
再沒有高尚的激情！
只有一群群臉厚心黑手狠的小人，
只有貪婪的物慾汨濫奔騰。
還有那一群群陰暗的死魂靈，
依然盤踞在長城上冷笑著，
我們的無能和怯懦。
啊，聽聽我的尖叫，
大家動手拆去長城，
用浸透血淚的磚，
鋪一條縱橫天下的華夏大道！

47·凍死迎風站

到了秋天，我又建立了一個極端秘密的七人行動組，作為突擊隊備用。然後我到北京看看情況，找到了高超群，得知一點動靜都沒有，我很失望。回到蚌埠以後，我暗暗監視行動組成員，

果然發現很多疑點，我果斷地下令解散。後來又過了幾個月我才弄清，這七個人裏居然既有特務，也有叛徒，公安局早已張網以待，正等待我們出擊！

終於有一天，高君流著淚告訴我，她已厭倦這種貧困加恐懼的生活，她看不到任何前途。民運不可能成功，就是成功了我們也得不到什麼好處，因為我們已筋疲力盡，傷痕累累。即使實現民主了，我們又哪裏是那些一點貢獻沒有一點犧牲沒有的，養得肥肥壯壯的小人們的競選對手。

中國人如此自私、如此冷酷，誰會理我們？好話不出門，惡言傳千里。我們注定只是犧牲品、墊腳石，只是民運炮灰，只是白白付出。你願意做墊腳石沒理由要求我也做墊腳石。

那段日子的確太艱苦了，比當年的抗日義軍還要艱苦。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僅僅以煮黃豆和饅頭維生。記得有一次我召集會議，七、八個人開了半天的會，個個肚子餓得咕咕叫，而我只有一兩塊錢，只能讓高君去買四個缸貼，就是特大燒餅，每人分半塊，當做晚餐，吃完後繼續開會。

面對如此窘困，許多人退縮了。說老實話，沒有好處，中國人是不肯幹事的。不聲不響地就溜掉了，而且此後見到我就躲。彷彿我是手拿大刀的督戰隊長，逼著他們拿出良心和正義感去與共軍作戰。其實每次我總是衝在頭裏，總是把危險承擔在自己肩膀上。

只有我絕不肯放棄。我堅信我們從事的是正義的事業，是終將造福於全中國人民的偉大事業，無論付出多少代價，無論付出多少犧牲，都是值得的，最終都會得到回報，至少會得到上帝的

嘉許。

在我的記憶中，我的出身於地主家庭的母親只教給我一句話，那就是「凍死迎風站，餓死不低頭。」自從我決心從事民運之後，我真是充分體驗了這句話背後的辛酸悲苦，意味著不得不忍受極端的貧困和任何磨難。

差不多有十來年我都沒買過一件新衣服，都是去找朋友揀不要的衣服穿，以致我養成了習慣。即使後來到紐約之後，我也沒買過值十美元一件的衣服穿，都是到九十九美分商店買舊衣服穿，我的大衣、毛衣、西服、褲子幾乎全是從辛灝年、劉青那裏要他們穿著不合身的，我實在捨不得花錢買。我在紐約從來沒買過一件家具，全是從大街上撿人家扔掉的。

當邪惡力量異常強大的時候，與之對抗的確是無比艱難的，非常孤立非常貧困。偏偏我是一個孤膽英雄，什麼也不怕，也不在乎失敗。我把曾國藩的一句話當作我的格言：「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我的一位至交勸我：「畢竟是血肉之軀，一個人的勇氣、忍受力，也就是生命力，終究是有限的，耗光了就沒有了，不能再生的，除非等下輩子。」

直到多年後我弄得渾身是病，又沒錢醫治，只得苦熬硬抗，才知此言不虛。

48·職業革命家

李海那時在全國漫遊，也到了我家裏，我們促膝夜談，使我瞭解到北京的狀況。看來又有事可幹了。我關閉了我早已厭煩透

頂的事務所，準備到北京去繼續我的職業革命家的危險生活，根本不去管可能有什麼危險。

我去拜訪王丹，有段時間我住在王有才在北京的宿舍裏，後來我又搬到劉念春家住。劉念春和他太太儲海藍為人特別熱忱友好，他們家在北京當時的民運圈子裏最熱鬧，幾乎成了民運食堂。每天都有很多人來訪，經常有十來個人吃飯。據我估計，他們家所有的錢都用來給我們買食物吃掉了。

劉念春從來沒有小雞肚腸，從不議論他人是是非非，愛下圍棋，而且手段高強，我和李海、王有才都遠不是他的對手。

別的人都還有一份工作牽扯，只有我和李海天天跑來跑去，只要是民運的事馬上就幹。有一次我奉王丹之命到西北去找翟偉民、郭海峰，九四年二月十七日，給王丹過生日，邀請了兩百多個民運人士及「六四」受難者家屬，我也忙得不亦樂乎。

從一九八六年開始，我基本上是以民運為職業的，只是從來沒有領過工資，當了差不多二十年義工。運氣好的時候可以得到一點資助，但大部分時間我還得自己養活自己。所以對於《紐約時報》稱我為「職業革命家」，我認為很得當。「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我從事的正是順天應人的正義事業。

我們尊重傳統，我們願意全面繼承祖宗給我們留下的東西，儒家思想，仁義禮智信。在這基礎上，我們願意學習來自西方的文明，我們以實用主義的態度看待它。現代民主制度的確解決了中國人兩千年沒有能夠解決的問題：專制導致的腐敗黑暗、愈演愈烈的政治矛盾最後導致全面崩潰，全面內戰，大家統統完蛋，每兩百年左右經歷這樣一個惡性循環。

從孔夫子開始，歷代儒家都夢想實現君民和諧，天下大同，他們總是一再強調彼此要相敬相愛，君要愛民，民要敬君。孟子甚至說：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但是事實上他們誰都沒有找到一個現實可行的辦法來達到這個目標，與歐洲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不同，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民主共和時期，從夏商周以來，一直都是由一個普天下公認的天子來決定一切。

否則就是沒完沒了的戰爭，一直到一個新的天子確立絕對權威。等到天子家族迅速膨脹、腐朽、衰弱之時，又是一場混戰。大部分歐洲的王室和貴族都有千年以上的遺傳繼承，中國沒有。被推翻的皇帝和他的家族以及臣屬他的貴族群體都必須徹底完蛋，協約從來沒有被遵守，對立雙方從來沒有共和過，中國人從來沒有共存共榮過！

當代民運不僅要建立一種新的政治制度，還要建立一種新的政治觀念：彼此容忍，共建規則，真正的共存共榮共和。我們不是激進派，而是保守主義者，我們只是想使中國社會恢復正常。

東歐各國，在經歷數十年共產主義革命的破壞之後不是正在漸漸恢復正常嗎？我們處在飛速進步的年代，人類的生活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誰也沒有能力設計出一套模式來滿足不斷變化的全體人民的政治需要。這就更需要實行民主政治。

49 · 「間諜活動」

我也時常到魏京生家裏去，有一天他給我介紹了《華盛頓郵報》記者孫曉凡，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黃明珍和BBC英國廣播公司記者麥傑思。他們很想深入中國農村採訪，瞭解農民的苦

難狀況，但這是違反中共宣傳部規定的。老魏讓我幫助他們，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然後我趕回蚌埠，和王庭金等民運人士落實這件事，我們精心安排了兩個農民特別苦難、村民與政府矛盾特別激烈的鄉村。

在約定的日子，我讓王庭金和另一個人去機場接來孫曉凡和黃明珍，把她們安排住在一個朋友的旅館裏。因為按當局規定她們不可以到蚌埠活動，憑證件她們無法住進任何酒店。麥傑思沒有來，因為他沒有一副中國人的面孔，無法進行這次秘密採訪。麥傑思後來在一天深夜來到蚌埠，和我的朋友見了面，談了一夜，但那時我已入獄。

我們先到懷遠縣，沿途看到公路邊幾萬農民在修路，我們都很吃驚，文化大革命不是早就結束了嗎？怎麼這裏又在搞大規模運動？我們索性先瞭解這件事。原來縣政府下令沿路農民每家每人都要去挖溝修路連幹一個月，每天補助零點五元，不幹就罰款，或抓到鄉政府批鬥。所以沿途八萬農民不得不拖家帶口去完成這項政治任務，這幾乎與當年秦始皇修長城一樣野蠻！

見我們問東問西，又不停拍照，戴紅袖章的糾察隊員就警惕地走過來盤問我們，我們只好匆匆離開。然後我們到我表弟維方家裏，請來許多農民談話，這個村的黨支書一班人特別野蠻，許多農民受到殘酷打擊。儘管我提前就讓表弟作了我們去採訪的準備，但是談了兩個小時之後表弟告訴我，幾個村幹部在附近轉來轉去，有可能在調集人手來衝擊我們。我擔心有意外，脫不了身，就匆匆帶他們撤退了。

我和王庭金又陪她們到蚌埠市郊一個村採訪，那個村的村

長貪污了幾十萬，當地幾百名村民集體告狀好幾年卻沒有任何結果，反而遭到瘋狂的打擊報復。後來我又陪她們到合肥採訪了幾位民運人士。

此後不久，所有人都被傳訊，王庭金也被抓走，我表弟維方還被懷遠公安局關了起來，縣政府定性為嚴重的裏通外國，出賣國家秘密的反革命事件，地方政府十分惱火。從那以後，我就不能在蚌埠市及懷遠縣公開露面了，當地村委會、鄉政府更狠，下令聯防隊只要一發現我就可以先打斷我的腿！可能那些報導嚴重地打擊了他們。

當時北京的政治環境還要好一點，這時我開始與劉念春合作發展「中國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我們頻頻會見外國記者，當時的英文《新聞周刊》駐京記者傅睦友善地提醒我，那幾篇關於蚌埠農村的報導給我帶來了嚴重的危險，他說：「我們很多記者認為不應當這樣做。我們渴望瞭解真相，向世界報導真實的中國，但我們不能以你們入獄為代價！」

我當時並沒有充分理解這段話，沒有意識到得罪地方政府的嚴重性，沒有意識到地方官員為了保證自己的政績和飯碗，可以不擇手段地收拾我。何況北京這時也有這個意思，無論找什麼藉口，都要把我這個幹得太歡的專業民運活動者收拾一頓了。

50 · 狂熱的計劃

我和劉念春開始到各地串聯，以把勞盟建成全國性的組織，我們不顧危險先到安徽蚌埠約見了王庭金等人，委託王庭金籌建安徽分部；又到上海找楊周，委託他在上海建分部，我們要求

楊周介紹幾位民運人士給我們，他說沒什麼合適的，完全沒有必要；後來我們又到了浙江嘉興；再到杭州，陳龍德陪著我們，並幫我們約見了三位民運人士。

最後又到江蘇活動了幾天，然後返回北京。那時我們已感覺到很危險了，沿途都有追蹤。幾乎每一個地方我們都是差一點被抓住，尤其是在上海和嘉興，幾乎是我們前腳走，警察後腳到。為了繼續活動，我們不得不進入隱蔽狀態，我們住在通縣一位朋友家。

我們秘密地約見了何德普等幾位民運人士。還先後與幾位外國記者秘密交談，我們都是在第一次見面時約好下次見面的地點和鐘點，然後只要在電話裏暗示一個日期就行了。

同時我們還在醞釀一個紀念「六四」五周年的遊行計劃，起草宣言，到天安門廣場周圍仔細地觀察地形，分析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以完善這個計劃。

我們打算秘密召集北京浙江安徽的民運精英，避實就虛，在便衣警察不多而人群又最密集的西單百貨大樓門前突然出現，召開演講大會，從樓上往下撒傳單，在當局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就糾集足夠規模的人群向天安門廣場遊行前進，再造八九輝煌！

完成這個計劃只缺人手，安徽和浙江可能只有王庭金和陳龍德會毫不猶豫地幹一場，其他人會患得患失，猶猶豫豫。如果再碰上一顆地雷，那將把大家都送進監獄。念春在北京有很多老插哥們，但是他們都年齡太大，不適用於當突擊隊員了，所以我們感到困難重重。

我不禁羨慕起清末，那時候的民主志士都是敢想敢幹，而且講義氣、重信用。像秋瑾、徐錫麟、陳英士都是縱酒高歌的勇士，一碗酒一聲諾即可與眾弟兄約定時間一起發難，拔槍就打，生死無畏。

同盟會歷次武裝起義，雖屢屢失敗，犧牲無數，但慷慨赴難的義士卻越來越多，直至武昌起義成功，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建立。

民國棟樑，皆是文武雙全，能打能拚。即使後來做了漢奸的書生汪精衛，也敢攜女友和幾個朋友，悄然離開日本，千里直赴京城，刺殺攝政王。

現在共末中國，說老實話，這樣的義士太難找了。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克林頓宣布無條件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的第二天，我和劉念春正在下圍棋，聽到輕輕的敲門聲。我走過去開門一看，是幾個警察，還有幾個便衣，一起擠在門口。我問他們是幹什麼的，他們說是派出所的，查戶口。我說可以，我要先去找防盜門鑰匙，我關上門回來告訴劉念春，看看後門是否可以逃走，我來與他們周旋。

然後我去銷毀隱藏一些不可以被搜走的東西，特別是我們打算在「六四」紀念日發動一場大規模遊行的宣言，為了實現這個大膽的計劃，我們已做了很多準備。

敲門聲越來越急迫，我只好去應付一下，我擔心他們破門而入。當我回到客廳，劉念春告訴我：「周圍全是便衣，起碼有六、七十個，絕對不可能逃出去了。」

最後我們只好把門打開，從容就捕。

51 · 再入牢籠

被捕之後我和劉念春就被分開了，我被帶到通縣玉橋北里派出所一間值班室裏。北京公安局一處負責審訊我，開始挺客氣，但是我根據以往的經驗，特別是「六四」之後的經驗，最好是什麼問題也別回答。尤其是一開始，一定要堅決頂住，就像防止大壩決口一樣。

不幸的是，這幾個北京警察脾氣很火爆，他們主要問我勞盟在各地發展組織的事，因為牽涉很多人，我便拒絕回答。硬碰硬使我們一開始就陷入僵局。

一個矮胖子頭目試圖緩和，但我已被激怒，沒有理他。矮胖子勃然大怒：「他媽的！對你太客氣了！讓你坐在席夢思床上抽煙，把他給我拉起來！」兩個人把我拉到牆邊站著，又把我的頭推靠在牆上。受到如此虐待令我更憤怒，我以仇恨的目光看著他們，那頭目也盯住我看了一會兒，然後怒氣沖沖地出去了。

幾分鐘之後他就回來大叫：「不能讓這個混蛋舒服！把他換個地方，帶走！」他們把我帶到看守所，但是看守所不收，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手續。他們指控我的罪名是在北京非法居住，沒有申報臨時戶口，但這最多是送到民政局收容站。他們嘀咕半天，又打了好幾個電話，看守所才勉強同意把我暫押。

通縣看守所擠得要命，晚上只能跟兩個人並排睡在囚室內走廊上。民運人士齊大峰以前曾被關押在這個號子。我們每天只有兩頓飯，每頓兩個拳頭大的玉米麵窩窩頭，和一點鹹得不能入口的爛菜湯。白天還要拆棉絲，就是用指甲把碎布條拆成棉紗團。

悲愴的靈魂

第二天他們就來審訊我，我還是樣子，拒絕回答問題。但我沒有預料到，他們四個人居然一起過來掐我打我，把我的衣服都撕爛了，我的腰也被他們打傷了，他們反覆打了我兩個鐘頭，這是我歷經百次審訊中遭受的一次最嚴重的毒打。

這真正激怒了我，我本性剛強，絕不吃硬的。他們又出門去借電棍，說非要制服我不可，但是沒借到。那個頭目臨走時惡狠狠地说：「民連我見得多了，沒見過你這號又臭又硬的，簡直就像茅廁裏的石頭。你至少要在手裏一個月，我天天打你，天天把電棍衝足了電帶來電你，看看究竟是你的嘴硬還是我的電棍硬！」

回到牢房我一籌莫展，沒想到北京警察這麼野蠻，本來我還以為北京的警察要文明一些呢，原來那都是表面功夫！這下我慘了，我只得以絕食抗議毆打。

沒想到他們再也沒來，可能是上級阻止了他們，畢竟長期毆打政治犯有損北京的形象，早晚我還要出獄控訴的。他們寧可把我交給地方政府來收拾。

52·不擇手段的誣陷

六月一日，我被蚌埠公安局三個便衣帶出北京通縣看守所，他們先把一個沉重的大包斜背在我身上，然後拿出一個很小的錘指鏢仔細地把我右手大拇指牢牢鏢在大包的接頭鋼絲環上，再蓋上一條毛巾，這樣就顯得我一點都不像一個被拘禁者。

北京市公安局一處的車直接駛入北京站內，沒有經過檢票口。那個科長一個勁地嘮嘮叨叨，說哪個該死的高官強占了他們

預定的勞動包廂。後來我們不得不上了一個硬座車廂，他們又換了手鐐把我錐在床板上，根本沒有一點逃跑機會。涉越到達蚌埠站，老廖廖孫守順帶了一幫人和車子在站台上等候，馬上就把我押送到蚌埠市公安局收審站。

漫长的審訊又開始了，我的問題還是太多，先後參加審訊的人有七、八個，多半都是我的老相識，都是一科的，也就是政治保衛科的。他們告訴我，在過去這二年裏，至少有三次，可以處我勞動教養一年，與高君瑜夢香港一次，組建七人行動組一次，在關建中的地區的台網，蚌埠民運聯合委員會一次，他們都饒過了我，主要考慮到我在蚌埠市的影響。

他們說，這次不可能饒我了，裏通外國以動記者到內地採訪，在北京後個國建隊了裏七竄八跳，和劉念有到各地串聯，參加組建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任全國聯絡人，所有這些事，每一件事都可以處我勞動教養的。

「被指控很明確，我們幫不了你了。如果你能老實交待問題，並且主動揭發，主動揭露，主動檢舉一些我們還不知道的事情，爭取立一大功，或許還能將功贖罪，否則誰也救不了你。」

我當然不聽他們的嚇唬，我經歷的已經太多了，他們還順便告訴我，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孫曉凡和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黃明珍已因為非法活動，功集情勢被驅逐出境，讓我老實交待引她們來安撫那段過程。

最後他們終於給我捏造了一個罪名，說我非法回國，說我該情說夢是叛軍行為，處我一年勞動教養，送我到南潯勞教處。那罪名之荒唐，幾乎把我活活氣死，從而使我開始了長達兩個月的

右的斷續絕食。那是我第二次抵死抗議。

我那時並不知道，江澤民有一個內部指令：政治案件的處理非政治化。後來我略微估計了一下，一九九四年江澤民實際掌權以來，將近一半的民運人士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抓入獄，另一半人的判罪也名實不符，嚴重違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

這就像江澤民打擊陳希同一樣，共產黨人總喜歡這樣做，總是自以為得計。卻不知這樣不按規矩出牌，導致的嚴重惡果，對手的極端憎恨。這必然會造就出一批鐵石心腸，使未來的政治鬥爭更殘酷。

很多年以後，在我又一次被中共誣讞並對我以「非法入境」的非法罪名勞教三年出獄後，魏京生在越洋電話裏勸慰我：「政治鬥爭本身就是殘酷的複雜的，共產黨人早已習慣於使用各種卑劣手段對付政敵，我們應該有足夠的承受能力，保持自信，否則會經不起敵人打擊，毀了自己的。」



第六章 水深火熱

一腳踏進勞教隊，
從此生死兩茫茫；
最是淒慘做奴隸，
牛馬不如心惶惶。

——〈地獄奴隸〉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

53·死亡線上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他們給我一張三年勞教通知書，那份決定書絲毫不提他們在三十次審訊我時提到的政治問題，卻胡說我非法同居，還說我以前談戀愛是引誘對方，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完全是顛倒黑白，指東打西。我看了以後憤不欲生，從而開始了漫長的斷續絕食。這是我第七次絕食。

我實在嚙不下這口氣，所以這次絕食最為慘烈。我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政權真正是徹徹底底絕望了！不想活了。

絕食開始後我就滿腔悲憤地寫申訴書，指控他們的惡毒罪行。收審站的站長股長沒有一個不認識我的，他們也認為這樣以莫須有的罪名整我太荒唐，紛紛跑來勸我想開一點。他們說政治鬥爭本來就很殘酷，現在比反右文革時還是好多了，都怪我不該從事民運，與共產黨鬥，雞蛋碰石頭啊。

絕食五天之後看守帶我去見公安局長程德本，但是他們幾個人見到我什麼話也沒說。我估計他們主要想觀察一下，我的身體惡化到了什麼程度了。第六天家人突然來見我，我很意外，在他

們的勸說下，我停止了絕食。

但是第七天，政保科和勞教辦就一車把我送到了幾百里之外，合肥勞教局中轉站。重新審理該案的希望落空了。這樣，在恢復進食一天之後，我又開始了第八次絕食。

絕食四天後中轉站指導員找我問了原因，然後說他們只負責中轉，別的什麼也不管，第六天他們又把我送到了南湖勞教處第一勞教所五中隊。

面對推卸責任的狡猾的共軍，我無可奈何，只有繼續絕食。那時候我走路都輕飄飄的，感覺自己快要成仙了，快到天堂了。胃已經不像頭幾天那樣磨來磨去很難受，也不怎麼想吃東西了。

軍訓的時候我就站在一邊看。他們知道我絕食很久了，但是假裝不知道。前後總共絕食到一個多月的時候，我走路就困難了，那天出工好容易才走到工地，然後就倒在地上不行了。

躺在潮濕的田埂上，想著我放棄順順當當、舒舒服服的共產黨奴才生活，一心一意探索真理、尋求正義，走上這條救國救民的艱險道路。想到八六年以來艱苦卓絕的奮鬥，想著身後孤苦無依的妻子紀曉，和只見過一面的女兒，我不覺熱淚盈眶。

他們把我架回中隊，扔在寢室的水泥地上，我在那裏迷迷糊糊一直躺到第二天。難道真的就這樣死了嗎？我心有不甘。他們終於採取行動了，幾個人團團圍住我，按住我，灌我米湯，我已失去反抗的力氣，由著他們擺布。

長期絕食使我的抵抗力下降，全身潰爛，惡臭難聞，又得不到治療。周圍的人都把我當成一堆垃圾，掩鼻而過。沒人願意端水給我喝，我只能扶著牆一點一點挪到水池喝點水。

後來，我又站起來了，但是沒有一點力氣，而且厭食。別人都拿飯盆排隊打飯，我不想吃飯，只揀幾塊南瓜或青菜象徵性地吃上兩口，一個星期吃的飯還沒有以前一頓吃得多。

我的身體越來越衰弱，根本沒有力氣幹活，走路都困難，我也堅決拒絕被奴役。他們把我轉到菜園班，隊副楊明球要求我做做幹活樣子，我拒絕了，他就毆打我，扒光我的上衣電擊我。我再次絕食抗議，這是我第九次絕食。

我已記不清那段時間有多少次絕食，每次絕食多久了，大約在兩個月的時間裏，只是偶爾吃一點點東西。面對共產黨的羞辱和虐待，我實在是太傷心了，太絕望了。

幸虧我的妻子來看我，回去後把我的情況告訴了中國人權，劉青為我做了大量呼籲，這第十次絕食到第六天的時候，他們終於把我送到醫院，我也確實快不行了。

在我八年的囚禁勞改生涯中，只有一位民運人士混進去看望過我，那就是儲海藍女士。受劉念春兄弟委託，她謊稱是我太太紀曉的表妹，從我家鄉派出所騙得介紹信，和我太太一起來看我。

儲海藍是異常勇敢的女子，那些年她為民運做的工作，足令男兒們羞愧。我當時非常感動，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一種莫大的恩情！無法感謝的恩情！因為我們被嚴格限制與外界接觸，不像一般的刑事犯，任何人都可以來看望。我們有時連父母都不准見。

經過一段時間療養，我又能站起來了，但是我的耳朵不靈了，別人說話非得大聲喊我才能聽見；眼睛也不行了，經常產生

錯覺，甚至看不清人臉。後來中隊把一間原來存放雜糧的小倉庫騰出來給我住，又安排一個人什麼也不幹，專門監視我。

二年以後，我才恢復一些。但是我一向堅強無比，幾乎什麼都能消化的胃垮了；一向活躍的、思維敏捷的頭腦也呆滯了；尤其是我的記憶力，幾乎接近零，老是丟東忘西，衣服釦子經常扣錯，褲子拉鍊都不知道拉。直到現在我都沒有完全恢復，恐怕此生已無望了。

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敢進行一星期以上的絕食了，除非我確定想死。即使想死，我也寧可採取別的方法。後來我在南湖又絕食兩次，但那都是為了有限目標，經過談判，兩三天就結束了。我的經驗是：絕食不絕水，不要超過一個星期。否則就會損害身體，留下後遺症。

54 · 抵死抗拒奴役

一九九五年四月，南湖勞教處一年一度的春茶採摘正在進入高潮，隊長們全都進入兇猛時期。我們每天四點鐘起床，早操也取消了，大家喝一點稀飯，四點半，天只朦朧亮，隊伍就出發了。茶樹上都是露水，採茶一會兒，我們的衣服就打濕了。

採茶時兩人一對，老兵帶新兵，被稱為互幫對子，主要是防止新兵逃跑。採到中午，中隊送飯上山，吃完接著採茶，一直到天色昏暗，才收工下山。回到中隊吃過晚飯，就開始檢查評比，批評與自我批評了。

帶工幹事坐在大沙發上，逐個講評，然後把採茶產量低，被稱作「駝鳥」的人叫過來，用高壓電警棍一一充電，電得他們鬼

哭狼嚎，跪地求饒。班長侍立一旁，用被板打擊「鴛鴦」頭部，打到腫起來，以給這些人加深印象。

然後命這些人分兩排面對面站立，互抽二十個響亮的耳光。下手不重的，由幾個組長拉到一邊個別輔導，教他怎樣打耳光最響亮，幾下子就可以把人臉打腫，打成變形金剛。

最後進入革命高潮：命所有產量低於平均數的人面對面低頭跪成兩排，再命產量高於平均數的人，雙手舉起結實的木板凳，用盡全力給前者砸背，一定要砸得傷痕累累，像被繩子捆起來待宰的豬一樣嗷嗷叫痛，才算一條龍服務到位。

所有人都像被打斷了脊樑骨的牲口，惶惶終日，拚命採茶，食指、中指、拇指全都血淋淋的，新傷舊傷累累，最後結成厚痂，一些人手指因此變形。

我一直在抗拒勞動、抗拒改造、抗拒奴役。別人採十斤茶，我只採一兩。一天中午因太陽太毒，全體回中隊吃午飯。剛進大院，指導員徐文奇便拿一副手銬，把我銬起來。先是把我吊在籃球架橫樑上，因我掙扎不止，他又要去吃午飯，怕我磨斷手銬鏈子，才改把我銬在籃球架豎柱上。

這在勞教隊是老常事，李小篩逃跑被抓回來之後，被這樣銬了整整一個星期，兩隻手腕腫得比上臂還粗，

徐文奇特意給我銬得很緊，當我抗議時，他笑瞇瞇地說：「該讓你嘗嘗這種滋味了，我們一向這樣對待採茶產量最低的抗改分子。」大家都在大院裏吃飯，只有我被銬在那裏。我仔細考慮了一番，我的雙手原來在廣東就被銬傷過，這樣緊地銬下去，只要二十四小時，恐怕就殘廢了。手殘廢了，人還有何用？還不

如死了乾脆！

我決定一不做二不休，抵死反抗一回。我決定把反擊矛頭對準徐文奇，這傢伙在隊長們中間一向孤立，明明膽小如鼠，卻天天要充老大。

「徐文奇是個孬種！想把我的手銬殘廢！這是違法犯罪行為！」我大聲吼叫起來，大院裏的一百多個勞教人員都驚慌地看著我。

「徐文奇一向執法犯法，虐待我們，他是中隊長，所有的毆打都是他指使的！」我聽到在外面吃飯的隊長嘰哩呱啦講話，徐文奇大叫值班員把所有電棍都拿來。

「勞教人員是全權公民，我們與徐文奇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法律規定我們有權進行正當防衛，不受非法侵害！所以今天我將開始依法與徐文奇鬥爭到底！只要他不把我的手銬解開，我就在這裏每天講話十次，揭露徐文奇的罪行！」

我厲聲吼叫：「徐文奇，你若有種就出來與我單獨決鬥！共產黨有幾百萬軍隊，那麼強大我都不怕，敢跟他鬥，我還會怕你這個孬種？我鬥不過共產黨，還能鬥不過你？你算什麼東西？」

七、八個隊長和幾個值班員湧進大門，徐文奇一馬當先，揮舞電棍，直撲向我。

「來吧！徐文奇！讓我們拚死決戰一場！大家可以作證！我是正當防衛！」徐文奇用電棍連連猛擊我，我雙手被銬，只能用腳踢他。如我所料，這傢伙其實很孤立，沒有一個隊長上來幫他。

我怒髮直豎，獅吼連連，不顧一切，決心死戰！激烈搏鬥

中，我奮力掙斷了手銬鏈子，與徐文奇搶奪電棍，他鬆手用腳踢我，我沒有了束縛，跳起來一腳把他踢倒。我正要揮棍痛打這隻惡狗，馮隊副和倪隊副衝過來架住了我的雙臂，喝令我不得傷害政府幹部。我也按照胡平的民運理論，「見好就收」，扔掉電棍。

徐文奇的老婆是勞教所財務科長，是個有良心的女人。她哭叫著衝進大院拉走了徐文奇，兩個隊副則把我架到辦公室。半小時之後，南湖勞教處第一勞教所黨委兩位副書記趕來調查，指責我煽動抗改抗教、擾亂場所秩序、襲擊隊長。

我針鋒相對，指出徐文奇非法侵害我，我只是依法正當防衛。同時我又表示，這件事可以就此結束，如果對方蓄意鬧大，我也奉陪到底，把這場官司打到任何地方去。

不久勞教處派來一個年長的指導員，徐文奇成了主管生產的第二把手，再也不管我的事了。但是每次見到我，他都斜眼看我。後來聽說徐文奇的靠山，老惡棍張所長來中隊喝酒的時候，大罵那些隊長沒有一起上來打服我。

聽說徐文奇還上交了一份報告，要求在我這三年勞教期結束之後重新勞教三年，但這也跟上次楊明球上交報告要給我延長勞教期一年一樣，都沒有任何結果。從這次激戰以後，再也沒有一個隊長敢打我，我被一些勞教人員稱為南湖第一條好漢。

55·小耳朵

肉刑很早就被人類放棄，尤其是殘害五官的肉刑。

而在中國勞教隊，一個組長就有權對組員實施肉刑。在實

施肉刑的過程中，經常會留下傷殘，但是你沒有地方可以討回公道，按照所規隊紀，這僅僅屬於違紀行為，不構成犯罪，你不能起訴兇手。

一九九六年在南湖勞教處一所五中隊，我注意到有幾個人的耳朵很特別，一隻耳朵只有另一隻耳朵一半大小，而且那隻小耳朵特別醜陋，像一朵枯萎的菊花，很彘扭地萎縮在一起。

我以前沒見過這種耳朵，就猜想這幾個人可能是某個特殊的少數民族，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就遞給一個小耳朵一支煙，與他攀談起來。原來他並不是什麼少數民族，而是個地地道道的漢人，家住大別山區。我忍不住直截了當地問，他的耳朵是怎麼回事？他的回答令我震驚。

「打的。」他目光黯淡下來，「被班長唐留紅打的。」「怎麼打的？」我急切地問。「那天早上他說我被子疊得不夠整齊，就用被板打我的臉，連打了十幾下，把我的耳朵打腫了，腫得很厲害，聽不清聲音。過了好幾天才消腫，耳朵就越變越小，一直變成現在這樣。」

我估計是毛細血管被打破了，整個耳朵的供血系統被破壞了，耳朵只有萎縮。「這是毀壞五官容貌的罪行，你為什麼不去告他？」我問。「我偷偷地找楊幹事告了，他說這不算什麼，還有被打死的呢，到哪兒告去？這是勞教隊，不是社會上，告什麼狀！讓唐留紅知道了，不打死你！後來我就不敢告狀了，找誰告啊？到哪告啊？我只有認倒楣了。」他悲哀地說。

人講究五官端正，尤其在找配偶的時候。可以想像對於一個未婚的年輕人，一隻耳朵殘疾意味著什麼？恐怕沒有一個姑娘願

意嫁給一個小耳朵。

不止異性會對此挑剔，當你走進一家公司應聘的時候，如果你有一隻耳朵殘疾，你肯定會被優先淘汰出局；你永遠也別想找到一份像樣的工作，你只能去幹沒人願意幹的、既危險又勞累、收入又低的工作，而且幹一輩子。

薩達姆懂得這一點，對付手下的逃兵，他就下令割掉一隻耳朵。薩達姆割掉了三千個逃兵的耳朵，他知道這就等於把這些人廢了。這些人此後一生就只能鬼鬼祟祟地生活，無論出現在哪裏，都會受到人們的歧視。

比起把這些逃兵槍斃，還有另外一個明顯的好處。這些人的悲慘存在，可以時時刻刻提醒薩達姆其餘的部下：服服貼貼做奴才，永遠也別做逃兵，那和死亡一樣可怕。

後來我留意了一陣子，發現我們中隊共有五隻小耳朵，形狀都一樣地醜陋，像一朵枯萎的菊花，很驚扭地萎縮成一種古怪的形狀。我估計都是被打殘的，而且很可能都是被被板打殘的。我們中隊有一百個勞教人員，我估計這個5%的比例可能適用於中國大多數勞教隊和勞改隊，中國有數百萬囚徒，那麼總共會有多少隻殘疾的小耳朵？

全中國殘暴的組長加起來，可能打出了十萬個殘疾的小耳朵，不是比薩達姆還要兇惡三十倍嗎？

被板，是一塊大約五十厘米長、八厘米寬、三厘米厚的木板，光滑結實，是大家用來撫平被子用的。在勞教寢室裏，它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用處，是班組長得心應手的打人工具。

被子疊得不整齊要挨打，衛生搞得不乾淨要挨打，不會背

「五要十不准」也要挨打，反正只要班組長看你不順眼，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揮舞被板，打你一頓。和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夫婦抓人整人一模一樣，完全是隨心所欲的，胡亂定個罪名就行了。

勞教隊經常有各級各部門領導來檢查參觀，他們一般都對勞教宿舍的乾淨整潔留下深刻印象。他們或許不知道，或許不願知道，更不願過問，這種整潔的假象是怎樣製造出來的。

這是打出來的，成年累月打出來的。用被板，用木凳，用電棍，用拳腳打出來的。用無數人的痛苦和傷殘為代價換來的，如那五隻傷殘的小耳朵。

最難弄的是被子，必須疊成整齊劃一的豆腐塊，正常人絕對疊不出來，即使在長期毆打下很多人無論怎樣努力也疊不出來。為了把被子疊成豆腐塊，勞教人員想盡了一切辦法，在裏面墊硬紙板，不允許；沾水疊，但不能弄濕被子；花代價請別人疊好，以後晚上睡覺就小心地把被子托到床下面。寧可自己挨凍，也要想盡辦法避免挨打，因為每一次毒打都可能導致殘廢，甚至死亡。

來檢查參觀的領導只看宿舍整齊的被子，從來不看勞教人員，不看被折磨的像一群牲口，臭烘烘、髒兮兮、頭髮蓬亂、破衣爛衫、形如惡鬼的奴隸們。有一次適逢大雨，中隊怕有人乘機逃跑，不敢出工，領導又要來視察。最後指導員就把所有勞教人員都驅趕到豬棚裏隱蔽，當成一群豬看管起來。

這樣惡鬼似的群體我以前只在小畫書上看到過，是我小時候看一本描繪長征紅軍的連環畫，裏面的紅軍戰士就是這個樣子，蓬頭垢面，齙牙咧嘴，形如惡鬼。

我以前一直納悶，既然共產主義這麼荒謬，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願意加入其中，並且賣命呢？

後來我仔細研究共軍史，用心琢磨，才終於明白，那些紅軍戰士，也和勞教人員一樣，都是被抓去的奴隸，並非自願的。他們想活下去，就只有絕對服從命令，「一切行動聽指揮」，「把生命獻給黨」。他們自身沒有任何做人的權利。世界上也只有奴隸隊伍才可以一日步行二百四十里，像紅軍飛將軍羅炳輝的部下。而其他任何正常的軍隊，都是不可能這樣做的。

紅軍軍官也許就像勞教隊的幹部一樣，待遇好一點，至少可以作威作福，但本質上也還是奴隸。記得看過一個老紅軍的回憶錄，說紅軍到了陝北，一個師政委到無人的前沿陣地觀察地形，順便向警衛員借槍練練手，抓起槍後就跳起來逃跑了。警衛員追不上，急得直哭，回來後受到了上級處分。因為這個警衛員警惕性太差，不太清楚所有紅軍將領都是需要嚴密看管的罪犯。

共軍有名的司令員許世友，在延安就兩次逃跑被捉回，用繩子捆起來，扔跪到毛主席腳下嚎啕大哭，差一點就被拖出去槍斃。就連當時中共的第二號人物張國燾，也是以上廁所為名，避開守衛在廁所門口的警衛員，翻牆洞逃跑獲得自由的。

後來中共的第二號人物林彪逃跑的時候，被貼身警衛員發覺。警衛員拔槍就打，在林彪乘坐的紅旗牌防彈小轎車上留下兩個彈痕。據說後來周恩來還假惺惺地責備這個警衛員：「林彪畢竟是黨和國家副主席，你要是一槍打死了他，我們怎麼向全世界交代？」

看來除了毛主席，所有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都是奴隸，僅

僅級別不同，物質待遇不同，分成二十六個奴隸幹部階級，和另外數目的奴隸群眾階級而已。

我讀《孫子兵法》知道，在雙方武器和人員素質差距不太大的情況下，奴隸兵團最有戰鬥力。尤其在決戰的時候，只有奴隸兵團可以克服一切困難，不惜一切犧牲，被迫戰鬥到底。

小說《血紅雪白》有一段談到在南滿戰爭時期，林彪部下一個共軍奴隸師埋伏在雪地裏，足足凍死了一半，都沒有人敢動一動，後來剩下的奴隸兵發動奇襲獲得成功。這對於人性化的，由正常人組成的軍隊，怎麼可能？

古希臘時期，實行奴隸制的、野蠻的斯巴達，戰勝了實行共和制的、文明的雅典，摧毀了當時人類最先進的古希臘文明。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摧毀了亞洲第一個半民主的共和國，便是在中國大地上重演了這段故事。

與勞教隊裏的小耳朵相比，紅軍官兵們應該更悲慘。他們大部分都死了，白死了。據王震揭發，共軍征服中國，總共「犧牲」了兩千多萬人。而他們在戰場上打死的對手，還不到兩百萬人。這表明，共軍大部分官兵，死於內部清洗，及虐待而亡。

僥倖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共軍更可悲。他們的心靈已被徹底摧毀，完全失去了思想能力，成了行屍走肉，只知服從黨組織的命令，為非作歹。所以「解放」後幾十年裏，這些「活死人」管理中國，便把一切都搞的一團糟，把中國人不斷推向更苦難的深淵。

56· 惡有惡報

韓幹事曾是五中隊的管教幹事，所謂管教，主要任務就是打人。每個中隊一般都有管教官員，管教隊副或管教幹事，電棍和手銬一般歸他管理，別的隊長需要這些刑具的時候要向他借用。

韓幹事是第一勞教所有名的「四豹之一」，打起人來機智靈活，掌摑、腳踢、肘搗，常常令被打者無法閃避。他的絕活是玩電棍，一把高壓電棍到了他的手裏就成了魔棍，搗得人癱倒在地，鬼哭狼嚎，跪地求饒。

南湖勞教處位於宣城境內，一般的隊長盡量不打宣城人，就是打也不會往死裏打，主要擔心以後受報復。韓幹事不信這個邪。為顯示自己誰都敢打，他經常把宣城人痛打一頓。韓幹事的信條就是鬼怕惡人，所以他決心以毛主席為榜樣，做一個最惡的惡人。

一般每個勞教所裏都有四虎四豹四狼，虎兇豹狠狼殘，獲得這個稱號的人一般都要打過幾千人次，或打死打傷很多人。雖然沒有黨組織的勳章或獎狀，但這個榮耀稱號比開槍鎮壓「六四」學生市民的「共和國衛士」還實惠，比南京大屠殺比賽殺人的日軍屠夫更令人畏懼。

虎豹狼走到哪裏都受到尊重，往哪裏一坐都是大爺。就是各級領導知道他們邪惡無比，也另眼相看，給他們面子，輕易不會找他們麻煩。

勞教隊是典型的黑社會，裏面的幹部，誰兇狠誰霸道誰就有地位，勞教人員家屬就把保護費送給誰，因為這樣才會得到關照和保護。兇惡的幹部有了大筆的保護費，自然能夠向上級大肆賄賂，所以權力和地位就更加鞏固，而且提升得也最快。

按說一個管教幹事的地位，在勞教隊裏最多只能排到第六位，因為一般的勞教中隊，都有指導員、中隊長、三個以上的副中隊長，有的勞教隊甚至有五、六個副中隊長，幹事倒是只有一至三個。共產黨各部門，早就是頭重腳輕，官多於兵，領導幹部多於一般幹部了。

但是韓幹事的權力卻超過了任何一位領導，提拔任何一個三大員都必須經過他同意，否則很簡單，隨便捏一個錯，把這個三大員痛打一頓，下大組幹活就是了。所以每一個班長組長都明白這一點，都必須送錢給韓幹事。

善惡到頭終有報。有一天韓幹事騎摩托車帶著女朋友到宣城一個商店買東西。一個以前多次被他毒打的勞教人員看見了，立刻抓起一根大棍迎上去。韓世元目瞪口呆，還沒反應過來，棍子已打在頭上，韓幹事連人帶車一起倒下。

這個復仇者痛痛快快打，每打一棍還問韓幹事疼不疼。一直打了50多棍，眼看韓幹事已口吐白沫，亂翻白眼，這個復仇者才收棍告訴站在一邊已嚇傻了的女子：「這就是南湖一所有名的四豹之一，打傷打殘了幾千個人，你怎能與這種野獸交朋友，早晚會被他吃掉的。今天我打他是為了報復他，以前我在他的中隊裏挨了他100多棍，今天先回報他一半，留他一條狗命，下次再打他50棍。」

那女子一聽韓幹事原來是這種人渣，當即表示該打，然後嚇跑掉了。韓幹事被踢進臭水溝裏躺了三個多小時才醒過來，女朋友和摩托車都不見了，他掙扎著向路人求救，人們都掩鼻而過，根本沒人理他。他這才感到世態炎涼，人們普遍見死不救。

最後他只好掙扎著往醫院爬，像一條被打斷了三條腿的野狗一樣，爬了三個小時才爬到醫院，筋疲力盡又傷得很重，他昏了過去。醫院根本不理他，護士醫生走來走去沒人停步看他一眼。又過了一個鐘頭，他醒過來，正好看見一個熟人，便拚命呼救。

那人忙過來扶他起來，帶他去看傷，可巧那人沒帶多少錢，只有打電話到韓幹事單位。他又流了很多血，等到單位同事帶錢趕來，醫生才給治療。由於傷重及耽誤治療，韓幹事直到三個月後才出院。

這期間韓幹事念念不忘控告那個人，但那個人也有關係，最後雙方對簿公堂。韓幹事找不到一個人證，那個勞教人員卻提供了幾十個受害者的名單，充分證明韓幹事邪惡成性，曾經野蠻地毆打了無數人，要求法庭調查。勞教局害怕事情鬧大，暴露太多黑暗，匆匆下令韓幹事撤訴，自認倒楣算了，否則就要開除他。

從那以後，韓幹事不再輕易打人了。他終於明白，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57· 李貴福和李前程

李貴福一點福氣也沒有，二十歲就死了，而且是被活活打死了。這是在八年的監牢生活中，唯一一次親眼目睹的虐待毆打致死全過程。

一九九六年秋，安徽南湖勞教處一所五中隊又分來十多個勞教人員，為防止新兵逃跑，按慣例要先軍訓一周，每天在操場上跑步，向左轉、向左轉、再向左轉！再向左轉！直到把你徹底轉暈。值班員闞慧拎著棍子一邊喊口令一邊毆打動作不夠麻利的。

有一個瘦瘦的老是挨打，後來被打得實在爬不起來了，闕慧再補上幾腳就不管他了。

那時我因病弱不堪特別獲准休息，躺在床上看這經常上演的一幕。由於我經常向上級反映中隊的黑暗，當時隊長們打人一般不讓我看到，畢竟司法廳明文規定不准打人，但是值班員和班組長打人就無須顧忌了。

後來我走過去遞給這個人一枝煙，得知他叫李貴福，阜陽地區人。當天晚上開飯前，他因為站隊慢了又被二班班長唐留紅打了幾拳，四個組長也一擁而上拳打腳踢，並不准他吃晚飯。

後來我幾乎每天都看到李貴福挨打，他從不反抗，見到所有人都是笑瞇瞇的。那是慘淡的笑，乞憐的笑，無奈的笑，悲傷的笑。我同情他卻無力幫助他，只能每次見他給一枝煙，有一次我送給他一條毛巾和一塊肥皂，他卻拒絕了。「謝謝你，但我確實用不著。我已經很久沒有洗臉了，軍訓、幹活累死了，根本沒有力氣洗臉，更沒勁洗衣服。唉，渾身都腫疼，睡覺都不能翻身，只能活一天算一天了。」

李貴福到勞教隊兩個星期以後的一天早上，因為前一天沒有完成生產任務被打了好幾頓，帶工楊幹事打，班長唐留紅打，幾個組長也輪番打，起床跑步的時候起不了床又挨了幾頓打，眼看不行了，就把他丟在地上。後來宣傳鼓動員去摸了摸，身體已經涼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早已死了，中隊長徐文奇才把他拖到醫院。由於參與毆打的人太多，實在難於確定責任，最後只得不了了之，一紙腎衰竭病亡通知書便掩蓋了一切。

後來中隊長徐文奇召集班組長開會總結經驗說：「勞教隊不

打人不行，不打沒人幹活，大家吃不上飯；打死了也不行，上級會敲詐我們錢。問題是打人要會打！有的人根本不經打，像這個李貴福，半個月就打死了。有的人太經打，像那個李前程，他媽的來到我們中隊堅決不肯勞動改造，天天挨幾頓打，三年挨了至少三千頓打，還是沒有被打死，浪費了多少糧食！」

那個李前程，我也很熟悉，的確很神奇，簡直就像香港武打片裏的角色，千打萬打，渾身是傷，就是不死！可謂是勞教隊的奇蹟。但是又有幾個人能像他那樣天生耐打呢？

李前程生在中國太不幸了，只能在勞教隊裏供隊長班長組長操練拳腳，年年月月天天白白挨打。如果他生在香港，可能是最優秀的特技演員，說不定早就成為武打明星了。我仔細觀察過，儘管渾身是傷，滿臉血痕，但是他相貌英俊，身材英挺，與劉德華有一比。

司法部一方面不准打人，另一方面又下達生產任務和利潤指標，經過層層加碼，到了每個基層勞教隊頭上已是可怕的數位。再加上隊長們的貪婪，制度性的腐朽，全部都要壓在勞教人員的肩膀上。如果沒有毆打和死亡的恐懼，誰又能忍受那麼苦難的生活，那麼艱辛的勞動，那麼殘酷的改造！

工業社會創造的財富足以養活大量的人，尤其是生活費用極低的中國人。我在美國看到大量的人領取社會保障金，過著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一點也不影響美國社會的繁榮和進步。而中國仍然以殘酷的奴役勞動來進行生產，其破壞性遠高於這種最原始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而且勞教隊的生產活動完全還是以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生產隊方式進行，效益極端低下，簡直不如什麼也

不幹虧損還要少一點！

千千萬萬個孫志剛被打死了，收容制度終於結束了。

千千萬萬個李貴福被打死了，勞動教養制度卻還在繼續！

58· 勞教隊的本質

勞教隊有許多慣匪，而且混得很好，這個現象最能反映共產黨說一套做一套的本質。

本來按照定義，勞動教養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以教育為主，勞動為輔。事實上卻正好相反，根本沒有什麼教育，完全是把勞教人員當成逮來的牛馬奴役，竭盡全力、不擇手段的榨取血汗。

本來按照定義，勞教班組長、值班員、炊事員這三大員都應該是品行相對較好的人擔任，因為是他們直接掌管具體事務。但是為了榨取利益，這些三大員的選擇標準反而是：第一要提供賄賂給領導，提拔你之後你可以利用職權再撈回來；第二是你必須心狠手辣，天天打人罵人，能逼人幹出活來，給幹部掙錢花；第三是要把大家都逼到死地，不得不哭求家人拿錢來賄賂幹部以減輕痛苦。

很多幹部由於慵懶成性，十分愚蠢，加上經常調來調去，根本就不懂得如何管理生活生產。大部分帶工幹事什麼都不知道，僅僅是跟著一班人後面跑去工地，連隊長用的水杯、暖瓶、板凳、雨衣、大衣都是班長安排專人伺候。然後班長安排一切工作，另外再派可靠的人去附近買些酒菜來給幹部吃喝，吃飽喝足就躺在大衣雨衣上睡覺。收工的時候班長再喊醒他回隊，就結束了一天的工作，除非想找幾個肉靶練練拳腳，否則可以什麼事都

不用操心。

勞教隊的用人模式完全與中國共產黨自上而下的用人模式一模一樣，都是選擇對自己有好處的人，對人民兇狠毒辣的人，狡猾的兩面派、變色龍，內心黑暗、骯髒無比、唯利是圖的陰險小人，獸性十足而又恭順偽善的人渣。

用這些人實際管理勞教人員，只會敗壞人心，毀滅道德，把一些人殘存的人性徹底消滅，從而教育出一批又一批窮兇極惡的匪徒，然後再把他們放到社會上，禍害全國人民。

這就是實際的勞動教養。

勞教隊是冶煉爐，把一部分人煉成牛馬，當然是懷恨在心，日後再報復的牛馬；另一部分人被煉成野獸，當然是隊長、班長、組長。

吳隊副當時是南湖勞教處一所五中隊後勤隊副，中隊裏流傳著他的故事。吳隊副的父親是鄉村教師，他本來也是想做一名教師，但是在師範學校畢業後，鬼使神差，把他分配到勞教隊。

吳隊副力大如牛，但卻膽小如鼠，到了勞教隊，看到隊長班長組長值班員天天打人，既厭惡，又害怕。他一再找領導要求調走，他不知道在南湖勞教處，一個幹部要想調走，除非有鐵硬的關係，至少要花十萬元。他在所裏找來找去沒有用，只好上訪到勞教處，又被推來推去跑了無數趟，終於有一天處長見了他。

吳隊副：「我堅決要求調走，這裏太野蠻了，打來打去，像是動物園，生命安全都沒有保障。」處長：「那大家怎麼照樣工作，只有你不安心工作，盡給我們添麻煩。如果誰想調走就調走，那不亂了套了。」

吳隊副：「我仔細看了勞教法規，從法律上我們幹部與勞教人員是平等的，如果勞教人員打我怎麼辦，你們怎樣依法保護我？」處長：「見鬼！我在這裏幹了三十年，只聽說幹部打勞教，沒聽說過勞教打幹部，那不是反了天了！」

吳隊副：「幹部打勞教也是違法的呀！這裏是執法機構，應該一切依法辦事，可是上面給分隊幹事下達的生產任務那麼重，不打人根本完不成。我不會打人，所以這份工作我做不了。」

處長：「什麼法律，勞教制度根本就是與法律無關的政府行為，高於法律的！在這裏，什麼都是我說了算，你敢打我嗎？」

吳隊副：「不敢。」處長：「那你帶一個班，什麼都由你說了算，誰還敢打你？你給我回去安心工作，如果哪個勞教敢打你，你再來找我，我去打他！」

幾年過去了，我到中隊的時候，有天早操時，我看到吳隊副只揮一拳，就把一個姓查的大個子打倒在地。等到出工的時候，大個子一隻眼成了大大的熊貓眼，足有半個拳頭大，腫得睜不開縫。

可憐的大個子，再過兩天就該解除勞動教養回家了，怎麼見親人？

楊幹事個子小小的，長得很秀氣，戴一副近視眼鏡，剛到中隊時見誰都笑眯眯的。那時我的勞教期已過二年，他一見到我就開玩笑，我也喜歡跟他說話，希望他別被冶煉成野獸。但是僅僅幾個月之後，為了能在各班採茶競爭中獲得優勝，多拿獎金，他就變成打人最兇的帶工幹事。

那時中隊裏有幾名基督教傳教士，其中有一個安慶人叫李程

生，已經四十歲了，身體被看守所折磨壞了，幹活不行，老受欺負。我從各方面盡力幫助他，特別要求楊幹事不要打他。

自從打敗中隊長徐文奇之後，我在中隊很有威信，我就利用這種威信竭力保護幾個良心犯。另外兩個帶工幹事也給我一點面子，他們也有一點良心，不打自己班裏的政治犯。班組長都是狗，只要幹部對你另眼相看，也不敢輕易打你。

平時我在中隊部養病不出工，但是採茶季節人人都得上山，中隊就讓我記帳，以節省一個勞動力。這樣一來，四個政治犯幾乎就不用採茶了，因為我給他們記假帳，而且記到平均數以上。帶工幹事和班長當然都心知肚明，但這可以增加他們的採茶總產量，所以都不吱聲；一般的勞教人員也不敢講，反正只要瞞著秤茶的中隊長一個人就行了。

整個採茶季節，由於我的假帳，四個傳教士都沒有挨打。我故意把帳記得凌亂，只有我自己才能看懂，別人根本無法核查。

但是採茶季節一過，楊幹事就翻臉了，把李程生踢得直不起腰來，走路都要人扶著。我得知大怒，徑直去找指導員，指控楊幹事打傷人，我要向所裏、處裏，乃至勞教局司法廳和國際人權組織寫檢舉信。指導員要求我別寫，他會特地交代楊幹事別再打李程生。

回頭我又叫二班班長唐留紅傳話給楊幹事：「別欺負老實人，有種就找我來打！」楊幹事沒敢來找我，但我們從此成為仇敵。唉，楊幹事變壞得太快了。

唉，傳教士們也實在太老實了，逆來順受，一點都不敢反抗！連絕食都不敢，儘管我多次向他們提議！如果我不是長期絕

食抗爭，如果我不是危急時刻拚命一戰，我在南湖也只有跟他們一樣窩囊。首先你自己要敢戰，別人才好來幫你，中國民運與國際社會包括美國政府也是這種關係。

59 · 勞教隊唱詩班

看到這個題目的人，一定會感到吃驚，勞教隊裏怎麼會有唱詩班？

然而這是真的。雖然她只存在了一個星期，只是曇花一現。

因為經常去教堂，所以我聽過許多讚美上帝的歌聲，英文讚美歌、中文讚美歌我都聽過許多。但是最讓我難忘的讚美歌，還是在勞教隊裏聽到的，那個臨時唱詩班唱的讚美歌。

一九九七年四月，春茶採摘開始了，所有茶葉隊都進入瘋狂野蠻時期。中隊逼迫大家每天勞動十六個小時，幹部們每天晚上殘酷毆打勞教人員，以提高產量和質量。

除此以外，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超額生產任務，勞教隊還從大別山區僱用了幾十個村姑來採茶。她們就住在中隊大院門外簡陋的招待所裏。

我有個老鄉在大伙房燒飯，能告訴我許多情況，我得知這些村姑來自霍山。我們中隊裏當時有四個傳教士，都是來自大別山區。那裏貧困的山民特別虔誠地信仰上帝，經常有人被抓來勞教。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當幾位村姑到大伙房打開水喝的時候，我隔著鐵柵欄窗口跟她們說話，告訴她們這裏關押了四個傳教士。我把他們的姓名和居住地，以及他們在這裏受到的種種殘

悲愴的靈魂

酷虐待，都訴說給她們聽。我請她們幫助這些落難的兄弟，也許她們可以在夜晚唱聖歌，給他們苦難的心靈一點安慰。她們問了一些情況，然後非常嚴肅莊重地答應了。

晚飯時我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那四個傳教士，他們都和我一樣激動。果然，大約九點鐘左右，一陣歌聲隱約傳過來，而且越來越嘹亮，都是讚美上帝的歌曲。中隊幹部們都在餐廳喝酒，一般都要喝得酩酊大醉才去睡覺。

後來歌聲更大，院子裏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聽清。我那時被單獨關押在一間小倉庫裏，由於接近解教日期，幾乎沒人問我了。我便遞給值班員一根香煙，請他在幹部進院子時給我打個招呼，然後我就去看那幾個傳教士。

他們都聽得如醉如癡，年近六十歲的老王更是淚流滿面。

幾十年來一貫殘酷血腥的勞教隊，只有在這一刻，才被聖靈占據，充滿了溫情。

以後的每一天，我們都盼望夜晚快快降臨。讚美歌總是準時響起，直到深夜。

大約一個星期之後，那些村姑突然離去。從值班員口中得知，幹部終於干涉她們，勒令她們不得在司法機構內宣揚宗教，禁止她們再唱聖歌。

她們拒絕合作，憤然集體罷工，最後終於全體離去。

最美麗的花朵，常常是在黃昏時分，開放在無人知曉的某個角落，甚至懸崖峭壁。

那個臨時被我策動成立的唱詩班，雖然存在時間很短暫，只有一個星期，但我深信，已在那所有參與者的內心裏，留下了終

身不可磨滅的美好印記。

哦！勞教隊臨時唱詩班！

上帝無所不在！

60·南湖勞教處

南湖勞教處座落在宣城北面大約二十華里處，九十年代中期下轄七個勞教所，每個勞教所下轄二到五個中隊，每個中隊一百來人，分成四個班。全處大約有近千名幹部，三千個勞教人員，比例是一比三。我估計與共軍一個步兵師的官兵比例差不多，可見管理是多麼嚴密。

每年安徽省司法廳勞教局下六百萬經費，實行財政包幹制，按這樣算，四千個人每人每年可以有一千五百元的平均經費。但是勞教處每年必須交給上級的利潤任務是三百萬，經費下撥時即扣除。

據隊長們說，每年為了應付各級領導部門額外的攤派、檢查、調查、招待、逢年過節送禮等等加起來也要六百萬。差不多每天都要接待幾個組織，都是有關部門領導安排的，招待不好就會惹禍的。

所以隊長們經常說，不逼你們幹活，大家都得挨餓。上級給六百萬，卻要拿走九百萬，錢從何來？我們又不會造鈔票。所以必須天天打人，年年都要打死好幾個人。隊長們必須昧著良心，必須兇狠，打人又這麼辛苦，當然也必須要得到額外的好處。

南湖勞教處主要種植和加工茶葉，漫山遍野都是茶樹。其生產管理方式也是層層分解生產任務，處裏下達給各勞教所，再下

達給各個中隊，完全雷同於毛澤東時代的三級管理模式：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

如果有人想瞭解毛澤東時代的農民生活，遍布全中國的勞教隊就是活標本、活樣板。大躍進、大生產、瞎指揮、大掠奪、大破壞，一場運動接一場運動，文化大革命在勞教隊裏從未停止，而且幾十年來愈演愈烈。

一般的茶樹可活三十年至一百年，年年可以採茶，但是勞教隊的茶樹一般只能活五年！因為產量年年增長20%，越來越離譜的茶葉生產任務必須完成，因此只有進行掠奪式狂採，不管新葉子老葉子，大把一起採。這樣的鮮茶葉有時只能賣四分錢一斤。茶樹都被採的光禿禿的，怎能吸收陽光？怎能再生長？很快就枯死了。

每個幹部都知道這個道理，但還是狂採不止，因為他們在政治上必須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年年高速增長，與時俱進！

南湖的幹部，從來不喝當地產的茶，因為那茶葉裏的化肥農藥之多，令人無法想像。按道理茶樹只應施有機肥，而且不能打農藥。因為茶葉是特殊飲品，要用開水把茶葉內的汁泡出來喝，而化肥農藥肯定會進入其中。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長期爛施劣質化肥農藥造成的嚴重污染還使茶蟲的生存能力也相應地突飛猛進，只要幾天不打農藥，這些茶葉就會被蟲子吃光。

為了抑制蟲害及提高化肥效力，後來索性直接把化肥農藥噴到茶葉葉面上。所以這種茶是名符其實的毒茶，化肥農藥茶，只有兩種作用：騙錢和害人！

姜處長是南湖勞教處處長，十分兇猛，號稱鐵腕。

有一個勞教人員被一個隊長打斷了腿，殘廢了，到處告狀。那個隊長又把他打了一頓，然後說：「姜處長在會議上都表揚了我，說我打得對！打得好！所以今後我一有空就來打你。」

這個人好容易熬過勞教期，解除勞動教養那天，他憤憤不平地拖著殘腿去找姜處長評理。在辦公室裏，他責問道：「〈國務院勞動教養條例〉明文規定不准隊長打人，你身為處長，怎麼能說打斷我的腿是打得好！打得對！」

坐在辦公桌後面的姜處長勃然大怒：「我說打得好，就是打得好！我說打得對，就是打得對！我看你根本沒有被改造好！需要繼續改造！來人！」那個勞教人員一看苗頭不對，趕緊拖著一條殘腿就跑。跑到門口，正好有一輛計程車，他跳上計程車就催司機快開，他要趕火車。

就在計程車跑了二十里開外，快到宣城火車站，他剛鬆了一口氣的時候，突然警笛聲大作，五、六輛警車狂馳追到，逼停了計程車，把他抓出車來，當場撕碎了他的解除勞動教養通知書，然後把他拖回勞教隊，宣布由於頂撞幹部延長他勞動教養期三個月。

看看還有誰敢不服？

農業勞教隊防止逃跑主要靠教奸，也就是積極靠攏政府的勞教積極分子和班組長，但是他們本身也是防範對象，所以主要還是靠平時的毒打、折磨和恐嚇。我以為中國人的狡猾、怯懦、互不信任才是難以逃跑的主要原因，否則在野外茶園，一個隊長怎麼能看住三十個人？我在南湖主要是因絕食身體太虛弱，不能持

久奔跑，否則我早就逃跑了。

追捕隊無法準確判斷逃跑者的位置，南湖勞教處經常出動五、六百人圍追堵截，大部分情況都落空。田野太大了，四周又都是山區，都是樹叢，就是看見了你，有時也追不上。後來在蚌埠被處決的基督教呼喊派領袖吳楊明，曾被送到南湖勞教三年，第一次到田野勞動時拔腿就跑。勞教處發動幾百人在後面窮追不捨，又派幾百人到處設立關卡攔截，結果還是給他跑掉，那年吳楊明已快五十歲了。

對逃跑者的主要威脅還是萬一被抓回來所受到的殘酷折磨，那是要把你雙手銬在籃球架上幾個星期，天天毒打的，延長勞教期十個月還是小事。另一個更要命的威脅是終身追捕，中國的戶籍奴役制度限定你一生必須住在一個地方，所以一旦逃跑就意味著，你永遠也不能回家了！

關於南湖勞教隊的歷史，一般認為是一九五六年根據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命令建立的。我在那裏被關的久了，與很多人交談，才知道一九五〇年那裏就開始建立了強迫勞動營，叫強勞。當時主要從上海南京抓來一批大學教授、中學教師、律師記者，以及地主資本家，包括從長江流域及華東各地逃到上海的這幾類人。直到現在，南湖一帶還遺留有專門關押上海人、浙江人的勞教隊。

後來瞭解的情況更讓我吃驚，原來一九三八年，皖南新四軍建立之初，這裏就建立了勞動隊，關押大批違反紀律的新四軍官兵和不服從共產黨領導的地方鄉紳。

看來共產黨所到之處，都一定會帶著手銬腳鐐，就地建立勞

改隊。因為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是沒有自由的奴隸，隨時需要抓起來勞動改造。

61·阿Q新傳

一九九四年年底，我因為長期絕食，身體極度衰弱被中隊安排與老Q居住在一個房間長達一年之久，不再參加中隊的勞動和改造。因此我有機會與這位六十八歲的老支書長期交談，他不僅長得非常像嚴順開扮演的阿Q，而且思想品德也與魯迅小說描繪的阿Q一模一樣，是最典型的流氓無產階級。

我估計阿Q當年沒死，逃到蘇北一帶，改名換姓又生存下來了。而且與一個姓馬的患精神病的乞丐結了婚，生了一個怪胎小Q。這個怪胎後來竟然走了紅運，加入了共產黨，翻身成了統治者。

小Q不到二十歲的時候就父母雙亡，家裏只有一間破草房，以在各處打短工並順手牽羊為生，嘴實在太饞了就去偷雞摸狗。

小Q有一次在半路上被新四軍截住，喝令他趴在水溝裏，不准說話，敢動一動就要開槍打死他。那水溝裏盡是新四軍，還有一些婦女和孩子。前面一里路左右的田裏有十幾個人在弄莊稼，這邊還有幾個包頭巾的婦女也在田裏忙活。

一支國軍開了過來，大約六、七百人。幾個偵察兵走在一里路之前，問那些鄉民附近有沒有新四軍？當然沒有。偵察兵看到前面還有一些婦女在勞動，就向後面打個手勢繼續前進。

偵察兵走到婦女面前正要問話，那些婦女突然彎腰拿起槍來，一齊射擊，幾個國軍偵察兵頓時倒地。然後槍聲大作，四面

八方都是新四軍。國軍猝不及防，死傷累累，剩下的只有臥倒還擊。

可憐那些莊稼漢，哪裏跑得掉，個個被當成新四軍打死。其實他們都是被抓來的附近村民，當誘餌用的，老婆孩子也被抓來當人質，放在水溝裏。國軍偵察兵先前聽到當地農民口音，自然沒有戒備。那幾個做田的婦女則是新四軍男扮女裝。

戰鬥十分慘烈，新四軍至少有五千人。國軍幾次突圍，都被打了回去，最後新四軍發動衝鋒，將之全殲，只有七個國軍在混戰中跑掉。田地裏、溝渠裏都是血，然後匯流到大溝裏，慘不忍睹。

那些婦女孩子都嚎啕大哭，新四軍則迅速地揀起武器彈藥，扒下衣服，抬著傷員，匆匆撤退。待到兩支國軍從大路兩頭跑來增援，新四軍早已不見蹤影。

小Q趴在大溝裏動也不敢動，直到國軍撤退，才敢起身去撿東西。小Q忙了一夜，剝屍體衣服，凡是值錢的都要。下半夜，附近一些村民也來搜掠，大發死人財。從那以後小Q就對共產黨佩服得五體投地，決心找機會加入進去。

解放軍工作隊進村了，瞭解到小Q是最貧窮的人，便挑選他作為培養對象，小Q也決心充分利用這次機會，扭轉祖祖輩輩一窮二白三無賴的命運。

阿Q終於當上了村貧協主席。土改開始了，但是村民都很狡猾，表面上說什麼都好，分地分糧食也都要，開批鬥地主大會的時候卻想八個點子拒絕發言控訴地主的罪行。很多人會前都被工作組交待了一遍又一遍，到時候卻成了啞巴。

阿Q知道他們的心思，村民們哪裏對地主階級有什麼仇恨，那些地主其實都是最老實、最勤奮的農民，何況他們都還沾親帶故的。現在分了他們的糧食和土地已經感到很不好意思了，大部分人暗地裏還同情他們。鄉里多次開會批評他們這個村，工作組長急了，阿Q也急了。

工作組終於宣布：取消平均分配的辦法，凡是鬥地主積極的，分浮財，分好地。最後終於找到幾家與地主家打過架，結過仇的人，還有幾個潑皮無賴，只要有好處，願意在鬥地主大會上辱罵他們。後來又把全村的光棍漢集中起來告訴他們，鬥倒地主之後，他們可以分配到地主的老婆。

這三種人渣喝過酒後興高采烈，一擁而上，指著地主的鼻子罵，但是地主都是有涵養的鄉紳，面對此情此景很快恢復鎮靜，笑臉以對，連連拱手。矛盾沒有激化。

終於有一天，這個鄉的工作隊長親自來到了這個村，先召集三種人開會精心布置一番之後，工作隊長又與骨幹聚餐。酒飯過後，工作隊長宣布，明天鬥地主，人人都要帶家什，個個都要動手打，有重獎，否則嚴懲不貸。

眾人散去，獨留貧協主席下來，工作隊長面授機宜：「我們已決定批准你的人黨申請，但是要對你進行最後一次考驗，明天你要首先動手，而且要大打出手。上級已有密令：每個村可以先打死一個地主。我們必須完成黨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你不必有任何顧慮，打死地主之後，民兵排就抽調一班人白天黑夜專門保護你，我還會發一支槍給你防身用。

「你也不用怕，從今往後都是共產黨的天下，地主階級會被

消滅光，你將是這個村的第一個黨員。只有打人，只有打死人，才能立威，大家才會怕你，你才能長期做貧協主席。具體打死哪個地主，由你決定！」

阿Q早就想有機會打死那家與他有仇的地主，占有她的小老婆。所以當即表示，堅決執行上級命令。

那天深夜，阿Q給工作隊長奉上了一錠他私吞的金元寶。

第二天上午，全村三百餘戶，一千多男女老幼集合召開群眾大會，工作組以及三種人都殺氣騰騰，地主們站在一邊輪流被叫上去批鬥。有的挨了拳腳，有的挨了幾棍。

輪到目標出現時，貧協主席衝了上去：「你是最反動的地主，我聽說你惡毒咒罵貧下中農，惡毒攻擊共產黨，你死有餘辜！」老地主目瞪口呆，嘴唇動了動，似乎想說點什麼，但是棍子已經打在頭上，老地主還沒反應過來，幾根棍子一起打過來，他依稀看見，貧協主席打得最急，棍棍有聲。

工作隊長在後面厲聲喝道：「這樣反動透頂的傢伙應該活活打死！都給我上去打！」棍如雨下，貧協主席轉身抄起一把鐵掀，猛劈過去。眾打手們驚呆了，一千多男女老幼也驚呆了，一下又一下，貧協主席瘋狂地連劈了十幾掀才停手。老地主已是血流如注，一命嗚呼。

整個會場鴉雀無聲，連呼吸聲都聽不到。工作隊長拔出手槍向天射了一槍，大喊：「打得對！打得好！打出了貧下中農的威風，打掉了地主階級的氣焰！」

「現在我宣布：由於阿Q同志勇敢堅定，經受住了考驗，黨組織正式批准他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成為這個村第一個光

榮的共產黨員！大家鼓掌祝賀！」然後把手槍連套子遞給貧協主席。

男女老幼都驚恐地拍掌，誰也不敢停下來。貧協主席向大家面露笑容，兩眼發出獸性的光芒。Q主席從此威風凜凜，氣壯如虎，過去連縣太爺都不敢、現在他敢打死鄉紳！

當天夜裏，他就把被打死地主的小老婆抓進自己房間單獨狠狠地批鬥了一夜，還把地主簌簌發抖的女兒抓出來交給工作隊長單獨批鬥，那一家人都嚇得要死，哪裏還敢有異議，還能活著就得千恩萬謝毛主席了。

土改工作終於轟轟烈烈地展開，所有的鄉紳都被控制起來，天天批鬥，天天吊打，用各種私刑拷問浮財。每過一段時間召開一次全體村民大會，打死一個地主。

村民們戰戰兢兢，Q主席所到之處，無不笑臉相迎，家家戶戶都能以請Q主席喝一頓酒為無上榮耀，尤其富農中農。酒酣耳熱，Q主席如果看中了哪家的媳婦閨女，就叫她去貧協談話，匯報思想，接受單獨指導。

Q主席的地位蒸蒸日上，儘管有些不平的村民寫匿名信告狀，但是Q主席牢牢抓住兩個鐵桿領導，區委書記和公安局長，逢年過節都要送大禮，金子銀子古玩。他們也會定期來檢查工作或看望他，他則安排村裏最好的酒菜和最漂亮的姑娘伺候，臨走再帶上大批土特產。

對於接到檢舉信來調查他罪惡的工作組，他更不吝嗇，先察言觀色，後投其所好。或女人好酒伺候，或金銀財寶撒下，無不奏效。弄清了誰是檢舉者，有遠親後台的從此笑臉以對，旁敲

側擊，但不再侵害；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伺機找到藉口，嚴厲打擊，上綱上線，絕不寬貸。

Q主席還兼任民兵營長，時時刻刻，手裏都拎著一桿名貴的紅纓槍，據說還是明朝時留下來的。找了一個媳婦，各方面都不錯，尤其品性端莊，自小受鄰人稱道。這個媳婦為Q產下一兒一女，後來卻因丈夫荒淫無道，規勸無效，三十歲上就喝敵敵畏自盡。

五十年代中期運動稍緩，告發Q主席的人卻越來越多，調查組不斷來，村民們紛紛揭露罪惡，大家都等著Q主席被抓進大牢，判處死刑。Q主席私吞私藏的金銀財寶也賄賂將盡，村姑村婦們也開始不聽使喚，Q主席惶惶不可終日，甚至準備逃走，以免成為槍下鬼。

就在這山窮水盡之時，突然柳暗花明，更加轟轟烈烈的人民公社運動開始了，新一輪對全體村民的大洗劫開始了，所有田地、牲畜、糧食、農具，甚至鍋碗瓢勺統統沒收公有。

貧協主席起死回生，成了生產大隊書記，權力空前膨脹。全村人的衣食住行都歸他支配，他趁機狠狠打擊那些告發他的人，把他們的家裏搜了一遍又一遍，連一片破碗碴子都不留下。Q主席的威望再次飛速爬升，比第一階段更加為所欲為。

緊接著反右運動展開，本來上級並沒有要求村裏揪出多少右派，但是Q主席明察秋毫，抓住村民們幾乎人人說過的「要想吃油，老蔣回頭」這句話，循著線索，深挖後面的黑手，揪出幕後的階級敵人，把全村人嚇得人人變色，個個膽寒。Q主席在村裏的威望幾乎和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威望一樣高，徹底打倒了所有反

對派和控告者，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隨後Q主席的統治進入全盛時期，一批又一批的人餓死。大隊倉庫雖然堆滿了糧食，但那是必須交給上級的公糧，由武裝民兵日夜看守，盜糧搶糧者當場格殺勿論。而且禁止村民外出乞討，一人逃出，全家株連，關押起來，統統餓斃。

再說那時全國，尤其安徽，遍地莫非赤土，何處能吃上飯？先是老弱病殘幼餓死一批，然後婦女餓死一批，最後青壯年也紛紛餓死。剩下活著的人也都兩腿浮腫，兩眼發直，朝不保夕。只有Q主席親信疼愛的人和武裝民兵吃得肥肥壯壯，頓頓有酒有肉。

無人膽敢反抗。Q主席已成了村裏的一尊活著的神，神聖不可侵犯，巍峨不可抗拒，殘酷不可企及，惡毒不可思議，像毛主席一樣尾大！

終於等到三自一包政策下達，已有半數村民餓死。又過幾年，村民們剛剛喘過氣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又開始了。Q主席有天晚上大醉，不要民兵保衛，竟然鑽進了大隊長千金的房間施暴。聽著女兒撕心裂肺的慘叫，大隊長夫婦肝膽俱碎。後來不久的一個晚上，Q主席突遇夜襲，被當頭一棍打昏在地，第二天早上才被人發現，抬回大隊部。

Q主席在病床上斷定是大隊長命人所為，因為只有他知道Q主席的行蹤。於是抓來許多大隊長的親戚，嚴刑拷打，終於成招。公安局辦了大隊長一個現行反革命組織罪，槍決了大隊長，把大隊長的弟弟兒子統統送到勞改隊。

Q主席在病床上總結統治經驗：一要臉厚，二要心黑，三要

手毒。永遠不要對任何人同情憐憫，他人永遠是洪水猛獸，永遠不要喪失警惕之心，階級敵人亡我之心不死，隨時可能猛撲過來。

不幸的是，Q主席結怨太多，死對頭也越來越多。暗中對抗，暗中告密的村民也越來越多，而給Q致命一擊的還是那些下放知青。

那些雪白嬌嫩，村民世代代沒有近處看過的大城市女孩，十六、七歲，正是少女最鮮豔的時候，被毛主席派到村裏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鄉村幹部的淫威下，在農村的黑暗昏兒裏大有作用。

開頭大家還不敢碰，後來發現這些城裏人竟然害怕鄉村幹部，糧食吃完了的時候，想請假回城看望父母的時候，生病不能出工的時候，竟然都臉紅紅的，羞怯的站在黨支書面前捏著衣角，苦苦哀求。Q支書總是先正言厲色，教育他們要一顆紅心跟著黨，無私奉獻為人民，自己排除萬難，幹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堅決服從貧下中農教育。

隨後老支書便會和顏悅色，提出做個交易。那幾年Q主席真是想盡了豔福。各級農村幹部用權威霸占了這個女知青群體，人民群眾談戀愛都不可以，隨時扣你一頂資產階級思想的帽子，群眾隊的紅黑雙色棍便會打到你身上。

Q在談到這段歷史的時候，眉飛色舞，然後輕蔑地表示，現在一般的黨政幹部，雖然有錢去嫖，或包二奶，但這些女孩哪有那時候的女知青單純新鮮，而且任我們幹部魚肉。

但是這豔福卻幾乎使Q送了命，一場清查運動，把他抓了起

來，關在公社大院裏，天天吊打逼供。所有的靠山都不伸援手，專案組審訊的問題越來越多，僅查實雙方都承認了的強暴罪惡就有一百多起。一個大隊書記和一個民兵營長已先後被拉去槍斃。Q主席每天夜不能眠，拴住他雙手的繩子就吊在房樑上，只能永遠站立，一聽到外面腳步聲密集，他就像待宰的小雞一樣渾身顫抖。

但是半年以後，還是把他放了，黨籍也沒開除，只是撤銷支部書記職務，下放生產隊勞動。那幾年真是難熬，天天灰溜溜的，本來準備再次結婚的新娘也毀約了。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鄧小平給許多老幹部平反，回到原位。那位老公安局長，後來升縣委書記，被打倒下放幾年後又官復原職。Q便悉數挖出深埋在地下的最後幾件值錢傢伙，送給老書記。不久之後，縣委工作組便把現任大隊書記調任鄉武裝部長，Q主席捲土重來了！

由於身體在公社武裝部被折磨的留下很多病，Q也總結歷史教訓，不再像以前那樣猖狂了。而是逢人便帶三分笑，轉過身後細思量。

正當Q漸漸重整旗鼓的時候，包產到戶運動開始了。Q意識到，他不可能再重現皇帝般的統治了，村民們慢慢地也不怕他了。他也想通了，祖祖輩輩都是窮光棍，現在天天有酒有肉喝個昏天地暗也就行了。特別是後來幾次鄉村行政改革過後，村黨支書幾乎沒什麼權力了，大事小事都要向鄉里報告。Q也老了，不願跑來跑去，更加得過且過了。

但是Q忘了，被他迫害過的村民還在等待機會把他送進監

獄。有段時間Q支書為了創收，交了幾個人販子朋友。而這個村由於長期受Q愚昧殘暴統治，特別窮，光棍漢特別多。Q支書在人販子的慫恿下居然做起了販賣人口生意，把人販子從四川騙來拐來的女子關在村委會裏，公開在村裏拍賣，在縣委和鄉黨委的暗中支持下居然幹了好幾年。

Q除了分錢，還能睡睡這些女子，總算重溫了一點舊夢。甚至還不顧年邁，不遠千里到四川實地考察貨源的品質和價格。結果又發現川民種鴉片獲利甚豐，便準備移植過來，發展村裏經濟。反正鄧小平說過，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只要發財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

他不知道，村民已經把聯名控告信寄到省裏和中央。正當他勾畫藍圖，浮想聯翩的時候，突然又被抓了進去。最終被開除黨籍，以販賣人口罪被勞教三年，儘管他已年過六十七歲，超過了國務院規定的勞教年齡，當地政府還是強行把他送到南湖勞教隊。

Q承認自己有罪，但也為自己辯護說：「這個社會本來就是一個黑社會，不是吃人便是被人吃，我有什麼辦法？」Q還多次向我表示：「這次如能活著出去，一定皈依耶穌基督，懺悔罪惡，尋求靈魂解脫，死後不下地獄，保佑後代延續。」

我後來仔細對比了一下，發覺Q主席各方面都像毛主席，沒準就是毛主席的千萬個化身之一。

62· 啊克拉瑪依！

「啊克拉瑪依啊克拉瑪依，我懷念你。」

不是因為這首讚美你的歌；不是因為你是沙漠裏的綠洲；不是因為你是中國的西北石油重鎮。而是因為西元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克拉瑪依劇院那場災難，那二百八十八個被踩死的男孩女孩。

當我在勞教隊裏，偶然地從《讀者文摘》中看到這篇報導時，我的心在泣血。

那天是全市小學生文藝會演，各學校精選了能歌善舞的、最可愛、最漂亮的男孩女孩，總共近五百名小演員，在這裏向近三百名市黨政軍領導匯報演出。市委書記市長副書記副市長各局局長濟濟一堂，首長們當然坐在前排，小學生們坐在後排，最後排是七十位帶隊老師。

演出正在進行，小演員們不斷向領導大人們鞠躬致意，感謝黨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齊聲高唱「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

舞台上突然現出火花，年久失修的電線短路著火了，整個劇院的燈光頓時滅了。帷幕逐漸燃燒起來，舞台上煙霧騰騰，所有人都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老師們趕緊向前排走，他們想維持秩序。三百個黨政幹部卻先亂起來，沒有一個幹部挺身而出，維持秩序，而是爭先恐後的逃命。

這是一座老式劇院，兩道大門都在後方。大家跑起來，大人和孩子爭相逃命，擠成一團。孩子們太弱小了，哪裏是膘肥體壯的黨政軍幹部們的對手，只能成為墊腳的或絆腳的。煙霧逐漸瀰漫了整個劇院，踏著孩子們幼嫩的身體，逃出劇院的領導幹部們紛紛鬆了一口氣，乘車絕塵而去。老師們則開始努力營救小學

生。

劇院大廳根本沒有著火，僅僅是舞台燃燒了，釋放出有害氣體，舞台緩慢燃燒一段時間之後消防隊趕到時熄滅了。最後是一份死亡率統計：老師：70%死亡，大部分是反覆衝入劇院營救學生時被煙熏死的，足可以和9·11事件中紐約消防隊的英雄們相媲美。小學生：60%死亡，幾乎都是被踩傷後煙熏死的。黨政軍領導幹部：無一人死亡或受一點兒輕傷，人類五千年歷史上最無恥的有組織的集體。

如果不是中共連續五十多年的高度集權專政，不是連續五十多年的共產主義毒化教育，徹底地摧殘了這些官員的廉恥和人性，怎麼可能出現這樣100%的墮落？因為那些被踐踏、被蹂躪的孩子，那些小天使般可愛的孩子，許多都是他們的親屬，甚至還有他們自己的孩子。但是只要遇到一點兒危險，只要沒有黨組織在背後拿槍頂著，誰也沒有一點點責任心。哪怕別人統統死掉，只要自己能逃命。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後不久，我的家鄉蚌埠也發生了一次4.8級的地震，並沒有什麼房子倒塌。但是在我的母校十二中學，三層教室樓上學生蜂擁而下，許多學生跳樓逃命，數十人摔傷。其中十八人重傷，多半是被從二樓上跳下來的人砸到身上而傷的。

而在西北一棟教員宿舍樓上，七九屆畢業文科班正在三樓西頭上課的學生們也驚恐萬狀，起身欲逃，語文老師張繼欽拍案大怒：統統不許亂動！排隊出去！幫助家屬老人和孩子先走！我最後一個下樓！

結果家屬樓裏數百人無一受傷，老老少少都從容撤退。當張繼欽老師最後一個從容地走出大樓，走到操場的時候，受到千餘名師生雷鳴般掌聲的歡迎，許多人熱淚縱橫！他一句話保護了多少人！

如果當時克拉瑪依三百名黨政軍領導幹部中哪怕只剩一位領導幹部還有一點點責任心，或者有一點點領導才能，或者殘存一點點人性，站出來像張繼欽老師那樣高喊一聲，站出來維持秩序，指揮扶助祖國的花朵從容撤退，可能無一傷亡。

但是沒有。沒有一個人，沒有一點人性，只有一群唯利是圖的豬，百分百墮落的豬。聽說這群豬當時雖受到批評，後來送些錢給上級，仍然繼續當官做老爺。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下令：禁止任何媒體再報導這件事，甚至連那首著名的克拉瑪依之歌也沒人敢再唱了。

但那首曲子時常在我腦海低徊，彷彿那二百八十八個被踩死被熏死的幼小亡靈在向我哭訴，他們曾經是克拉瑪依最美麗、最可愛的男孩女孩。

他們曾經像鮮花般燦爛，在克拉瑪依劇院舞台上載歌載舞，獻給他們敬愛的黨政軍首長，而首長們卻像一群豬，野蠻地踐踏他們，踩死了他們。

史載當年蒙古鐵騎橫掃中原的時候，有一次俘獲了一大批當時的黨政軍領導幹部。蒙古人是縱情酒色的民族，他們令當時的黨政軍領導幹部們排成大圓圈，趴在地上，掀起屁股供蒙古人當板凳坐，那些黨政軍領導幹部的妻女們立刻變成三陪女郎，滿臉堆笑地侍候蒙古兵飲酒作樂。

那些蒙古騎兵喝足了、玩累了、睡醒了，第二天起來排隊的時候，發現大部分黨政軍領導幹部已經被他們壓死了，沒有一個幹部掙扎反抗。我一想到這段歷史就欲哭無淚，當時在蒙古人眼裏，這些黨政軍幹部就是一群豬！只配當墊子用，只配被壓死！

我的豬兄豬弟豬姐豬妹們！克拉瑪依已經再一次證明，歷史常常是會重演的！

啊克拉瑪依，啊克拉瑪依，我為你哭泣！

63·臨行託孤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我已被關滿了三年，他們卻拒絕釋放我。我怒不可遏，再次絕食抗議，一周之後，他們才說剛接到上級指示，我可以離開南湖勞教處了。

回到家中，更令我悲哀。原來我妻子紀曉的精神，在三年的孤獨與苦難煎熬之後，幾乎崩潰。她對我們的前途，已沒有任何信心。她又中了一個騙子的奸計，此時便執意與我分手。

我回家不久，就頻頻與中國人權聯繫，發表了幾份政治聲明，又發表了幾首詩。有天晚上，劉青打來電話，警告我說又有危險了。我剛剛出獄，實在不願束手就擒，再回到監獄裏去。當夜我就在王庭金的幫助下，離家逃亡了。

但我沒敢走遠，因為我可憐的女兒，始終沒有得到父愛的女兒，我還不知道怎麼安排她的生活！

紀曉沒有能力照顧女兒，後來我終於想到一位義人，魏輝，曾在「六四」鎮壓後拍案大怒，作為車間主任，下令停工停產，率領大家再去動員大批學生，上街遊行，斷絕交通，衝擊中共。

我找到魏輝，他立刻同意，當天中午就到王庭金家抱走了我的女兒。然後，我才忍住悲痛，離開蚌埠，離開我的骨肉，亡命天涯。

直到現在，只要回憶起那段臨逃亡前託孤的情景，我就會黯然神傷。為了早日結束共產主義暴政，我不僅自身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的妻子，我的女兒也都跟著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在逃亡中，我到過河南、北京，幸而碰到一位大學同學，他很同情我的遭遇，就建議我到美國去，他可以幫助我。

但我沒有護照，只好試探與蚌埠公安局政保科徐科長電話聯繫，他們正因為我失蹤而焦頭爛額。因為對付民運人士，中共實行戶口屬地監視管理原則，不管我在哪裏，幹了什麼，地方公安局都有責任。他們一再向我保證目前沒有抓我的計劃，要求我回到家鄉。我的條件是給我護照，他們請示上級之後終於同意了。

但是我一回家，就聽到公安派出所審訊我弟媳，以及大肆追捕我弟弟的消息，害得我弟弟在汕頭打工都不得安寧，聽到家鄉公安去抓他，匆匆丟了工作也逃亡去了。儘管我家人很少參與我的政治活動，但也照樣受到政治迫害。

我很氣憤地去大慶派出所責問他們，誰知他們竟然當場把我扣押，我真是自投羅網！

幸而幾個小時以後，他們接到了政保科的通知，釋放了我。我這時才知道，原來自從我失蹤之後，蚌埠公安一直在追捕我。後來我與他們電話談判之後，才停止追捕，但並沒有通知到各基層派出所，所以大慶派出所才會見到我就扣押起來。

我後來估計，那是江澤民訪美之前，故意要做些改善人權的

動作，我就由於這個契機，在大學同學的幫助下，持旅遊簽證到了美國。登機前我給劉青打了個電話，告訴他我將到美國流亡。

64·下崗工人

九七年我剛出獄的時候，蚌埠人正流傳著一個悲慘的故事。蚌埠曾是安徽省最重要的工業城市，但是在八十年代的改革浪潮中漸漸沒落，「六四」屠殺之後一年比一年衰敗，工廠紛紛停產半停產，大批小型集體企業倒閉。

有一對夫婦都在集體企業裏工作，都下崗了，他們有一個十歲的女兒。父親下崗後還可以領到一百多元的下崗津貼，而母親的單位破產了，一分錢也領不到。這個家庭也沒有任何積蓄，三口人只能依靠這一百多元月收入生活。

父親幾乎天天跑去勞動局看有沒有重新安排工作的機會，跑了半年也沒有結果。母親的身體本來就不好，現在生活這麼艱難，心情壓抑，更是連連生病，又沒有錢去醫院看病，只能硬撐著，身體越來越壞。

女兒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本來家裏的伙食還湊合，每個星期至少可以吃一回豬肉，一回魚或雞，這幾個月卻天天吃鹹菜，或蘿蔔大白菜，偶爾才有一點豆腐青菜，幾個月下來，女孩饑得要死，天天跟爸爸媽媽嚷著要肉吃。

她哪裏知道，每月家裏的收入只夠買米買煤買油鹽付水電費房租費，根本沒有錢買菜吃，媽媽每天傍晚會拎著一隻籃子到農貿市場去，揀一些別人不要的大白菜幫子，或以極便宜的價格，從急於回家的菜農手裏買一些幾乎沒人肯買，被挑剩下的菜。父

母正為她下學期的學費發愁，而且春節又快到了，面對可愛的女兒的要求，父親只得敷衍說：「下個星期，乖女兒，下個星期，我一定會買肉給你吃。」

那一天父親領到了下崗津貼，便拿回家跟妻子商量怎麼花，要不要給女兒買一點肉吃。卻看見妻子正在獨自流淚，忙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妻子哽咽著說她不想活了。

「我十五歲就被迫下放農村，幹農活累了十幾年，經常還沒得吃。男知青還可以去偷東西吃，我們女知青為了填飽肚子，不得不向大隊借糧，受盡了農村黨員幹部的欺負。好不容易回了城，又在工廠裏三班倒，苦幹了十幾年。

「唉，我把青春，把力氣，把一切都獻給了共產黨，獻給了毛主席，獻給了小平同志。現在身體累垮了，渾身都是病，到頭來卻連吃飯的錢也不給了。我除了擋車又什麼也不會，這個年齡改行，到哪裏能找到工作？活下去只是家庭的一個負擔，我想來想去，還是死了的好。」

下崗工人想勸慰妻子，還沒開口卻也掉下淚來，想到自己的遭遇不也同樣嗎？就算再過幾個月重新找到一份工作，也就是二百多元，一家三口還是難過得很，累了大半輩子，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也沒有任何財產，馬上要實行房改了，哪有錢買房子？難道流落街頭嗎？還有什麼希望？還有什麼奔頭？還有什麼好說的？

於是他不再開口，轉身走出了門。想到自己一家人的悲慘遭遇，想到許許多多和自己境遇相似的下崗工人家庭的淒慘狀況，和自己這幾個月來找工作的辛酸苦辣，他不禁淚流滿面。他也不

再在乎鄰居和熟人看見他的眼淚了，這個社會如此殘酷，這個世界如此淒涼，他還有什麼可以在乎的呢？他暗暗下定了決心。

女兒中午放學回家，看見桌子上一大盆熱氣騰騰的蘿蔔燒肉，高興得驚叫起來。桌子上還有一瓶酒，父母都坐在桌子邊在等她，慈愛地勸女兒吃個痛快。父親一口就喝掉半茶杯酒，他已經幾個月沒有喝酒了，然後他親自為妻子和女兒夾大塊瘦肉，自己也大口的吃。

妻子本來捨不得吃，想省下來讓丈夫和女兒多吃幾口，但是禁不住丈夫熱情的一再的要求，只得含著淚也吃起來，她擔憂地想，丈夫中了哪門子邪，買了這麼多肉，以後不吃飯了？

這家人幾天不開門，鄰居好奇怪，議論紛紛，最後居委會強行撬開了門，進去看到，一家人都死了。下崗工人一手緊緊地抱住妻子，一手緊緊地抱住女兒。

後來法醫鑑定三人都是吃老鼠藥中毒身亡，肉湯裏殘餘著大量老鼠藥，最後調查結論是：下崗工人不忍妻子女兒窮困，走投無路，全家自殺。

在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之後，這些下放知青，這些下崗工人，實際上都是共產黨的奴隸，雙方有一種事實上的契約關係，後者是被迫做奴隸的，沒有任何選擇和討論的權利，而且這種奴役關係延續了幾十年。這些工人被榨乾了青春，被榨乾了血汗之後，竟然一腳踢開不管了。無論按照什麼樣的社會倫理標準來衡量，都是不可思議的、不能寬恕的罪惡！即使在二千年前的奴隸制時代，也沒聽說有這麼殘忍的奴隸主，把年老有病的奴隸一腳踢開就不管了！

這還是一個自稱工人階級的政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竟然能幹出這種事情！

經濟改革，變終身制為僱傭制是對的，但是不能把那些事實上已經做了大半輩子奴隸，從幾塊錢十幾塊錢一個月的工資拿起，安分守己地做了幾十年奴隸，從來也沒有考慮過別的生活方式的工人一腳踢開。共產黨應該給與他們公正的補償和保障，而不是把他們逼到絕路上去。

這件事如果發生在中國以外的地方，一定會引起媒體的跟蹤報導，但在新聞專制的中國，和過去五十多年來所有類似的數十萬數百萬件慘事一樣，沒有任何報導，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只有這個城市的市民，口耳相傳，人人歎息：這個社會的確太殘酷了，太黑暗了！

殘酷到不許人們正視殘酷，黑暗到不許人們正視黑暗！每個人都只能像螻蟻一樣低著頭，找口吃的，苟且偷生。



第七章 激越的心靈

我們是衝天而上的爆竹，
我們是迅如閃電的利箭。

我們是凌空萬里的雄鷹，
我們是壯懷激烈的流星。

我們是怒髮衝冠的書生，
我們是頂天立地的好漢。

——〈正義黨衝鋒隊〉一九九八年十月十日於紐約

65 · 參與組建正義黨

我一到紐約，就參加了一系列民運活動，並曾在哥倫比亞大學赫爾曼人權研究中心協助魏京生工作。一九九八年在中共駐紐約總領事館門前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我也是主要的組織者之一。不久，鑒於民運各黨團的渙散無力，有的黨團甚至只有幾個人，我感到必須改變這種狀況，給民運注入一股新鮮的血液，增加一些活力，就積極參加了組建新政黨的活動。

第一次組黨籌建會議在艾姆赫斯特傅申奇的辦公室進行，組黨首先要解決黨名問題，名不正則言不順，我認為這是頭等大事。大家總共拿出了十幾個名字，多半是民主什麼的，幾乎都是被用濫了的。當然最好的名字是民主黨，但是海外有過兩個，大陸可能有過幾十個。

我自己就在八九民運期間，在安徽省秘密創建過民主黨，成員遍及全省，因為當時這是一個極端秘密的核心組織，我始終沒有公開。倒是後來共產黨把他弄個一清二楚，在《中國地方志·蚌埠志》書裏披露過。這也是構成我陰謀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名的罪狀之一，蚌埠公安局的起訴意見書裏有大量有關卷宗，將來可供人查閱。

為了避免名字衝突，為了更有深意，我們應該起一個新的名字。最後我提出「正義黨」這個名稱，我說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是正義問題，正義涵蓋民主理念，中華文明的核心是「禮」「義」二字，禮是外觀程式，義是內涵實質。我們搞民運不能數典忘祖，不能背離傳統中國文化，民主畢竟只是現代的、文明的政治運行規則，類似於新「禮」的概念，是幫助我們尋求及獲得正義的程式，也許是目前我們能夠找到的最好的途徑。

正義還涵蓋一種精神追求，一種包含倫理、類似信仰的概念。那次會議最後作出決議，接受我的提案，為這個新建立的民運組織定名為「正義黨」。

但是後來並沒有再開會議討論這個問題，王炳章卻說與國內商量了一下，還是稱「民主正義黨」更好，簡稱可以用「正義黨」。我很生氣，這個名字太俗了，囉嗦了，有悖於中華傳統文化的簡潔精萃、惜墨如金。還是共產主義餘毒太深，非要時時處處冠以民主不可，其實這是一個早已被共產黨用濫用壞了的詞，如果能夠，我們還是應該盡量避免歧義之詞的。

若非要冠以民主二字，美國的共和黨應該叫民主共和黨，英國的工黨應該叫民主工黨，保守黨應該叫民主保守黨，那太囉

嗦。而就我所知，這些政黨一開始的名字也是很長的，後來歷久磨礪，才簡練如此。

黨名如同人名一樣，往往是歷史形成的，以後想改都難改。如日本自由民主黨，怎麼都難簡練，最後只得稱自民黨，真是不倫不類。而我們現在有機會起一個簡潔響亮、意象鮮明，可以持久使用，可以有更多發揮空間的名字，十分關鍵。名字不當，意象不夠鮮明，意蘊不夠深遠，損害是很大的，比如俄羅斯那些愚蠢冗長的黨名，正是政治幼稚的表現。

莎士比亞說過：「簡潔是智慧的靈魂，冗長是膚淺的裝飾。」

正義黨既沒有從其他組織裏拉人，也沒有與其他組織爭錢，當然也沒有攻擊任何民運黨團，但是從成立伊始就受到圍攻。中共當然立刻確定，這是最反動、最有威脅的民運組織，必須發揮統戰能力，按照傳統策略，充分利用中國人的劣根性，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予以圍殲。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圍剿正義黨鬥爭打響了。

其實我對這些並不太在意，這是預料之中的事，我在蚌埠，在安徽已經歷多次。有好多年裏，我都在沉思這個問題，試圖找到解決辦法。

民運人士都經歷過漫長艱苦的獨立思索，都是在抗拒共產主義腐朽思想的嚴密包圍中艱難形成的，都歷經坎坷，都是獨立的種子，破土而出的土壤、氣候、環境各不相同，所以相互相容起來特別困難，需要一個長期的、痛苦的磨合過程，最後才能達成共識，建立遊戲規則。這特別需要我們每個人在政治品德上磨練

自己，不妄言，敏於行而訥於言，克己復禮。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根深蒂固的「中國病」，在中國人身上最明顯的一種傳統痼疾。唯我獨尊，自私自利，趨利避害，嫉妒仇恨。差不多也就是《聖經》裏耶穌講的人類七個原罪，被共產主義運動發揚光大，而成為一種更可怕的頑症，使中國人幾乎不能精誠合作。一些人非要充大佬，否則就要跳起來鬧，這樣總會贏得共產黨特務們及小人們的滿堂喝采。鬧來鬧去，把大家都鬧傷了心，民運自然消亡。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民運遠遠未到切餅分餅的時候，連一毫米的地盤都還沒有，共產黨的幾千萬把鐵錘鐮刀沉重地懸在我們所有人的頭上，我們急急忙忙打什麼內戰？從內部搗亂民運幹什麼？何況民運已是積弱不振，內傷累累，分崩離析。獻媚於共黨，踩同道肩膀，以為這樣就能獲得共產黨青睞，給予一點生存空間，那純粹是癡心妄想！反倒使共產黨更藐視民運，下手時更不猶豫！

共產主義的餘毒之一便是以神仙的標準來衡量別人，而以魔鬼的標準來衡量自己。這也是許多民運人士的通病，也是每一個民運人士最容易滑入的陷阱，一些人甚至掉進這個深淵永遠也出不來了！我將之命名為「民運病」，其實這是「共毒」，這是「中國病」。

海外民運的分崩離析，至少也是因為這個共產主義餘毒，這個中國病。不過這也許是一件好事，大浪淘沙，新的力量正孕育著，準備蓬勃而出！

芳林新葉催陳葉，病樹前頭萬木春。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66 · 暴力與非暴力

正義黨一成立，就面臨一場論戰，就是關於暴力與非暴力問題。

其實這是一個無須爭辯的問題。暴力，尤其是正義暴力是必須時時刻刻存在的，壞人壞事永遠都會有，而沒有正義暴力的地方，必然是邪惡暴力肆虐的地方。即使在自由和平的美國，暴力也無處不在，在任何可能產生暴力衝突的地方，美國警察都以最快的速度趕到現場，隨時準備以暴力解決任何問題。

用不用暴力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即使現在的中共，也是盡量避免使用暴力的。暴力是任何一個生命體、或一個組織，任何一個人甚至一個動物，都不可能徹底放棄的。尤其不能放棄暴力作為最後的和最終的威懾。

否則那就等於告訴壞人，你盡可以衝到我家裏來，殺人放火，洗劫強暴。反正我是永遠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無論你想幹什麼，你都盡可以幹個痛快。

我會堅持批評你的行為，但我絕不會採取任何暴力行為阻止你；不僅如此，我還會堅決反對我的親人採取任何暴力阻止你，你盡可以放心地幹個痛快好了，我們一家人都絕不會抓起椅子或菜刀阻止你。

我也不會借助任何暴力來阻止你，我絕不會去叫警察，因為他們一來必然會使用暴力阻止你，你只管從從容容幹你想幹的壞事好了。——這簡直是愚蠢透頂！人類現實生活中從沒出現過這

種蠢人！

生命的存在本身已經告訴我們，我們永遠也不能放棄暴力或暴力威懾，除非我們不是活的生命體，除非我們是一道青煙，嫋嫋西上。如果沒有美國暴力的保護，所有那些民運絕對非暴力主義者都會統統被共產黨抓進監獄，連一個屁都放不出來！或者一個暴徒拿一把刀就可以把他們統統殺光，讓他們到陰間去實行徹底非暴力主義！

什麼時候人類生活能離開暴力或暴力威懾？永遠不可能！就連攻擊性語言本身，本質上都是一種類比暴力，甚或是含有暴力因素的威脅！

最為非暴力主義者迷戀的印度獨立運動，也是在暴力的威脅下完成的。即使當時世界上最文明的、民主制度最完善的英國政府，如果不受暴力的威脅，也不願輕易放棄印度。印度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獨立戰爭一旦打起來將是很多年，英國政府、印度殖民當局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這個必然的後果。

英·甘地從來也沒有像中國民運界的徹底非暴力主義者那樣，宣稱永遠地絕對地放棄暴力，更沒有去拚命攻擊國大黨那些暴力主義者，而是以他們做後盾不斷去威脅英國殖民當局：盡快放棄殖民統治，否則就會面臨無休止的獨立戰爭！一旦開打，大家就會身不由己、收不住腳！

其實即使主張以身飼虎的正信佛教，也不肯絕對放棄暴力進行自衛的，看看中國武術史，武功水平最高的竟然是那些少林寺和尚！緊要關頭他們打得最兇，根本不在乎血肉橫飛。

與民主政體相反，我們面對的共產黨政權，內心裏是最迷信

暴力的，只相信暴力語言的！過去幾十年來，共產黨只有對擁有暴力機器的政治力量才會和顏悅色、才肯假以辭令。

中共幾十年來只與美國談判，主要是因為，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暴力機器。更典型的例子是北韓，儘管他的核計劃威脅著周邊每一個國家，但他卻執意只與美國談判，而根本看不起其他任何一個國家。

台灣人在大陸受到優待，西方人受到共產黨的尊重，都是因為他們的背後還有強大的或潛在的暴力機器，絕不是因為什麼荒誕不經的非暴力主義！

法輪功不參與政治，是徹底奉行非暴力主義的，那就不僅被打得更狠，還要他們每個人徹底轉變思想，轉而擁護共產黨。達賴喇嘛一再聲明放棄獨立訴求，要與中共進行自治談判，中共理都懶得理他。

如果沒有暴力或暴力的威脅，如果永遠地、絕對地放棄任何暴力，這個世界到現在都不會產生任何一個民主國家！英國光榮革命是暴力完成，美國獨立革命是暴力完成，法國革命是暴力完成。德國日本義大利則是完全由美國軍隊使用大規模暴力建立的民主制度，南美洲的民主化是在暴力革命的威脅下實現的，亞洲的民主化是在民眾暴力的威脅下實現的。

東歐的民主化也沒有離開暴力，尤其是暴力的威脅，如果沒有美國及西方遠勝於共產黨世界的強大暴力武裝機器的威懾，蘇共隨時都可以出兵鎮壓，血洗民主力量，像他們當年鎮壓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運動那樣。羅馬尼亞共產黨是被暴力推翻的，其他六國共產黨也是在人民紛紛起來，隨時可能使用大規

模暴力的前提下，放棄了獨裁專制政權的。

蘇聯共產黨也是如東歐一樣面臨各地武裝暴動的情勢下，不得已才逐步退讓的；而且其殘餘勢力在八·一九又發動武裝政變，在遭到暴力阻止的情況下才失敗的。

67·行動派—強硬派

北大東門內禮堂東牆上有四個字：行勝於言。每個字都有一間房子那麼大。但是我在紐約看到的正好相反。記得有一回民運召開一次大型會議，規定一個人發言不得超過五分鐘。先是一個共產黨特務跳上台臭罵了民運十分鐘，胡平在主持會議，提醒他已經超時五分鐘，他總算下來了。第二個共特一會兒又跳上台臭罵了民運十分鐘，胡平提醒他早已超時了，共特兀自痛罵，根本不管任何遊戲規則。

二十分鐘過去了，台下二百個左右的民運人士都安然不動，彷彿與己無關，只有胡平去勇爭話筒。我那時剛到紐約，奇怪怎麼沒人制止，簡直就像在大陸，大家排隊買東西，卻有人硬加塞，而沒人干預一樣。太荒唐了，這樣拖下去還不如散會，以後也別開會了。

我決定行動。我把魏泉寶、高光俊、董覺民喊到外面商量了一下，我要求他們和我一起排成四人方陣隊伍進去，從而形成威懾，盡量避免使用武力，但是必須向這個流氓表明，我們會堅決制止他的無賴行為。

我們排成隊走到那個流氓面前，我和魏泉寶架起他的雙臂，把他架出會議廳。開頭他還掙扎，但是一出大廳，他就立刻老

實了，露出一幅畏怯可憐的神態，他真的不知道我們會不會把他從二十層樓上扔下去。我們不說一句話，僅僅用威嚴的目光威懾他。那流氓狼狽不堪，一溜煙逃走了，從那以後再沒來搗亂。

當年同盟會，就有胡漢民的筆、汪精衛的嘴、張繼的腿之說。沒有張繼的腿，民運連一場會議都開不成，一個無賴就可以攪亂一切，一隻老鼠就會壞掉一鍋湯，還能幹什麼？

一股政治力量，一個政治團隊，在本質上應該是一支不拿武器的軍官團。當這個團隊沒有士兵，甚至也沒有武器的時候，即使赤手空拳，即使只有指甲和牙齒，必要時也得挺身為榮譽而戰，為尊嚴而戰，為思想而戰，為信仰而戰。

當代民運的主流一直是希望與共產黨合作，真正實現共和，共同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可惜始終都是一廂情願，而且不停地挨打挨罵受關押受折磨。對於沒有暴力或暴力威脅為後盾的政治團體，如黨內同志，或八個民主黨派，中共一貫是像對待家奴一樣任意折辱的。

本來民運強硬派與溫和派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就像嘴唇和牙齒之間的關係一樣，就像一個生命共同體既要通情達理，又有自衛能力，缺一不可。西奧多·羅斯福早就說過，無論我們想幹什麼，都應該手拿大棒，說話溫柔。強硬派需要溫和派的支援，否則便如麥芒一樣有鋒無力；溫和派也需要強硬派的威懾，提醒任何政治集團不可輕視，不可侵犯，我們有能力付諸行動，必須認真聽我們說話！

民運強硬分子其實是民運力量的鋒銳，應當加以特別愛護的劍尖刀刃，應該重金重愛蓄養的獵虎獵鷹，如魏泉寶一類的猛

士。當年燕太子丹舉國不遺餘力侍奉荊軻，何在乎醇酒美人？這都是以一當百、以一當萬的烈性壯士，天下何處可求？中華更是一向罕見！

有了他們這些民運衛士，民運才有與共產黨討價還價的本錢，民運整體說話才有份量！自古以來任何政治力量都深深懂得這一點，而許多民運人士竟然一竅不通，竟然糊塗到與共軍裏應外合，圍攻剿滅自身鋒銳。悲哉民運！

鋒銳好比一把匕首的尖子，或一枝箭的鋒鏑。鋒鏑一折，箭身便如同一枝竹竿，復有何用？一支萬人大軍，其真正的戰鬥力，有時就在於它的鋒銳，有時只是那一百個冒死突陣的敢死隊員。

當年項羽破釜沉舟，抵死進擊。而百萬諸侯軍隊，皆作壁上觀，幾乎全是無用的廢物，後來爭權奪利倒是行家裏手；當年亞歷山大大帝以三萬人攻擊六十萬波斯大軍，也是先擊滅其少量鋒銳，奪其志，其餘不戰而自潰；當年張飛在當陽長阪坡上一聲斷喝，百萬曹軍皆膽裂，何故？曹軍銳氣已盡。

國共內戰時，共軍常以十倍兵力，圍攻國軍精銳，不惜一切代價，志在必取。74師師長張靈甫中將的衛士長，受傷被俘關押三十年後回到故鄉安徽蚌埠，常常對人談起孟良崗激戰，其情形慘不忍睹。共軍奴隸兵各團皆獲必死衝鋒令，蜂擁而上，蟻附而攻，其死傷超過74師官兵總數二倍以上。

面對陣前如山屍積，久經行伍的張靈甫將軍淚如雨下，那都是他的血肉同胞啊！連日疲勞及受血腥刺激過度，一代名將終於不忍，仰天長歎：天意既如此，何辜眾生！遂停發各團彈藥，

扯斷電話線，舉槍自盡。

附近各支國軍，俱躊躇不前，不肯死戰解圍，甚至有幸災樂禍者。悲哉國軍，敗在自身；精銳且亡，全軍夕潰。五支精銳被擊滅之後，各地國軍雖然還剩二百萬左右，但多半只有投降逃跑潰散之能了。要不是胡璉大戰古寧頭，折斷共軍鋒銳，盡摧毀之，力挽狂瀾，恐怕台灣早就淪陷了，與今日海南島應該差不多。

何況我們並不輕易訴諸暴力，迄今為止也只是一再提醒中共，不要一味使用暴力鎮壓異己，到一定時候必然會導致我們的暴力對抗和武裝起義。我們不希望中國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那樣憋到一定時候打個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把中國人的鍋碗瓢勺都打碎掉；我們也不希望中國像前蘇聯那樣在內戰中漸漸解體、分崩離析。

我們和作家王力雄寫《黃禍》的本意一樣，最好別發生那種情況！我們不過疾言厲色一點，但我們還是滿腔熱誠希望共產黨能夠看清形勢，懸崖勒馬；順應歷史潮流，主動進行民主變革。

正義黨何辜？民運鷹派何辜？誰能拿出一點點這批人真正有罪的證據，究竟為何要群起而滅之？請告訴我！

68·心酸的感覺

那段日子總是心酸。我常常坐在百老匯大道與八十二街交叉處的一家比薩餅店裏喝咖啡，透過壁式玻璃看著成直角的兩條街上健康快樂的黑人、西班牙人、印度人紳士淑女般地走過。我心酸，我們中國人為什麼只能過貧窮而愚昧的生活？我們安徽老家

的許多農民，一年累到頭掙的錢只夠吃飽肚子，茅草屋漏雨了，甚至都沒錢修理。據官方統計中國還有八千萬人溫飽問題還未解決，也就是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其實至少有六億中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想道中國人幾十年來所遭受的苦難，直到現在還看不到光明的前景，我心酸。那年白宮主辦的總統早餐會，邀請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客人在白宮草坪和白宮政要共進早餐，我也是受邀客人之一，也是因為心酸，我把這份榮幸讓給了李洪寬。

艱苦奮鬥了十幾年，到美國看到民運圈子這麼糟糕，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一片混亂，我心酸；真的受到詆毀，真的受到懷疑，假的道貌岸然，謊言到處流傳，惡語受到歡迎，我心酸；小人和特務整天嘀嘀咕咕，這些墮落的靈魂占據了絕對優勢，我心酸。

詆毀圍毆一個剛到美國的民運人士，對於特務和小人來說是很容易的，他們在我之前已經打倒了幾乎每一個類似我這種情況的人，這些墮落的靈魂擁有絕對優勢。何況我剛剛出獄，多種疾病纏身。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甚至直到現在，這麼多年過去，那些混在民運隊伍裏的小人都不明白，他們之所以浪得虛名，他們之所以沒有被打倒，並不是因為他們有任何才智或品德或貢獻，而完全是因為中共特務們在有意識地扶植他們，保護他們。

特務需要利用他們這些天生妒貨去嘀嘀咕咕，散播流言蜚語，暗中圍攻詆毀真正的民運志士；特務需要利用他們這些根本

不值錢的鍍金戒指來取代真正的民運志士，從而把民運搞得一團渾水，然後去打抓中共真正的對手；特務需要利用他們這些弱智小人去敗壞民運聲譽，切斷各方面對民運的同情和援助。

就像當年共產黨利用張瀾、馮玉祥、李宗仁這類小人一樣；就像當年日本人利用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那類小人一樣。而且這些混在民運裏的小人更低級、更差勁、更可悲，既無真正的才華，又無深刻的思想，甚至連一點點政治道德都不懂，只能在這個特別的年代特別的環境瞎混上幾年，最終注定了只是共產主義的另類炮灰。

這種心酸的感覺經常持續很久。所以到九八年底，我放棄在美國的一切，冒著敵人的炮火，不顧一切地返回祖國。我寧肯蹲監獄，也不肯與那些小人打來鬧去，那簡直等於自殺！

在美國的後半年我總是心酸，我不想見任何人。我為我無知的童年、懵懂的少年、苦難的青年時代而心酸，為我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甚至現在還不能講英語而心酸，為苦難使我的精神和身體受到太大的損壞，記憶力幾乎喪失，整天心神恍惚，煩躁不安，滿臉傷痕，容貌未老早衰而心酸。

我心酸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共產黨不僅沒教過我任何有用的東西，反而灌輸給我一大堆荒謬的顛倒黑白的理論。從十三歲起我就在內心裏與這整整一大套謬論抗衡著，我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才從頭腦中清洗掉這些有毒的垃圾。

我從高中到大學都沒有認真聽過課，我一進共產黨的教室就打瞌睡，無法抑制的瞌睡，好像完全是一種本能。本能的抗拒這種教育制度，這種填鴨式灌輸歪理邪說，乃至抗拒這個社會制

度。而當我二十三歲開始能正常地思考和專業從事民運之後，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抓進監獄。

二十多年來，我不得不完全憑著上帝給予我的原始生命力去思考去探索。我總是失敗，總是一回又一回的被共產黨打倒在地，被穿解放鞋的臭腳肆意踐踏。我受盡苦難，但我從未屈服，我有時氣餒，甚至懷疑，甚至絕望地喝酒。但幾個月之後，我就醒悟過來，我又像一個清教徒那樣生活，又重新開始我的征程。

有一回我和一個黑人朋友看一盤粗糙錄製的錄影帶，幾百個非洲土著黑人沒完沒了的唱歌跳舞。我一會兒就看膩了，黑人卻興致勃勃，甚至起身手舞足蹈，和錄像裏的黑人一起又跳又唱，並指著一群黑人男女對我說：「這是我的爸爸，這是我的媽媽。」我好奇地問哪一對是他的父母，他說：「那些人都是我的父母，那是我二百年前的故鄉，他們都是我的親人。」他的回答令我陷入沉思，令我想起了黑人民權運動中表現出的熱烈的同胞之愛。

而中國人正好與之相反，就在我到紐約之前的一個星期，聽說一個中國人在紐約唐人街最熱鬧的緬街被四個西班牙搶劫者用刀子殺死。街上中國人如潮往來，可能有數千人經過，卻無人願助同胞一臂之力甚至打一個報警電話，任同胞屍橫街頭，直到白人巡警發現。在海外的中國人類似在國內的中國人：彼此敵視，沒有善意，相互提防，相互攻擊。

那段時間印尼華僑遭受迫害，以紐約華人為中心的全球華人抗議活動正達到高潮，大約兩個月裏我全力以赴地呼喊、奔走，盡可能地動員紐約華人參與進來救援同胞。我到處張貼宣傳品，

有一個星期裏我天天站在法拉盛鬧市中心路口散發傳單，我身體的前後左右都掛滿了大幅宣傳畫，我自己就成了一個活動的廣告牌。

那對我來說是一段傷心的經歷，因為大部分同胞對此冷漠，使我費盡心力組織的抗議活動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雖然兩千年前孟子就教導我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目前的華人社會倫理卻正好相反，大家仍然是各掃自家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那時候，我寧願自己是一個黑人。我嚮往黑人那種不分男女老少水乳交融相處在一起歡樂歌舞的情境，更嚮往黑人那種視同族父老皆為自己父母的古樸感情。

對於中國人這個特別龐大特別古老的種族來說，我想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文明、富裕、強大的祖國，我們就像水面上的浮萍，我們失去了根，我們沒有向心力，在精神上我們統統都是亡國奴。

西方人不奴役我們，僅僅是因為他們文明，僅僅是因為他們不願奴役任何人。

在大陸的中國人是更可憐的亡國奴，亡於西方邪教馬克思列寧主義。

所以我更加熱切地想要返回我的祖國，哪怕只能為她吶喊一聲就被共產黨招住脖子；我要和我的同胞們相依為命，共同抵抗專制暴政；與吾土吾民血肉相連，生死與共！

我到美國的時候，沒有錢買禮物，只給民運的朋友們帶了幾十包土，那是故土，那是來自我們故鄉中國的土，我們不能遠離我們的故土。記得辛灝年教授曾激動地對我說，他從來沒有收到過比這包故土更貴重的禮物！

巨人泰坦曾一次又一次被敵人打敗，但是一倒下，一接觸大地，泰坦就重新獲得了無窮的力量，就能挺身再戰。民運也是，我們不能長久的遠離我們的故土，否則我們便會失去知覺，失去感情，陷入無聊惡鬥和精神空茫的泥潭！

我越來越渴望返回我的祖國，我的故土，我全部的愛和希望！有機會就大幹一場，沒機會就到監獄苦熬時光，怎麼都比在流亡中沉淪要強！

黑暗大陸仍然還有許多良心在掙扎，更有許多英魂在呼喚著我，魂兮歸來！

在「六四」那場血與火的鬥爭中，我最佩服一個四川山區的十七歲少年，那是比王維林更勇敢的少年英雄。「六四」屠殺之後，少年組織了一個三人團體，立即開展武裝鬥爭。他們決心給「六四」死難烈士復仇，決心給中共一點教訓。他們先在一個地方埋設了自製的地雷，然後打電話給警方報警，說發現「六四」分子。一輛武裝警車前往拘捕，結果被炸翻，警察也被炸傷炸死，少年們便有了槍。

當少年們再用這個策略引誘伏擊敵人的時候，狡猾的共軍立即出動大批公安武警，嚴密圍困了那整個地區，少年們發覺中計，急忙分頭撤退，溜回家中。

但是嚴密布控的鄉村民兵終於發現線索，十幾名便衣公安突

然衝進屋內，用繩子把少年捆了起來。剛抬至院外，正在附近山坡砍柴的少年父母發覺，兩個老人立刻撲過來營救兒子，因為他們知道兒子從事的是正義事業，他們只有這一個兒子，一向視若珍寶，自小天資聰穎，嫉惡如仇。他們決心與兒子同生死、共存亡！

二老突然揮舞柴刀猛砍猛劈，共軍幾十年沒遇到這種場面，措手不及，驚慌失措，胡亂開槍，竟然都沒有擊中二老要害。結果五、六個共軍被砍翻，剩下七、八個共軍倉皇逃命。這時在周邊掩護的大批武警聽到槍聲，包圍上來，猛烈射擊，把少年一家三口統統打死！

何等英烈之家！我在一本四川地方法制雜誌上看到過對這個事件的反面敘述，雖然姓名我實在想不起來了，但絕不會有假。我們將來一定要找到這個英烈之家，在天安門城樓上給他們樹立雕像！

我在美國吃飯吃菜，從來沒有感覺到香味。我不知道是我失去了味覺，還是我水土不服，還是別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反正感覺怪怪的。好像我是一條沙灘上的魚，或是失去了天空的雄鷹，反正橫豎不對勁。

自由、富裕的生活當然是人人喜愛的，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也許就是全部。普通的中國人在美國可以生活得很快樂，但是對於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於真正用全部的愛和感情投入這塊土地、這方人民的正統知識分子，就會感到一種靈魂的焦灼。

總是感到不安，總是感到若有所失。我們失去了我們的天空、我們的土地、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山河、我們的家園，難道

世上還有比這更重要的東西嗎？我們寢食能安嗎？

而且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觀念，也只有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才有用處、才有價值。美國根本不需要這些東西，至少是可有可無。我們在美國生活得再好，我們的存在本身也是可有可無的。在美國最高的境界也就是獨善自身了，而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還在那裏胡攪蠻纏，那就成了罪人。

而在中國大陸，我們卻無比重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點點金光，照耀四方。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意義，假如流亡海外起不了多大作用，那還不如衝進鐵幕，即使被關進監獄，那也是一種強有力的衝擊。

不管中國人民，還是共產黨人都會受到震動，因為普通人和共產黨人都渴望到美國去生活，所以他們不禁要問：這些人，這些民運人士究竟為什麼要回來？究竟為什麼要放棄舒適生活而回來受苦受罪？

共產黨人總是以愛國自我標榜，總是誣衊我們是壞蛋，是叛國者，是賣國賊。而我們衝回來本身，僅僅這一個行動就可以戳破這個謊言，就證明我們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我們熱愛故土，我們熱愛人民，為了這份熱愛，我們寧可放棄一切，寧可去蹲監獄。共產黨人有過這樣的獻身精神嗎？

所以為什麼共產黨領導人對這些衝回來的人特別恐懼，拚命給這些人扣上間諜或流氓的帽子，甚至要給王炳章判處無期徒刑。實在是因為，這種行動戳到了他們的要害，戳破了那些假愛國者的畫皮。

儘管二十年來，不顧一切衝進來的民運人士只有幾個人，

但給共產黨人的衝擊和震撼是巨大的，遠比一百個無所事事，可有可無的所謂民運人士在國外觀望，或瞎吵與胡鬧要強。面對我們這些不顧死活的亡命之徒，共產黨領導人在內心裏是深深恐懼的。我們不計利害，我們不在乎榮辱，我們不貪圖安逸，我們敢想敢幹，我們無所畏懼，我們視死如歸，什麼樣的魑魅魍魎不害怕我們？

70·情何以堪？

共產黨對人民是竭盡全力進行性壓抑的，而對黨政軍幹部則是完全相反的另一套標準。五十年代，毛澤東親自下令，給所有省軍級以上領導幹部發一本嚴禁在社會上流傳的黃色禁書《金瓶梅》，以啟發引導他們淫亂。據說這個主意是周恩來出的，目的是讓這些人筋疲力盡，精神空虛，喪失思維能力；惟命是從，安做奴隸，永遠不敢造反，以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這跟日本軍官給士兵服用搖頭丸，蘇聯紅軍給戰士服用伏特加，解放軍在中越戰爭時給戰士喝茅台酒都是一個原理。至於中共制定的黨政軍幹部內部淫亂標準，更是荒唐，這最能體現共產黨人的邪惡本質。他們總是用雷鋒王傑的奴隸標準來衡量人民群眾，而用西門慶潘金蓮的淫亂標準來衡量黨政軍幹部。

米蘭·昆德拉在使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塑造的主人公托馬斯因為在一封反共公開信上簽名而從主治醫生調去當清潔工後，善良的捷克人民默默地同情他，幫助他，多付他報酬，受難八年裏居然還有幾十個女人與他幽會，給他溫情，撫慰他受傷的心靈。

要在中國，托馬斯早就以流氓罪被勞教幾十次，或索性以強姦罪被槍斃掉幾次。基督教吶喊派領袖吳楊明就是這樣被槍斃的。這種中國特色甚至毒害到民運內部，一些人常常用共產黨的謊言來罵你排擠你，讓你好不傷心！

儘管在內心裏我有火熱的激情，生性像法國人那樣浪漫，但是由於不幸地走上了反抗專制鬥爭的不歸路，致使我的整個青春幾乎都葬送在監獄裏，或地下活動中。而在我更年輕時，由於受共產禁慾主義的損害，加上那時我竭力想成就一番偉業而抑制自己，所以在我的幾乎整個青春歲月裏，我都是被迫遠離異性，遠離情愛生活的。

儘管我在情愛生活方面幾乎是個可憐蟲，甚至還不及普通人豐富，僅有的幾次愛情又因為監禁，被中斷、破壞掉了，我始終有強烈的缺憾感，共產黨卻還在這方面攻擊我，真令我傷心，一九九四年幾乎把我氣死。正是哪兒可憐，哪兒是疼處，共產黨就往哪兒戳！也可能因為我專門攻擊共產黨的要害，所以他們就以牙還牙。區別只是，我以誠正，對方以誣陷，外加牢籠。

其實這也是共產黨迫害黨內黨外異己的一貫策略，歷次迫害異己運動中的三大革命法寶之一，另外兩大法寶就是反革命和特務，這是從井岡山開始，在瑞金成熟，在延安深化，到北京爛熟的革命法寶，毛澤東和康生最擅長使用，一般共產黨人也都用心學習，深諳此道。

溫情和愛戀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內容，我從來不是冷酷無情的極端狂熱分子，而是血肉豐滿、熱情奔放的詩人和愛人。因為我的一切都起源於愛，我的生命、我的理想、我的事業統統起

源於我對人類的愛，對家人、對朋友、對鄰人、對同胞的愛！沒有這些，生命毫無意義，我早就死掉了。

所以我始終有一種強烈的缺憾感，始終有一種難言之痛，每次回顧我的青春經歷，我都有一種灼痛的感覺，都有一種被刺傷的感覺。在我的心靈深處，二十多年來我一直渴望遇到一個純潔透明、充滿智慧的白衣天使，能夠溫柔的憐憫我，撫慰我心上的累累創傷；能夠輕輕牽著我的手，走遍天涯海角，走過春夏秋冬。

但是沒有，每當我似乎得到的時候，共產黨就把我抓進了監獄，把一切都給毀了。而等到我再次出獄，傷痛和苦難已深深刻寫在我的臉上、身上和心上，我離我的目標更遠了。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對我未來的悲劇人生有預感。後來還是尼采給了我啟發，他說得很對，既然無論怎樣生活，我們總是感到痛苦，既然人生注定是一場悲劇，既然我們又不想過早謝幕，那麼我們何不將這場悲劇演得轟轟烈烈一些，熱情奔放一些，多姿多彩一些，有意義一些！

所以二十年來，我才能把一切，包括生死都置之度外，只憑著正義的指引，只憑著愛的驅動，無所顧忌地與共產主義巨輪抗爭，而不去患得患失，而不管我的結局怎樣！

71·誠信價值

我還有一種遠異於一般中國人的誠實。我在到達紐約的時候，在甘迺迪機場海關，當移民局官員問我到美國的目的是什麼時，我覺得我不能欺騙美國人，便直截了當的回答是為了尋求政

治庇護，結果我立刻被扣押。因為我是大學同學妹妹擔保的旅遊簽證，這個簽證也沒有任何民運人士幫過一點兒忙。

來接我的陳破空在出口處老是接不到我，到裏面得知情況後驚慌失措，連連責備我太誠實，簡直是愚蠢。警告我隨時可能被驅逐出境，被押上下一班飛機遣返回中國，誰也無能為力。

移民局是最跋扈、最官僚化的美國政府機構，再加上中美文化隔閡，他們辦起中國人的事來，幾乎和中國政府機關一樣低效腐朽，有些時候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不受被服務者監督批評的權力機構多麼容易變質，無論在世界任何地方。我被扣押了四個小時，反覆受到極其難堪的、刁鑽古怪的狡黠盤問，氣得我最後幾乎主動要求他們立刻遣返我回祖國。最後一個航空公司的台灣翻譯告訴我，完全是由於我走運，碰到了一個還算善良的主管官員，放我一馬，我才得以進入美國。

我一向最痛恨撒謊者，我簡直不明白為什麼一些同胞就敢把黑的說成白的，我一直以為我是個錯誤地出生於東方的西方人。八九年在獄中，面對太多的問題，我既不願交代也不願撒謊，老是回答「我忘了」、「我記不得了」也令我厭煩，於是我就對主審官陳炎林說：「別再問我了，不管會付出多少代價，我是不會交待任何可能損害他人的問題的。」

「還有」，我接著說：「即使面對你們這些迫害狂，我也不願撒謊。我實在不願撒謊，那對我是一種羞辱，我的良心會感到不安。即使面對任何敵人，只要對方屬於人類，我都不願撒謊。」

對於牽涉隱私或一些實在不能回答的問題，我寧可迴避也不

願撒謊，我的底線是既不能傷害自己也不能傷害任何人。我的家人和密友都深知我的脾性，從不讓我去買東西，因為我太誠實，總是吃虧，總是輕信任何人。我一做生意就必敗，有時候想狡猾都狡猾不好，實在是天生缺乏這方面的基因。

這種思維習慣來源於我對文明的思考。依我看，人類文明水平其實就是人類的合作能力水平，而人與人合作的最基本前提是誠信，一個沒有誠信的群體是絕對沒有任何力量的，甚至是注定要被淘汰被毀滅的。中國人如此之多，整體卻如此虛弱的根源，在我看來本質上就是因為誠信問題。

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宗教因素而在這方面固有的缺陷，由於沒有上帝的眼睛每時每刻在盯著每個中國人，由於綿延兩千年的高度集權專制，所以造成了中國人違心說話的傳統習慣。

清末民初人口迅速滋生致使生存艱難，導致人們爾虞我詐，又加劇了這種敗德現象。

而共產黨的腐惡專制，肅反、反右、文化大革命更把中國人推向虛偽說謊的頂峰！

幾十年下來，中國人現在簡直是出門如見敵那樣警惕，何況言語！到現在連我們使用了兩千多年的漢語都被破壞成一種支離破碎的、名實相悖的摻水語言，所以國人就把撒謊當成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保護自己不受意外侵害的外套，出門就穿，甚至在家裏都不脫！

這樣中國人慢慢地就與誠實的距離越來越遠，甚至根本意識不到誠實這種品質不可代替的非凡價值！尤其在現代社會裏，這可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所能達到文明高度的主要標誌之一！

斯塔爾不惜耗費數千萬美元調查費，不惜持久浪費全美國人的注意力，不惜在全世界人面前使美國蒙羞，緊緊抓住克林頓的誠實問題不放，大部分國家的人民、包括許多歐洲人都不太懂究竟為何，其實這正是美國文明能達到現在高度的根本基石，即使弄錯了也值！

所以我一貫反對民運神秘主義，有多少事情需要保密啊？大家多知道一些事情，每個人都能夠作出更正確的判斷，遠比相互封鎖真實消息；大家都稀里糊塗、都去栽一回跟頭要強。只有上帝才是神秘的！我們能有多聰明啊？我們這些凡人都是赤裸裸的！紙包不住火，沒有什麼事情最終能瞞得了大家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薩達姆迅速崩潰的主要原因就是誠信問題了，但是中共還絲毫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也根本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將來他們必然崩潰於此。民運不解決這個問題，也將一事無成。

中國近代史上我最佩服的人是曾國藩，他白手起家，以誠信號召散遺鄉間的誠士、誠勇，以誠信編練治理湘軍，然後以寡擊眾，掃蕩群賊，所向披靡。若不是他的功勞，我們中華民族可能要提早一百年陷入更殘酷的另類共產主義深淵裏。

如果早生一百八十多年，我會投到曾國藩門下，一定可以馳騁疆場，累建奇功；或者早生九十年，我會比張靈甫更堅忍，死守一個城市，任憑百萬共軍如黃河決堤，洪水氾濫，我必定要戰至最後一刻，流盡最後一滴血，只要中華有一個燦爛明天！

「六四」之後，全中國有幾個民運領導人能像我那樣毫無退意，全力組織反擊中共，策劃炸橋搶軍火庫，堅持領導鬥爭，直

至最後被捕一刻！

我在清華唸書的時候，班裏四個女生給全體男生寫過一首嵌名寓意詩，對我的那一句便是：弓手長歎林亦哀！真是神來之筆，簡直預言了我的命運。

所以當民運圈裏那些撒謊成性的特務及小人反而誣衊我撒謊的時候，而另一些民運人士又絲毫沒有能力辨別真偽的時候，我真是感到由衷的悲哀，我為當代民運，為當代中國悲慟，我為何要生在這個謊言肆虐、黑白顛倒的時代！

我在紐約的時候因為悲憤剃過一次光頭，那段日子我每天都有一種發瘋的衝動，每天都想像瘋子一樣，滿大街奔跑，號啕大哭，為我傾注了那麼多感情的當代民運的墮落，為我傾注了所有青春血淚汗水的中華民族的墮落，而終年累月慟哭死去！

難怪當年陳天華要蹈海而死，難怪當年屈原要自沉汨羅江！

72·突進鐵幕

共軍雖千萬人，吾往矣！

風蕭蕭兮東方寒，猛士一去兮不復還！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王炳章和傅申奇到甘迺迪機場為我和魏泉寶送行。我們經過香港海關時，魏泉寶順利入關，我卻被攔到一個房間裏等待決定。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之後，才有一名海關官員告訴我，可以讓我進入香港，同時提醒我要遵守香港法律。焦急不安的魏泉寶終於等到我出來。我們在大廳裏轉了兩圈之後，陳老闆出現了，帶我們坐大巴到九龍油麻地，住進一家小旅社。

第二天我和魏泉寶討論行程的時候，我從門縫發現旅社老頭側耳傾聽，那家小旅社只有幾個房間，是開放式的，無需值守，但是那個老頭卻始終坐在我們門口。當我們趁老頭不在打電話時，電話卻沒有一點聲音，後來我們問老頭怎麼回事？老頭說我們想打電話必須先跟他打招呼。我斷然要求魏泉寶換地方住，我們搬到了新高雅酒店。

陳老闆向我們介紹他在「六四」時負責安排逃到香港的民運人士的衣食住行，一九九七年之前他拿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簽發的白皮書到美國避難，後來又返回了香港。我們明確向陳老闆說明，此次行動由我負責，他卻背著我私約魏泉寶外出交談，這讓我很不舒服。我們原來約定在香港只停留三天，但是五天過去了，陳老闆說很難租到船，還得再過幾天再說。

第六天傍晚，我思前想後，覺得我們的行程肯定已暴露。兵貴神速，我們離開美國這麼多天，紐約民運中的共產黨特務肯定已感到懷疑，致電大陸防備。而且海關被阻、老頭監視、陳老闆私下籠絡魏泉寶、行期拖延四個疑點無法解釋。

我提出取消這次大陸之行，陳老闆和魏泉寶一致反對，尤其是陳老闆，非常激動地反駁我，並表示，如果我執意取消這次行動，他這張老臉就丟盡了，以後就沒法再幹民運了。魏泉寶也表示，如果我不去他自己也一定要去。竟然嚴重到這種程度，把我嚇了一跳，不知如何是好。

但是我仍然確信我們已暴露，我提出我們可以從羅湖海關走一下，試探一下。魏泉寶認為我說得有理，可以一試。陳老闆看看魏泉寶，又看看我，漲紅的臉褪色了。他祝我們好運，說他明

天還有別的事，不陪我們了，然後沮喪地走了。

第七天，也就是十一月七日，我和魏泉寶到了羅湖海關，魏泉寶從一樓過關，我從二樓過關，他持護照，我持身分證。輪到我的時候，邊檢問我通行證呢，我說丟了，他把我的名字輸入電腦，然後掩飾不住得意地對我說：「我們等你已經很久了！」他招呼一個站在旁邊的武警過來，把我帶了進去。當我被帶進一間辦公室的時候，我看到魏泉寶已先我而到了，我們相視而笑。

我們在那裏等了很久很久，兩個武警坐在對面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當魏泉寶伸手摸煙抽時，立即遭到武警阻止，魏泉寶指出茶几上和辦公桌上都有煙灰缸，證明這間辦公室可以抽煙，與他們吵了幾句。沒用，還是不准我們動。那二個小時真是漫長，因為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接下來會有什麼遭遇。

然後魏泉寶被帶了出去，兩個人進來開始問我一些問題：「回國幹什麼？」「包裹背了什麼東西？」「別的證件呢？」最後他們又仔細地搜查了我的背包。然後幾個穿制服的武警過來向我宣布：「禁止你入境，你的護照早就作廢了。」我問他們有何法律依據？回答是：「根據上級指示。」然後十來個武警一起排成人牆驅趕我出境，後面還有一名武警扛著攝像機。

我背著背包穿過羅湖木橋走回香港海關時，魏泉寶已在那裏等候多時。我不想再跟陳老闆聯繫，於是我們通過在香港認識的一位女歌手找到一間很便宜的住房。

詹姆斯·邦德的每一次冒險行動，都會遇到性感美麗的女郎。作為一個行走江湖的俠士，如果沒有這些粉紅色的邂逅相遇，那將枯燥乏味，觀眾將不忍去看。

挑戰者的勇氣本就來源於深沉的愛，來源於激越的愛！我們渴望與我們熱愛的這個世界親密無間，我們渴望與我們熱愛的人類血肉相連。

但是我們卻又不得不忍受孤獨的煎熬，無論在獄中，還是在地下活動時。我們沒有普通人溫情的生活，我們總是在赤道炎熱和極地酷寒之間走鋼絲。

所以我總是忙裏偷閒，我總是想浪漫一點，以慰久旱的心田，尤其在上戰場之前。我和魏泉寶多次去聽金薇唱歌，她是一個美麗的歌手，後來我們成為朋友。

可悲的是，我們不能告訴她，我們的名字，我們是什麼人。說聲再見，之後就杳如黃鶴，遠飛如一縷清煙。

但那驚鴻一瞥，足以使我依依思念，在牢中伴我漫漫三年。

王炳章要我們再與陳老闆合作，如果三天之內還不能偷渡成功，再取消這次行動。我又與傅中奇通了電話。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中共已經掀起一個鎮壓民運的新高潮，民主黨領袖王友才、秦永敏等一大批人已經被捕。

在中共看來，我們是頂風作案、激流勇進，最讓他們忌憚的。我當時只能看到香港報紙，幾乎找不到大陸民運方面的消息，可能香港媒體自律很嚴。

第二天我們花了半天時間辦理延期滯留香港的手續。然後約見陳老闆，我又提出我們轉道澳門或越南偷渡，陳老闆說澳門十分混亂，我們有可能被共產黨特務裝入麻袋，丟進海裏，無聲無息。陳老闆又追問我們是否能立即決定，我猶疑了一會兒，魏泉寶執意偷渡。我已三面被圍。最重要的是：我和魏泉寶是同行

兄弟，必須有難同當，我不能讓他獨自承擔危險，所以我只有屈服。

我想只要陳老闆不出賣我們，我們迅速殺個回馬槍，潛入大陸，等到中共察覺，我們已深入內地，辦好假身分，潛伏下來了。直到幾年後我才明白，之所以拖延那麼多天，是因為陳老闆一直在暗中與中共討價還價，而中共的官僚體系注定要花幾天時間才能反饋決定回來。找船本身實在太簡單了，香港是走私天堂，隨時可以找到船。

我離開紐約之前沒有與任何親友告別，主要是擔心親友不小心會洩露秘密。我十幾歲的時候讀過辛亥革命志士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他那種已看到不可能成功，卻仍遵守信約，決心以一死謝國人的英雄氣概曾讓我感動得熱淚盈眶。我現在也面臨類似處境，我已看到前途兇多吉少，為了對得起朋友，為了一諾千金，我就只有將安危置之度外了。

船在午夜時分起航，出避風塘，在夜色中沿大陸海岸東行。天空群星閃爍，前途吉凶莫測。我們不敢睡覺，時刻保持警惕，諦聽船上的一切響聲。船上只有兩個船工，以魏泉寶的勇猛，只要醒著，足以應付任何突然襲擊。

魏泉寶曾在一天深夜獨自迎戰十多名酒醉後蓄意滋事的福州幫打手，以一把西瓜刀砍死一人，重傷兩人，逐走其餘，威鎮紐約華埠。法庭最後判定魏是正當防衛，魏被稱為最勇猛的民運人士。何況我也不是等閒之輩。我選擇與他同行，就是為了在緊要關口，如有戰機，能一舉而建奇功。

天明之後不久到達馬坑，一路順利到達廣州。我們還沒確定

先到哪裏，一輛計程車便停下來，司機伸頭問我們到哪裏去，而我以前坐過幾百次計程車，也沒見過司機伸頭問的，他們只是放慢速度，眼睛看著你的意向。我們只好按照陳老闆給的地址先去看看，那竟是一家酒店，當我們詢問那個女人在哪裏時，接待員神色不自然的低下頭，轉身到後面打電話去了。

我正在狐疑，魏泉寶卻拉起我就走，出了門跳上一輛計程車才告訴我，剛才他一直留意那個鬼鬼祟祟的司機，發現他在我們下車之後，不在酒店前等客人，而是開走了一段距離，停在一處旁邊無人的樹下回頭看我們。

看來我們已被牢牢控制，所以我決定不住髮廊，而住酒店，明天買好假證件和火車票，後天突然離開廣州，到處亂跑，看看是否能擺脫控制。

我們在幾家酒店住宿都遭到拒絕。正當我們無奈之時，一個拉客仔過來說他可以解決，而且死死纏住我們，帶我們去金鷹酒店住，只登記我的身分證就可以。幸虧我們沒有住在那個女人那裏，也沒有按照陳老闆的交代去住髮廊，否則中共就可以從容地製作一盤精采的成人錄影帶了。

我們在房間裏先後接到幾個奇怪的電話，有男有女，儘管我們都不認識，那些男女卻死纏不休。第二天我和魏泉寶分頭辦事，準備證件。第三天下午魏泉寶先走一步，我去取行李時被捕。

73 · 車輪戰

車輪戰是一種殘酷的審訊方式，沒經歷過的人無法想像其威

力，細心的人如果注意看報紙，會留意到公安機關對某某疑難大案集中審訊力量，連續作戰，終於攻破疑犯防線的報導，這就是車輪戰審訊。就是十個或二十個審訊員分為幾個組，輪番在密室裏污辱、威脅、折磨、審訊一個嫌疑人，直到他徹底交代問題才允許睡覺。

按照中國法律，對已經定罪的罪犯都不可以施肉刑或其他精神折磨，那麼對嫌疑人就更不應該施肉刑或精神折磨了。但實際上是，只要你被抓進去，就被切斷了與外界的任何聯繫，你就被剝奪了所有做人的權利，你就進入了黑暗世界，任何時候都可能被施肉刑，或進行精神折磨。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三點，我在廣州金鷹酒店的三樓走廊突然被八、九個人圍住，其中一個還扛著攝像機對準我拍攝。他們說他們是公安局的，懷疑我的身分，要查看我的證件，我要他們先出示證件，其中一個人出示了工作證：廣州市公安局一處五科（就是政治保衛處審訊科）科長。我也只好掏出我的身分證，科長仔細地看了看說：「就是這個人，就是你，你涉嫌非法入境，跟我們走一趟吧。」

他們禮貌地把我帶到一間辦公室，開始的談話也很有禮貌，滿臉笑容，問題也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回國幹什麼？怎麼進來的？」我引用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指出：「嫌疑人對於與犯罪無關的問題，有權拒絕回答。我當然沒有犯罪行為，從小到大都沒有，所以當然有權拒絕回答你們提出的任何問題。」

這時候他們就岔開話題，問我在紐約怎麼樣，我想聊天是可以的，我就大談紐約民主制度的優越性，能讓來自世界各地的難

民和睦相處，掙一份優裕的生活。一般的工作，只要查查報紙，打打電話，幾分鐘就可以找到。外國人在紐約生活，比外省人在廣東生活要容易得多，至少不會買到假貨，商人也不會漫天要價。他們聽得津津有味，我也越談越起勁，我後來才意識到這是他們的疲勞戰術。

他們一再以商量的口氣說：「就那麼兩個問題，順便談一談吧，我們也就可以交差了，就算幫幫忙吧，怎麼樣？再說犯罪不犯罪，不能完全由你來判斷，說出來大家一齊來評判，不是更好嗎？你不是民主運動人士嗎？咱們民主一回怎麼樣？把問題談清楚，如果真無罪，我們也會幫你說話的。」

我只好說：「這些問題很難說清楚，我畢竟什麼也沒幹，剛一進來就給你們逮住了，僅僅停留在腦子裏的東西，談出來有何意義？」

審訊者：「要等你幹了就什麼都晚了，幸虧我們及時阻止你。預備犯罪也是一種罪行，當然可以從輕處理，還沒開始行動的也可以不處理，但是必須說清楚。或者先談談你是怎麼進來的吧？」

我：「至於怎麼進來的？大陸去香港很難，從香港回大陸太容易了，更不值一提。我是中國公民，沒有任何一家中國法院開除我的國籍吧，但是海關就是不准我回國，顯然他們違法了，我建議你們把他們抓來問問，可能更有意義。」

審訊者：「就算你說得對，可是我們現在先找你談，你也違反了出入境法呀？」

我：「如果你回家時看到有一些人霸道地占據了你家的大

門口，你又無力趕走他們，只得走後門或從窗戶鑽進家，你有錯嗎？會有人責怪你嗎？國家國家，國同於家，我回我的國我的家，正門有人擋道，不得已我走後門溜回家，何罪之有？」

「胡說！」審訊者一聲斷喝打斷了我：「你是老反革命分子，你反動透頂，你猖狂已極！你想顛覆國家政權，你是敵對勢力的急先鋒，你必須交代問題！我們對你太客氣了，別以為我們沒辦法對付你，不管你反審訊的經驗多麼豐富，終究你是在我們手裏，我們一兩個人對付不了你，十個人二十個人還不行嗎？你想想清楚！與強大的戰無不勝的無產階級專政對抗，你是雞蛋碰石頭，你只有死路一條！」

他們這麼迅速地變臉，嚇了我一跳。

沉默了幾分鐘之後，另一個審訊者說話了：「何必這樣僵呢？咱們各為其主，彼此都不要為難對方，就那麼兩個簡單的問題，說了不就完了嗎。你回到賓館繼續休息，或回家鄉看望家人，我們也可以結束工作。哪天說不定街頭碰面，還能打個招呼，何必非要搞得你死我活，形同水火。」

「你的同黨王炳章上次來大陸旅行，被我們抓住了，開頭也是什麼都不肯說，後來還不是什麼都說了，我們也就送他回美國了。現在不是好好的嗎？你何苦要折磨自己？給人方便自己方便，皆大歡喜多好！」

我沒有回答，我知道他們在誑我，在引誘我。王炳章回去後親口說過他的審訊經歷，英勇無畏，我當然相信王炳章的話。看我沉默，他們就敲桌子：「喂！喂！說話！何去何從！機會有限！早早決斷！」

我依然沉默。又過了很久，一個審訊者出去了，我估計去請示領導去了，果然，他很快返回，而且帶來四個新的審訊者。我意識到：第二個回合開始了。先問姓名、年齡、籍貫，老一套的明知故問，目的是為了形成問答慣性。然後就旁敲側擊，東拉西扯；然後突然話鋒一轉，直奔主題；碰壁了就再東拉西扯，逐漸接近問題。

他們並不作記錄，令我納悶，我想肯定有錄音，比筆記更好。最後是他們不耐煩了，大發雷霆，威脅利誘，反反覆覆。我決心挺住。他們死纏硬磨，我也死纏硬磨；他們和顏悅色，我也乘機爭取他們；他們咆哮密室，搗桌子踢板凳，我就以沉默對應。

第三個回合開始了；第四個回合開始了；後來我注意了一下，他們很有規律，差不多每四個小時換一組，每組三到六個人。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有時也換著唱，有時還有一個專門諷刺挖苦我的，有一個始終不吭一聲負責記錄的。

二十四個小時之後，我感到挺不住了，暈得要死。但他們絕不讓我睡覺，只要我一閉眼，就會有人走過來踢我的板凳，或把桌子搗得山響，有時還端著電風扇對準我吹。

以前我也多次熬夜，沒覺得怎麼樣，現在不知怎麼搞的，難受極了，五臟六腑都在疼，簡直無法忍受又毫無辦法，但是為了保護朋友和同志不受無辜傷害，我又不能胡扯。還有，最重要的是，一旦我開了口，絕不僅僅是這兩個問題了，至少還有幾十個幾百個問題等著我。

而且，「回國究竟要幹什麼」這個問題就無法說清楚，就

會沒完沒了，必須從一開頭就死死頂住。從一九八六年起我就明白：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

他們又吼又叫，我漸漸產生幻覺，這是在哪裏？他們是什麼人？想幹什麼？然後我又猛地一醒：這是密審室！他們在審訊我！只要我回答問題，一切就可以結束，我就可以去睡覺了。唉，在美國好好的，回來幹什麼？到這裏來受罪嗎？荒唐！

他們又換人了，又是問：「年齡多大？」「籍貫哪裏？」「來廣州幹什麼？」「不幹什麼，路過這裏。」「要到哪裏？」「要回家。」「回家幹什麼？」「我女兒沒有戶口，沒有護照，我想帶她去美國。」「胡說！」一聲大吼使我一驚！繼續問……繼續問……沒完沒了……沒完沒了……我的肚子突然又一陣劇痛，我實在受不了了，從椅子上滑了下去。

幾個人圍過來：「怎麼回事？」「怎麼回事？」「站起來！」「站起來！」「別裝蒜！」「裝蒜沒用！」發動群眾鬥地主，文化大革命，批鬥大會，幾個鬥一個，人海戰，車輪戰，又來了，始終都這樣。

他們把我拎起來，放在椅子上，才發現我滿頭虛汗，面色如紙。「這小子這麼虛」，「別讓他死在這裏」，「量量脈搏」，幾個人七手八腳地摸我。我慢慢地緩過勁來看著他們，但是頭腦已混沌不清。

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又換了一組審訊者，還是那些問題，還是那些手段，我只有苦苦熬下去。他們也難熬，畢竟要幹四個小才能換班，他們像熱鍋上的螞蟻，在我身旁晃來晃去，威懾我、刺激我，逼我屈服、逼我投降。

儘管我以前遭到過超過一百次的審訊，可謂閱歷豐富，久經沙場，但那以前的大部分審訊是在安徽蚌埠，隔兩天才來審訊一次，每次也只有兩三個小時。而且蚌埠看守所和收容審查站的審訊室是用鐵窗隔開的兩個小房間，審訊者只能以語言威脅我，除非得到所方允許從後面繞進來。而且始終都是那幾個審訊員，我完全可以很放鬆。

只有一九九四年五月在北京通縣看守所的一次審訊比較可怕，四個人們圍住我又抓又打，逼迫我回答問題；還有一次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在廈門邊防派出所，連續審訊了我十二個小時，那是一次恐怖的記憶。現在已經超過四十個小時了，而且不知何時才是盡頭，我感到自己越來越撐不住了。

而且他們還是那一套威脅恐嚇，沒完沒了，老是叫你心跳。又死撐了幾個小時，我感到五內欲裂，身體快要爆炸了，在一次他們的大吼聲中，我突然也站起來猛拍桌子，又吼又叫：「大不了一死！大不了一拚！你們這是野蠻審訊！大不了把我折磨瘋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們驚呆了：「這傢伙瘋了」，「肯定瘋了」，「幾十年沒見過一個受審者敢這樣對我們大喊大叫」，「也不怕激怒我們打死他。」

可能他們覺得極限已到，逼急了，狗都會跳牆。他們終於結束了第一次審訊，我看了看牆上的鐘，時間已過去四十八個小時！至少二十個人輪番惡鬥我！

車輪戰！車輪戰！多麼可怕的夢魘！多麼難熬的夢魘！

二十天以後，他們又對我發動了一次車輪戰，又用老一套方式把我折磨得半死不活，但是依然一無所獲。最後，那個主審

官，一個快退休的老處長，對我說：「北京的幾位副部長對你的案子都很關注，一再要我轉告你，只要你把這次潛進來的目的、行動計劃給我們說清楚，我們立刻就會釋放你，你想到哪裏去我們就送你到那裏去。」

「但是迄今為止你一直執迷不悟，頑抗到底，對於你那些民運同黨，尤其是正義黨的陰謀策劃武裝暴動的問題，我們急於想知道的，你一點點也不肯說。現在，我們將會讓你細細地品嚐你自己釀的苦酒。什麼時候嚐夠了，通知我們一聲，我們馬上就來。」

一個月後我接到勞教通知書，罪名是非法入境，予以行政處罰。後來的三年裏，那些審訊員從沒有放過我，每過一段時間，每當我在勞教隊挨一次毒打，便會去找我，問我有沒有想通，現在交代還來得及，這裏的日子太難熬了是不是？想不想離開這裏，回美國生活？最後還是那些審訊員，在三年後把我接出勞教隊，押送上到合肥的飛機。

他們問我要了一千元買飛機票，等我上了飛機，鄰座的人告訴我，他只花了五百元買這班飛機票。最讓我傷心的是，幾乎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財產，一台我在香港花了一萬二千多元買的手提電腦，被他們扣押了三年，徹底壞掉了。之前我多次要求他們，把這台電腦給我父母帶回家，因為勞教人員管理規定上有這一條。但是他們卻堅持違法違規，毫無理由地拒絕了我。



第八章 地獄深處

悲愴的靈魂

讓我的眼淚化成墨水，
一滴一滴地滴成詩行，
寫出我的悲哀和憂傷。

讓我的汗水化成墨水，
寫出我的千年夢想，
寫出我的深情希望。

讓我的鮮血化成墨水，
寫出我靈魂的悲愴。

在所有的歌聲都疲憊之時，
這一支歌依然激昂。
讓我的生命化成墨水再化成火炬吧！

在漆黑的夜空下，
當所有的星辰都睏倦之時，
閃出熱烈的光芒！

——〈祈禱〉二〇〇三年九月

74 · 黃華看守所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四點半鐘，我被押入黃花看守所

所，這是公安部直屬監獄，有兩個武警持槍值守大門。檢查登記物品的時候，看守只登記了我的物品的一小部分，我表示抗議，但他拒絕補充。我當時已被車輪戰審訊了四十八小時，頭腦昏沉，只想趕快睡覺，所以我的大部分物品就這樣稀里糊塗地被劫掠了。

我先被關在319倉，這裏強迫我做塑膠花。我寫了一封抗議書，指出看守所強迫我們做出口產品既違反了司法部的規定又違反了國際法，我宣布以絕食抗議強迫勞動。第三天他們就把我調到專門關押外國人的322倉。因幫助王希哲偷渡而被判刑三年的范一平，曾在322倉被關押很長時間，有兩個被關押了兩三年的經濟犯都見過他。322倉本來有一個新加坡毒販，我去之後幾天給調走了，因為他可以會見親屬，看守所恐怕擔心他幫我傳遞消息。其餘幾個人都是廣州人，送了錢給所裏幹部的關係戶，很少幹活。所以這是名義上的外籍倉，實際上的腐敗倉。

三樓一般關押要犯，監倉都很小，通鋪只有四個平方米大，聽說陳濟棠初建這所監獄的時候，這種小倉只關押一個人，現在一般關押五到六個人，十分擁擠。另外還有一個同樣大的放風間，但一到晚上就關閉。為了爭奪一厘米的睡覺空間，我們幾個人要長年累月的進行階級鬥爭，最後彼此全是不共戴天的敵人，這正是共產黨管理中國人的典型方式。

後來我們倉修整，被臨時調到一排大一點的監倉，我才知道，僅僅三樓就有許多備用的空艙，平時寧可空著，也要讓我們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表面的理由是為了降低自殺率，方便幹部管理，其實卻是為了殘酷折磨我們，逼得一些人為了早日脫離

苦海而送錢給他們。倉裏還有一個規矩很惱人，就是輪流值夜制度，每人夜裏要值班一個半小時，防止有人逃跑或自殺。

廣東的冬天也是很冷的，但是我沒有被子，沒有褥子，只有一套夏裝。我反覆要求被褥和衣服，根本沒人理我。看守所只管關人，卻不管人的死活，竟然規定這些東西要家人送來，但他們卻又不通知我的家人。其實我母親得知我們在廣州失蹤的消息後，很快就趕到了廣州，但是廣州公安局堅決否認關押了我，堅決隱瞞我的任何消息。

我幾乎被凍死，兩隻腳一個多星期都是冰涼的，沒有知覺的。直到兩個星期之後，我才高價買到一床被子、一床毯子，和一件棉衣、一雙襪子。

魏泉寶後來也轉送給我一件毛衣，原來我的衣服都放在了魏泉寶的箱子裏，被捕那天我們一大早就分開了。我被捕之後十分擔心他也被捕，就把與他同行的火車票揪機會塞進了一個雜亂的辦公桌抽屜，並且決心掩護他到底。奇怪的是他們不太關心魏泉寶的事，我估計他也被捕了。後來我在照相時碰見過魏泉寶一次，他鬍子拉碴、滿臉滄桑，告訴我他也被勞教三年。

勞動教養決定書下來以後，他們把我調到321倉，竟然強迫我和一個廣西人睡在零點四米寬，一點四米長，三面是牆壁的夾道裏。兩個人躺下來動都不能動，腿只能蜷著，互相壓著，難受得要死，根本無法入睡。到了後半夜，我終於忍無可忍，跳起來猛踢鐵門。

深夜激烈的響聲招來了大差和值班看守，他們要我坐在一邊等天明再解決這個問題。難友們也都被驚醒，紛紛勸我別傻，說

這樣鬧會挨打。他們還說很多號子比這裏擠得多，一樓二樓的號子裏經常是六、七個人睡在馬池（廁所）裏，那馬池只有零點五米長，零點五米寬，七個人整夜只能像一堆貨物站坐在那裏。但是我決意絕食抗議，三天以後，他們又把我調回外籍倉。

我在看守所被關押五個月之後，渴望與外界取得聯繫，這在看守所是不可能的，我就絕食要求他們把我送到勞教隊。三天後他們把我送到了廣州市第一勞教所。

75 · 聖誕燈

耶誕節又快到了，全世界二十億基督徒又要歡度他們一年中最隆重的節日了。聖誕樹是必不可少的，而現在，幾乎所有的聖誕樹都會繞上一圈圈聖誕燈。象徵生命的聖誕樹加上五彩顏色的聖誕燈，象徵著生命的美好，生活的多姿多彩。尤其是孩子們，常常會帶著喜悅和敬畏的表情圍著聖誕樹，久久地觀賞，不肯離去。

然而我一看到聖誕燈，就會回憶起苦難的歲月，看守所度日如年的生活，每天苦著臉裝配聖誕燈，完不成任務還要挨打。

我們用手指把燈泡後面的兩根金屬絲掰開按在兩邊，再套上螺紋圈，擰到燈頭上，再串上導線，一串聖誕燈就做好了。在機器生產與成品之間，必須有手工裝配這一關。一個人最多每天裝配三千隻小燈泡，據說看守所可得三元加工費，這麼廉價的加工費，全世界只有在中國才可能找到人幹。

一般的中國工廠也不可能幹這些活，加工費太低了。即使企業領導也像看守所那樣另外還拿百分之百的回扣，但是無法找到

工人，即使抓來奴隸幹都不行，因為總要給奴隸飯吃。只有無須任何成本，吃皇糧、幹私活的看守所多花點力氣打人，才可以幹這樣的加工活。

掰金屬絲最麻煩，經常扎進手指。我們拇指、食指、中指輪流用，最後都會傷痕累累，一觸即疼。但不幹更可怕，一個東北人幾乎被活活打死。

沒有道德和法律約束的市場是殘酷的，所以全世界的加工活都往中國轉移，最廉價最簡易最危險的加工活則轉移到看守所、勞教隊、勞改隊。尤其是在廣東，所有被關押的人都得幹加工活，每天幹16個小時，星期天從來沒有休息過。

按中國法律，看守所是關押未定罪的嫌疑人的地方，不應當勞改的，但是照樣勞改，沒有一家看守所例外。民政局收容機構更與勞改無關，但是你如果拿不出贖金，照樣要幹活。反正只要你失去了自由，專政機關絕不會讓你閒著，一定要榨乾你的血汗。

中共政府表面上是反對地方當局這樣違法亂幹的，但是在利益的驅使下地方當局照幹不誤，因為各級領導都可以分一杯羹。只有在高級領導來看看守所視察的時候才會停一下，或者因為抓革命促生產打死了不應該打死的人，在中央領導批示，有關部門調查的情況下不得不停幾天避避風頭，風頭一過照幹不誤，還要加班加點把損失補回來。

耶誕節又快到了，聖誕燈非常美麗，但是我想提醒基督徒們：這些聖誕燈幾乎百分之百是在中國廣東的勞教所裝配生產的。其中一些人從沒做過一點壞事，還有一些人是中國社會新三

類分子：民運人士、基督教士、法輪功弟子。

76 · 我是皇帝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二日我被六個壞人押送到第一勞教所六大隊，我背後是一名端著半自動步槍的武警。我想可能在他們眼裏我太可怕了，儘管我只是一介書生，已經被囚磨了五個月，當時還正在發著高燒，咳嗽哮喘，走路都搖搖晃晃。

穿過兩道大鐵門之後，他們讓我蹲在籃球場上等候發落，南方的太陽已經很毒，曬得我頭昏眼花。過了很久才有人領我去剃個光頭，然後回到操場上繼續曬太陽。最終他們把我發落到二中隊，一間陰暗潮濕的地下工廠，儘管此前我在許多地方被關押過，但走進那間地下工廠還是令我心驚肉跳。

那是怎樣的一幅地獄慘狀啊！百十個面目猙獰、衣衫襤褸的光頭煞氣騰騰的，在昏暗的燈光下一齊抬頭看我。地下車間骯髒不堪，到處都是污穢的雜物，像一個垃圾處理廠。一想到要在這個地方煎熬三年，我真的想死，但又不甘心。

地下工廠裏做塑膠花，就是用鐵線，衝壓成型的塑膠花片和膠水做成假花，膠水有毒，剛開始聞噁心。直到晚上他們才叫我去操場收拾我的行李，我的兩床棉被、一床毛毯、一條毛巾被，還有指甲剪、剃鬚刀都沒了。在勞教隊，我們的財物被偷被搶都是正常的，不屬於犯罪行為，他們讓我重新買一條被子。

夜裏十一點半我們才得收工去寢室睡覺，我又暈又累又渴，衣服也沒脫就趴在鋪上睡了。蚊子開始攻擊我，繞著我裸露的臉、手、腳嗡嗡叫地飛，拚命地咬，我打死一些又上來一些，簡

直就像戰場上的解放軍一樣不知死活。

我被咬得急了，就用被子蒙住頭腳，但是一會兒就憋得渾身是汗，悶得不行。一掀開被子解放軍就從四面八方衝過來咬我，加上發燒咳嗽，那一夜我根本沒睡，其痛苦情形到今日我仍記憶猶新。

第二天早上五點多鐘集體起床，集合、點名、洗漱、疊被子、喝稀飯、開工，我都是量量乎乎的。八點鐘，分隊長到車間上班，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沒有人敢說話，沒有人敢抬頭。分隊長往安樂椅上一坐，兩名組長便侍立兩旁，匯報情況。

然後組長念名單，被喊的人就去蹲在走廊上，像一串蛤蟆，總共約四十隻。然後挨個蹲行到分隊長座下，四肢著地趴下，分隊長舉起大棒毆打，根據昨日完成產量情況打五棍或十棍。

八點半左右分隊長就打完了四十隻蛤蟆，然後單獨叫我過去。這種陣勢雖然令人發懵，但我還是盡力保持平靜，儘管做人的尊嚴在這裏早已蕩然無存了。我蹲在分隊長面前抬頭平視他，發現他正用瘦臉上兩隻野獸般兇殘的小眼瞪視我。

「我是皇帝！」「我是這裏的皇帝！」他充滿威脅地向我宣告。

「我可以讓你生，也可以讓你死。甚至讓你連死都不如。聽說你是三進宮、三朝元老，老反革命、老油子了，規矩你都懂。但是別想在我這裏混三年。老子從部隊退伍回家，連份工作都找不到，花了十萬塊錢買了這份工作，年年月月還要上供。不打人根本掙不到錢，打一棍也只能掙幾毛錢。你是政治犯，我不想打你，但你也別逼我打你。去！幹活去！」

我回到工作台上，腦中回味著他的話。他只是一個帶工幹事，在盤坐在人民頭上共產黨二十六個幹部階級裏屬於最低的階級，尚且以皇帝自居，其他階級更高的皇帝豈不更可怕？中國有七千萬共產黨員，國家幹部也有三千萬。這個帶工幹事可能既不是黨員也不是正式幹部，僅僅是以工代幹的合同工便如此囂張，中國老百姓的日子可怎麼過？

我粗粗算了一下，這樣的皇帝在中國起碼有五千萬，五千萬個皇帝！比人類有史以來歷朝歷代的皇帝加起來還要多！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也只封了二萬七千個王，看來共產黨要比太平天國瘋狂十倍百倍千倍！

這些皇帝不僅惡毒，還異常狡猾。可能我領旨不當，違背聖意，不久就嘗到了厲害。

由於患病得不到治療，以及抗議派給我無法完成的勞動任務，抗議每天長達十六個小時的勞動時間，我給他們寫了一份絕食聲明，開始絕食。他們並不理我，而是強迫我繼續幹活，同時醞釀打擊我。在這些野獸看來，絕食就是反抗，絕食就是反叛，必須堅決打擊。他們早已喪失了所有人性，絕對沒有任何憐憫之心，而只有貪婪的物慾和瘋狂的獸慾。

我病弱不堪，絕食兩天後，在地下工廠門口，組長李傑突然對我揮拳就打。我正欲反抗，瞬間便有十來個人從工廠裏衝上台階，圍住我狂風暴雨似地拳打腳踢，一直把我打下台階，打倒在地。打到我不能動了還補上幾腳，然後像拖死狗一樣把我拖到一個角落。我醒過來發現我躺在一堆垃圾上，周身疼痛，尤其胸背。

我在垃圾堆上躺了幾個小時之後分隊長上班了，他命組長叫我去幹活，我拒絕了。他們把我拖到工作台前坐下，揪著我的頭髮讓我坐直幹活，他們一鬆開我又臥倒在工作台上，這樣反反覆覆好幾回。

他們又過來說要讓我清醒清醒。李傑和另一個組長葉小強把我拖進廁所，把我的頭按進洗廁所掃把的大水桶裏，我拚命反抗，他倆死死按住，我噙了好幾口水，他們才把我的頭從水裏提出。他們問我幹不幹活，我憤怒已極，拒絕回答，他們又把我按進水裏。如此反覆五、六次。最後他們累了才結束這場遊戲，把我拖回車間，扒光我的上衣，把我扔到垃圾堆上。

我在垃圾堆上一直躺到晚上集合點名，我沒有動，四個人便衝過來猛踢我，其中一腳踢得特別兇，我幾乎疼暈過去。然後他們便把我拖上台階，沿著地面像拖死狗一樣拖到操場上。

廣州勞教隊是我被關押過的十幾個地方中最殘酷的。沒有任何別的辦法，我繼續絕食抗議，他們也繼續毒打凌辱我。絕食六天以後，幾個組長和勞改積極分子把我拖到一個角落，按住我，他們先用一根鐵棒往我嘴裏塞，然後再把一個堅硬的漏斗塞進我嘴裏灌米湯。這是我經歷過的最野蠻的灌食辦法，但是面對這些人渣，我沒有任何辦法。如果堅拒，他們會把我的牙搗掉！

這僅僅是我在廣州第一勞教所勞動改造的序幕，那位第二十六階級共產黨皇帝給我上的第一堂無產階級專政課。後來我永遠記住了這個罪惡的名字：劉華晃！

廣東人背地裏稱這位皇帝「麻螻」，翻譯成普通話就是猴子。後來我仔細觀察了他的長相，的確像一隻猴子，他的行為

更像猴子。我曾經和許多人討論過這隻猴子的生活習性，它每天只工作一個小時，也就是上午八點到九點，喊一批完不成任務的人過來棒打一遍。猴子每天給大家下達的任務是任何人都完不成的，挨打最重的是那些沒有送禮給他或者也沒有別的利益關係的人。

打完人之後一天的工作也就結束了，麻體就躺在龍椅上睡覺，因為每天夜裏要找小姐玩或者成夜賭博。睡醒之後麻體就品嚐勒索來的點心、水果、可樂，或者和其他皇帝聊天。麻體每天還要叫一個勞教學員給他做足部按摩，在百十名緊張勞動汗流浹背的勞教學員面前，麻體伸出他的臭腳讓人撫弄捏摸，滿足後便鼾聲大作，睡醒之後就去吃一頓豐盛的免費午餐，然後再去隊長值班室賭錢。

麻體總是使我想起人類的起源問題。《聖經》說人類是上帝造的，起源於神。馬克思則一口咬定人類是從猴子演變來的。我認為都有道理，人類的起源並不是只有一個源頭。基督教徒的確起源於神，而共產黨人的確是猴子演變過來的。眼前這隻猴子和他的五千萬個同類可以作證，否則很難解釋它們的殘暴貪婪，肆無忌憚，沒有人性。

五千萬隻猴子，五千萬個中國皇帝，還要統治苦難的中國人民多久？

77·蹲下！

在廣東，無論民政局收容站，還是公安局看守所，還是司法局勞教隊，你被抓進去的第一條規矩就是蹲下。第一次被抓進去

的人會不知所措，尤其北方人聽不懂廣東話：「貓倒！貓倒！」那你立刻就會挨打，一直打到你聽懂這個詞，並且一見到共產黨幹部就自動蹲下為止。

像一隻蛤蟆一樣蹲在那些迫害你的人面前，蹲在那些毆打和虐待你的人面前，蹲在那些十惡不赦，死有餘辜的罪犯面前，蹲在那些人類渣滓面前。

首先就要讓你感到羞辱難當，無地自容，然後再慢慢折磨你。蹲下和跪下差不多，時間久了甚至比跪下還難受，你簡直無法再站起來，使勁站起來會雙腿酸痛麻木，無法走路，有點貧血的人站起來會暈倒。蹲下比跪下使人感覺更矮，更低人一等。

在勞教隊，每天早中晚夜都要大隊集合點名，立正！向左看齊！蹲下！隨著這充滿威脅的口令，數百人瞬間就變成了數百隻蛤蟆，齊刷刷地蹲在操場上，任由隊長斥罵侮辱。

按照勞教隊的規矩，任何勞教人員在任何情況下見到隊長都必須先蹲下，然後舉起右手喊報告，經過隊長允許，才可以說話。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任何人都不能不從，否則會一直打你，打到你屈從，或死掉。

我從沒看見過任何一個膽敢拒絕蹲下的被關押人員還能活著走出大門，倒是親眼見過一個一條腿有殘疾，根本無法蹲下的勞教人員被猴子隊長下令兩個組長修理得渾身是傷，一條僵硬的腿幾乎被折斷。後來便令他專門練習用一條腿蹲下，另一條腿甩在前面。皇威之能，令猴子皇帝狂笑不已。

僅僅像蛤蟆一樣蹲下是不夠的，還必須「蹲好！」什麼樣子才算蹲好，只有打你的人才知道！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廢除了跪禮，但是廣東的共產黨人卻發明了迫使人像蛤蟆一樣蹲下這種侮辱人格的新規矩，而且幾十年一貫如此，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共產主義制度的專制本質。

78·赤泥勞教隊的蠻荒生活

赤泥鎮有三個勞教所，分別是廣州市第一、第二、第三勞教所。我所在的第一勞教所共有九個大隊，九大隊在碼頭，我沒有去過。另外八個大隊集中在一個以前是監獄的大院裏，監押設施完備，與世隔絕，幾乎沒有機會逃跑。五大隊在我們隔壁，每天早上七點我們開工的時候，他們早已在幹活，而當我們晚上十一點收工的時候，他們還在幹活。據說這個大隊和一大隊、三大隊是最邪惡的三個大隊，每天勞動十八個小時，厲害的時候，每天要勞動二十個小時。

聽說我們六大隊在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四年最殘酷的時候，每天也曾勞動二十二小時，只有兩個小時休息。後來發現大家都像長征時期的紅軍一樣病倒了，怎麼打都不行，打死了很多還是不行，後來才在上級的干預下，減少了強迫勞動時間。而那個時候，一、三、五大隊乾脆就二十四小時在工廠裏幹活，偶爾才允許你打一下瞌睡，要這樣連續幹上一個月才可以回宿舍睡一覺。

想起來都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卻是真實的。經歷過那種折磨的大部分人當時都是二十歲左右，還活著，還要活幾十年。而且他們的姓名住址、籍貫和親人的檔案都還在，任何人如果不相信都可以親自找到那些人去調查。

有段時間我天天要去醫院打針，在等候打針的時候我可以乘

機問他們一些情況，醫院的隔壁就是三大隊，我們還可以從窗戶裏親眼目睹毆打與虐待的全景。

隊長舒服地坐在安樂椅上，手裏拿著大棍暴打膝下蹲著的一個勞教人員，那隻蛤蟆不禁毒打，倒在地上。站在一旁的組長便會用腳提醒他：「蹲好！」而且那個組長的腳法也特別，是先跳起來把左腳踢高，然後再用腳後跟下擊。據說三大隊都是這種腳法，還是一個革命老前輩開創的，後來便形成了光榮的革命傳統。

我們南面隔壁的是二大隊，專押法輪功學員，那個隊也很殘酷。就在二〇〇一年五月份，他們還在一個中午，把一個姓馬的西北回民連續毒打了幾個小時，最後活活打死。幾個勞教打手僅僅被延期幾個月，而指揮和參與毆打的隊長們僅僅被調換了工作崗位。但是張所長一幫所領導卻借此案敲詐了這批打手們不少錢，據說最少有二十萬。

張所長是河南人，中國河南壞人之多之惡，大概僅次於廣東。張所長的老婆弟弟一家子有七八個人都在這個勞教所裏工作，幾乎成了家天下，特別黑暗。

他幾乎每天都到各大隊視察，但從來沒有問過一個勞教人員，吃飽了沒有？熱不熱？冷不冷？隊長打得狠不狠？勞動時間是不是太長？睡眠時間是不是太少？他只是問隊長，今天幹了多少活？質量怎麼樣？能掙多少錢？還要抓緊啊！

他是主管監控我的頭目，但是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每次照面，我們都是冷冷的對視。這是一個狡猾的老狐狸，和老臭蟲一樣殘忍嗜血的野獸，這個勞教所裏勞教人員所受的苦難，與

這個人的殘忍邪惡是無法分開的。

人類結束在荒野裏進食的歷史雖然難以準確考證，但至少可以大致估計，五十萬年前大概從穴居時代起，除非遠離家鄉作戰的軍隊，或者萬里跋涉的商隊，很少會有一大群人成年累月在露天進食，即使牛馬，累了一天，也會讓它在棚子裏從從容容地進食。

然而我們，廣州市勞教局十幾個勞教所的幾萬個勞教人員，卻成年累月在露天進食，不管夏季正午的太陽有多毒，不管冬天的寒流來的時候有多冷，不管天色陰沉即將下雨或者已經下雨，我們都必須像蛤蟆一樣蹲成十幾圈，吃那些豬都不肯吃的飯菜。

我們從來沒有食堂，沒有餐廳，萬一你看到一塊牌子寫著餐廳字樣，那一定是假的，偶爾給來參觀的人看的。裏面一定堆放了大量的生產工具，參觀者一走，馬上開工。我在廣州勞教隊三年，從來沒在任何一間食堂吃過飯。

廣東的夏天是很熱的，一蹲下來我們就會流汗，但你不能動，要蹲在那裏，等輪流值日的難友排隊去伙房提飯菜來，給大家分在每一個盆子裏，然後輪流去拿，才可以吃。如果你太餓，匆匆吃完了，也還要繼續曬太陽，直到最後一個人吃完，然後大家排成隊離開。

當然你也不能最後一個吃完，因為幾十雙冒火的眼睛正在盯著你，你只能立刻放下碗，吃了多少就算多少。所以那裏吃飯，就像一群豬搶食一樣，個個狼吞虎嚥，最後都把腸胃搞壞。看著我們滿頭大汗在毒日下熬煉，隊長得意洋洋地坐在樹蔭下的安樂椅上，體會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

有時打雷下雨，會有奴僕站在旁邊給隊長打傘避雨。幾百個勞教人員只有被雨淋，誰也不敢動。只有下大雨暴雨時，才會允許大家到寢室吃飯。

我們不如牛馬，牛馬可以在棚子裏進食；我們不如乞丐，乞丐可以在樹蔭下進食；我們只是抓來的奴隸，要盡一切可能榨乾血汗，只要給些豬食就行了，水都可以節省。

這從另一個角度證明，我們不僅退回到了三千年前的奴隸社會，我們也已經退回到了五十萬年前的蠻荒時代。我們不如北京猿人，他們至少可以在樹蔭下進食。在這個世界上，也只有共產主義制度會出現這樣普遍的邪惡現象，而且五十年不變。

僅僅廣東省，就有數十萬勞教人員，也許還有更多的勞改隊員，每天都是這樣在露天進食，過蠻荒生活。從來沒有一位共產黨中央領導想一想，這些人難道不是爹娘生的？就該這樣被虐待？法律允許這樣虐待人嗎？這些被非法野蠻踐踏的人永遠沒有機會報復嗎？

79 · 老臭蟲

臭蟲是南方特有的一種毒蟲，以吸血為生，是名符其實的吸血鬼。

臭蟲行動敏捷，善於窺測時機，出你不意，攻你不備，吸血之後，迅速撤退。當你感到疼時，它早已不見蹤影。臭蟲善於隱藏，床板、席縫、被褥、牆縫都是它的藏身之所，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裏，它都埋伏在隱蔽所裏，伺機出擊。它知道自己是人類的天敵，絕不能暴露自己，必須永遠隱藏自己。

原來我以為，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和生存哲學主要來源於毒蛇和老鼠，後來我飽受臭蟲毒害，才想到毛是南方人，肯定從小就跟臭蟲為伍，悟到了不少生存絕技。所以才能斂心忍性，鑽山越嶺，長途跋涉，最後一舉占領北京。尤其到了晚年，更是神出鬼沒，摧殘九州，比他的前輩洪秀全更見功力！

真是越怕鬼越被鬼纏身，我被關押的勞教隊就在洪秀全的出生地：廣東花縣赤泥鎮。那裏的臭蟲是天下最毒的，連那裏的泥土都是赤色的。

我在下面要談的一隻老臭蟲，正是洪秀全毛澤東的一個忠實學生：梁永勝，廣州第一勞教所六大隊教導員。有一次他找我訓話：「任何人到我這裏都必須給我幹活，給我掙錢，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即使華國鋒、江澤民被拉到我這裏也得拚命幹活，我的棍子可不是吃素的。沒有任何道理可講，只有埋頭苦幹，才能活著出去。聽說你絕食抗改，想死是吧？那沒什麼！大不了我花三百元拉你去火葬場燒掉！」

「說這裏苦，七〇年我當兵之前這裏才真苦，我幾乎沒吃飽過飯，赤泥鎮上很多人都活活餓死了。聽說你們安徽是六〇年大饑荒，我們這裏是六九年大饑荒。現在至少不會餓死你，他媽的還有什麼好說的。說這裏的臭蟲厲害，咬得你無法睡覺，勞教隊不是賓館，你也不是我請來的客人！」

「勞教隊從來就是如此。是龍你得給我趴著，是虎你得給我臥著，我們勞教隊就是降龍伏虎的地方。你還不知道吧，全世界就數我們廣東人最壞，我們都是歷朝歷代殺人的、放火的、偷盜搶劫被判刑流放到這裏的囚徒的後代！而全廣東就數我們花都赤

泥的人最壞！你給我小心點！你給我老實點！我的工作就是罵人打人，對你算是最客氣的。去！幹活去！」

我經常看到老臭蟲大打出手，即使對病人也不放過。軍訓的時候，有幾個人病得走路都困難，老是向左轉向左轉就會轉到在地上爬不起來。老臭蟲大怒，走過去對著病人的臉猛踢，踢的幾個病人滿臉青腫都不過癮，又下令把他們拖去曬太陽。

全大隊沒有不害怕老臭蟲的，連隊長們也不例外，老臭蟲所到之處沒有人敢喘大氣，地上掉根針都清晰可聽見。老臭蟲在大隊的威望幾乎和文革時的毛主席一樣高，隨便放個屁都是絕對真理，絕沒有人敢說臭！老臭蟲還有一雙蛇一樣惡毒的眼睛，當他盯住你時你會喘不過氣來，彷彿瞬息之間他會吞掉你。他那張嘴也很恐怖，彷彿經常吃死人肉。

老臭蟲貪婪無比，大隊幹的每一批加工活，廠家提供的與帳面上加工費一樣，多的回扣全歸老臭蟲霸占，大隊裏二十多個值班員組長伙房廚工的職位都要花三千至五千元來買，這些錢也統統歸老臭蟲獨占。

在勞教隊幾十年如一日始終沒有停止過的階級鬥爭中，老臭蟲始終占上風，從沒落敗，每個時期他都要找到一個鬥爭目標。就像歷史上毛澤東鬥張國燾、鬥王明、鬥劉少奇、鬥林彪那樣，一直鬥到對方失敗、死掉還不罷休，還要讓對方遺臭萬年。

每過一段時間，老臭蟲便會發動一場群眾運動，大生產運動、大檢查運動、大躍進運動，三反（反消極、反對抗、反逃跑）運動，五反（反吸毒、反喝酒、反洩密、反讀書、反寫字）運動，讓所有人成年累月都提心吊膽，生怕鬥到自己身上。文

化大革命早已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定性為人類千年浩劫，在社會上基本停止了（鬥法輪功例外），但在勞教隊從沒停止，而且愈演愈烈，千千萬萬個毛澤東餘孽鬥志旺盛，不達邪惡目的絕不罷休。

老臭蟲的專橫跋扈吃獨食引起了張所長的猜忌，專門在大隊院裏釘了一個所長信箱，每天上午八點鐘派兩名執勤所幹來取檢舉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老臭蟲在大會小會上不斷重申紀律的重要性，保守大隊秘密的必須性，一切都是絕對機密，洩密者將以現行反革命間諜罪被活活打死。

老臭蟲堅信：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為了以防萬一，老臭蟲還密令宣傳鼓動員每天早上執勤所幹到來之前用特製專業鐵鉤從所長信箱底縫裏勾出檢舉信，換成表揚信。其生性狡詐多端，於此可見一斑。

解教回家後有很多次，我從夢中突然驚醒，彷彿老臭蟲又來了，彎著腰拎著黑棍，拎著小米加步槍，睜著血紅的眼睛，咧著恐怖的嘴，喊著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類鬥一直鬥到天昏地暗人類滅絕還不罷休的革命口號。

毛澤東的忠實學生們遍布全中國各監所，耀武揚威，雄風正熾，戰無不勝！

80·飛毛腿

飛毛腿名叫易明，顧名思義，擅長用腳踢人，一看就知愣呼呼的。上初一時就因成績太差而棄學，家人無奈，讓他跟人學做生意。學了幾年也學不會，眼看二十多歲了，卻什麼也不會。當

搬運工個子又太矮，又沒力氣，簡直什麼用也沒有。後來家人咬咬牙花錢把他弄到司法幹校混了兩年，買到一張畢業證書，又花錢買了一份勞教隊的工作。

這樣一個廢物，到了勞教隊，有了皇帝般的感覺，久而久之便認為自己很能幹了、很了不得了。有一次點名時他看到黃鑄便喊黃瘦，喊了三聲才有人猶猶豫豫的答到，易明感覺龍顏被冒犯，勃然大怒，把這人痛打了一頓。黃鑄被打倒在地，怎麼也不明白自己錯在哪裏？明明是這些隊長不識字亂喊，結果卻是他挨打。

飛毛腿看到，在勞教隊打人越兇混得越好，所以就拚命打人。就像在解放初期，鬥有錢人鬥得越狠，殺得越多，提升得越快；就像在文化大革命，越聽毛主席的話，整革命同志整得越慘，向上爬得越快。

有段時間，飛毛腿像足球運動員一樣，把勞教人員當皮球踢，踢得瘋了，一不小心踢死了一個人。在勞教隊，如果你的後台硬，打死一個人就像打死一隻蒼蠅。但是飛毛腿的後台沒那麼硬，一些對他飛揚跋扈早就看不順眼的領導趁機整他，把他從中隊管教幹事整成分隊帶工幹事。

飛毛腿並不吸取教訓，又開始練習用棍子打人。有段時間，大院裏的人都可以聽到木棍打擊肉體的撲撲聲，經過編織車間大門可以看到飛毛腿坐在安樂椅上雙手舉棍痛打趴在地上的人，旁邊還蹲著一行等待挨打的蛤蟆；有段時間，飛毛腿一個月就能打人用斷一筐幾十根棍子。

飛毛腿還喜歡動輒集合全分隊訓話，他的漢語水平大約只相

當於當年侵華的日本鬼子，甚至連一句完整的語句都說不好，經常沒有主語，聽他囉嗦半天都不知道他講的是誰，是什麼事，為什麼要講這些話？反正是一塌糊塗。

在勞教隊，這樣的廢物非常多。本來這些人雖然低能，總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有一份正常的生活。在正常的社會裏，他們本來也並不壞，也壞不起來。但是到了勞教隊，在封閉的專制制度培養和庇護下，在特權利益的驅使下，就變成了不折不扣的毒蛇猛獸。

這些隊長每時每刻都在吞噬文明和正義，踐踏法律和公理，他們既敗壞中國，也敗壞共產黨，完全像白蟻一樣。

民運人士從正面抨擊共產黨，卻並沒有傷害共產黨人，連被共產黨視為恐怖頭目的王炳章，一生都沒有傷過共產黨人的一根毫毛，卻被判無期徒刑。而類似飛毛腿這樣的成千上萬的白蟻，每天都在用尖利的牙齒啃咬共產黨骨頭，喝人民血吃人民肉，共產黨人卻視為同志，親密戰友。

正是思想桎梏、政治封閉、新聞封鎖，才培養造就了千千萬萬個麻饅皇帝、老臭蟲、飛毛腿這類的害蟲。他們如同陰暗潮濕封閉的建築物裏的細菌和蟑螂，拚命滋長，與時俱進，最後占據所有房間，直到大廈崩潰，把他們統統壓死。

81·小臭蟲

小臭蟲人名李映航，是廣州市第一勞教所六大隊司務長。剛到六大隊第二天中午，我和三百個人像蛤蟆一樣蹲在操場上被點名的時候，看到在三三兩兩吃完飯從專用雅座餐廳走回大隊部

的幹部中間，有一個很年幼的少年，看樣子不過十六、七歲。我當時想這樣少年就到這個地方鬼混，實在可惜。後來知道他是司務長，比一般隊長還要兇惡，我才意識到，中國是真正沒有前途了，一代比一代壞。

有段時間他經常到我們分隊值中午班，他總要在人群中轉一轉，找個人踢一頓開開心。而且最特別的是，他喜歡踢人的臉。

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他一腳就踢掉一個人的三顆門牙。社會上的流氓打架也沒這麼毒的，因為這在刑法上屬於嚴重的毀容傷害罪行。那個人的名字我實在想不起來了，但時間大約是二〇〇〇年秋。那個人很有骨氣，一有機會就告狀，但告來告去一點用也沒有，反而又挨了幾頓打，還被延長了勞教期。

後來我問了幾個人才明白，小臭蟲這麼兇惡是有原因的。司務長必須剋扣勞教的伙食錢，用來提供給幹部吃豐盛的飯菜，以及招待上級領導。另外還要給自己 and 主管領導提成，所以就必然成為全體勞教人員的公敵，如果不够兇狠，震不住人，經常被人告狀，那就很麻煩。相對而言，打人畢竟是小事，讓人害怕，能撈到錢才是更重要的。

大隊公布的帳目，每個勞教人員每月的伙食費是120元左右，實際上提供給我們的飯菜大約只值50元左右，最多不會超過60元，那麼另外60元呢？大隊一般有300個人，一年下來， $60 \times 300 \times 12 = 216,000$ 元。二十多萬元呢，哪去了？

小臭蟲雖小，卻深諳統治中國人之道，我估計他對共產主義學說研究得很透。有段時間我因抗拒改造被罰蹲在門口，我就索性坐在那裏打瞌睡。一次聽到小臭蟲在跟一個別的大隊的隊長聊

天，小臭蟲得意地聲稱：「我這個司務長是不容易幹的，你看隊裏的這些隊長，個個都是禽獸，或者兇狠，或者陰險，沒一個好東西。我年齡小，個子小，如果不像毒蛇一樣毒，還不是給他們欺負死。」

「你看老劉隊長快五十歲了，連飛毛腿那個楞種都敢欺負他，一點黑錢都撈不到，整天像個龜孫子。大家值夜班賭錢，誰都可以隨手掏出三、五千塊賭個痛快，他卻掏遍全身連二百塊都拿不出。贏了錢的請大家去玩小姐他都不敢去，說逮住了要罰五千塊，一兩個月的工資獎金分紅全沒了。真是怕死鬼，我們就是警察，誰還敢來抓我們？」

小臭蟲完全是按照黑社會惡棍的路子來混世的，而且混的很得意。他看得很透，下手也狠毒。他們這一代的小青年，在共產主義思想的哺育下，很小就學會了爾虞我詐、殘酷兇狠的鬥爭哲學。

比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臉更厚、心更黑、手更毒。目的也更單純：唯物！

82· 塑膠花與癮君子

那些塑膠花，遠看起來像真花一樣美麗，用它裝飾房間，不用澆水，不用護理，價格便宜，是現代生活的一道美景。然而那是中國囚徒的血淚製作，在棍打肉體的撲撲聲中完成。

一九九五年，後來流亡美國的民運人士陳破空曾被抓進廣東第一勞教所製作塑膠花，他託人輾轉把一枝塑膠花送到美國國會作證，結果一船價值六百萬美元的塑膠花被美國海關依法沒收

銷毀。中國司法部此後也發文件，禁止各監所再從事出口加工生產。

但是一九九九年我被押到同一大隊的時候，那裏還在生產供出口的塑膠花，我仔細看了好幾次商標，上面印的公司地址是在美國俄克拉何馬州，顯然是為美國公司訂做的。

第一勞教所位於廣州市花都區赤泥鎮，製作出口塑膠花是那裏的傳統支柱產業。利益驅動一切，中國司法部也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些花很難做，膠水又有毒，加工費又低，最後只有轉移到勞教隊生產，反正又不用給勞教人員發工資。

麻體皇帝負責管理塑膠花生產，他的辦法就是抓革命促生產，每天打人三百棍。棍子打斷了幾百根，產量質量都上去了。棍子還在撲撲地打，塑膠花還在源源不斷地運往美國。賺得大量美元回來，餵肥貪官酷吏，提高解放軍戰鬥力，支援朝鮮古巴革命，讓金正日卡斯楚這類惡魔盡可能久地奴役人民。這是無本萬利的生意，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現在回憶起來，我在那裏受到特別嚴密的監控，恐怕不僅僅是政治原因，勞教所更關心他們的經濟利益。我入隊第二天他們就問我是否認識陳破空？看來勞教所已充分吸取了教訓，對我進行徹底封閉管理，禁止任何人與我說話。有兩個人僅僅與我打個招呼便被叫到大隊部痛打一頓，外加延長勞教期五天。

車間裏的兩個組長和坐在我周圍的四個組員，密切監視我的一舉一動，我上廁所都有兩個人寸步不離地跟著。麻體皇帝索性把他的龍椅搬到我面前，每天對我瞪著小豬眼，威懾我、嚴管我。晚上睡覺時，一個夜值就坐在我附近，這樣二十四小時徹底

封閉的監管就滴水不漏了。

我被抓九個月後，才獲准第一次見家人，之前之後兩個隊長對我嚴密搜身。見面時他們左右夾住我，隨時制止我的話題，威脅停止會見。他們肯定是特別擔心我也把塑膠花帶出去，送到美國國會作證，再一次沒收他們的勞改產品。我也很想這樣做，但是實在沒有機會。

塑膠花，苦難的花；塑膠花，罪惡的花！

廣州吸毒成風，毒品無所不在，即使勞教隊裏也不能倖免，那些毒販總能把毒品賣進來。我們大隊一個叫阿吾力的新疆大毒販，關進來沒幾個月就給放出去了，他的同夥竟能把五萬元現金送進來給他，供他賄賂張所長楊大隊長，兼吸毒用。

現在廣州街頭的毒販都很老到，隨身攜帶的毒品只有兩克，一旦被抓就說是供自己用的，就會被送到戒毒所，戒毒所要勒索八千元的戒毒費，就把人放掉。不給錢就往死裏打，然後讓你給家人打電話要錢。

吸毒者需要的劑量是不斷提高的，癮大的人一天可以注射四到六克或者更多。白粉價格貴的時候三百多元一克，那樣每天就會吸掉一兩千元，一個月吸掉三、五萬元。不是一個普通人或普通家庭可以承擔的，所以吸毒三年，一般都會傾家蕩產。

自己的錢吸完了就去騙家人或親戚，再騙朋友和同學；所有認識的人都騙完了就開始偷，也是按照上面的順序去偷，最後再偷素不相識的人；到了最後關頭，毒癮發作，就只有鋌而走險去搶了。

吸毒者的靈魂全是墮落的，無恥之極的。沒有他們幹不出來

的事情，有丈夫賣老婆的，有母親賣女兒的，有哥哥賣妹妹的，反正只要能吸上毒，幹什麼都不在乎，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人一模一樣。

廣州人以吸毒為時尚，在勞教隊裏最明顯，吸毒者普遍歧視其他人。一般的組長、值班員都是吸毒者充當。葉小強、李傑都是有十年以上吸毒歷史的老毒販，在勞教隊裏當組長，無惡不作，每天至少要打十個人，成為「麻髓」隊長手上的兩根活棍棒，他們每天可以敲詐到一百塊錢，用來吸毒抽煙孝敬隊長。

陳博文雖然不是組長，卻是大隊最大的流氓團伙的頭子，這個團伙的成員遍及各分隊。加上他還是對我特別監控小組的頭目，所以混得比那兩個組長還要兇猛，這人的毒癮更大，更邪惡。後來終因對阿吾力發動夜襲群毆，搶劫毒品，冒犯了張所長，而被關禁閉，延期調隊。

隊長們特別喜歡吸毒者，總是提拔他們做壓搾財富和殘酷施暴的助手。因為他們本質上是一丘之貉，前者吸食精神鴉片馬克思主義，享受殘忍的、腐敗的、獸性發作式的快感；後者吸食海洛因，享受虛無縹緲的、夢幻似的生理刺激的快感。

83·吃人肉

後期有一個負責監視我的組長名叫芮仲敏，每天幾乎二十四小時和我在一起，晚上也挨著睡在大通舖上。久之我們無話不談。他常常說，他比我受的折磨更多，更恨共產黨。從十五歲起到三十三歲，他差不多全在牢中度過。

「山西的監獄煤礦比這兒還黑。人們光聽說煤礦經常砸死

人，卻不知道在監獄煤礦人被砸死了還會被吃掉。」他說。

「我剛入監的時候，監獄長有一次開會說：『我們這兒也是煤礦，但為什麼不像一般煤礦那樣叫挖煤而叫打煤呢？因為一般煤礦可以挖到煤，我們這裏挖不到煤，這些煤井都是別的煤礦挖過以後轉給我們的。所以我們只有打煤，只有打著人去冒著生命危險採煤，不打根本沒有煤，我們也沒有錢花，大家豈不活活餓死？』

『每年司法廳撥給我們的經費，只夠我們必須上繳的利潤任務加上招待上級領導應付各種檢查費用的一半左右，就是說如果我們什麼也不幹，即使連飯也不吃，每年還要欠債幾百萬。所以必須打人，必須狠狠地打，對於那些完不成生產任務的，打死了就說是事故砸死了，或者逃跑了。只有這樣做，我們才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政府。大家才能完成改造任務，才能活著出去！』」

「有一天夜裏我的老鄉悄悄把我拉醒，到他舖位上吃肉喝酒，幾個月沒吃到那麼大塊的肉了，真香！後來我忍不住問他從哪裏搞來的，他的回答嚇了我一跳：『從小明大腿上割下的，這小子老是生病幹不出活，隊長早就對他膩歪了，昨天砸死了他，叫我負責處理屍體，他去寫報告說小明逃跑了。我乘機割了一塊大腿肉，老馬也割了很多肉，這小子還拿去賣錢呢！』」

「後來時間久了，我也就習慣了，不然吃不到肉啊。監獄生活太苦難了，苦難得讓人失去了一切人性。唉，人到一步說一步，實在是沒有任何辦法啊。」

「那監獄領導知道嗎？」我問。「當然都心裏有數，但是誰

也不管。只要吃了肉有勁幹活，給他們掙錢就行。」他說。

監獄、勞教隊都是人吃人的地方，幾乎沒有例外。但是這樣直截了當地吃人肉，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按說監獄的共產黨幹部比例遠高於一般的社會群體，幾乎和解放軍的軍官比例相當，管理上也完全沿襲解放軍的一套，因為大部分管理幹部來源於轉業解放軍軍官，管理得很仔細的。

所有問題都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至少都有兩三個人在現場，極易查清任何一件事的真相。因此發生吃人肉這樣的事件監獄方是難辭其咎的，而且長期不管不問，顯有縱容之嫌，且不管其目的何在，至少其群體的道德墮落是毋庸置疑的。

中國是圍牆國家、圍牆社會。由大大小小一圈套一圈的圍牆單位組成，每個圍牆單位都像是獨立王國，都有一套自給自足體系完整的制度，特別是紀律。所有紀律的第一條是絕對服從，任何問題都不可以討論；第二條是絕對保密，任何事情都是機密。紀律永遠高於法律。

這是一套完整的現代奴隸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返祖現象，在這種大環境裏，每個人都被限制死了，就只能像蛆一樣不擇手段地鑽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每個人都在蛻化，整個社會也必然要墮落，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落到社會最底層的監獄煤礦囚犯也就只有互相吃了。

以前聽說過六〇年大饑荒時吃人賣肉，文革時廣西吃人成風，也聽說現在廣東貪官流行吃八個月胎兒煲成的湯，我估計都是短暫現象，整個社會在得知後必然要堅決反對。唯有監獄煤礦可以長期吃人肉而不被人們察覺，因為任何人也無法進去調查核

實，加以阻止。

王庭金在結束最近三年的勞動教養回家後，我就問他，他所在的南湖勞教集群寶豐煤礦勞教隊有沒有吃人肉現象，他十分肯定地說有。看來在全國各地的監獄煤礦、勞教隊煤礦，吃人肉是一種普遍現象。

幸而我沒有被關進這樣的監獄，否則以我多病的身體，難免被吃掉。

84·搶劫無罪

在人類世界的每一個地方，搶劫都是有罪的，都要遭到法律制裁。世界上唯一一類地方搶劫是無罪的，肯定不會受到法律懲處，那就是中國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關押人的地方。在這些地方，不僅搶劫，還有盜竊、敲詐、傷害乃至殺人都是無罪的。

所有到過這些地方的人都奇怪：為什麼在這些執法機構裏面犯罪不算犯罪而只屬於違紀？搶劫和傷害可以大行其道。在社會上，無論多麼兇惡的匪徒也不敢隨意攻擊一個鄰居，因為那可能受到法律懲處，而在執法機構裏，則根本不會。在社會上你受到攻擊可以起訴對方，而在執法機構裏你則被莫名其妙地剝奪了這種權利。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被押到南湖勞教處第一勞教所所部等待分配的時候，看到牆上寫著大字標語：向執法幹警行賄違紀，每行賄一百元勞教人員延期一個月。這真是天大的笑話，賄賂罪的犯罪主體應該是受賄者，尤其是在一個絕對專制的國家裏，絕大部分賄賂行為其實是敲詐勒索！是誰有罪在這裏完全顛倒過來，一

切罪責都屬於行賄者了，也就是被敲詐者被勒索者了。

深思之後我才理解這些幹警們的良苦用心：勞教人員應該而且必須送錢給幹警，同時還要承擔保密的責任，任何時候都不能告訴別人，尤其是在有關部門比如紀檢調查的時候，否則受懲罰的還是你！

二〇〇〇年在廣州市第一勞教所，一個廣州老頭入隊的第二天，因為家裏送來了好多好吃的水果，他不懂規矩，沒有送給分隊長享用，而是收藏起來留給自己慢慢吃。

分隊長易明得知後大怒，隨便找個藉口把他痛打了一頓，打得他滿臉滿身是血，然後令組長把他拖回座位寫檢查。老頭寫了一份事實陳述，易明看後大怒，將檢查撕個粉碎，再接再厲，再打一頓，令他重寫。不知老頭的腦子被打壞了還是老頭生性倔強，重寫之後還是挨打，一直打到老頭不能再寫字為止。

在勞教隊，隊長搶劫勞教是公然進行的。每個星期六是勞教人員接見親屬的日子，親屬一般都會送些水果，回來之後多半就被隊長搶走了，有時候搶的很多，就抬到大隊部辦公室裏公然分贓。個別隊長不搶，允許你帶回去，但是如果你不送給你的分隊長一些，那是要挨打的！一般人寧可不吃水果，也不願被暴打一頓。

在監所內，幾乎每一個隊長，每一個牢頭獄霸都是罪惡累累，都有數十、百次的搶劫、盜竊、傷害、敲詐罪行，任何一家公正的法院，都可以很容易的收集罪證，因為幾乎所有罪惡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的。但他們就是不會受到懲處，他們始終受到共產黨的特別保護，長期逍遙法外！

如果你向上級幹部控訴，上級幹部一般不會去調查懲罰那個人，反而會把這件事告訴被告人，勒索一些錢，而你又要受到打擊報復。正如在社會上，大部分上訪控告的結果是：控告信最後會有價轉讓給被控告者，從而使控告者遭到更多的打擊！

在勞教隊，幹部痛打你一頓之後，你必須打掉牙齒往肚裏吞，還要寫一份檢查，不僅都是你的錯，還要寫明幹部對你耐心教育，絕沒有毆打你。如果你不寫，或者你如實寫，你肯定會挨第二頓打第三頓打直到把你打服，或者把你打死。

我想起毛澤東時代，經常有革命幹部強姦民女，政府卻反誣民女拉攏腐蝕革命幹部，勾引革命幹部下水，破壞革命事業，因此很多民女被送去勞動教養。強姦無罪，被強姦有罪！

就是說，革命幹部強姦你是看得起你，誰讓你長得漂亮，民女無罪，美麗有罪！你引動了革命幹部的邪念，所以你就應該逆來順受，接受強姦。而且必須保守這些革命機密，倘若膽敢洩露出去，還要嚴懲不貸！

85·赤裸裸的牲口

勞教隊的貧困是不可思議的，特別是在廣東這個富裕的省份。大部分勞教學員來自外省，家人不可能千里迢迢去看望，去送錢，至少有一半人完全得依靠自己。每天勞動十六個小時，每年勞動三百六十天，勞動三年卻沒有一分錢報酬，只有豬食一樣的飯菜，別的什麼也沒有。被折磨虐待出病來，卻要自己付錢看病。

從來也不發一件衣服穿，連一條內褲都沒發過。倒是一年

強迫我們每個人高價購買兩套校服，供隊長們充門面用。我們付錢買的校服卻不歸我們所有，而是大隊部統一保管，怕我們穿舊了，平時根本不給我們穿。只有有關部門重要領導來參觀的時候，才給我們穿一會兒。被子蚊帳都要我們自己付錢購買，價格相當於市場上的三倍。不買還不行，自己帶來的統統給你沒收。

完全按照勞教隊的管理辦法，至少一半人沒有衣服穿、沒有鞋子穿、沒有牙膏、沒有肥皂、沒有洗衣粉、什麼都沒有。完全像赤裸裸的牲口，在鞭打下拚命地幹活。

當然這些人只有另想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偷，偷衣服穿、偷鞋子穿、偷牙膏用、偷肥皂用、偷洗衣粉用，反正什麼都偷。你報告隊長說你東西丟了，隊長哈哈一笑：「我有什麼辦法？你自己不看牢，還能讓我給你看看東西？去！幹活去！」

我家人後期經常去看我，三年裏給我送的加上我自己買的內褲約五十條內褲，起碼有四十條被偷了。內衣被偷了你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你總不能去扒掉別人的外衣查看，害得我有時候真的無內褲可換。汗衫背心、棉毛褲棉毛衫、牙膏肥皂也總是丟。你簡直就像生活在賊窩裏，轉身就找不到你的東西了。

第二個辦法是，給別人幹活、洗衣服、當馬仔。這樣你的主人會給你一點舊衣服穿，那是很辛苦的。但對於比較老實或膽小一點的人來說，那是不光著屁股，不赤著腳的唯一辦法。

你像牛馬一樣幹滿三年以後，一分錢收入都沒有，反而欠了一屁股債，儘管你有病不敢看，或看病而不敢拿藥。也不敢買任何東西，但那些強迫你購買的東西你必須付錢，即使你勞教期已

滿，隊長也會把你扣下來幹活抵債，一天算你五塊錢。我看過許多人這樣被非法拘禁，幹活抵債，而那些債幾乎都是訛詐到你頭上的。

敢於為了五塊錢就非法拘禁人一天，並且打人強迫人幹活，恐怕全世界都沒有。只有中國勞教隊，幾十年如一日，膽大包天，照幹不誤。

我曾多次跟老臭蟲梁永勝反映過半數人的赤貧問題，大家幹了那麼多活總應該給一點點報酬。他總是說：「這不是美國監獄，這是中國勞教隊，條件有限，就是這樣窮。」

我沒有指出他們一年要從這些人身上壓榨上百萬元人民幣，僅僅是問他：「給點水喝，不值錢吧？讓大家可以有正常的睡眠，也不值錢吧？」老臭蟲馬上露出一副吃人不吐骨頭的嘴臉：「不喝水也死不掉！少睡覺也死不掉！去！幹活去！」

86·艱難的探視

為了與外界建立聯繫，我幾乎想盡了一切辦法，看守所的囚室是與世隔絕的，小牢房裏的幾個人都有暗中監視我的責任，無論我怎樣試圖說服他們，都沒有效果。他們都是貪官污吏，毫無一點正義感的，在共產黨的幾十年培養教育下，他們都成了拔一毛利天下而不肯為，而為了一分錢利益就可以害盡天下人的人類天敵。

我不願這樣與世隔絕地在看守所裏被關押三年，在勞教隊與外界聯繫的可能性就大很多。本來按照慣例，勞教通知書下達以後一周之內，就應該被送到勞教隊的，而我接到勞教通知書已有

四個月了。看守所也不願這樣長期關押我，嚴重違反司法程式，我又不斷給他們添麻煩。我絕食抗議後，他們就堅決要求上級把我轉移。

一到勞教所，他們就對我殘酷圍攻，致我身體多處受傷，但我還是利用一切機會爭取與外界聯繫。但是他們看守太嚴，嚴格禁止任何人與我說話，只要有人跟我說上兩句話，就會被又打又罰，所以大家都不敢與我接觸。

但我還是不斷努力。我被捕的時候，身上還捆了大筆現金，我就用這筆錢買煙買食物買衣服送人，廣泛收買人心，結交朋友。大隊後來有所發覺，就千方百計限制我買東西。我先後找過幾十個人，現在回想起來大多是騙子，他們並沒有幫我傳遞消息，當然也可能被所方發覺，制止了他們，或者他們本來就是被派來監視我的。

直到九個月之後，我才獲准見到父母。他們向我訴說找我的艱難，廣州市公安局、司法局、勞教局、各看守所、各勞教所幾乎都跑遍了。我的前妻高君也到處打聽我的消息。後來還是有一個我委託的人解除勞教之後打電話給我母親，她們才確知我被關押在廣州第一勞教所六大隊，我父母立即趕來，但是當局拒不承認。我在紐約的妹妹弟弟聽到消息後絕食一周抗議，一些朋友們也為我大聲疾呼，當局才允許我見家人。

但是第一次會見之後，他們指責我違反所規隊紀，洩漏了我在勞教隊受到殘酷毆打虐待的機密，並且要求我保證不得再洩漏這類黨和國家機密，否則將永遠不可能再見家人。我開始當然不答應，但是後來他們對我說，你父親來看你在外面已等了一個多

星期了，你不答應就永遠不讓他來見你。

他們就是這樣公然執法犯法，毫不掩飾；這所地獄對我就是這樣殘酷，毫無顧忌。

我想見面總比不見面好，對這些邪惡的隊長多少構成一點壓力，所以不得不答應了。我父親已六十歲了，因為長期等待見我已病倒，我家鄉離這裏一千多公里路程，每次來都要坐一天一夜的硬座火車，真夠難為他的。

父親告訴我，母親上次來看我，在廣州遭到搶劫，又摔了一跤，肋骨摔斷了，正在養傷，不能來看我。兩個隊長緊緊夾坐在我的左右，密切監視我一舉一動。

後來家人又多次去看我，告訴我外界冷淡，幾乎沒人問我的事。我的心也冷了，只有默默苦熬歲月。

87·英勇的法輪功

大約在二〇〇一年初的一個深夜，極度疲憊的勞教人員都已睡熟。突然從後山傳來了廣播聲，把大家都驚醒了。原來是法輪功廣播，內容是天安門自焚真相和李洪志先生的講話。

由於聲音很大，幾乎所有人都驚起來，湧到窗前觀看。我們六大隊的勞教人員都住在二樓，後窗的位置超過圍牆的高度，圍牆後面是幾座山。

大家都議論紛紛，幾乎整個大隊的人都在傾聽和討論，都感覺要爆發一場危機。從後窗和前門走廊上，可以看到整個勞教大院上空的光線漸漸明亮起來，很顯然，第一勞教所的八個大隊和所部前院的燈都被打開了，勞教所圍牆拐角的所有探照燈也都全

部打開，不停地轉動掃射。

很快地，負責值夜的野豬隊長手揮電棍和另外幾個輪值隊長都衝上二樓，大喊：「上級命令：所有人回到舖位上去！」、「不准走動！」、「不准上廁所！」、「不准說話！」、「不准議論！」

大家面對暴力威脅，趕緊都退回到舖位上。心裏都撲撲跳個不停，不知道後面會發生什麼事。

後來廣播聲漸漸微弱，大家仍在竊竊私語，紛紛讚歎法輪功的英勇和智慧。在勞教隊廣播真理，這可是五十多年來第一回啊！所有人都受到了震撼。

第二天聽大差說，所黨委當夜動員了幾百名幹部警察到後山圍捕法輪功弟子，忙了半夜才找到一個大功率的揚聲器，一個收音機和計時器。幾十個警察在摸黑上山下山的途中摔傷了，第二天不能上班。

果然，我們看到上班的隊長比平日要少，而且都耷拉著腦袋，無精打采的，一進車間就躺在安樂椅上呼呼大睡。

後來的很長時間，大家仍在議論紛紛，都認為法輪功實在太神奇、太勇敢了。

那年國慶節大會，一位大法弟子起身高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弟子無辜！」轉瞬便有幾個幹部衝上去，死死地按住他，摀住他的嘴，並且拳打腳踢，把他抬出了大會場。

但是他英勇無畏的行為，大義凜然的樣子，卻震撼了所有在會場的三千個人！

經過這兩件事以後，隊長們對法輪功的態度也有所轉變。一

天飛毛腿隊長找我訓話，談到法輪功時就說：「要是你們民運像法輪功這樣團結、這樣堅定，相互忘我支援，我們也就不敢欺負你們了。」

而另一邊，正巧是老臭蟲教導員在找法輪功弟子訓話，他一反常態，和藹地問：「你們到底有多少人？是不是有幾千萬？你們為什麼要堅持下去？我一點都不明白，這樣堅持下去有什麼好處？你們自己被抓進來，受苦受罪，還連累家人！我們共產黨人，都是為了利益加入共產黨，而你們究竟是為了什麼？」

那位姓彭的大法弟子回答：「我們為了真理，我們為了正義，我們有我們的信念，我們不損害任何人，但對於任何非法打擊迫害，我們也不會低頭！」

當時我們大隊有四名法輪大法弟子，儘管隊長們嚴厲警告任何人不許與他們說話，但我還是利用一切機會，與他們交流，想盡辦法幫助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由於受到嚴重虐待，法輪功弟子大多患有嚴重的疥瘡，渾身流膿流血，走路十分艱難，我送給他們幾條內褲，供他們換洗。我也多次患過疥瘡，知道這種病痛癢難忍，十分痛苦。但是他們都能平靜面對苦難，從容不迫。他們自始至終都能保持理性和善良，令人感動。

後來我們勞教所成立了一個專押法輪功弟子的二大隊，集中了一百多個大法弟子，就在我們六大隊的隔壁，由一個肥豬教導員管理，大家都稱他「肥教」。他雖然思想反動，但是反對毆打法輪功弟子。而一個姓葉的副大隊長，人稱「癲狗」的，卻經常毆打法輪功弟子。後來法輪功多次集體絕食抗議，這個癲狗最終

受到了處分，才老實了一些。

一般勞教隊的幹部，後來對迫害法輪功都十分反感。但他們迫於上級壓力，只能迴避這個問題。所以在這個勞教隊裏，法輪功可以拒絕勞動，在一起低聲討論問題，隊長都會假裝聽不見、看不見。如果其他人這樣做，立刻就會遭到一頓毒打。

我從事民運近二十年了，總是失敗，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普遍的道德墮落、極端自私自利所導致的。後來我常常想，法輪功從修煉人的道德品性入手，很有可能在為中國人提供一條出路，使大家最終能從道德沉淪中崛起。不僅如此，很有可能，正是法輪功，在為東方文明的真正復興，奠定堅實的倫理基礎。



第九章 腐惡中國

悲愴的靈魂

我拚命撲動四肢，
在空中飛行，
企圖逃命！

毒蛇和老鼠，
從深山和高原傾巢而出，
頃刻間布滿了中國大地。

一條幽靈般的馬蛇纏住了我的脖子，
要吞噬我的魂魄；

日俄二隻巨鼠咬住了我的雙腳，
這兩頭貪婪嗜血的傢伙！

我向南飛，
南方瘴氣瀰漫，
毒疫橫行，
土蛇土鼠已露出猙獰面目；

我向西逃，
崇山峻嶺擋住了我的視線，
黃帝老莊如來佛都已隱身不見；

我向北飛，

北方赤地千里，
黃河斷流，
蛇鼠啃光了草原森林；

我向東逃，
東方波濤洶湧，
自由女神遙不可及。

我向天上的孔子孟子列祖列宗哭救，
他們說此劫早已注定，
最好聽天由命。

馬蛇終於吸盡了我的靈魂，
巨鼠終於抽乾了我的血液，
我終於失去知覺。

我無聲無息地掉落，
再經過土蛇土鼠的腸胃，
變成一堆污穢。

——〈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場惡夢〉二〇〇三年八月

近代以來，西方一直視中國為東亞病夫。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出發點，據其自稱，就是救亡，就是想使故步自封的中華民族重新煥發活力、重新崛起。

遺憾的是，共產黨人不僅沒有達到目的，反而恰恰相反，把中國拖向了更病弱更苦難更蒙昧的深淵。現在中國不僅是東亞病夫，簡直是世界病夫，病勢沉重、病入膏肓的世界病夫！

二戰以後，憑著工業迅速進步創造的社會財富和國民信仰正義的力量，美英聯手義務維護國際秩序，中國根本不存在救亡問題，連新加坡、汶萊、湯加等等世界上一百個以上的麻雀彈丸小國都可以維持獨立與尊嚴，誰還會企圖侵略老大中國？

是的，現在中國有原子彈和遠端導彈，有載人航太飛船，有人數占世界第一的三百萬軍隊，似乎非常強大。

但這全是虛假的表象，猶如沙灘上的城市，只要一場風暴來臨，隨時可能全都崩塌下來。因為這個國家的政權，自始至終與人民為敵，全心全意害人利己，堅持以暴力和欺騙手段維持專制政權。

陀螺轉得再穩，也有倒下之時；沙堆堆得再高，也有崩塌之日。現代世界根本就沒有一個長久不潰的革命專制國家，不管其「革命領袖」多麼狡詐。

因為無論中國人民多麼愚昧，也會有覺醒之日；無論中國人民多麼軟弱，也有剛強之時；無論中國人民多麼像一盤散沙，也有群情激憤、一哄而起、誅除暴虐之時！

而共產黨政權一旦崩潰，中國人免不了要像阿富汗、柬埔寨、索馬利亞那樣內戰。中國幅員如此遼闊、人口如此眾多，以

致無論美軍還是聯合國軍，都無力承擔維持和平的責任，都不願進入中國維持秩序。周邊鄰國會嚴密封鎖邊境，阻止中國難民湧入。

毛澤東的厚黑學思想和不擇手段的鬥爭與毀滅藝術無疑已造就了千千萬萬的傳人，這些傳人絕不會批評共產黨，從而給自己帶來麻煩，被抓進監獄。他們都默默隱身於民間，日夜在窺測時機，好揭竿而起。

正如現在中國假貨會淘汰真貨一樣，由於人民愚昧，絕對利己主義思想根深蒂固，人人趨利避害，會導致最殘酷的軍事集團占據上風，中國將與索馬利亞發生的情況類似，艾迪德一類的梟雄會蜂擁群起。

在內戰中強大起來的軍隊，無疑都會爭相使用殘酷與卑鄙手段。即便其領導集團中部分人當初有一些民主思想，在殘酷的內戰中也會被消磨殆盡，最後都變得冷酷無比。

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一些在文革中受盡迫害的共產黨人指出，共產黨已經患了癌症，不可救藥了。由癌症繼續領導國家，人民當然都會患病。

第一是愚昧病。由於共產黨連續五十多年的愚民政策和蓄意欺騙，中國人民的愚昧程度是十分驚人的，連一些最基本最簡單的事實和道理都不知道。每個人除了眼睛看到的事情，別的幾乎都不知道。所有的新聞媒介都蓄意欺騙誤導人民，沒有一種官方消息是真實可靠的，甚至連天氣預報都是假的。

這常常讓我想起歷史上的印第安人，他們曾經有數千萬之眾，建立過輝煌的印加文明。但是他們在西方人到來之前，就已

經走上了自我毀滅的道路。印第安人的金字塔，就是用來自毀滅的屠宰塔。祭師每天把大批內戰中失敗的人抬上金字塔，再丟下去摔死掉。大部分印第安人就這樣在無休止的內戰中，在痛苦而無奈的哀號聲中消失了。

歐洲移民到來之後，也並不想殺死印第安人，他們更希望與印第安人合作，至少是和平共處。但是印第安人卻把歐洲人視為魔鬼，利用一切機會殺掉任何一個他們碰到的歐洲人，必欲滅絕之而後快。就像義和團和共產黨紅衛兵視西方人為魔鬼，阿拉伯人視猶太人為魔鬼一樣，一定要戰至最後一人。結果這些愚昧的蠢貨卻都是毀了自己。

我們可以設想，幸虧二戰時德國人和日本人沒有造出原子彈，否則一旦造出來，丟出去，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這兩個民族都會被激怒的美國人從地球上徹底抹掉。

同樣地，幸虧賓拉登和薩達姆也沒能造出核武器。如果9·11爆炸的是一枚核武器，一下子炸死了幾十萬美國人，我們完全可以想像，數千枚核武器就可能在某個瞬間飛向所有的無賴國家，使他們徹底喪失活著的權利。甚至連帶向無賴國家輸出核武器技術的中國也跟著玩完。

金正日本來就比薩達姆邪惡，現在仍然以為有了原子彈就可以為所欲為，所以還在拚命地製造。他愚昧到堅信所有地球人都跟他金家父子一樣邪惡和殘酷。他一點也沒意識到，他擁有和隨時可能使用核武器的結果反而是：自己被徹底毀滅掉。

在五十年代的朝鮮戰爭中，毛澤東和被他暴力驅使的中國人民，在愚昧和狂熱的信念驅使下，幾乎把大批原子彈引到我們頭

上來，中國人差一點遭到大批的屠宰。我們現在才知道，是美國人信仰的上帝拯救了我們，給了我們繼續生存下去的機會。

想到當年我們如此愚昧，幾乎掉進深淵，我們現在不感到膽戰心驚嗎？我們這樣繼續愚昧下去，沒有理智，上帝會永遠眷顧我們嗎？

我們的病根就是我們的愚昧。我們喪失了思想，我們喪失了最基本的判斷力。而這一切，都是共產黨堅定不移的愚民政策造成的。

第二是野蠻病。愚昧者不懂規矩，不懂遊戲規則，不懂得尊重別人，不會與別人公平交易、公平合作，必然是野蠻的。

一八六一年中國與英法戰爭之前，英法公使赴北京和談破裂，僧格林沁竟然不由分說，就把英國公使一行外交官和衛兵捆綁起來，丟進監獄，大半折磨死掉。所以按照中國傳統，這就意味著宣戰了，還用再說什麼別的理由嗎？

一九〇〇年中國清軍和義和團竟然圍攻使館區，那也就等於向世界各國宣戰，還用再說什麼別的廢話嗎？

至於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打砸搶燒殺，連共產黨都稱之為千年浩劫，還不夠野蠻的嗎？

一九八九年，中共竟然出動坦克和數十萬軍隊，使用開花彈射擊手無寸鐵、和平示威的學生市民，人類歷史上還有比這更野蠻的行為嗎？

事實上，在中國農村，五十多年來，地方中共黨政惡霸對農民的統治，一直都是赤裸裸的暴力，毫不掩飾的野蠻統治。安徽蚌埠作家陳桂棣在他的作品《中國農民調查》裏，有大量確切而

生動的描繪。敢不服氣、敢抗議就打你，甚至打死你，哪裏有一點點道理可講！

關押千萬人的中國各種監所比農村更黑暗更野蠻，更沒有一點點道理可講。不服氣就打你，直到打死你。所有的「法律」、「法規」統統都是空話謊話，如果你當真去依「法」論理，並且堅持到底，那你絕對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任何一個蹲過監獄的中國人都深知這一點。

事實上，共產黨人建立的「新中國」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就是野蠻的、赤裸裸的野獸與野獸之間的關係。什麼平等、公正統統都是連篇鬼話！

第三是邪惡病。在共產黨的邪惡殘暴統治下，愚昧而野蠻的中國人只有蠅營狗苟、唯利是圖、損人利己。官員腐敗，人民也跟著墮落。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泥巴，中國社會就是人吃人的野蠻社會。因為生活太艱難了，因為大家都很壞，你不壞就只有處處吃虧。

幾乎所有人都鼠目寸光，緊緊盯著眼前的丁點兒利益。只要能得到一點利益，人們害盡天下人也在所不惜。而得到了非法利益，只要給上級有關權力部門送禮，你就可以繼續幹下去。君不見種種假貨橫行無忌，政府卻禁止人民打假，堅決「依法」保護製假販假者的非法利益！

最近上海市的辦法更絕，索性「立法」規定，知假買假者不得索賠，否則就有故意擾亂市場之嫌！這簡直是在慫恿製假販假者，大膽地幹吧，害盡天下蒼生皆可，只要給我們領導送紅包就行！

其實共產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毒瘤，只要認真總結過去五十多年來我們國家經歷的一切，看看我們身邊發生的種種邪惡事情，一個普通的人就可以得出正確結論。但是有幾個人願意正視殘酷現實，坐言起行，改變這種悲慘現狀呢？

連萬分之一的人都沒有！漢民族確實病入膏肓了！

89 · 拯救女兒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我從廣州第一勞教所回到家中，等待返回美國。我和美國大使館多次聯繫，他們願意幫助我再次進入美國，但是他們要求我必須擁有一本護照。我以前的舊護照早在一九九七年底即已上了黑名單，即內部作廢，並且五年內禁止我出入中國大陸。

出獄一年多來，我與公安局聯繫無數次，他們從來沒有向我出示任何一份文件說明一個正當理由，卻始終拒絕給我護照，他們不斷欺騙我說：「再過幾個月，再過幾個月。」這樣一過就是一年多。這段時間我結了婚，又生了一個女兒。誰曾想，我這個可愛的小女兒還沒有降生就要面對無窮的災難。

先是居委會多次找我，要求我殺掉這個胎兒。接著是街道計劃生育委員會，他們像當年的敵後工作隊那樣，先是一兩個人敲門，然後七、八個男女突然闖進我家裏。他們神色詭異，令人畏懼，從各種角度威脅我們絞殺胎兒，否則他們就會強行拖走我太太，按到屠宰板上殺掉胎兒。

那幾個男女反覆告訴我，過去二十年裏他們一直都是這麼幹的，這就是他們的日常工作。中國計劃生育委員會至少絞死了幾

千萬個胎兒，當然在脅迫下被絞殺的胎兒可能數以億計，這都是上帝造的生命啊！

風聲越來越緊，壓力越來越大，恐怖是現實的。我們實在不忍心我們愛情的結晶被屠殺，我太太只好每天東躲西藏，以逃避追殺。最後我們只得逃離家園，租屋別居，而且每天膽戰心驚不敢出門。最後，我們可愛的女兒終於歷經劫難，來到這個恐怖的世界。

女兒出生時，我一直守在產房外面。那一天那所醫院共有十二個孩子出世，其餘十一個全是男孩。這是一個可怕的比例，多少女嬰被墮掉！儘管中國政府禁止醫生用超聲波鑑別胎兒性別並告知父母，但是國營醫院如此腐朽，只要塞給醫生二百元紅包，馬上就給你作鑑別！

在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限制下，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中國農民無論如何都要生一個男孩給自己養老的。這些男孩長大成人之後，到哪裏去找配偶？恐怕這種人類歷史上最顛倒的比例失調到一定時候都會引發內戰，十男求一女，不打架才怪。

孩子出生以後，為了申報戶口，我花了五個多月時間數十次的與蚌埠市西區大慶街道計劃生育委員會聯繫，終於得到第一個通知：第一筆罰款一萬三千元。藉口是預征十年社會撫養費，女兒申報戶口的事還遙遙無期，沒有任何承諾。

他們警告我：一個月之內我必須主動交錢，否則他們今後可以隨時強制執行，而且要加上每天的滯納金2%。一年的滯納金就是 $13,000 \times 2\% \times 365 = 94,900$ 元，將近十萬元，拖上十年就是一百萬元，二十年就是二百萬元！

我當然交不起這筆罰款，而如果等到我的女兒二十歲之後自己掙錢交她的出生罰款，她一輩子可能都交不清，那就只有祖祖輩輩交下去，這意味著在未來的數十年裏乃至數百年裏，他們完全可以依法隨時對我和我的後代進行洗劫。其實按照計劃生育法，我的孩子也僅僅是早生了幾個月，但就這幾個月之差，在貪官污吏的眼裏就可以勒索這麼多錢，何等貪婪！

而這僅僅是中共計劃生育委員會這一個行政部門的欲壑，另外還有幾十個其他部門呢！每個人在一生中都要跟大部分部門打交道，加起來可能比宇宙黑洞還要黑！

這是在人均實際年收入不到二千元在中國安徽省，城市居民的低收入保障是每年一千二百元，可能有一半無收入者根本領不到，我就是其中之一。而農村居民的低收入保障是零！老了病了又沒有兒子贍養的人只有像一九六〇年大饑荒那樣睜著眼睛等死！

一方面公安局不准我帶女兒離開中國，一直在尋找藉口把我再抓進去關起來。關了我八年多還不過癮！害得我家破人亡妻離女散還不過癮！僅僅因為我關注中國人的悲慘命運並試圖找到解決方法。另一方面其他部門就想出辦法來準備隨時洗劫我！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天羅地網！

想到他們隨時可能摸進我家裏搶走一切，這幾乎把我全家都嚇暈了。我父母愁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儘管我家裏的全部財產也許不值五千元，但我們要靠這些家什過日子啊。雖然這種事以前聽的見的多了，在農村司空見慣，每天都會發生，無數農民家破人亡，背井離鄉。現在這種政策居然又按照共產黨的一貫策

略，「先占領農村，以農村包圍城市，再占領城市」了。

我出獄近二年了，由於在獄中受盡折磨患上多種慢性病，特別是精神受到重創一直沒法找到工作，再說民運人上本來在大陸就是結構性失業者。我的生活只能靠以前的一點積蓄，一直在為今後的生計發愁。

街道辦事處也從來沒有給過我一分錢的低收入保障，自從我的兩個女兒出生以來也從未得過政府一分錢的幫助。甚至大女兒上小學除了付學費之外還要另外付三千元的贊助費，每次打傳染病防疫針也都要付錢。

由此我想到十幾億的中國平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一年掙個幾千元，共產黨的貪官污吏隨便找個理由就勒索一萬二萬的，胃口「與時俱進」。全中國人民都知道，現在中國幾乎無官不貪，只有胃口大小之別，現在只是輪到我的頭上而已。苛政猛於虎，酷吏貪似狼。

90·停止大屠殺

上帝給我這個女兒，使我能夠領略近十億中國農民家家戶戶都曾承受的這份恐懼這份苦難，這逼得我不得不認真思考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

中國的人口壓力本來並不大，毛澤東在五、六十年代為了解放全人類，把中國的奴隸社會制度用AK-74衝鋒鎗和原子彈推廣到全世界，號召人民多生孩子。原打算犧牲一半人餵原子彈去實現這個理想的，只可惜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在朝鮮戰場被美國人炸死了，這個遺願也只有讓他的患難兄弟、金日成的兒子金正日

來繼承了。

這多出的一半中國人沒有被犧牲掉，所以形成了人口多的第一個原因。加上消滅一切宗教信仰，和尚尼姑神父修士修女等等不願生育的人都得還俗結婚生孩子，意識形態上強制推行共產主義標準生活方式，破壞了人類的自然增長方式，才導致人口激增。

所以這並不是老百姓的錯，不應該由老百姓來承擔。而且如果國家真正想減少人口，完全不必去罰款殘殺胎兒，只要對全國人民，特別是農民，提供全世界全人類最低最低最低的生活保障，哪怕每個月只給五十塊錢，也就是六美元也就夠了。

中共官方報紙上說中國每年公款吃喝二千億，另外勒索人民付錢吃喝我估計可能過萬億，大部分貪官污吏的胃都喝壞了撐壞了，還要花更多的錢療養。而這些錢的十分之一就夠支付赤貧農民的生活保障。

中國農民之所以冒破產的危險生孩子，特別是堅持至少要生一個男孩，主要是出於生存的危機感，老病毫無保障只有等死的恐懼感。中國工人有了養老金就不願多生育就是一個明證，因為普通人在中國生活太艱難了。

還有，毛澤東長達數十年的閉關鎖國政策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把中國人民像家奴一樣鎖在家裏不准出境，否則至少會有幾千萬中國人移居外國。樹挪死，人挪活，世界上空曠人稀的地方多的是。在哪裏中國人會活活餓死？甚至連討飯的權利都沒有？或者因為口糧實在有限活不下去而任由大批胎兒被屠殺？

我第一個女兒出生前五天我就被捕入獄，三年後我出獄前，

前妻即與我分手，我當時只得把女兒託給民運人士魏輝撫養。等我到了美國之後想把女兒接過去撫養，當局卻拒絕給她入戶，她沒有戶口當然領不到護照當然不能離開中國。直到六歲時趕上人口普查她才入戶，母親多次向我述說入戶的艱難，至少跑了幾百趟，兩條腿都跑腫了，現在走路都困難。有關政府部門都貪得無厭，一般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可以敲詐勒索的機會。

在大女兒七歲以前，我和她相處的時間只有一個多月，幾乎沒有機會養育她，這是我終生的痛。現在上帝又給我一個女兒，並且讓我從她媽媽懷她那天起就能夠陪伴她，養育她，這是一種天恩。我的體會是，生兒育女給人類帶來的歡樂和滿足可能遠遠超過任何其他事，因為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短促的，只有幾十年，我們都會死去，無論苦難或歡樂都如過眼煙雲，都會消逝。唯有孩子，唯有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後代，才會千年萬年延續我們的生命，我們的思想；我們每個人特殊的生命特徵，我們在茫茫宇宙中曾經生存過的肉體證明；我們由於生逢亂世、受盡磨難而對美好生命的殘存夢想，我們被剝奪了一切而頑強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撫育一個孩子真不容易，我五個月大的女兒每天都要在我懷裏玩耍幾個小時，不時拉屎拉尿，她最喜歡讓我雙手摟住她的腰站在我的腿上，對我唧唧呀呀說個不停，彷彿在傾訴生命的奧秘、生存的艱難。她那嬌弱的小手時而摸摸我的臉，時而抓抓我的耳朵。我看著她美麗的小手，想到美國詩人迪倫·托馬斯的一句詩：「沒有人——甚至沒有雨點——有這麼小的手。」

可是千千萬萬雙更小更美麗的手卻在睡夢中被絞成肉漿。

我久久地凝視女兒那雙清澈的眼睛，彷彿天上的星星美麗而深不可測。想到那像天上的星星一樣不可計數的胎兒，個個都有星星一樣明亮眼睛、個個都有小天使一樣聖潔面容的嬰兒，被如狼似虎的計生官員二十年如一日地成批的大屠殺，我感到不寒而慄。這個世界，這個地球，真的容不下他們嬌嫩清麗的小生命嗎？

真的沒有一口飯給他們吃，沒有一口水給他們喝嗎？必須殺害他們嗎？

小天使們在流血！小天使們在哭泣！星群在流血！銀河在哭泣！

當年納粹的理論是人類生存空間有限，所以必須大批屠殺劣等民族。現在呢？生存空間有限？必須大批屠殺最弱勢群體胎兒？多麼恐怖的政策！多麼深重的罪惡！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你們認真思考過嗎？全都麻木了？

每當國際社會談論人權時總是用過高的標準來衡量中國，事實上也許只有李鵬說的準確，中國的人權問題主要是生存權問題，也就是他代表的共產黨是否允許一個中國人活著的問題。

數以億計的生命在娘胎裏就被扼殺了，他們根本沒有生存權，甚至連看一眼這個世界呼吸一口空氣啼哭一聲的權利都沒有。胎兒的父母敢反抗嗎？長城般的鐵拳隨時準備伺候，以政權為依靠的計劃生育委員會工作隊拎著繩子和棍子橫行中國大地，遑論其他。

91·悲哉中華

其實中國人現在已經不需要節制生育了。前南斯拉夫是世界上第一個實行經濟改革的共產黨國家，也是共產黨實行經濟改革最成功的國家，這種成功使南共成為歐洲存活最久的共產黨政權。

無可否認的是，南共的下場也最悲慘，米洛舍維奇和他的一班政治局常委現在都在監獄裏受到人類公審，經歷長期內戰的前南斯拉夫人民也最慘。現在的中國，基本上正在沿著前南斯拉夫的改革道路勇猛前進，正在不知不覺中一步步滑入戰亂。

千萬別以為中國的民族矛盾少，相鄰兩個村，相鄰兩個縣的漢族人打起來可能都比兩個民族打起來還要慘烈。綿延二千年的專制使中國人議約合作的能力已經全世界最差，再加上這幾十年的極端專制使得中國人的議約合作能力更是幾乎降到冰點。

即使在並不受共產黨壓迫的美國，流亡的一群中國民運人士也始終不能精誠合作，長期沉湎於被窩裏苦鬥，內耗大於外耗。即使現在中共實行民主政治，民主力量在十年二十年內也不一定能夠挽狂瀾於既倒。

看看香港，過去一百多年裏英國人一直在主動地給香港人民民主權利，但大部分香港人卻不屑一顧，從來沒聽說香港人大力爭取民主自治。直到今年今天才聽說五十萬港人上街爭取民主，實在令人驚詫，令人欣慰，港人畢竟還受了英國人一百多年的民主薰陶啊。

中國大陸蛻化到今天這種地步，悲慘命運已經難以挽救了。我以前還想拚命挽救，現在則希望能帶著妻子和兩個女兒逃出中國，逃出這塊充滿邪惡與垃圾的沼澤地。中國人將來要麼被捲入

殘酷而持久的內戰，要麼逃亡世界各地。幾十年幾百年之後，世界各地的華人逐漸歸化為美國人、英國人、加拿大人；以及印度尼西亞人、菲律賓人、泰國人、緬甸人。

血腥的內戰可能使中國大陸的人口減少一半以上。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專政歷史較長的專制政權的崩潰都曾經導致人口減少一半以上，秦末、西漢末、東漢末、隋末、唐宋元明末莫不如此，一點也不聳人聽聞。只有清政權是通過談判下台的，算是例外。

我感到悲傷。為了中國人民能夠實行民主政治，能夠不受威脅地生存，能夠擺脫苦難，能夠真正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我選擇了從事民運。在經過了近二十年的艱難努力，僅僅在牢中就苦度八年之後，我現在不僅身殘志廢，也看不到中國有任何真正意義的進步。

所謂的經濟增長也就是充當世界苦力，迫令幾乎沒有生存機會的農民子女在出口加工廠裏每天十四個小時奴隸般的服苦役來掙每月幾百元的生活費，而且這種經濟模式和前南斯拉夫一樣，根本經不起國際制裁，一旦將來台灣、西藏、新疆或內地打起仗來，甚至一場比SARS更嚴重的傳染病，一場政治鬥爭，都可能使中國徹底崩潰。

至於中國的人權進步程度，直到現在我們連我們的孩子，自己的骨肉的生命都不能保護，談何其他？何其可悲？面對這個徹底底幾十年無產階級極端專政導致國人現在幾乎完全喪失了政治思維能力瘋狂加麻木的國度，我只有仰天長歎，以淚洗面！

我在勞教隊幾乎每天都在想，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我的同胞

走到這麼遙遠、這麼可怕、這麼邪惡的深淵。我的答案是：徹底的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了所有異見者，統治者和人民都被堵上了耳朵，蒙住了雙眼，變成了一群十幾億的聾子和瞎子。

而在中國漫長的農業時代，朝廷很大程度上相當於一個議會，大臣們公開地大聲地表達自己的見解，也可以寫成文章發表出去，觀點常常是截然相反，甚至極端對立的，皇帝很多時候實際上相當於議長，必須聽取各種陳述、權衡利弊、最後形成決議，這樣形成的政策才不致太荒謬。

正是這種言論自由，正是這種討論方式彌補了皇帝專政的不足，社會才可以大致維持正常運轉，很少有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長期慘禍。可這幾十年來，即使在統治核心中共中央委員會內部，什麼時候中央委員們能夠真正不受威脅地自由地表達自己內心的真實思想？

回想我在美國時總是感到心酸，每當我走在紐約皇后區百老匯大街上，看到滿街衣冠楚楚精神十足的黑人西班牙人韓國人印度人，這大都是美國的窮人新移民啊，而且相互語言不通，生活傳統迥異，按照中國大陸的文化標準不僅是文盲，甚至還是語盲，而紐約的民主制度就是能讓占人口一半以上的這些語盲過著富裕且有尊嚴的生活。

我想到我的中國同胞，我可憐的大陸同胞，識字能說會算的八億農民，滿頭滿面滿身灰塵，端著鹹菜飯碗，蹲在家門口為幾畝地一年只能收成幾百元而發愁，這些土地由於幾十年濫使大量劣質化肥農藥污染嚴重利用價值接近負數；為與時俱進的苛捐雜稅發愁，為將來的日子發愁。

因此一九九八年十月我和魏泉寶一起，以獻身的精神，慨然放棄在美國的美好生活，以辛亥革命志士林覺民與妻兒書時的心態，以荊軻易水別燕人的傷感，偷渡進入中國大陸從事民主運動，我們妄想以生命給惡魔致命一擊，製造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來撼動專制制度。或者至少用身軀發出一聲震破夜空，令惡魔肝膽俱裂的怒吼。

我還清楚地記得，在甘迺迪機場，我和魏泉寶對送行的王炳章和傅申奇淒然慨歎：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果真一頭栽進圈套，栽進牢房，栽進殘酷的勞教隊，在魔鬼腳下幾乎成了一個笑柄。

也真是的，大家都拚命逃出去，我們卻拚命鑽進來，根本沒有可能有作為，完全是飛蛾撲火！難怪當時二十多個警察連續四十八小時輪番逼問我：「進來究竟想幹什麼？」幸虧我天性如頑石，牙關如金剛鑽，抵死忘了一切。

結果中共當局惱羞成怒，在沒有找到任何罪證的情況下以公民擅自返回祖國為由，以行政命令方式奴役虐待我三年，而且蓄意造謠誣衊我，反正是關起門來痛打落水狗，甚至連一點點一點點反駁求證的機會都不給我；甚至我在勞教隊三年每天被強迫勞動改造十六個小時什麼也不知道，直到出獄之後才從魏京生、李宏寬打給我的電話裏得知一些情況。

劫後餘生，種種打擊折磨令我身心俱廢、神思恍惚、一蹶不振。本想回到美國，找份工作，養育女兒，默默生活，療傷散痛。

不曾想這個社會已腐朽糜爛惡毒到這種程度，公安局嚴密監

控我，死死扣住我不放，可能一直在收集我的罪證，把我像王炳章那樣判個無期徒刑才過癮，另外這些喪盡人性的計生官員現在又用此法來勒逼我。實在令我忍無可忍！無法再沉默，使我不得不再次拍案而起嘶聲吶喊，控訴罪惡！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母親和我的太太一直在我身旁憂傷地注視著我。當我寫完這篇文章時，她們竭力勸我不要發表。我告訴她們，這樣也許可以有助於挽救數以千萬像我女兒一樣可愛的小生命，至少能為她們做一點點吶喊，她們沉默了。

我母親最後說，如果一定要發表，那就寫她的名字，她已經六十四歲了，她可以替我承擔一切後果，她可以替我去坐牢，可以替我去死，我受的罪已經太多，應該留下來養育她的孫女。我母親是地主家庭出身，一生受盡勞累驚嚇，她真的擔心一貫殺戮生命、嗜血成性的計劃生育委員會殺手隊衝進來，把我當成超生胎兒一樣用鐵鉗絞成肉漿，丟進陰溝。

至此，我實在禁不住涕淚交流，回首驀然驚覺：中國人多麼熱愛他們的後代！原來好多中國人為了自己的後代能活得好一點，可以忍受一切，也可以付出一切，包括每人只有一次的生命！

92· 垃圾共和國

中國已成為名符其實的垃圾國，幾乎每一個城鎮都在巨大垃圾山的包圍之下，各地市政當局除了撈錢之外就是搞些「面子工程」，對付垃圾的唯一辦法就是亂倒亂堆，貽害無窮。一到夏天，垃圾堆附近蒼蠅蚊子密密麻麻，簡直如同世界末日一樣可

怕。各種細菌滋生其間，繁衍瀰漫，形成毒域，造成各種威脅人們健康的傳染病輪番出擊，肆虐中華大地。

二〇〇二年夏天，紅眼病蔓延全中國，至少幾千萬人患病，人民損失慘重，但是新聞媒體幾乎沒有報導；還有各種流感、腸炎、肝炎、肺結核、血吸蟲正在各地氾濫，也幾乎沒有報導；SARS如果不是出口到國外也不會為人所知。

幾十年連續不斷地濫施化肥農藥，土地結成板塊，肥力耗盡，寸草不生，幾乎每一塊土地都變成了被劣質化學品浸透了的垃圾地。大部分食品在加工過程中又被加入過量的防腐劑和各類有害無益的添加劑，商場裏銷售的幾乎都是垃圾食品，生產日期都是假的，人吃了以後容易患各種怪病。

遍布全國的垃圾工場裏每天加班加點地生產門類齊全的垃圾產品，市場上幾乎買不到真貨，盡是假冒偽劣商品，所有的監督、檢查機構都腐敗透頂，誰給紅包就說誰的質量合格。人民因為靈魂墮落、道德淪喪變成了垃圾人，整個社會沒有一個方面、沒有一個地方是不被污染的，成了一個標準的垃圾社會。

中國有一個奇觀，就是到處在修路，不是新建路，而是使用才幾年的公路，到處坑坑窪窪，不重修就不能行車了。二〇〇三年十月，從山西到北京的兩條高速公路路面損壞嚴重，不得不同時進行大修，致使幾萬輛汽車堵塞二十天以上，不知道有多少鮮貨路上爛掉。可以說，最近二十年修的路，基本上都是垃圾路，國家修路投入的經費，絕大部分被貪污掉了。

不僅公路、橋樑、車站、碼頭、河堤這些公共工程都是垃圾工程，一般的民用建築，特別是高樓大廈，也都是垃圾工程。因

為所有的工程監督機構都腐敗透頂，只知伸手要紅包，而主管機構更腐敗，建築商賺錢的唯一辦法就是偷工減料。北京西客站號稱亞洲最大的火車站，建成投入使用不到一個月，主廳屋頂就掉了下來。

所有這些建築，不知哪天就會突然塌了，改革開放的所有成績，也會和這些垃圾建築一起毀掉。到那時候再回頭一看，簡直還不如什麼也不幹！

所有這些垃圾，都是腐敗導致的。腐敗早已向縱深發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只要有權在手，完全可以繞過黨中央、中紀委、反貪局、監察局的紅線，從從容容地圈錢。逢年過節，家人生日，或其他名目，廣邀部下或有關人員前來歡聚，或經常約他們喝點酒，唱唱卡拉OK，跳跳舞、喝點茶、洗洗澡、談談工作，然後點點紅包就可以了。誰奈我何？如果有人不識相，不上路子，那就留意點，當今社會如此腐朽，法令法規又牛頭不對馬嘴，誰能沒有罪錯？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收拾掉。

所以現在一查貪官，就有幾百萬元幾千萬元來路不明。專業的辦案人假裝不明白，而老百姓倒都明白。豈不好笑？統統都在拿紅包，統統都是皇帝的新衣：什麼也沒穿！

幾乎所有的官員都不同程度的貪污腐化，按照共產黨的規定，他們都是罪犯；按照正常社會的標準，他們全都是垃圾。整個中國是由一群垃圾在代表，由一群垃圾在領導，這樣的領導還要加強，這樣加強下去，還不是製造更多垃圾，毀掉所有健康因素，直到把中國變成徹底的垃圾國？

報紙雜誌登載的是垃圾文字，電視台電台傳播的是垃圾資

訊，所有這些精神垃圾沒有一天不在誤導著人民，毒害著人民，生活在這樣的閱讀和視聽環境裏，人民怎麼能不墮落成垃圾人？看看網路上那大量的仇視一切的愚昧「憤青」，與一堆垃圾有什麼兩樣？

本來按照中國的人口與資源之比，中國應該走一種最簡約的經濟發展之路，類似印度的綠色道路，甚至應該比印度更簡約，寧可發展慢一點也絕不能破壞生態平衡。共產黨卻徹底相反，走了一條全世界最粗放、最浪費，對環境和倫理破壞最厲害的垃圾發展之路，透支了以後幾代人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

比如搞三峽大壩一類禍國殃民的巨大垃圾工程，啟用第一年即導致長江中下游四省——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的生態失衡。地下水位嚴重下降，氣候失常，連續兩個月氣溫居高不下，歷史上從未有過。估計以後會更糟，其所導致的全部損害要過很多年才能陸續顯現。

這些代價遠遠超過經濟增長給人們帶來的好處，因為這些資源都是不可再生的，一旦破壞了，無論再付出多大代價，也很難恢復的。

從大躍進亂砍濫伐，大煉廢鋼渣開始，共產黨就一步一步地，花了五十多年時間，把中國改造成了全世界最骯髒最敗壞的垃圾國，同時也在政治上把中國人改造成了世界上最墮落的垃圾人！

93·一個中國人值多少錢？

這也許是一個荒誕的問題，但是如果我接著問：如果把中

國人偷偷地賣掉，一般來說，什麼性別、什麼年齡的中國人最好賣，價錢最高？

也許很多人會想到：應該是十六到二十歲的少女最值錢！

在城市人的視線之外，在全世界的視線之外，被人販子從四川、雲南、貴州等省拐出來的十八歲左右的農村少女，長期以來在中國的售價是二至五千元。價格多麼便宜！

原來中國人竟然如此不值錢！

不是一萬兩萬個少女這樣被賣掉，甚至遠不止一百萬兩百萬個少女這樣被賣掉。在東部人口稠密的農村，許多村莊裏買來的媳婦，竟然占一半左右！可以說，在這些農村地區，凡是家裏沒有一萬元積蓄，無法在附近找到媳婦的莊稼漢，都不得不找人販子買一個外地少女做老婆。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粗略的估計，有數千萬中國少女這樣被賣掉！

這些女孩子都生長在「紅旗」下，沐浴在共產黨的「陽光雨露」下，然而實際上卻像牛馬一樣苦難，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而且被共產黨的愚民政策教育薰陶的就像白癡，什麼也不懂。她們長大以後，又找不到工作，走投無路。

當人販子告訴她們，可以到安徽、河南、陝西找到幾百塊錢一個月的工作時，就不顧一切地跟著走了。甚至按照人販子的特別交代，不敢告訴任何親友。

然後這些女孩子就被當成牲口一樣地賣給一個貧窮的男人，價格還不如一頭母牛！然後就在買主家的嚴密監視下，長期被強姦、做牛做馬、生兒養女，從來不敢奢望任何自由和人身權利，

直到貧病交加、默默無聞、悲慘地死去。

沒有人注意她們的苦難生存狀況，報紙和雜誌只是偶爾報導一些人販子被抓的消息，讚揚公安機關英明果斷。當局卻從不統計有多少少女淪為奴隸，從不討論這種拐賣女奴狀況是怎麼造成的？根本原因在哪裏？怎樣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北京崇文門保姆市場曾經非常熱鬧，許多農村女孩子到那裏找工作。後來北京市公安局發現，有大批女孩子就在那裏被人販子一車拉去賣掉了，總數以萬計，僅僅被拐賣到山西忻州地區的女孩子就有幾千個。

後來在中央領導批示下，大約在一九九五年，北京打拐處與山西公安廳、忻州公安局合作，出動四百多名公安、武警，突擊忻州山區的幾個村莊，救出了幾十個被拐賣的女孩子。但是貧困而剽悍的山民被激怒了，因為花錢買來的老婆幾乎是他們唯一的財產，於是數千人手持武器圍剿追擊共軍，且抓住很多共軍作為人質以交換被救出的女孩子。

很明顯，地方政府「持不同政見」。山霧瀰漫中，北京打拐處和大批共軍只有倉皇逃竄，最後還是靠當地政府「談判」，交換了彼此扣押的人質。並且當局從此再也不敢到忻州山區打拐，任由那裏買賣少女。

販賣奴隸，尤其是拐騙人販賣為奴，本是重罪，是應該處以極刑的。允許一點奴隸制的《大清律》尚且明文規定：拐騙人販賣為奴者，斬立決。

但是「光輝燦爛」的中國共產黨怎麼能承認，中國有大量的拐騙奴隸買賣！所以中共從來沒有在這方面認真立法，在一般情

況下，拐賣人口的人販子，竟然只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由於腐敗嚴重，大多數人販子向派出所繳些罰款，或者送一筆賄賂，就可以免予刑事處罰！

遍布農村的基層黨支部竟然慫恿人販子這樣犯罪。沒有他們的支持，一個被拐賣的女孩子怎麼能夠長期住下來，再入戶口？如果村裏有一個「反革命」或「特務」，情況馬上就會層層匯報上去，嚴密監視，再抓起來。而許多女孩子被販賣到村裏，長期為奴，卻幾乎沒有人關注！

這正好反映了我們這個極權制度的本質：各級政府、立法機構、司法機關僅僅為掌握政權的特權官僚階層服務，從來不考慮人民群眾的死活。

在占中國人口三分之二以上地區的廣大農村，少女被拐賣，被奴役，被長期強姦，竟然無人過問，足以表明，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根本沒有被共產黨當做人來看待，從來沒有受到任何人權保障。

這麼大量的少女被拐賣，並且長期受奴役，也從另一個角度表明，我們這個社會多麼野蠻，我們這個社會的奴隸制殘餘勢力多麼強大，我們離文明社會的距離多麼遙遠！

94 · 牛馬化中國

同樣是發展中國家，印度主要出口智慧產品——軟體、電影，而中國出口汗水、眼淚和鞭打，也就是勞力密集型產品。

仔細觀察一下現代中國經濟，一個最簡單的事實就是，中國正在變成世界加工廠。這似乎令人歡喜鼓舞，但是如果更仔細地

一看，所有這二十年裏轉移到中國的加工業，都是血汗工業，或者是世界上其他國民不願意容忍的、有毒有害的、污染嚴重的夕陽工業。

而且這些加工業老闆幾乎都是外國人，或台灣、香港人。這些加工廠大部分的生產利潤，都為老闆們所得。這些加工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技術人員，也都是外國人或台港人。

所以中國人既沒有賺到多少錢，也沒有學到多少本領。而這些簡陋的加工廠，老闆們並沒有多少投資，都是租房子幹的，他們都準備著，一旦共產黨翻臉，或有風吹草動，就可以突然撤退，也沒有太大損失。只要丟掉一些沒什麼價值的，在國際上已被淘汰的設備就行了。

如果再到加工廠裏仔細看看，更讓我們吃驚的是，中國人幾乎像一群牲口一樣被關押起來，沒有人身自由，沒有人身權利，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每個月只能休息一天，清一色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這些牛馬不管多麼勞累順從，每人每個月也只能掙幾百元。我們更會悲歎：改革開放僅僅是把我們從一貧如洗的奴隸變成了有吃有穿的牛馬！

是的，雖然似乎聳人聽聞，實際情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年，被鎖在工廠裏活活燒死，而無法逃生的工人還少嗎？到珠江三角洲的工廠裏看一看，你就什麼都明白了。那些工人，沒有任何保障，沒有任何權利，甚至做了很久牛馬，最後卻連工資都拿不到。

考慮到外向型加工業已占中國經濟50%的事實，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我們會看到，中共統治集團更像一個龐大的監工階層，

全副武裝，拎著刺刀和棍子，迫使走投無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中國人，為外國老闆幹活，做牛做馬。

不管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荒謬經濟學原理，還是按照正常的經濟觀念看中國經濟現實，都應該很容易地得出這個結論。

以前我對於中國人的墮落，對於中國人不關心群體命運，不關心現實政治常常感到不可理喻，用一般的理論很難解釋得通。怎麼就這麼差勁呢？現在用我這個新觀點來解釋，就很容易了。牛馬考慮的僅僅是吃飽肚子，還能要求他們更高嗎？

中國作為一個監工化和牛馬化的國家，自然就越來越墮落，自然在生活方式上，文化水平及鑑賞力上就是低水平的。所以粗俗的趙本山就會成為最當紅的紅星，所以野蠻醜惡的毛澤東就仍然受到崇拜，所以不堪入目的小丑潘長江就能夠成為中國金雞電影獎「影帝」，所以官員們就會普遍貪污。官貪民刁，犯罪、撒謊、欺詐也就會大行其道，煤礦就會一座接一座倒塌，傳染病就會一波接一波席捲而來，各種各樣荒誕離奇的罪惡也大量出現。

不管是坐在廣東勞教隊恐怖的牛馬工棚裏，還是走在安徽蚌埠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都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我的這些同胞，怎麼這樣蒙昧，越來越不可理喻呢？

難怪毛澤東可以鞭打與改造他們，甚至成批地殺害他們，他們還要跪在毛澤東面前三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中共當局規定，人民代表的候選資格是十個以上選民聯合推薦。一九八七年初，為了競選人大代表，我去到針織廠工人中間動員。正好碰到幾個夜班工人，他們對投票選人大代表都茫然得很，我就跟他們談起來。中國人對錢最敏感，於是我就從錢的角

度引導他們：「不要小看發給你們的這張選票，讓我算筆帳給你們聽聽。

「你們每個月上班，可以創造二百元左右的財富，但只能拿到一百元左右的工資。另外一百元呢，都作為利稅，交給上級，也就是交給政府了。政府用這些錢來安排大家的居住、治安、學校、道路等等。你們三年才有一次投票機會，三年你們累計交給政府的錢就有三千六百元，所以這每一張選票，就值三千六百元！你們每個人，怎麼能夠不珍惜這張三千六百元的票子，來決定讓什麼人花這些錢呢？」

「就是因為大家不認真投票選擇官員，所以這張三千六百元的票子作廢了，政府官員自然也就樂得把你們每人交上來的三千元花在自己身上，所以大家的生活質量始終都很差，道路泥濘、學校破落、治安混亂、官員腐敗，什麼都是一團糟。」

但是誰也不相信那張廢紙片值三千六百元，他們告訴我，假如有人出一塊錢買一張選票，一定可以買到很多很多，甚至所有的選票。我悲哀得再也無話可說了。

再用我這種「牛馬化中國」觀點回過頭來看共產主義運動，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共產黨國家只有兩種人：像監工一樣揮舞鞭子的共產黨幹部，以及一貧如洗牛馬般勞作的工人農民。其他人都被殘酷地消滅了。改革開放也就是把毛主席這個唯一的老闆變成了一群「招商引資」借來的外國老闆。中國的實際變化就是，牛馬們吃的穿的好了一點，監工們發了一點黑心財而已！

在人類正面臨千載難逢的高速進步時期，在二戰後美國佬免費為大家維持國際和平，巡邏全世界，日本俄羅斯和任何鄰居

都不可能侵略中國的時候，在各國家各民族都在利用這個機會長足進步的時候。我們這個民族，竟然心甘情願地充當世界牛馬，充當人類牛馬，而且還要不斷加強這種監工化的「黨的領導」，加深這種牛馬化的「改革開放」，也就是把中國徹底監工化牛馬化。

誰能告訴我，這個地球上，還有哪個民族，比我們更可悲嗎？

地球上的物質資源畢竟是有限的，而全世界人口還在不斷增長，在耕地、淡水、能源等很多方面都會面臨不足，人類的處境會日益窘迫。到了那個時候，全世界首先遭到排斥的群體，毫無疑問是世界各地的華人，而最可能被封鎖的群體，肯定也是中國大陸人！

看看我們周圍的近鄰國家，哪一個不冷酷自私？哪一個不希望中國四分五裂，貧窮得要死。然後他們就可以像日本人那樣，在每年的「9·18」——中國國恥日，到大陸珠海或上海或北京，來集體尋歡，淫辱漢家女兒？

俄羅斯還能出口少女、武器、石油，我們將來恐怕只能出口少女、建築業勞工、汗水、眼淚！另外還有人權受踐踏，政治權利得不到保障，又違反國際公約，監工揮舞鞭子打人的消息！

中國共產監工黨領導階層也許可以更有錢、更墮落、更野蠻，而中國人民，只有更加牛馬化，更愚昧，更不適合民主政治，與文明世界的距離更加遙遠，從而陷入更苦難的深淵！

到那個時候，地球上可能給我們墊底的，恐怕只有古巴人和朝鮮人了。朝鮮人將來可以指望韓國人搭救，古巴靠近美國，

近水樓台先得月，自有美國人可以指望，十三億中國人指望誰搭救？

四百年來，華人在印尼遭到了幾十輪的虐殺、排斥，在歐美的華人則比較幸運。這就警告我們華人，不能永遠依靠別的民族的善良和公正，來討份生活；我們也不能指望，美國人永遠像現在這樣寬厚，永遠不計較華僑的墮落和缺乏社會責任心。

我們更不能忘記，在美國歷史上，也曾有過兩次大規模的排華運動。即使現在，由於中國人的狡猾和自私，相當一部分美國人，在內心裏最討厭的就是華人！一旦美國面臨經濟或社會危機，首先被拋出遊戲圈的，現在可以肯定，和一百多年前一樣，還是華人！

對於我們中國人悲慘的命運，和更悲慘的前途，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醒悟？

95 · 弱智化中國

共產主義運動導致的民眾愚昧，將會久遠地損害中國人。愚昧是因為長期得不到正確有用的知識，而這是共產黨堅決實行愚民政策的必然結果。

長期愚昧在深層次和潛意識裏所造成的危害，則是弱智。其主要症狀為思考問題的方法和習慣，也就是思維方式，有嚴重缺陷。這種有缺陷的思維方式，通過日常交流相互感染，就會形成群體性弱智。群體性弱智最難糾正，主要原因是，大家根本意識不到。

在文化和新聞封鎖被解除之後，愚昧問題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解決，但是弱智就不行。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的華僑敗類，如梁冠軍、花俊傑、陳文英一類，雖然像猴子一樣機靈，善於鑽營漁利，但是絕沒有學到任何文明理念。不管在自由世界待多久，他們永遠都是醜陋的中國人。物以類聚，他們組成醜陋的圈子，相互傳播弱智意識，強化弱智觀念。

這些問題，在中國大陸更加嚴重。連續五十多年的、徹底的愚民政策，已經把中國人拖到了愚昧和野蠻的深淵——弱智！

一九九九年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襲擊之後，反美浪潮席捲全國，勞教隊也不能倖免，我也被拖去參加「討論會」。所有人都認為這是預謀襲擊。

我說：「美國政府的政令雖然不能說完全公開透明，但是在大部分情況下，特別是在重大問題上，幾乎不可能瞞著民眾，隱秘地作出重大決策。日本可以偷襲珍珠港，美國就不可能不宣而戰，大規模偷襲任何一個國家。這是民主制度的性質決定的。」

如果布希政府竟敢繞過國會和民主黨，擅自作出偷襲中國大使館的決定，那麼不用等到中國人收拾他，美國人就會把他收拾掉。這樣的命令必須經過數十名官員傳令知悉，而在任何關節上都可能遇到抵制。不管文官武官，美國官員可不是奴隸。在明顯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大部分美國官員都是有辨別能力的。

但是我的說法遭到了所有人的激烈反對，他們一致認為這是預謀偷襲，一致認為美國官員和中共官員一樣，也是毫無正義感和辨別力的奴隸。後來他們索性開起對我的批鬥會來，讓我既驚惶又憤怒。我只有閉嘴，以避免圍攻。

後來我反覆分析，為什麼所有人都堅持謬誤？最後我才得

出結論，這正是群體弱智的典型症狀。那些人總以為，任何人都和他們自己一樣陰險狡詐，整天圖謀不軌，美國人當然更不會例外。

現在中國人的疑神疑鬼心態，已到了可怕的程度。很多人就像原始森林裏的野獸，把大量時間和精力，投入捉迷藏式的相互攻擊、相互提防和猜測上面。他們既不相信事實，也不相信別人，只相信自己的揣測和臆斷。

從人類進化的角度看，這種原始動物般的智慧是現代文明的大敵。薩達姆和他的兩個兒子，以及他的家族，都固執地認為，美國人和他們自己一樣狡詐殘暴。所以薩達姆一再暗示自己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為這樣就可以嚇阻美國軍隊，使他們不敢進入伊拉克。現在看來，這是多麼的愚蠢，簡直是自找滅亡！

共產黨的獨裁者，更是如此。他們一生都堅信，誰也不能信任，必須永遠高度警惕，自己一不小心，就會被別的猛獸一口咬斷脖子，一命嗚呼。鄧小平和中共中央總結「六四」經驗，結論就是共產黨的警惕性不夠！

所以他們始終堅持愚民政治，堅持愚弄所有人。人民當然也不相信他們。可以說現在的中國，誰也不相信誰。大家都是出門如見敵，睡在床上都不放鬆，做夢都夢見敵人要來撕咬自己。

在這種沉重的心理負擔下，中國人彷彿生活在原始叢林裏，天天疑神疑鬼。其實這是一種原始獸性，一種明顯的群體弱智心理狀態。它就像一條沉重而巨大的原始尾巴，死死地拖住了所有中國人，不管願不願意，大家都得在臭水溝和污泥潭裏掙扎！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怎麼能夠潛心於創造性工作？怎麼能

夠沉思默想一些重大問題，特別是政治和宗教問題？而不解決這些根本的問題，中國人又怎麼能建立現代文明？

這樣再通過專制制度強化反饋回來，更加劇了整個群體的弱智化傾向。

我們知道，真理與謬誤之別，常常只因為一念之差；而正義與邪惡之爭，也常常是勢均力敵的。所以中國人，在野蠻專制的威逼驅迫下，也就只有一錯再錯，沿著弱智化的共產主義康莊大道，蜂擁向前了。

這樣群體弱智化的結果就是，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在世界性分工的時候，中國人只能去做牛做馬，幹最簡易最骯髒最污染的加工活。而中國共產黨，也就成了一個頭腦簡單的、純粹的監工黨，端著槍，拎著鞭子，迫使頭腦更簡單的中國人老老實實做牛做馬，為外國資本案賣命。

96 · 原始中國

最近聽到有幾個中國官方「學者」聲稱，中國已是「基本發達國家」了。他們無視九億農村居民依然走在泥濘的原始土路上，沒有自來水用，沒有任何醫療保障和醫療救助，其中絕大部分人的實際年收入不超過一千元，貧苦患病無依者的低收入保障是零元！

陳桂棣、春桃夫婦在安徽五十餘縣所作的調查，已經把中國農民悲慘絕望的生活狀況，寫得一清二楚，這些「學者」為什麼不去看看呢？

可以作為證明的是，最近另一組學者的統計結果是：中國城

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大約是農村居民的三至六倍。而城市居民的低收入保障是一百多元，無論除以三還是除以六，農村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都可以大致估算出來。

一百多元的低收入保障，可以提供什麼樣的生活呢？甚至連一間有衛生間和廚房的房子都租不到！只能在小城市郊區租一間十來個平方米大、光禿禿的房子，室內連自來水都沒有，大約也要六十至二百元。再買米買煤，買油買鹽，交電費水費，剩下的錢連買青菜吃都不夠。

即便如此，為了領取這份低收入保障，城市居民還是擠破了頭地爭取，因為各地方並不是按實際情況發放，而是有計劃按城市人口大約5%的比例發放。而中國的實際失業率高得嚇人，官方又拒絕承認，以致各居委會為誰該領低保的事情，長年累月吵鬧不休。只要你家裏有一台值二百元的舊彩色電視機，或價值三百元的舊電腦，你就絕對沒有資格領低保了。

前些日子我上樓找鄰居有點事，從黑洞洞的樓梯下來的時候，一腳踏空，摔腫了腳脖子，到現在走路都彘扭。一想起那黑洞洞的樓梯，我就心有餘悸。我以前住過樓上，就是因為有一回摔破了頭，才決心不住樓上的。我的太太，更是摔了幾回跟頭，腿幾乎摔殘廢。

而中國城市的普通居民住宅樓，至少有90%以上，走廊和樓梯都是沒有照明燈的。穩重的中年人尚且會摔跟頭，那老人和小孩子該是多麼危險！

住在設施完備的高級住宅裏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從來都沒有想到絕大部分中國人過的是什麼日子。讓他們爬一爬黑洞洞的樓

梯試一下，就知道中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了！

還說什麼現代化！還說什麼基本發達國家！這些學者簡直無恥到了極點！中國離現代化、離發達國家的遙遠程度，簡直沒法估計。

出口加工業的確帶來了大量美元，但是絕大部分都歸外商和貪官污吏分享了，除了幾個大城市和南方沿海地區的一部分人沾了一點光以外，大部分中國人民除了做牛做馬，根本沒有獲得多少經濟上的好處。與毛澤東時代饑寒交迫的生活相比，現在也就是能吃饱肚子，有衣服穿而已。

如果去掉貪官污吏，這些確實也不能算正常人的「異類」不算，就中國人民實際人均生活水平、生活質量而言，如果有一個公正的國際統計機構進行公平的統計，我估計結果很可能是：

全世界倒數第一：朝鮮；

全世界倒數第二：中國、越南、古巴。

因為共產主義也罷，改革後的特色社會主義也罷，都是人類最壞的社會結構。除了貧困、愚昧和野蠻，我們究竟還有什麼可以值得沾沾自喜的呢？

應該如何定義當前中國社會形態？

世界上最先進的東西中國都有，從電腦、互聯網到載人飛船、遠端導彈，中國都有；從電氣化鐵路、高速公路到股市，中國也都有。好萊塢有什麼新片子發行，一個月之內中國大城市消費者就可以四元人民幣一盤買到；美國有什麼新東西，中國也很快就有，除非一些特別先進保密的軍事技術產品。

但是另一方面，九億中國農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與

二千年前相比，並沒有太大不同。雖然手扶拖拉機代替了牛馬耕種，也有了電燈電視，但是農民的總體生活水平，正如陳桂棣、春桃夫婦描述的，並沒有多少提高。

九億人，占中國人口的70%！除了他們，還有什麼人可以代表中國？

貪官污吏不能代表中國人，墮落的知識分子也不能代表中國人；北京上海廣州人不能代表中國人，其他城市人也不能代表中國人。唯一可以代表中國人的，依然還是九億中國農民！

城市貪官污吏的腐化享樂生活強烈地吸引著農村的黨政幹部，所以他們便利用專制權力，紛紛以殘酷的手段對農民敲骨吸髓，各地攀比之風盛行。安徽阜陽是中國最貧困的農業地區，但是王懷忠、肖作新和他的黨政同事們卻和其他地方的黨政官員一樣貪婪嗜血。

而最近被雙規的唐山市委書記張和，竟然能聚斂十億元財富，可見官員們何等貪婪！因為張和僅僅是一個市級幹部，地位和他相當或比他高的共產黨幹部，中國起碼有幾十萬，這是一支多麼可怕的貪污腐敗大軍，僅僅他們就可以吞噬一切！

何況他們手下還有幾千萬胃口與時俱進的小吸血鬼！任何國家也承受不起！

所以就可以代表中國人的九億農民而言，他們過的仍是原始農業生活。到城市打工的農民，處處受歧視、受盤剝，處境也好不了多少。而且都是吃青春飯、吃體力飯，沒有任何保障，生病了年齡大了只有退回農村去等死。

雖然也有許多先進的東西和龐大的出口加工業，但總體上中

國仍是一個原始社會。

以上是從經濟上而言，如果從文化上說，中國社會的原始特徵更鮮明。所有資訊載體年復一年傳輸的都是資訊垃圾，每個中國人只能選擇聽或不聽，一般不能有別的選擇。久而久之，人民就非常愚昧。

中國的政治更是明顯的原始奴隸制，人民沒有任何權利可言，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人權保障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不僅普通人享受不到，就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也享受不到。官員們只有和共產黨組織一起腐化墮落，否則就會受到排擠和打擊。

原始中國！原始中國！什麼時候你才能開始進化！？

97·苦難的中國人

中國有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有燈火通明的繁華大街，有一擲千金、一頓飯吃掉幾萬元的貪官污吏。但那只屬於極少極少數的殘酷剝削階級，他們是嘴裏喊著三個代表的共產主義寄生蟲，他們的總數不會超過1%；還有大約10%所謂「中產階級」，他們是紅色商人、紅色醫生、其他專業人員或南方的高薪打工仔；而其餘的90%左右的普通人，都過著艱難的生活，而其中的一些群體，農民和生活在城市的農民工，十分悲慘。沒有人注意他們，儘管他們是大多數。

這個冬天我一直在寫這本書，經常是徹夜寫作。有一天夜裏兩點多鐘，我突然感到特別饑餓，家裏找不到東西吃，我就到附近一家回民餐館喝了一碗羊肉湯。身上熱乎乎的，我決定散散

步。走到露天菜場，我驚訝地發現，在黑暗中，居然有許多車和人在那裏靜靜地等待著什麼。

我決定弄個清楚。我先沿著大街走過去，看到路兩邊排滿了菜農，有些人在討價還價，大部分人在等待天亮以後賣菜。我問一個四十歲左右的農民，為什麼要來這麼早？現在離天亮還有四個小時左右呢！

菜農說：「這算什麼！有的菜場，凌晨一點鐘趕去，就找不到賣菜的位置了，這裏菜價最便宜，所以凌晨兩點鐘還能找到位置。如果我們把菜拉到大明溝批發市場去賣給批發商，扣除種菜成本，幾乎是不賺錢的。」

「我們的家離這裏幾十里地，手扶拖拉機又不能進城，我們只能在夜晚把菜拉到城市附近，再換成小板車拉到菜場來，一般都要忙上半夜才能把菜拉到這裏。那些到批發市場買菜來零售的人，也是上半夜就趕去。」

這個群體的人數特別多，比起種糧的農民，菜農的收入還要多一點。在這麼冷的冬天，他們竟然這麼辛苦，我以前從未想到過。

附近也有一個室內菜場，但是空蕩蕩的。肯定是攤位費太高，嚇得菜農不敢去。其實這是一個管理問題，腐敗的官員們，哪裏會為這些辛苦的菜農著想一點，只想勒索更多的錢。這些菜農也只好這樣，幾十年如一日，白白的站在黑夜裏幾個小時挨凍，浪費著生命。

如果沒有各個環節的腐敗，生產者－批發商－零售商－消費者這四個環節能夠正常的、公平的、合理的交易，這些菜農怎

麼會這樣受罪？大家每天都要吃菜，作為政府，連這些事都管不好，還能管好什麼事？

那天晚上我在公交車站等車的時候，注意到沿路邊有大約二十多輛三輪車，車上鋪著被子，工人蜷縮成一團躺在車上。我有點奇怪，這麼晚了他們在等什麼？

正好旁邊有一個報亭，我買了一張報紙，順便問亭主怎麼回事。亭主歎口氣說：「這都是農民工，家離這裏幾十里遠，如果每天蹬三輪車回家過夜，那就沒有力氣幹活了。他們蹬一天三輪，也就掙十來塊錢，還要買飯吃，如果再去租房子住，那就餘不到錢了，家裏的老婆孩子吃什麼？」

「所以每天晚上，他們只有像狗一樣蜷縮在三輪車裏睡覺。好在白天很累，他們一倒頭就睡著了。如果讓我睡在那種地方，我是一夜也睡不著的，放腿的地方都沒有，簡直活受罪！」

「最可憐的還是夜裏下雨，他們那個慘勁，想找個地縫鑽都找不到，連人帶棉被都淋成落湯雞，要是城裏人，非發燒住院打吊針不可，可這些鄉裡人，第二天還接著蹬三輪，真他媽像騾子一樣能受罪啊，簡直不像是爹娘生的！」

「就他們這麼慘，交警還找碴罰他們款，不給錢就把車子砸了，真是喪良心啊！唉，這個社會太黑了，老百姓想活下去，只有做牛做馬！就我看這個報亭，也好不了多少，白天黑夜守著，冬天凍得要死，夏天曬得要死，每月得交二百多管理費，剩下掙的錢只夠我一人吃飯。跟誰講理去？」

有一天中午我出門去買點吃的。香噴噴的新疆烤羊肉串吸引了我，一塊錢六串，我買了兩塊錢的，站在烤箱邊津津有味地吃

起來。

這時候我注意到不遠處一個撿破爛的老人躲在樓角避風處，在啃一塊乾糧。那老人看起來很老很老，滿臉皺紋，恐怕足有八十歲了。我有點不忍，便多要了兩塊錢烤羊肉串，走過去請他吃。他吃驚地看著我，卻不伸手來接。我執意請他吃，他才猶豫地接過去，我注意到他的兩隻手都黑乎乎的，盡是凍瘡。

我問他：「這麼大年紀了，冬天又這麼冷，為什麼還要出來撿破爛？」

他淒慘地笑了笑：「我還不到六十歲，家裏幾畝地的收成只夠交給鄉政府，不然就扒房子。我不出來撿點破爛賣，那一家人還不餓死？」他又接著說，「謝謝你！我長這麼大年紀，還從來沒有吃過烤羊肉串。你能告訴我這附近哪裏有自來水嗎？我怎麼找不著。」

我吃了一驚，連自來水都喝不上！仔細想一想，在我們這個貧民區裏，恐怕真找不到自來水喝。公共廁所裏的自來水龍頭，都被管理員用粗鐵絲捆死了，可能就是為了防著農民偷自來水喝。反正我每次上公共廁所，儘管付了錢，一般也是找不到水洗手的。

我請他跟我來，然後請他坐在一排露天板凳上，替他叫了一碗素菜湯，只要一塊錢一碗。我告訴他，我真的不知道哪裏可以找到自來水喝，為什麼不找小飯店要點水喝呢？

「怕人嫌，我們撿破爛的，渾身都髒兮兮的，哪裏敢問人要水喝？」

在每個城市裏，現在拾破爛的人實在太多了。在每個大中小城裏，都有數百至數千人，中國有一萬個左右的城鎮，所以這個群體至少有上千萬人。他們都是被農村的黨政惡霸欺負得實在沒有辦法了，又不願要飯乞討，才不得不以這種方式維持生存。

這麼龐大的社會群體，在二十一世紀，只有無比優越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才可以製造出來。政府對他們的淒慘視而不見，媒體也從不報導他們的悲慘存在。

在城市裏，三十歲以上的下崗工人，沒有一技之長的，都是很難找到工作的。那些二十歲左右的農村青年男女，一天可以工作十四個小時，幾百塊錢的工資，任勞任怨，從來也沒有星期天，才是僱主願意要的。

而那些三十歲以上的農民，更難找到工作，體格健壯的也許可以在建築工地幹活，體格不夠強壯的和四十歲以上的似乎只有撿破爛為生。

他們在每個居民區裏轉來轉去，在每一個垃圾堆上扒拉來、扒拉去。一般城市居民，確實也討厭他們。

看看他們身上的髒，聞聞他們身上的味，想想他們天天趴在垃圾堆裏，用木柄二齒鐵鉤抓出碎紙和髒塑膠袋，再用手分別裝進兩個化肥袋子裏，是夠令人噁心的。

但是我不然，我一向同情他們。他們雖然髒，但還是憑勞動吃飯，沒有損害任何人。在我看來，比起那些穿得體體面面，腦滿腸肥，口袋裏有大把鈔票，一頓飯吃掉幾千塊，還說「胃口不好」的共產黨貪官污吏，這些撿破爛的乾淨得多！至少他們不犯罪，他們的靈魂不骯髒！

也許他們，此生注定，要受盡共產黨的專制奴役和殘酷剝削之苦，趴在垃圾堆上撿口飯吃，甚至最後昏倒在垃圾堆上死去。但在他們死後，我相信，不管天堂多麼擁擠，上帝都會特意給他們留個乾淨的好地方，撫慰他們淒慘的心靈！安慰他們悲愴的靈魂！

98·九億農奴何時翻身？

70%左右的中國人是農民身分，乘以十三至十四億人口，就是九億。城郊農民和南方沿海富裕地區工商業化了的農民大約有一億五千萬左右，他們的生活水平和城鎮居民相仿。在其餘的農民中，十五至三十歲的青年現在有一半以上到城鎮打工，所以這個群體的總數目約有一億五千萬以上。

工廠、建築工地、服務業的大部分從業人員，現在都是農民工。但是他們既沒有工人的身分，更沒有工人的待遇，他們受到政府嚴重的歧視。他們不能入城鎮戶口，他們需要隨身攜帶許多證件，警察可以隨時把他們抓到派出所罰款或毆打。反正他們是外地人，怎樣虐待他們都行。反正他們討不到公道，沒有能力也不知道怎樣控告迫害者。

他們也不知道怎樣行賄，也沒有多少錢行賄，誰也不理他們。所以他們注定了必須任勞任怨、逆來順受，國家的勞動法等對他們都不生效，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公民權利。

老闆可以任意剋扣他們的工資，不服氣敢搗亂的就讓保安揍他一頓，或者親自動手也行，然後拖出工廠，像扔一袋垃圾一樣，扔到大街上就沒事了。一般的農民工也很識相，用不著打，

那時的學生，也普遍模仿他們的口音說話，以嘲笑郊區菜農子弟為樂趣。現在回憶起來，我有一種心痛的感覺。他們受到了多少根本不該有的心靈傷害！

記得有個農村孩子被安排坐在工人的孩子中間，大家為了驅趕他，竟然一起向老師誣告他「一節課放了七十多個屁，熏得大家頭昏眼花，根本沒法聽課。」以致老師擔心大家一起打他，而不得不再把他安排坐在鄉里人中間。

僅僅一條小路就把兩群人徹底隔絕為兩個世界！共產主義等級歧視就是這樣嚴重，這樣可怕！

這一切歧視的根本，都源於戶籍制度。其實這是一種現代奴隸制度。一個人一輩子都必須待在一个地方，像有主人的牛馬一樣。

中國脫離奴隸制已有兩千年了，歷朝歷代的中國人基本上都有遷徙自由、工作自由，只有共產主義時期，又倒退回兩千多年前了。共產主義運動本質上是人類的野蠻退化運動，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通過一輪輪的殺戮、鎮壓和運動，強行把中國人都變成了奴隸，把大家都拖回到了野蠻的、殘酷的奴隸社會。

那些到現在還在拚命維護戶籍奴役制度的人，何曾為這70%的農民考慮過一點點。據說他們主要的理由，是治安工作更困難。看來為了維護共產特權階級的安全，為了長遠地維護極權專制統治，為了使司法機關能夠更從容地腐敗，他們是絕不肯歸還中國人最起碼的遷徙自由的。

現在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的人民沒有遷徙自由，那就是：中國和朝鮮。所以僅僅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共都要拚命維護這個

夥伴，免得金正日匪徒集團崩潰，自己成孤家寡人。

99 · 祖父的懺悔

我的祖父今年八十四歲了，月前我從鄉下接他到我家裏住了一個星期。他的耳朵聽不清聲音，眼睛看不清面前的人是誰。我帶他到醫院看，他不願意去，他說醫生治不了他的病，另有原因。

「一九六〇年大饑荒的時候，全村的人都餓得半死，你奶奶和姥姥都沒有口糧，餓得兩腿腫脹，不能走路。那時候不是勞動力就沒有口糧，還不准在家裏煮飯，所有的鍋碗瓢勺都被沒收了，鐵鍋和鐵鏟用來大煉鋼鐵，其他的打碎，就是不准你做飯吃。食堂也沒有你的飯。

「我要救活她們，只有偷東西給他們吃。中午開飯的時候我省下半個饅頭偷偷塞在懷裏帶回家。那時每天都是天沒亮就出工，天黑以後才收工，我磨磨蹭蹭走在後頭，趁隊長不注意抓一些麥穗或芋頭秧子藏在懷裏帶回家。等到後半夜巡邏的民兵都回去睡覺了，我從床底下找出撿來的破瓦罐，用石塊磨碎莊稼燒湯喝。我們一家人總算活了下來。

「後來幾十年我都在想，這樣也是作孽呀，我們那個蔣莊子，十一戶人家餓死絕七戶，只剩四戶。我一生中就作了這些孽，現在就有了報應，眼睛耳朵都不行了。唉！」

聽著祖父的敘述，我的心如石頭一樣沉重。苦難深重的中國人啊！我小時候每年暑假去老家玩，在那些殘垣斷壁裏捉迷藏，有時還能從老牆上摳到銅錢，覺得很好玩，從沒想到這些房子裏

的人都餓死了。上次下鄉的時候，我發現蔣莊子只剩我們一戶人家了，問了之後才知鄉人迷信，認定這個莊子兇煞，剩下幾戶人家也都遷到別處住了，可惜了偌大一片土台子，當年築的時候該費多少力氣。

我是大饑荒之後出生的，從小學到大學幾乎年年月月都受到共產黨的教育，說舊社會勞動人民水深火熱，新社會幸福無比，回想起來全是謊言，全是蓄意欺騙。

祖父是舊社會過來的人，年幼時受過十多年的私塾教育，唐詩宋詞背誦如流。我四歲時受他啟蒙，學三字經百家姓，記得那時祖父找來一些粗糙的紙，裁成簿子，然後就憑記憶寫出百家姓教我。

到了新社會，他的知識全作廢了，只好當一輩子饑寒交迫的人民公社社員。但是他的價值觀念沒有受共產黨影響，沒有中毒，依然保持著舊社會人民的善良質樸，特別是懺悔意識。

在完全是共產主義奴隸制度製造的大饑荒時，在被剝奪了所有的財產以及所有做人的權利，甚至連外出求生尋找食物的權利都被剝奪的情況下，祖父為了救家人的命，偷吃點半熟的莊稼，本無可非議，尚且懺悔！現在的貪官污吏欲壑如海，吃人不吐骨頭，從沒感到有罪嗎？不怕報應嗎？

我看過那些被處以極刑的共產黨高官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訴，都說什麼自己辜負了共產黨的培養，全是一副市儈嘴臉，從沒認識到自己的罪惡，沒有一個真正懺悔的！連懺悔的基本概念都沒有！難怪會惡貫滿盈，被處極刑。新舊社會的觀念，確有天壤之別！

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那可是最善良最誠實最本份的中國人！鎮反反右及文革害死了幾百萬知識分子，那是中國僅有的知識分子，現在中國幾乎沒有知識分子了，雖然識字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很多。

這樣下來，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種族，還剩下什麼呢？只剩下成群結隊的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在啃咬一切，森林、河流、土地，和同等重要的禮義廉恥。

100 · 一個辛酸的夢

每次想到北韓人逃亡的悲慘處境，特別是野獸般的韓共人民軍把逃越中朝邊境的難民用粗鐵絲穿過肩胛骨或手掌心，一兩百人穿成一串，拖回朝鮮槍斃，想像那種恐怖的景象，我的眼睛就會忍不住濕潤。那是多麼可怕的人類慘狀，納粹也沒有這樣幹過，納粹也沒有這樣殘忍。但是這個世界照樣容忍。

我曾經問過一位親眼目睹過這種情景的朋友：「那些難民為什麼不反抗？」「反抗？反抗不僅一樣會被打死，還會連累親屬。那些朝鮮人一見到人民軍就像老鼠見到貓，腿軟身癱倒在地。」

這位朋友接著說：「當年納粹把一車車的猶太人押進集中營的時候，當年日軍把一群群的南京人驅趕到長江邊的時候，有誰反抗？恐怖是一種傳染力最強的情緒，尤其是你處在一群人中間，你會完全喪失思維判斷能力，像一頭羊一樣。你看過牧童放羊嗎？就是那麼回事！」可悲的人類！

但是歷經千辛萬苦終於逃出來的北韓人最後總可以找到一個

自由，安全的樂園：韓國！在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軍隊的保護下他們可以一切從頭開始，建立美好生活。古巴人、越南人、柬埔寨人、阿富汗人、伊拉克人、伊朗人、敘利亞人所有這些苦難的人民，只要逃離國境，都可以找到一個安全的避難所。

兩伊戰爭打了八年，民族仇恨可謂深刻，但是幾十萬伊拉克人照樣可以到伊朗避難，不會被驅逐出境；巴基斯坦可謂貧困，照樣接受幾百萬阿富汗難民。

這個世界大太小有五千多個民族，唯有一個民族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受歡迎，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地區願意收留，甚至連一個角落都沒有！都可能遭到驅逐，被強行押解回去，關進收容站，家人再拿一筆錢出來贖回家。這就是唯一的另類——中華民族。

華人在世界上幾乎到處都有，也有一些華人的國家和政區，如台灣、新加坡、香港、澳門。但是他們對待自己的血肉同胞還不如英美語系國家人道一點，在八十、九十年代，大批越南人可以在香港得到庇護或轉往其他國家獲得庇護，中國人則被立刻驅逐出境，押解回籍，累計可能有數千萬之巨。

印度人雖然也窮，但生活得逍遙自在，從來沒聽說過一船船印度難民逃往世界各地，尋求庇護。假如聯合國願意在世界各民族作一份民意調查，題目是哪個民族處境最悲慘，前景最不妙，我想答案很可能就是：中國！

也許有人會說，大部分中國難民都是因為經濟原因而逃離。可是中國人的貧困完全是由於政治原因造成的，逃避貧困就等於逃避政治迫害。逃出來的北韓人不都是因為經濟原因嗎？但完全

是金正日匪幫的殘暴奴役造成的。

紐約皇后區的艾姆赫斯特是世界上最複雜的民族聚積地，一九九八年時我看到一個市政統計：一百二十三個國家或民族聚居在這裏。沿百老匯大街星羅密布的商店裏華商的生意最好，特別是香港超市錦昌超市整天人來熙往，簡直是賺錢機器，華人的商業競爭力的確非凡。

尤其是曼哈頓的唐人街，那可能是全美國最熱鬧的商業街，街邊行人密度可與香港彌敦道相比，華商富豪如雲。如果世界各民族隨機抽一些人來到森林沙漠冰川荒島上比試生存能力，我相信中國人一定會得第一，我們畢竟有三千年連續不斷的生活經驗積累啊！

那麼究竟為什麼我們這個民族淪落到目前這種悲慘的處境呢？僅僅因為我們走到哪裏都是一盤散沙，熱中於內鬥內耗？只適合於忍受專制統治？或幸運地享受英國人美國人建立的民主制度？或者把一切責任都推到共產黨頭上？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沒有一點責任？

我長期從事大陸民運，但是越幹越悲哀，越幹越沒勁。大陸人的墮落已經沒藥可救了。假如你像孫志剛那樣一走進收容站醫院房間就被七、八個素不相識的病人輪番圍毆，打累了歇一歇再打，直到把你活活打死。或者像我一樣一進勞教隊就被十幾個素不相識的人圍毆，雖然我僥倖活下來卻要帶著幾個月的傷痛還要每天被強迫勞動改造十六個小時，還有一生的恐懼和惡夢，你可能會贊成我的觀點。

但是我還有一個夢，一個辛酸的美夢，始終殘存在我的腦海

裏，揮之不去，斷之不能。

假如我能找到一群夥伴，能籌到一筆錢，那麼我們就去買一片荒島。無人居住，沒有任何自然資源，沒有任何人感興趣，甚至連一滴飲水都沒有，一棵小草都沒有的太平洋深處的一片珊瑚礁群。我們帶一些故鄉的泥土，帶一些故鄉的井水，帶一些故鄉的糧食乘船到那裏建立家園，我們在那裏圍湖蓄雨水填海造地捕魚種糧。

當然我們必須買一台衛星電話。然後我們就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這裏是中國人建立的世界第一個人類庇護所，不僅中國人，所有地球人都可以在這裏立即得到庇護，不會被關進難民營，不管你是政治原因、經濟原因、宗教原因，十分鐘之內就會得到公民身分。

任何人都都不需要任何簽證就可以進入或離開。聯合國難民署可以把任何難民送到這裏，無限期居住生活，享受全權公民待遇，徹底貫徹人類生而機會均等的原則。

我們可以以全世界最低的稅收最低的工資吸引製造商來這裏建立加工廠，其實只要台灣香港的一部分製造商過來就行了。我們完全按照住民自決的原則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一個中國人的自由家園。在現代資訊工業社會，我們一定能夠生存發展，我們一定能夠興旺發達，我們一定能夠為人類開闢一個新的自由聖地！

其實好的生活並不一定需要消耗很多物質。我們的味覺我們的消化系統都是很有限的，我們的視覺聽覺觸覺能給我們帶來的歡樂也很有限。曾經有個學生問孔子：「老師認為人類最美好的

境界是什麼樣的？」孔子說：「老少七八人，到河邊去游泳，愛怎麼游就怎麼游，或者躺在河灘上曬太陽聊天。順之天性，適情隨意，又不妨害別人就行了。」

猶太人在淪落兩千年之後都可以重建家園，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我們的祖先不乏披荊斬棘，建家立國，頂天立地的英雄。現代中華兒女就找不到本·古里安、梅厄夫人那樣的復國英雄嗎？

這也許是一個很可憐的夢，但是對於更可憐的中國人來說，可能都無法實現。固然這個世界有很多荒島野礁，也可以花錢買到。但是海外的中國人可以有更好的地方生活，而大陸的中國人並不可以隨便離境。可能統統被作為偷渡者抓起來，而我很可能被當作蛇頭判重刑。

但是，這個辛酸的夢依然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斷之不能！



第十章 路漫漫其修遠兮

悲愴的靈魂

一曲悲歌一行淚，年年傷感舊情懷。
春風何時再吹來？

漫漫長夜數十年，夢裏多次返故園。
荒蕪深處獨徘徊。

——〈獨徘徊〉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101·蚌埠民運

蚌埠僅有幾十萬人口，只是中國數百個中小城市中的一個。蚌埠經濟落後，是破敗的工業城市，知識分子特別少，本科大學也只有兩個，民運資源最貧乏，幾乎沒有外援，我們只能靠玩命苦幹！

因為民運在這個年代純粹是奉獻性的事業，太危險，誰也不知道共產黨什麼時候會抓我們？所以全國各地大部分有民主思想的人不敢從事民運。誰也不願意蹲監獄，誰也不願意雞蛋碰石頭，被習慣於殘酷迫害異己的共產黨搞臭、搞殘、搞死。

毫無愧色地說，之所以有蚌埠民運，蚌埠民運之所以有如此貢獻，就是因為我的存在。我是一台發動機，近二十年來始終不停地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投入民運。我總是把我知道的一切與朋友分享，把他們引進這個民主陣線，為民運事業作貢獻。只要能夠推動民主進步，我不惜一切代價。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與之相應，蚌埠公安局的鎮壓力量

也是特別強悍的。十年來，無論是縱橫中原四省，曾有五十萬信徒，各地各市都無奈的呼喊派領袖吳楊明；還是橫行南中國，在廣州、杭州、上海、南京都成功擺脫追捕的王炳章，都栽倒在蚌埠公安局的手裏。

一般大陸城市的公安局長、安全局長，都是曾經主管油水最大、紅包最豐厚部門的官員出身。唯有蚌埠，這兩個局的局長都是清水衙門一科出身，長期負責政保工作。他們的政治警惕性實在太高，他們一直是共產黨看家護院的一柄忠實而兇猛的鐵錘。

他們不僅兇猛，還特別狡猾。將近二十年來，他們總是能夠在我們身邊收買安插許多特務，讓許多人暈頭轉向；總是攪得我們一團混水，內鬥激烈。

孔子早就教導我們：要想自己站得穩，必須首先幫助別人站得穩。我全心全意地幫助過很多人，曾經在紐約民運圈裏流傳的「民運之最」裏對我的評價就是：隨時準備討好所有民運人士。我很高興這個諷刺的評價，我願意像店小二一樣跑來跑去，為大家效勞，因為我熱愛民運，我敬愛這些人，願意為他們效勞，我不在乎我自己！

我理想中的武士就是這樣的：衝鋒的時候能衝在最前面，退卻的時候能留在最後面，到了後方休息的時候還能給大家端茶倒水，所以十七年來我一直是這樣幹的。

在蚌埠民運界，我先後推出過好幾個領導人，而且我是真心實意地想抬舉他們，培養他們，只要他們肯為民運出力，敢與共軍叫板，願意做一條好漢。但是遺憾的是，有的人馬上飄飄然的就以為自己真的成了領袖，就不向共產黨進攻了，反而開始絞

盡腦汁打壓同志，生怕別人冒出來取代他。就等著共產黨倒台好摘桃子了，甚至以此為資本去公安局申請津貼去了，真是可笑可悲。

儘管如此，甚至恰恰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將近二十年連續不斷的糾纏滾打下來，蚌埠才能形成一個民運圈子。所以無論公安局怎樣痛擊我們，一次又一次把我們投入監獄，我們始終沒有屈服，始終沒有銷聲匿跡，始終在堅持著。

102·灰色民運

我一向認為德比才重要，一千個小人加起來還不如一個君子有用。

小人總是兩面三刀、信口雌黃、沒有一點坦蕩君子的味道，所以本質上都是孤立無援、內心虛弱的。他們從來沒有理解現代文明的本質，不懂得遊戲規則，以及傳統約定俗成的、非文字契約的重要性，這正是中國人傳統劣根性的表現，而尤其是共產主義餘毒發作的結果。甚至可以說，中國人五十年來所遭受的苦難，主要是由於這個原因！

特務雖然眾多，經費也多，畢竟只能躲在暗處，躲在民運人士的腋下、背後，只能放暗箭。小人嘀嘀咕咕，作用也與特務類似，多半是竊竊私語，不能登堂入室的。能夠起巨大破壞作用的還是假民運人士，也就是變節者。他們在我流亡美國時趁機造謠中傷，或在我入獄時趁機落井下石。

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S在M的唆使下糊里糊塗地攻擊我，顛倒黑白，造成很惡劣的影響。愚妄的人是

不可救藥的。我的對策是，大路朝天，你我各走半邊；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願往來！這些人是不可接觸者，永不接觸最好。一旦接觸了，他們就像又黏又臭的柏油一樣，早晚非要損害你不可的，怎麼洗都難洗掉。

其實中國人在這個世界上，確實類似於人類賤民群體，在全世界範圍內正在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歧視，凡是從法國巴黎轉機的人一定深有體會；凡是在俄羅斯東歐經商的人一定也深有體會；至於東南亞華人，受歧視更嚴重。未來華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更不容樂觀。

在民運與中共之間，始終有一種灰色民運，其一貫路線是詆毀民運人士，其如意算盤是，幫共產黨打倒真正的民運人士，等待共產黨對民運實行統戰之後進入政協，弄個委員當當，也就可以混一輩子了。這些人總是以為別人在跟他爭政協的討飯碗，簡直可笑。

灰色民運一直存在，這些人中派遣特務較少，絕大部分都是民運叛徒。都是有人格缺陷，被公安局抓住了把柄，在威脅利誘之下做了特情。然後長期拿著津貼、偽裝民運、兩面三刀、挑撥離間、鬼混一氣、形如鬼魅。

他們就像抗日時期的偽軍一樣，腳踏兩、三隻船，一味自利自重，自以為得計。這是符合許多中國小人性格的，良心、道德在他們眼裏從來不值一分錢，當年被竹聯殺掉的江南、現在正被審判的陳文英都是這樣的多面特務。

一九九三年M便開始從公安局領津貼，長期從事破壞民運、詆毀民運人士的勾當。誰起來從事民運，他就全力攻擊誰。

他那種把共產黨放在一邊，全力攻擊同道的姿態，那種喋喋叨叨、小蒼太婆似的心理狀態總是令我感到悲哀。他完全失去了最基本的坐標系，大是大非完全顛倒過來，根本方向都弄錯了。在他眼裏，彷彿沒有別的更重要的事可談，彷彿民運人士比共產黨人更壞更腐敗。

其實這正是辨別灰色民運、特務和小人的一項法寶，他們總是把反共及民運當作點綴，而90%以上的談話內容則是在譏諷真正的民運人士。

天下無有甚經君子，墮落常常是不知不覺的，魔蟲每每時刻都在引誘我們。

每個人都要保持警惕，不要變成小人，不要變成偽君子！

一定要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

克己復禮！

103·王庭金、王炳章與中共特務

聽到王庭金要自焚的消息，我嚇了一跳，我急忙請他太太張奇琴來注意，然後我就急忙去勸慰他，因為我瞭解他，他太單純、太正直、太善良了！他剛剛結束了三年勞動教養，回到家還不到一個星期。

下午他還在我家裏，當時他神態沮喪，說終於承認自己長期與公安局合作，多年來一直領取津貼和大舞活動經費，在何德甫未進監獄之前，他三次去北京找何德甫都是公安局出的費用。但是他又辯解說他的目的僅僅是爲了賺錢，他並沒有出賣民運多少有用的情報，王庭金忿問：「難道公安局是傻瓜，這麼多年長

期白白地付給你那麼多錢？」

W又揭發另外兩個特情，他作證說，那兩個人拿的錢比他還多。而那兩個人都是王庭金一向信賴的，其中一個還是與王庭金一同被捕的同案，其實我早就懷疑那兩人，現在終於被W證實了。

原來一切竟是如此荒唐的遊戲！王庭金的精神一下子崩潰了，他悲傷地問我：「我們究竟是為了什麼？我們究竟在幹些什麼？我們的身邊盡是特務，我們整天被特務牽著鼻子走，這麼多年毫無察覺，只是奇怪我們無論幹什麼公安局都一清二楚。現在才知道原來我們周圍盡是特務！盡是卑劣的小人！」

「我真的絕望了，我們太可憐了，我們太可笑了，我們太可憐了！」王庭金絕望地歎道：「這樣窩囊地活著還不如放一把火！轟轟烈烈地燒死自己！」

我勸慰王庭金，想開一點，現實就是這樣，各地的中共特務都那麼多，何況蚌埠。墮落的靈魂占據絕對優勢，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必須面對的。

一九九四年我被莫須有的罪名勞教三年，憤而絕食二個多月，差點死掉。後來得知背後盡是落井下石的枝枝暗箭，也氣得要死。但是不也過來了。想開一點，方今共產黨為刀俎，我們人民為魚肉，有何辦法？比起毛澤東時代，現在還是好多了，至少不殺我們了。

我只好跟他談我的經歷，這樣的事我碰到的太多了，我在紐約時已懷疑W是特情，因為他竟然在家裏的電話裏大談一些不該暴露的事，特別是我離開安徽前與他們私下預定的極秘密的事，

這樣通了幾次電話之後，我幾乎可以斷定他是特情。

我從廣東勞教所出來回家鄉之後，堅決不與那幾個可疑的特情見面，他們個個都像熱鍋上的螞蟻，團團亂轉，多方面託人要求見我。我僅僅用這一招就使他們好幾個人暴露出來。

後來我與他們再見面的時候，就直截了當地問他們，W第一個向我招了，另外三個特情在我的頻頻暗示下也巧妙地向我承認了他們的複雜背景。對這種人我並不想打爛他們的飯碗，我的要求一向不高，只要承認就行，免得我被你迷惑，被你賣進監獄還不知道怎麼回事。

特務之能，有時候是匪夷所思的。王庭金告訴我，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初，南湖勞教處突然如臨大敵，戒備森嚴，王庭金多方打聽，得知南湖當局得到警告，我要帶人去劫獄救出他。王庭金急切地要通知我，別掉入陷阱，對方已有防備。

那個時間我和魏泉寶還在香港，還在和陳老闆討價還價。半個月後王庭金妻子來看他，他便急忙讓他妻子設法轉告我，別回大陸來，我的動向這邊已知。他妻子則告訴他，我幾天前已在廣州被捕了，看看多麼厲害！

這個消息令我震驚，因為這個念頭，我只跟王炳章小聲說過一次，在他家裏。只跟他一個人說過一次！

王炳章家裏肯定有竊聽器！他不去租一間安全的房子，卻為了省一點錢租一間可能有竊聽器的房子，當然是特務介紹給他的。他總以為他有能力去駕馭中共特務，我和魏泉寶掉進陷阱就是因為王炳章如此，他自己掉進陷阱也是因為如此。

我在南湖勞教三年，情況非常熟悉，救一個人並不難，如

果勞教隊毫無防備，事先設法通知要救的人，然後去一輛車接走就行了。在山坡上帶工的隊長只能目瞪口呆，他們又沒有通訊工具，只能派人下山去中隊部報告，再逐層向上報告。等到管理處追捕隊派車追趕，已是半個小時以後的事了，我們都跑到六十里開外了，一路上也沒有任何檢查站。

一九九八年一月王炳章第一次回大陸的時候，我毫不知情，王炳章只是說他有一個朋友要到大陸去，問我有沒有可靠的朋友介紹兩個給他。我就把王庭金和王庭金最信賴的一個人的電話給了他，並特地警告王炳章，王庭金家裏的電話可能是被監聽的。他還特意做了一個記號，但是後來在慌亂中，他竟然直接打這個電話與王庭金約見！

得知二王在蚌埠被捕之後，為證實下落，我十分著急。除了讓我母親和王庭金妻子出面作證外，我還用公用電話給丁啟彬打了一個電話，讓他去偵察一下，二王是不是被關在玻璃設計院招待所裏。那是一個條件很好、很隱蔽的地方，我估計十有八九關在那裏。前天王庭金終於證實：的確如此。

正當我們籌款準備委託丁啟彬找一幫江湖上的哥們營救二王時，王炳章已獲釋了。

王炳章回紐約後向我表示，兩人之所以被捕，一是怪他自己直接打電話給王庭金被竊聽，二是怪王庭金警惕性太差，沒有抓緊時間走脫。

前天我問王庭金此事，他說他當時根本不知道對方是王炳章，根本沒有感到有任何危險。還以為僅僅是一位民運人士來看他，很平常的，沒什麼大不了的。如果他當時意識到有危險，兩

人完全可以從從容容地逃掉。

王炳章當初肯定沒想到這一點：他不信任別人的習慣總是導致別人無法作出正確的判斷。正應了一句古話：聰明反被聰明誤！

查清一個特務的底細很不容易，一般都得花好幾年時間。只有長期從事專業民運的人才能弄清楚一個地區的特務情況，匆匆過客或時常隱退的民運人上一般無法搞清楚，最容易掉進陷阱。王炳章精明過人，但也多次掉進去。那些想突然做大、不問青紅皂白、急急忙忙招兵買馬的民運領袖，也最容易掉進這類陷阱。

104 · 抓特務

民運之所以可悲，就在於墮落的靈魂占據絕對優勢，而普通人則在趨利避害的天性驅使下躲避我們。所以熱心跑來圍繞我們的，多半是特務，或者最後變成特務，我們常常是根本沒有選擇合作者的餘地！

我一到紐約，就被輾轉介紹住在特務家裏。我要自己裝電話，特務怎麼也不肯，非要從她家裏拉一根電話線出來，以便隨時可以監聽我！我剛到美國，我的鄰居就帶我去大西洋城教我賭博，看我沒什麼興趣，轉而又熱切地建議我去搞傳銷，帶我去聽傳銷課，說肯定能發財。幾天後，另一個「民運人士」更是熱情地帶我去傳銷公司，還說許多民運人士搞傳銷都發了大財！

但那時我還沒有想到這都是特務的安排。過了幾個月我才突然意識到，我住的地方可能是一個特務據點，連房產都被中共買下，住在那裏的幾個人都鬼鬼崇崇的。我急忙逃出那間住房，有

半個月裏只好睡在哥倫比亞大學海爾曼人權研究所辦公室的地板上，陳破空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兩位學者曾在火車上看到我在紐約逃亡時的可憐相。他後來還跟我說，看到我拿著幾個紙袋，茫茫然的樣子，幾乎流出淚來！

契訶夫有一篇小說「變色龍」，描繪了一個八面玲瓏的官員怎樣投機。其實對於中國人而言，那是小兒科。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每個中國人都是一條變色龍，多變善變、投機取巧的經驗已積累了幾千年，男女老少都能嫻熟運用，幾乎成了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天性。

變色龍天性體現在政治上，就更加複雜。毛澤東和康生曾經有一個論斷：凡是被捕過的共產黨員，肯定都會背叛組織，絕對都是叛徒。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也符合一般犯罪集團的規律。

周恩來臨死前幾年，見人就辯解他沒有被捕過，那是敵人造謠。中共第三任總書記向忠發，上午被捕，下午叛變，晚上就親自帶路去搜捕周恩來。中共第一號領袖、中央總書記尚且如此卑劣下賤，何況其餘。

所以中國人是最容易做特務的，最容易被收買的。蚌埠民運圈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特務們之間為了爭奪有限的津貼和活動經費，經常鬧得不可開交。有時打得很兇，互相檢舉揭發，鬧到最後都被暴露出來，讓我們哈哈大笑。

按照我的估計，特務和叛徒的比例在紐約的民運圈子裏占70%，在大陸則占80%。每個真正的民運人士，身邊都圍繞著三到五個特務，並且以他們為至交，一個不行，就再換一個。在大陸這更簡單，誰和你來往，公安局就找誰談話，在威脅利誘下，

大部分人或者與公安局合作，或者與我們斷絕來往，在蚌埠就是這樣的。

我們完全處於被嚴密包圍之中。

因為與特務打了十幾年交道，也親手抓過許多特務，所以我對特務有一定的瞭解。他們一般思想薄弱，不夠深刻，這是他們的致命缺陷。所以當你懷疑一個人是特務時，與他深談，就會暴露他的膚淺。

這是任何機智和訓練無法代替的。在共產主義腐朽思想的嚴密包圍下，一個真正的民運人上是要一定的天賦，加上十數年的心血，獨立思考、艱苦探索才可以達到一定水準，很難濫竽充數的。

其次是與他談倫理，瞭解他的道德觀，那往往是特務的另一個致命傷。在內心深處，他們都是冷酷的唯物主義者，唯利是圖，談多了就會掩飾不住地暴露出來。他們沒有同情心，他們沒有正義感；他們完全以自我為中心，視他人如草芥。

因為老是被特務包圍，老是吃他們的虧，久病成醫，所以我最近兩年，一意清理門戶，抓到了六、七個特務。現在一般的特務，我只要用鼻子聞就可以聞出來，因為他們與品德高尚、一團正氣的人完全不同，身上確實有一股鬼魅般的邪佞之氣，接觸多了就一定可以聞到。

這些特務都是定時炸彈，十分危險，不抓出來，等到將來民運進入高潮，這些特務就會占據重要崗位，關鍵時刻就會給我們致命一擊，把一切都給毀掉。

由於中共統治已進入末期，陷於人事制度的複雜，特務注定

了只能被欺騙利用一段時間，共產黨一般不會給他們多少福利，加上思想觀念上有一定的不同，所以特務最後都要被無情地拋棄。

我對特務還是一向積極爭取的，按照我的估計，將來民運的很大一股力量便是這批特務，像是蘇聯的克格勃那樣。因為他們接觸西方文明的機會較多，與我們相處的時間較長，他們畢竟還是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看大限將臨，他們馬上就會棄暗投明。至於變節者，本來就是牆頭草，隨時都會順風倒。

105 · 將計就計

一九九三年五月，王丹給我來了一封信，只是寥寥幾句問候語，但我決定把這份信複印很多張，傳給我的民運朋友們看，以鼓勵士氣。那時我突然靈機一動，先把複印件給了三個人，其中一個是我懷疑多年的特務，我一直想檢驗一下。

第二天我打電話給政保科，他們是定期找我談話的。我說現在一分錢都沒有了，這裏有一份文件想出售給他們，我開價當然很高，但是他們根本不相信我，說第一次做生意一定要先看看貨，再談價格。我當然不同意，堅持他們先付錢，否則免談。他們也傾向於認為我在捉弄他們，但顯然沒有往更深處想。

最後我們終於達成協定：他們先付一百元，再看貨，再談價格。洪彥民來了，他一看見我那份複印件就臉色突變，破口大罵我在耍弄他們。我只好說交易就是交易，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如果存心想禮尚往來，回敬公安局一下，那就必須先抓一

個特務，然後唱雙簧。這個方面，我也給過當地共軍一次沉重打擊。把他們累得半死，幾乎活活氣死。

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對一個特務說台灣陳賜麟那邊有人約我去黃山見面，但是缺乏往返路費。特務第二天就來找我，說他舅舅願意資助，條件是他也跟去。那邊政保科如臨大敵，傾巢出動，千里追隨。

我就優哉游哉地去玩這場遊戲，中途到南京，為了進一步捉弄他們，我又謊稱接到條子，改在上海國際飯店見面，於是立即改道南下。害得他們白白在黃山北海賓館布置一番，立刻急弛上海。

我們在國際飯店最豪華的餐廳從從容容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看看錢花得差不多了，我就說剛才在衛生間又接到一張條子，附近有嚴密監視，取消這次見面，以後再說。真是好玩的遊戲。

遺憾的是，這個特務從此受到懷疑，停發津貼，最後遭到解雇。本來我是打算過幾個月再讓他們出一次路費送我到西藏遊覽一回，我非常想再去看看西藏的山，獲得一些靈魂的安慰。

也只成功這一次，後來我想在另一個特務身上故伎重演，卻根本沒有任何反應。共軍對於他們真正的對手，看得很清楚的。至少他們是不肯吃虧的，所以無論想出什麼辦法對付他們，也只能成功一次。

沒有玩過這種遊戲的民運人士不妨試一試，將計就計，絕對好玩。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我們可以有一點幽默感，調劑一下過於緊張的神經。反正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再說這一招也是共軍常玩的，長年累月耍弄我們，派特務來欺騙我們。我的遊戲畢竟不害人，而一九九四年、一九九八年對手則以毒辣的方式把我玩殘，差點把我玩死掉。他們還把王炳章玩進來，玩了一個無期徒刑。

王庭金一九九八年再次入獄，在雲南海關被捕的時候，罪名竟然是經濟詐騙！王庭金在被押回蚌埠的飛機上，與他們怒吵起來，氣得幾乎要頭撞飛機而死。我們明明從事的是高尚的事業，對手卻老是任意給我們捏造難聽的罪名！

106 · 冰冷的現實

從十六歲我有明確意志開始，我就自然而然地一步步走上了反抗共產黨黑暗專制的道路。開始還隱蔽一點，含蓄一點，二十三歲之後就確定了一生的道路，開始大膽行動了。比起老一輩反革命，我還是幸運的。自從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執政之後，在民主力量的衝擊下，共產黨對民運還是不得不一步步放開放鬆的，雖然這個過程很緩慢，雖然我們付的代價也很大。

共產黨也不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對我們這類人窮追不捨，監控是肯定的，但並不主動追擊我們，總的來說他們對我們還是狙擊性的而不是進攻性的。每次出獄之後，如果我們不再從事民運活動，他們一般也不會主動找我們麻煩，我過去那些夥伴，這些年來一直正常地生活。

但是，監控系統是很嚴密的，這麼多年來，無論我們在哪裏，以何種方式發動進攻，共產黨就會在那裏狙擊。只要我們過了紅線，就會立即被抓進監獄。無論我們怎樣探索，無論我們怎

樣努力，我們總是失敗，總是一敗塗地，總是鋃鐺入獄。是我們太無能嗎？是共產黨太能幹嗎？不，我始終不這樣認為。是我們錯了嗎？共產黨是正確的？這更是不可能的，打死我我也不會同意。

每次失敗之後，在監獄裏，我都會反反覆覆地分析原因，吸取經驗教訓。想得腦子都疼，最後都空了。最後我才得出結論：中國人的確是墮落的，不願爭取民主的，我們太孤立。

從根本上說，民主是大家的事業，絕不是少數人的事業。當年中華民國之所以失敗，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那個時代的中國人，道德水平比現在要高很多，但是趨利避害的特性仍然占了絕對優勢，很少有人願意挺身而戰邪惡勢力，大部分人想的是怎樣從中漁利。

中華民國三位軍隊副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都是鼠目寸光的、典型的傳統的勢利小人，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更是如此。共產黨的奴隸大軍鐵板一塊，巨輪滾滾，焉能不勝？

如果中國人不是墮落如此，幾萬滿清騎兵怎能輕易征服上億的中國人，並且讓他們俯首帖耳做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奴才？

更讓我痛心的是，我看到，絕大部分中國人目前並不願去爭取自由民主，他們只需要錢，只需要享樂；只需要更多的錢，只需要更多的享樂。

即便有殺頭的危險，即使有成千上萬的人已被槍決，數十百萬人也要去製毒販毒，中國的禁毒政策其實是世界上最嚴厲的，但是依然擋不住滾滾毒流在短短十幾年之內把中國不僅變成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費國，就我所知，中國也已成爲世界最大的毒品生

產國。一切都在地下進行！

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只有雲南、四川、陝西種植鴉片，但是一九九六年，我在南湖勞教隊，碰到許多毒販子，他們已在安徽、河南、山東農村到處收購生鴉片，然後再去賣給別人提煉。二〇〇〇年我在廣州勞教隊又碰到大批毒販子，他們告訴我現在全國各地都種鴉片，套種在糧食地裏，只要遠離公路十華里以上，上級幹部不願走到的地方。

有一天我在菜盆裏發現一顆罌粟乾果，驚問太太從何而來，她說現在這已是最普及、最便宜的調味品，任何調味品攤子上都可以買到，只要一毛錢一顆！

而更厲害的毒品之王——專制權力，不受監督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更是氾濫成災，掩沒了一切良心、良知。吸食海洛因是以損害自己獲得快感，而濫用權力，貪瀆勒索則是以損害民眾，摧毀道德倫理，摧毀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獲得快感。

但是我們看到，無論怎樣反貪反腐，怎樣抓殺，貪官污吏仍如滔滔黃河，潰決千里，勢將吞沒一切！而最讓我寒心的是，很多老百姓認為：貪官貪污，是有本事，是有能力，是正常的，理所當然！

所以希望大部分中國人會以奉獻精神為大家的自由民主事業付出一些代價，至少現在，幾乎是不可能的！中國人也許會喜歡自由民主，但都想不勞而獲。

一九九九年，美軍誤擊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有組織的全國性的反美浪潮甚至衝到勞教隊，討論會上每個人都必須表態，有的說美帝國主義侵略本性永遠不會改；有的說美國人什

麼都不會，只會侵略別國掠奪財富；有的建議趕快往美國扔原子彈；有的主張立即與俄國結盟向美國宣戰，既然美國鬼子已經開火，不能等到他打過來，我們都成為亡國奴。

這些白癡似的胡言亂語簡直令我目瞪口呆！當我表示由於美國的民主政治制度，每一件事最後都得被公眾所知，誰也別想搞什麼陰謀，因而美軍不可能蓄意攻擊大使館之後，幾乎所有人都哄鬧起來，紛紛指責我是賣國賊，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差點要開批鬥我的大會，這就是中國的老百姓！

我們這些極少極少數人，還能幹什麼？

在中共瘋狂鎮壓法輪功時，儘管大部分中國人對法輪功一無所知，而且也不想知道究竟怎麼回事，但我聽到和看到的是：他們支援鎮壓法輪功，全盤接收中共的宣傳，至少認為這件事與他們毫無關係，那些大法弟子被抓被打被殺似乎只是為他們騰出了多一點的生存空間！這就是中國的老百姓！

現在中國人品德更是已經墮落到了深淵，墮落是一種很強的傳染病，絕大部分人是無法抗拒的。現在中國有專業的盜竊村，專業的詐騙村，專業的搶劫村，專業的製毒販毒村。每個單位，每個團體，只要有利可圖，都是奮不顧身的攫取，從來不考慮是否有罪，從來不考慮是否嚴重地損害了他人利益，甚至善盡天下人也在所不惜！只要自己能得一點點利！

我以前有一個供電局的朋友，在冬天裏，他家每一個房間都燒了一個三千瓦的大電爐取暖。他告訴我，供電局職工家家如此，我粗略計算了一下，一個家庭一天起碼燒掉二百度電，值一百元，一年起碼燒一百二十天，就是一萬二千元，當然誰也不

會付一分錢，當然都轉嫁到別人頭上，而這筆錢可以提供十個蚌埠市人一年的最低生活保障，各行各業各個單位莫不如此運作，絕對不會有一家例外，這就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這就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我以前更多考慮合理性，較少考慮現實性。西方文明越來越大的影響，人類科技的進步，傳播媒介的發達，全球民主化的巨浪，共產主義世界的土崩瓦解，的確都是民主化的有利因素，也向我們表明一種民主進步的必然性。

但是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倫理道德觀，中國人的政治理念，五十年來不僅沒有任何進步，反而日益倒退。利弊相抵，民運比五十年前更艱難，甚至比一百年前還艱難。

107 · 共產後遺症

毛澤東充分利用中國人的劣根性建立了極權統治，而在共產黨統治五十多年後，這些劣根性都得到了空前的發揚光大。對於這個世界，這才是真正的黃禍！

廣義地說，毛澤東把整個中國都變成了一座大監獄，而勞改隊不過是嚴管隊而已。在這個大監獄裏，按照馬克思主義，每個人都要在黨的領導下「積極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根據這個定義，所有人都必須「改造」自己，通過勞動和服從「改造」自己，把自己「改造」成共產黨的馴服工具。

所以不僅僅是監獄裏的勞改犯患有勞改後遺症，經過五十多年的共產黨奴役之後，被蒙上眼睛和耳朵的全中國人民都患有勞改後遺症，可能稱其「共產後遺症」更確切。

我們的父母一輩，當年在工廠裏，每天除了八小時勞動，還要義務地為共產主義事業添磚加瓦，也就是加班。另外還要政治學習，匯報思想。大家都沒有任何選擇權利，跟勞改生活也差不多。

世界上從來沒有高尚的奴隸，人們也沒有理由去要求奴隸高尚。而奴隸們主要的反抗或墮落方式就是「偷」，所以在勞改中國，幾乎所有奴隸都會「偷」。各級官員們「偷」的本領，更是了得，當之無愧是世界之最！

搞垮大型國營企業的不僅僅是貪官污吏，工人階級也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幹部貪污敲詐，工人就偷東西。什麼都偷，從一塊布到一根鉤針到一塊肥皂到一塊餅乾，發揚愚公移山精神，積少成多，然後拿去送給親朋好友，積累人情，互相「幫助」，解決苦難生活。這是毛澤東時代一般幹部和工人的典型生存方式。

這是無奈的生存方式，我在這裏並不譴責這些人，確實不能怪他們，都是被逼得沒辦法。但是另一方面，這又是一種極其敗德的惡習，一旦養成了就很難改掉。所以中國的官員在貪污敲詐的時候，從來沒有遇到思想上或道德上的阻礙，唯一需要考慮的僅僅是做得巧妙一點，別被發覺。

在已經實行民主變革的東歐和前蘇聯，這種普遍的道德墮落也是很難扭轉的，記得有一個統計說，俄羅斯有70%的官員腐敗，這些多半都是前共產黨員，唯物主義者，普京的擁護者；其餘30%的官員不腐敗，多半則是東正教徒。

習慣的力量是強大的，改正起來十分困難，因為很多情況下我們根本意識不到。

扯謊和欺詐。在大陸，你上街去買東西，不管真貨假貨，你都得不到公平交易的機。即使與你熟悉的朋友，也不能公平合作，凡是合夥做生意的中國人，都吃盡了這個苦頭。民運之所以不團結，便與這種素質有關。這種流行病甚至嚴重到，一個誠實的人也會被當成騙子！

中國人虛偽、好鬥，也是一個奇景，一方面我們都有毛病，甚至缺陷，卻把自己當成不能碰的神仙；另一方面卻動輒攻擊別人，甚至不遺餘力，其大部分攻擊理由，竟然都是似是而非的、根本不值一提的。

這些都是大大強化了的中國人劣根性，即共產後遺症。

記得一九八〇年在北京看過一個阿根廷現代舞「女孩之死」，表現一個在墓穴裏長大的女孩，後來獲得了解放，開頭興高采烈，亂蹦亂跳，後來就不知所措，感覺空虛無聊，最後竟然一步一步的退回到墓穴裏！

當時我特別激動，這個舞蹈太有象徵意義了，如果給她改名「中華民國之死」，更恰當。不再向皇帝磕頭的中國人，在獲得自由之後確實是不知所措，非要找一個皇帝效忠不可。在放棄了可以選擇的權利之後，只有「選擇」毛澤東這個粗野、狡詐的山匪頭子頂禮膜拜。

不僅工人農民不知所措，大部分地主、資本家、知識分子也不知所措，他們伏倒在地，三呼萬歲萬萬歲，甘心情願做奴隸。一群可恥可憐的奴隸，隨後就被屠宰或奴役！

如郭沫若這類偽君子真小人，不明大義，民國時期有點自由就大鬧特鬧。最後竟然認賊作父，非要鬧出一個毛澤東式的暴

君，以冰冷的刺刀對付他，他就像烏龜一樣老實了。類似的敗類數量太多，他們都向我們活生生地證明：他們只配做奴隸，他們根本做不了文明人。他們願意享盡一切自由的樂趣，卻絲毫沒有感到自己有義務要承擔！

直到現在，中國的工人農民雖然因為生活苦難而怨恨不已，但還是願做一個奴隸，渴望有一個英明的主人出現，不再折磨他們，使他們以後能吃的穿的好一點，知識分子、官吏也莫不如此。

這個共產後遺症，在國外的華人也應該能看到：海外的擁共者，就是如此，他們一方面享受自由民主的福利，一方面為了賺更多的錢，卑劣地為專制暴政服務。

這種只想貪便宜不想付代價的劣性思維方式，這種不肯與他人、不肯與社會公平交易的劣性思維方式，在經過五十多年的奴隸生活之後，在中國大陸更加嚴重！

如果一九八九年時有更多的中國人少一點自身利害考慮，正義感和社會責任心稍微多一點，支援民運堅決一些，而不是等天上掉下餡餅，猶疑不定的鄧小平也就順水推舟，中國也就和東歐蘇聯一樣順乎民主潮流，至少向前進一步了。

這些都是共產後遺症。

共產主義狂潮退去，留在沙灘上的，就是愚昧和墮落。我們不能異想天開，必須比其他人付出多一倍的努力，付出足夠代價，用力清洗，反覆清洗，然後這個群體才能有所作為，中華民族的大悲劇才有望結束。

108 · 金子是怎樣煉成的

共產黨人有一本書名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裏面的主角保爾·柯察金最後被煉成了一塊沒有思想、沒有靈魂、自覺自願的馴服奴隸，這樣一塊廢鋼鐵竟然曾經是全世界許多人的偶像。

五十年代中共曾經在每家各戶搜盡鐵鍬鐵掀、鐵鍋鐵鏟、鋼勺鋼碗，來大煉鋼鐵。記得我上小學的時候，城鄉道路上布滿了巨石一般的鋼鐵渣，其作用便是污染環境、妨礙人們正常走路。

經過共產主義運動幾十年的錘煉，十幾億中國人現在已經被煉成全世界最愚昧、最野蠻、最墮落的人；最可憐又最可恨的人，就像那些廢鋼鐵渣。實際上中國人也是除朝鮮、古巴之外最貧窮的人，中國人只要出了國門，在自由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掙到多幾倍的工資和更好的生活。

保爾·柯察金和他周圍的那些人一望而知全是苦瓜爛膿，他們根本不知道生命有何意義，從來也沒有認真思索過。資質低劣卻又不肯認真學習聖賢教導，道德敗壞卻又不肯虔誠信仰宗教，完全是一群迷途的羔羊。更像野獸一樣，每天活著就為一口麵包，打來打去，和我在勞教隊見到的那些壞人幾乎一模一樣。

共產主義煉來煉去，只煉出兩種人：史達林一類的惡魔，保爾·柯察金一類的奴隸。這是中國勞教隊的基本結構，也是所有共產黨國家的社會結構，也是共產主義的最終正果。

而真正的人，真正優秀的人，首先有三個要素：

第一，他是一個思想者，他思考人生意義，他探索生命真理；他有詩情畫意，他有浪漫情感；他憐憫眾生，他扶老攜幼；

悲愴的靈魂

他經常反省自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明白何為公義，何為公理。

第二，他是一個創業者，一個工匠。他有明確的奮鬥目標，不辭勞苦，辛勤工作，創造財富。按照自己的願望，建立富裕美好的生活。

第三，他是一個戰士，他必須有判斷能力，他知道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他首先要能保護自己和家人及朋友，其次要能捍衛人類正義。在緊急關頭，他能拔劍而起，挺身而戰，不惜一死。

看看我們曾經卓越的祖先，文王、武王、姜尚、項羽、岳飛、文天祥，都是一身兼任詩人、業主、戰士三種角色，即如導師孔子，也是勤儉治家，佩劍周遊列國，傳播思想。

看看美利堅合眾國的創建者和捍衛者，華盛頓、傑克遜、林肯，也都是一身而三任。他們既是傑出的思想者，又是成功的業主，又是善戰的將軍。這三個要素是環環相扣的，缺一不可，雖然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但構成完整人格的三個要素依然沒有改變。

任何時候思想都是第一位的。沒有思想，就像被切掉大腦的小白鼠，就像被擠斷脖子的羊群，就像茫茫大海中失去了方向的航船。一切財富來源於思想，一切美好的東西來源於思想，沒有思想，我們就會或為行屍走肉，出了門往哪兒走都不知道，當然更不知道明天應該幹些什麼？明年應該幹些什麼？一生究竟應該幹些什麼？

美國強壯的根源既不是科技發達，也不是武器先進，因為這

些東西隨時可能被更先進的東西淘汰。美國強壯的基礎還是豐富的思想，信仰及由此制定的法律。

而資產、財富，本質上是人體生命的外延。一匹馬可以把人的兩條弱腿變成四條健腿，一輛車又把我們的弱腿變成四個飛輪，可以日行千里；一身暖和的衣服可以使人血氣充盈，一套漂亮的時裝可以使人瀟灑優美；一頓好飯菜可以使人精力充沛，一套溫暖寬敞的居室可以使人保持健康。這些統統離不開財富。而共產主義卻拚命煽動人們仇視資產，仇視財富，其結果，人們一無所有，赤身裸體，紛紛餓死。現在的北韓就是一個活樣板，簡直愚蠢透頂。

最後我們還得是戰士，我們必須隨時準備保衛我們的生命、財產和思想。這方面必須有適當投入，投入思想，投入財富，有時候還得投入自由、健康，乃至生命。如果我們拒絕投入，就像我們的房間沒有鎖，沒有堅固的牆，我們的車沒有門鎖，沒有保險一樣。壞人永遠都會有，我們必須永遠保持戒備。

我常常想，五十多年前的中國地主富農資本家商人知識分子，既不願出資，也不願出力保衛中華民國，任由保護他們的政府倒台，像一群極端自私自利，目光短淺的豬。結果共產黨一來，他們的財產都被沒收，知識統統作廢，連人都被奴役或消滅，子孫也都被打入另類，吃盡惡果，多少也有點活該。

現在正在改革開放的共產黨人，已經掠奪了幾乎所有的社會財富，卻不考慮怎樣長久保持，一味使用暴力壓制別人，任由自己貪慾橫行，也是徹底反過來的另一種愚蠢。他們從來不知道使用頭腦認真想一想：辛辛苦苦從正道積累財富的地主資本家都會

悲愴的靈魂

被連人帶錢一起滅掉，他們這些掠奪者和破壞者對社會究竟有何貢獻？何德何能享用這些財富，而永遠不會被滅掉？

當代民運已經探索了二十多年，幾乎所有的路都嘗試過了，到目前沒有一條能走通！當我們無可奈何的時候，我們只能修煉自身，把自己煉成一塊金子。

真的金子，閃閃發光，熠熠生輝，數千年來，受到人類始終不渝的熱愛；

真的金子，出淤泥而不染，無論怎樣蒙垢，揮掉紅塵，光輝依舊；

真的金子，既剛強又溫厚，不怕煙熏火煉，不懼風刀霜劍；不怕污泥腐蝕，不懼掩埋千年。

真的金子，如霍金，四肢俱廢，全身癱瘓，連話都不能說，卻傲然搏擊命運，堅忍不拔，成為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僅僅憑著一個手指頭緩慢地敲擊鍵盤，便能夠寫出科學巨著。

真的金子，如佛蘭克林·羅斯福，坐在輪椅上競選美國總統，坐在輪椅上領導全世界人民摧毀法西斯。

真的金子，如項羽，以必死之志，破釜沉舟，九戰九勝，一舉而滅暴秦，救天下黎民於水火之中。

只要你有一顆金子般的心，有燃燒的激情，有激越的靈魂；不甘於沉淪，不溺於安樂，你最終都能成為一塊真金！天生萬物，俱有其用！

只要民運有一群真金，我們一定會時來運轉，人民早晚會需要我們，我們一定能透出溫暖，最後發出光輝。

真正的英才，都是在逆境中，在毀謗中，在萬難中產生的！

破土而出，逆水行舟，本就是生命本質；凌空搏擊，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

呼喚黃金！呼喚白金！呼喚真金！呼喚英雄！呼喚真英雄！
呼喚大英雄！



第十一章

新觀念：文明與野蠻

致中國：
你是新千年人類文明，
最後一片遼闊的沼澤。

陽光不能蒸發罪惡，
山崩地裂也不能摧毀邪惡。

依然需要血肉之軀，
憑著愛和勇氣衝擊！

—— 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

109 · 失落思想的民族

人類，這種兩足動物，究竟靠什麼生存於萬物之林，而且生活得最好？

我們幹活不如牛馬，打鬥不如虎豹，靈巧不如猿猴；既不耐寒也不耐熱，更不耐勞。人類嬰兒的生存能力，幾乎是所用動物中最差勁的，離開父母的長期照顧，根本不能存活。

我們究竟靠什麼，才能在殘酷的自然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萬物之靈長？

思想。我們人類靠的是思想。比起任何動物，人類更善於思想。我們人類所有美好的一切，以及我們的強大，統統來源於思想。沒有思想，我們就只有走向衰敗毀滅。

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大饑荒，九十年代以來北韓大饑荒，人們指出的原因各種各樣，而所有這些原因的背後，其實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這些群體，也就是這個國家的民眾，失去了思想，喪失了思想能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之所以沒有大饑荒，是因為我們歡迎國外資本家到中國來設立加工廠，把國外污染的、勞力密集型的夕陽工業轉移到中國來，讓走投無路的農民子弟像牛馬一樣幹活，我們才沒有像北韓人那樣大批地餓死，才有可憐可悲的「經濟增長」。

儘管如此，中國主要還是靠殘酷的計劃生育政策，把幾億胎兒扼殺在母腹中，使他們不能出生，才在最近二十多年裏制止了成年人大批地被餓死，才有可憐可悲的「經濟增長」！

沒有思想，或缺乏思想的後果，是顯而易見的。現在全世界各國各地區各民族民眾的生活水平，幾乎就是與民眾的思想水平相當的。

思想博大精深、寬容博愛的民族，就是會富裕。即使他們沒有任何自然資源，如英國、以色列、瑞士、日本。美國的富裕與強大，其實主要也就是思想的富裕與精深。

而思想蒼白、人民愚昧的民族，即使坐在金山上，也是註定要受窮受苦的，如中國、伊拉克、伊朗、俄羅斯。

漢民族最輝煌燦爛的時代，是萬花齊放、萬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隨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思想殺手——秦始皇出現了。他殘暴地毀滅了所有思想和思想的載體——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漢民族從此淪喪。

項羽雖破釜沉舟，擊敗了秦軍，但由於漢民族已墮落，人們普遍動物般唯利是圖，結果劉邦一夥販夫走卒，反而打敗了有思想意識和復興周文明政治意圖的項羽，建立了庸俗的漢王朝。

後來更是每況愈下，唐詩宋詞的繁榮只是遣詞造句的曇花一現，並沒有拓展漢民族的思想空間。所以安祿山一介武夫，也能興起大亂。後來漢民族便越來越弱，飽受野蠻少數民族的蹂躪。

到了明代，中國歷史上第二個思想殺手——朱元璋出現了。他大興文字獄，用特務管理國家，給了苟延殘喘的漢民族思想以沉重打擊，使漢民族更加墮落。以致到後來三萬八旗兵就像打獵一樣追殺數百萬漢軍，在中國大地建立了少數民族長期專制漢人的政權。

近代以來，借助西方民主新的思想觀念，漢民族從沉淪中試圖崛起。不幸的是，中華民國的復興運動先遭日寇侵略摧殘，又遭俄寇輸出共產主義蹂躪，從此墮入更黑暗的深淵。

這時，中國歷史上的第三個思想殺手——毛澤東出現了。他通過一次次的大屠殺和清洗運動，幾乎消滅了所有思想，尤其是思想的血肉載體——政治、文化、商業及各領域漢民族精英。

然後，又通過反右、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殘存的次精英群體一網打盡、一掃而光。從此，漢民族簡直就被共產黨改造成了一個類牛馬愚昧群體，或者饑寒交迫，或者為異族做牛做馬，到出口加工廠裏幹活。

這是任何一個失落了思想的民族必然要承受的惡果。

直到現在，解放中國人思想仍然是一句空話。中共當局仍然全力以赴地禁錮人民思想，把持所有的思想文化新聞藝術媒介；

並殘忍地對所有好不容易從愚昧污泥潭裏掙扎出來的、不甘沉淪的、政治文化宗教藝術的思想者，統統施以迫害，乃至關進監獄，進行牛馬化勞動改造。

中共全方位地禁錮思想，還包括干擾國外電台，禁止人類先進思想進入中國，嚴格控制各級教育，用共產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次品法西斯主義）等等垃圾思想，對國民徹底洗腦。反正竭盡一切手段，決心把十三億國民冶煉成沒有思想的牛馬或共產主義鏽鋼爛鐵。

所以，無思想中國、不思想中國人，已經注定了長期貧窮、愚昧和野蠻的悲慘命運。我們正在被拖往的方向，就是漢民族更加牛馬化、弱智化。

這樣走下去，到有一天人類為了節約有限的地球資源，各國不得不大規模限制貨物貿易，改而實行資訊貿易的時候，或資訊產業足夠智慧化，可以取代密集勞力工業的時候，牛馬化、弱智化也不行了，走投無路的中國人，只有像一九六〇年一樣，再一次大批地被餓斃。

110·新歷史觀：從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

（1）重新看歷史

共產主義衍生的歷史唯物主義把人類歷史劃分成七個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儘管我不能讀懂外文，不知道外國學者怎樣劃分歷史，何況我又在共產黨監獄生活八年多，對很多東西都所知不多，但是我經過長期獨立觀察現實中國，認為這種劃分不對。

我的劃分很簡單，主要是因為，我在勞教隊裏，看到目前的中國社會既有原始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特徵，也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當然也有一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味道。儘管共產黨把以上這些東西都混合在了一起，但它在本質上竟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奴隸社會！一個絕對的野蠻社會，幾乎聞不到一點人類文明的氣息！

在這本書裏，我以我的民運生涯和監禁勞改生活為視角，從這文明荒漠裏，從刺人的野蠻荊棘裏出發，從勞教隊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發，從當代中國人與人之間的本質關係出發，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角度出發，從各種角度剖析了這個社會的奴隸制本質。

經過漫長而痛苦的思考，最後我斷然把人類歷史劃分成兩個時期：野蠻時期和文明時代！

野蠻社會的兩個基本特徵是：生產力水平低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野蠻的服從與被服從，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

文明社會的兩個基本特徵是：生產力水平很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每個人都享有自由和基本人權，自然是民主政治與之相應。

在這個定義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三個社會形態的區別都是不大的，都可以概括成野蠻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都是後野蠻社會，是人類從野蠻社會向文明社會過渡時期的異化形態，是一些群體對抗文明社會，拒絕進入文明狀態的蠻性發作。

在人類沒有開始工業革命之前，由於生產力水平非常之低，

絕大部分人僅僅為了填飽肚子，就得像牛馬一樣終生忙碌，根本沒有條件受最基本的教育，去閱讀文字，能知天下事，有條件思考政治問題。原始的通訊和交通條件也根本無法承載民主政治這種大面積大範圍的交流，當然也就不可能進行民主選舉。偶然出現的古希臘古羅馬共和制很難生存，只能曇花一現，很快就滅亡了。

在面臨異族入侵，民族存亡的時候，人們又必須整隊出戰，這就必須有一個領導集團；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又總是有大量的矛盾仇恨，另外還有些殺人放火、四處擄掠的匪徒橫行，人們也必須有統治者率領一個武裝集團來保護他們。

基於人群最基本的安全生活要求，王權應運而生，統治集團出現了，他們當然是專制的。開頭他們還小心翼翼地不向民眾索取太多，但隨著權力的鞏固，就越來越無所顧忌了。然後就是腐敗腐朽崩潰，就是天下大亂，直到新的王權確立，如此周期性循環往復以至文明時代到來。

（2）四百年對抗：文明與野蠻

工業革命使人類獲得了從牛馬般操勞解放出來的基本物質條件，大家都能學習文字、閱讀和思考，都能通過廣播電視報紙雜誌瞭解各種事情，並形成自己的判斷。人類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公平地討論問題，建立民主代議政府，甚至對一些重大問題訴諸全民公決了，在工業化前社會，這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在工業化時代，人們也必須實行民主制度，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和對立才能盡可能減少，因為這是一個主要由智力知識而不是體力勞動建立的社會，要求每個人盡可能心平氣和地動足腦筋，

創造性地工作，並能夠公平地在市場上出售自己的工作成果。

所以最早實現工業化的英國最先建立了民主制度，並且漸漸把它推廣到其他國家。主要由英國人建立的美利堅合眾國，這時已漸漸顯示了民主制度的無比威力，短短兩百年裏把一塊不毛之地建成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國家，可以在全世界武裝巡邏，主持公道，推廣文明。

在這個推廣過程中，民主面臨傳統王權的拚命抵制，西班牙帝國、法蘭西帝國、德意志帝國、日本帝國的統治者都視民主為洪水猛獸，竭盡全力煽動人民仇恨，並先後舉國抗拒，但最終都歸於失敗。

而中俄兩個古老帝國最後走向共產主義極端道路，成了專制主義最後的、最頑強的堡壘，也是與民眾傳統專制觀念的頑固性，與這種歷史大背景分不開的。

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已建立民主制度，阿富汗、伊拉克不自量力而自取滅亡，北朝鮮、敘利亞、伊朗惶惶不可終日，利比亞索性舉手投降了。民主化浪潮明顯已勢不可擋，抗拒的國家必有一天崩潰戰亂，而戰亂之後，民主制度還是會建立起來。

何況實在鬧得兇了，美國會迫於人道壓力而出兵干預，至少可以搞搞斬首行動。而專制國家，只要首惡被斬，其他問題就好解決了，正如杜甫詩言：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3）歷史夾縫中存在的共產主義

在人類數千年歷史上，共產主義幽靈始終在一小撮人腦海裏徘徊，從陳勝吳廣到黃巾軍，到李自成洪秀全，都曾經在天下大

亂、人心迷惑的時候揭竿而起、大肆破壞過。

所有這些人類早期的共產主義運動失敗的原因，並不是共產黨人分析的那樣，是沒有正確思想，是沒有馬克思主義指引。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就曾經斷言，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還不到一百個，但是他們照樣奪取了政權。

根本原因在於，農業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根本無法承載共產黨這樣一個龐大的、素質低劣的、極端低效的統治集團和軍隊。

清廷統治中國二百七十六年，即使到清末，人口已達四億，軍隊人數都沒有超過四十萬，正式的國家幹部，也就是終身任職的官員，才六千四百個！原因很簡單，多了供養不起！因為軍隊要花钱養，官員必然要腐敗，人多了錢從何來？稅賦重了，有權腐敗的官員太多了，占用社會財富太多了，人民承受不起，必然要造反！

而現在中共，一個城市，甚至一個縣的腐敗官員數目都在數千人，如果不是工業革命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百姓怎麼可以忍受得了，早就武裝起義殺韃子了。

只有在工業革命進行過程中，在槍炮、社會財富、通訊條件已超越傳統農業社會的情況下，如共產黨這麼龐大低效的武裝集團，才可能存在於人類從野蠻社會轉向文明社會這個歷史的夾縫中。

為了保持隊伍的絕對服從，就必須建立雙長制，古代也曾用宦官監軍實行雙長制，但結果總是更糟，部隊更無法打仗。只有電報的存在，才能對遠處的部隊實行雙長制，才能隨時調解矛盾，及時發出命令，有效控制隊伍。

而洪秀全以前的共產主義者根本沒有電報，訊馬跑得再快也跟不上軍情變化。人心總是易變的，歷代共產黨人又沒有德行，焉能服眾？所以太平軍叛變的比例極大，誰也沒有辦法解決，最後只能分崩離析。

為了維持大規模的部隊生存，大量的槍械彈藥也必須機器生產，在洪秀全以前這也是不可能的，儘管太平天國所到之處，總是連人帶物擄掠一空，但還是不夠裝備全軍，因為這些東西只有機器才能大量生產，不斷補充。共產黨在最狼狽的時候，都要抬著一些機器的。而共產黨真正迅速強大起來，還是在獲得了當時中國最發達的東北工業設施之後。

大炮也無比重要。在傳統農業社會，一座堅城固壘就可能毀掉一支百萬大軍，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戰例。天京淪陷之前的一年裏，洪秀全曾發動數十萬大軍輪番衝擊曾國荃營壘的萬名守軍，結果反而把自己的隊伍消耗光了。但是工業大炮可以毀掉一切，任何堅壘堅城都不在話下。

槍炮彈藥及其他軍用物質在農業社會都是不可能大量迅速生產出來的。

共產黨在歷史的夾縫中終於建立統治之後，又是依賴工業化的交通通訊和工業產品來維持統治。沒有中共給赤柬提供這些東西，波爾布特那夥人早就人神共憤，被群起滅掉了；沒有這些東西，越共那些土匪還能幹什麼？

沒有工業化軍隊的沉重威脅，中國大陸六〇年大饑餓之後，農民早就抓起菜刀鐵掀，到處搶掠，揭竿而起了，絕不會在家裏眼睜睜餓死！歷史上就從未有過！九百個擔心遲到受罰的農民都

敢揭竿而起反抗鯨吞六國、威勢駭人的秦軍，共產黨又有什麼好怕！

現在的北韓，更是明顯，若沒有工業化軍隊的威脅，若在古代，十多年連續饑荒，遍地饑民早就造起反來，金正日只有被饑民生吃掉！

（4）次品法西斯主義

拒絕工業化的共產黨政權，如赤柬、阿富汗、衣索比亞，在內戰中滅亡了；拒絕進步、停滯不前的共產黨政權如東歐蘇聯也人心渙散，瓦解了。只有改革開放，不斷放權的南斯拉夫和中共政權，轉而退向法西斯化，勉強生存下來了。

但是這種改革是可憐的，這是次品法西斯主義，只是把人民送進出口加工廠裏做奴隸賺外匯而已，這就等於把整個國家的國民，置於在共產黨工頭監督下的體力勞動者的境地，這對一個民族的傷害是巨大的，這是由共產主義國家勞改隊演變而來的，另一種形式的全體國民體力勞動營！這會導致整個民族的牛馬化弱智化！

同樣是發展中國家，印度出口智慧產品——軟體，中國出口鞭打、血汗和眼淚。

即便如此，在工業化、資訊化進步的同時，共產黨專制政權面臨的問題也越來越多，而且糾纏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

如果這個時候，共產黨統治集團能認清人類的基本進步原理，認清工業化社會與專制社會不可並存的基本道理，認清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與政治結構的必然關係，順應歷史潮流，認罪認錯，回頭是岸，那也沒有什麼，對大家都有好處。苦海無邊，回

頭是岸。過去天子一遇災難，就下罪己詔，正常的事。面子能跟一個民族的深沉苦難相提並論嗎？

過去幾十年的災難，共產黨有責任，民眾也有責任，大家都有責任。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過程中，在從野蠻社會向文明社會轉化的過程中，人們的觀念沒有及時跟進，絕大部分中國人都驚慌失措，只顧自己，甚至害人利己（如國共內戰和文化大革命），才導致了這場民族浩劫。

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旋轉的陀螺，統治者靠的是威脅，靠的是不斷用鞭子抽民眾來維持統治。它不可能合理的分配利益，最後總是導致嚴重失衡，不可遏制的腐敗和最後崩潰。

文明社會則是一架三輪甚至四輪馬車，大家在共同的利益和理念下建立公平合理的合作關係，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都獲得充分保障，絕大部分人都能有一份合適的生活，維繫社會靠的是向心力，靠的是共同利益感。

只有民主政體才可以通過公平的討價還價，不斷調整社會關係，逐步解決利益分配問題，遏制腐敗，使大家都能生活得更好。

一般的專制政體，只控制政權和軍隊，以納粹為代表的法西斯主義也不過是強化一點這種控制，他們都算不上真正徹底的極權主義。唯有共產主義控制一切，思想、宗教、財產，乃至人民的身體自由，才是真正徹底的極權主義！對國民的危害性和對人類文明的威脅性是最大的。

而共產黨的改革，不過是從其政策導致的大饑荒和民族滅絕面前後退，從共產主義退回到法西斯主義而已！而且是次品法西

斯主義！所以儘管卡扎菲薩達姆之類正宗一點的法西斯主義看不起中共，中共卻仍然暗中支援各種小陀螺似的法西斯主義，因為中共更有全局觀念，更擔心唇亡齒寒。

看一看納粹黨的政治綱領，再仔細對比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尤其是三個代表理論，任何人都會發現，兩者驚人地一致！公平地說，對於中共而言，這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只是縱觀人類進步的大座標系，中華民族到現在才進步到這種程度，委實令人悲哀！常常讓我忍不住想號啕大哭！哀哉中華！

111·新歷史觀：文明法律與野蠻政令

我勞改勞教過三次，每次我都憤憤然，因為罪名也好，量罪標準也罷，都是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量罪條件。都是純粹的政治迫害。但是當我在監獄裏問別人的情況時，我吃驚地發現，大部分人的罪名和量罪竟然都有問題。

而後來我出獄後再留意一下與政治有關的案件，我更加驚訝地發現，幾乎所有的政治犯，要麼是亂按罪名，要麼是名不符實，要麼是根本不符合量罪標準，竟然沒有一個是貨真價實的罪犯！

後來我想，這還有一個很明顯的原因，就是政治犯都是有理智的知識分子，都是出於良知、出於社會責任感而說些話，做些事，又沒有什麼現實利益，這些人採取每一個行動、每一個步驟，都是很謹慎、很小心、反覆思考過的，當然不會去硬撞「法律」。

另外給我更大刺激的是，在看守所裏，在勞教隊裏，在收容

站裏，中共制定的「法律」竟然完全作廢，而替代「法律」的竟然是所規隊紀！比如打人、傷害、搶劫、盜竊、甚至殺人這些明顯犯罪，在中共司法機構內部竟然都不構成犯罪！

就在這種受害的痛苦中，我開始認真思考中國的法律和司法。最後我才得出結論：中國根本沒有法律，至少沒有現代意義的、與世界接軌的、文明的法律。

中國只有野蠻的政令，或條文化的法令，或臨時性的政策，或區域性的、行業性的規定，或單位性的紀律。就是沒有法律！

因為法律來源於契約，是當事人在不受威脅的情況下，根據各方的利益，按公平原則，根據現實生活需要，自願簽訂的。而所有的中國「法律」，與當事人，也就是人民完全無關。人民從來沒有機會表達意見，參與制定「法律」。所有中國「法律」都純粹是統治者單方面發布的政治命令。

所謂的立法機構，被稱為橡皮圖章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根本不是人民選舉產生的，從來沒有代表人民制定過符合人民利益的任何一條法律，完全是按照統治者的意志撰寫一些含糊的條文。中國的所有法律，與我在勞教隊裏見到的，完全按照隊長的利益需要而制定的所規隊紀，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

事實上，如果仔細對比一下，中共管理中國，與看守管理監獄，沒有任何本質區別。

既然中國沒有法律，所以也就談不上公正「執法」。原因很簡單，既然只是統治者單方面發布政令，那就可以隨時更改，任意解釋，甚至任意扭曲而不用作任何解釋。這就像你進入一家公司工作，公司對你宣布，契約就是公司的管理規定。既然如此，

公司當然可以任意罰你的款，甚至隨時可以打你一頓，或者索性趕走你。

我們必須明確，統治者既然有權單方面制訂為自己服務的契約，那這個契約就像統治者的外套一樣，他當然不會讓自己的外套妨礙自己。他隨時可以脫掉外套，甚至脫掉所有衣服，赤裸裸地對你說：「我就是要打你，就是要把你關起來！」

中共的「法律」還有一個奇觀，那就是在公布的「法律」與實際操作之間，還有不經過人大，而由黨委和行政機關下發的紅頭文件。而這些文件，竟然是對人民保密的！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更主要是依靠這些紅頭文件的規定辦事，所以人民跟共產黨講理，連講理的依據都沒有！還有什麼理可講？還有什麼法可依？還有什麼公正可求？

我把人類工業化和民主政治以前的時期統統稱為野蠻時期，野蠻時期可以包括奴隸制、封建制，其基本特徵是農業生產搭配專制政治。專制王權制定的「法律」，與民主政治通過全民公選的議會制定的法律，都有一個根本的區別，那就是前者其實是政令。

右翼法西斯主義和左翼共產主義屬於後野蠻社會，其特徵是人類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過程中，政治形態跟不上社會生活需要，從而產生變異，走向極端，而出現的一種異化政治現象。其表現在立法和司法方面更加野蠻，與文明社會的差別更大。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天天喊法制，卻越來越混亂的根源。那就是，在人民沒有民主政治權利，不能民主選舉立法機構，

悲愴的靈魂

不能公正制定法律之前，中國根本不會有法律，只會永遠混亂下去，直到「無產階級」專政結束。

112·共產主義陀螺原理（1）

大家知道，一個物體必須至少有三個支撐點才能穩定，但是世界上有一樣東西，只要一個支撐點，那就是陀螺，我小時候曾經非常迷戀的玩具，只要你不停的用鞭子抽它，它就可以不停的旋轉下去。後來我思考共產主義原理，發覺它就符合陀螺原理。

傳統社會有政權、教權、族權三個支點；現代民主社會有政權、法權、教權三個支點，所以都比較穩定。而共產黨單靠法權政權管理社會，猶如陀螺只有一個支點。

首先必須有一個打惡的主人，不停的抽打下屬，不讓再抽打他的下級，這樣一級一級抽下去，這個制度才可以維持，否則就會越轉越慢，最後倒下來。

共產主義的最早陀螺是馬克思，但這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陀螺，因為馬克思沒有鞭子，也就是專政機器，所以馬克思幾乎連飯都吃不上。後來列寧甘當類國者，被俄蘇二世政變趕走，回俄國充當德軍第五縱隊，到俄國後方發傳單發動叛亂，搞他的祖國。列寧搞成功，從此有了紅軍這根鞭子，去抽林森德這條鞭子，抽的俄羅斯人團團轉，全部轉暈了，全民墮落，直到幾十年後才漸漸醒悟。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向忠發、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都是書生氣太足，心腸不夠黑，不會使鞭子，不會抽陀螺，所以中共幾乎滅亡。後來日本入侵，蘇共援助，毛澤東得到

機會，在延安從容操練了八年鞭法，加上他又是天生的虐待狂，所以中共這支陀螺便高速旋轉起來。

陀螺原理可以解釋為什麼共產黨政權奴役人民，與世界為敵，與人類為敵，卻在一定時期很穩定的原因，因為當陀螺轉速飛快的時候，旋轉性可以調節它的平衡，它的確是穩定的。

鄧小平等共產黨人常常指責毛澤東太左，經常把運動擴大化，豈不知這正是共產主義運動，也就是陀螺運動的基本原理和必然規律，陀螺不抽就要倒，鞭子不狠它轉得慢，也容易倒下。

任何共產黨統治者，都必須像抽陀螺一樣，不斷發動一場又一場運動，把所有部下都弄得頭暈眼花，全體人民都暈頭轉向。絕對不能停下來歇一歇，否則陀螺必然倒下。

為什麼全世界的共產黨領導人，都會越來越荒謬，越來越殘酷？因為他們不能違反陀螺運動原理，他們必須每過一段時間就揮舞鞭子狂抽一頓，否則陀螺就要歪倒。

共產黨的各級官員，都是很忙很累的，長年累月都像陀螺一樣在高速運轉。幾乎從來沒有休假，更不可能休長假，除非病重住院。所以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思考重大問題和根本問題，只要一當官，休息權利就被這個制度自動剝奪了。儘管撈了很多錢，官員們也從來沒有機會從容地享受。本質上他們都是不能自主的奴隸，都是高速旋轉的陀螺，都是可憐蟲，都是共產主義陀螺運動的殉葬品。

一個正常的社會，比如民主社會，總統幹不幹事，幹多少事，對社會的影響不太大。雷根第二次任總統不久，就患了老年性癡呆症，在橢圓形辦公室開會的時候，他經常打呼嚕，其他人

照樣開會，作出決定，叫醒他去念稿子就完事了。這並不影響美國政府正常的運作，更不影響美國社會的正常生活，甚至不影響雷根依然是一位偉大的總統。

在封建時代，也經常有幾歲小孩子做皇帝，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因為正常社會的每個部分都會正常運作，中央政府的管轄權十分有限，即使癱瘓幾年也無礙大局，何況還有朝廷議會給以彌補，教權、族權自主運作。

但是共產黨統治不同。黨主席不抽鞭子不行，權力會迅速丟失，陀螺會倒下；亂抽也不行，也可能抽倒它，因為陀螺只能朝一個方向轉，左右搖擺更容易倒下。抽狠了不行，轉速太快會失去控制，如當年「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四五運動」；抽輕了不行，陀螺速度慢了，一個小坑就能使它倒下，蘇共就是這樣完蛋的。

玩過陀螺的人還知道，這種遊戲只能一個人玩，只能用一根鞭子抽。兩個人一起玩，兩根鞭子一起抽，鞭梢絞在一起，每一下子都可能把陀螺抽倒，這就是劉少奇林彪都死無葬身之地的原因。現在的中國就是兩個人在握鞭子，兩個人在玩陀螺，那是最危險的玩法。

對於極權專制的國家，正所謂「國不可一日無主，國不可一日二主。」

悟性高的玩家，看到這種局面，就袖手不玩了。因為玩鞭子像玩火一樣危險，每一鞭子抽出去，速度異常快的鞭梢都可能飛回到自己身上。靜下心來，讀讀歷史，看看未來，頭腦也許可以

清醒過來：自古使鞭子抽陀螺的人，沒一個有好下場的！不管他多麼精明狡詐！

因為任何陀螺，都只有一個支點，不可能永遠旋轉下去，都必然有倒下之日！

113·共產主義陀螺原理（2）

陀螺的轉速越快，穩定性越強。當陀螺面臨坎坷的時候，必須足夠的速度才能跳躍坎坷，旋轉下去。但是這裏有一個極限，就是地形不能太陡峭太複雜，鞭子也必須堅韌。

一九七九年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峰，在國際歌聲中，十多萬蘇聯紅軍雄赳赳、氣昂昂地侵略阿富汗，企圖把它變成自己的衛星國。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阿富汗的地型太複雜了，種族也太複雜了，根本不是玩陀螺的理想之地；紅軍這隻鐵鞭也腐朽了，不能再打仗了。

五年之後，安德羅波夫要求政治局和紅軍指戰員克服避戰厭戰情緒，絕不能丟臉地撤退。他說：「在十月革命之後，在我們打敗了所有的對手之後，高加索山地的叛軍不是繼續抵抗了十五年嗎？最終還是被我們鎮壓了。幾萬游擊隊員算什麼？我們一定要頑強堅持下去！」

於是蘇共又堅持了五年，腐朽的紅軍不僅沒有玩轉這隻小陀螺，反而從此深陷泥潭，不僅最終拖垮了蘇共，還幾乎終結了共產主義運動。

陀螺只宜在平地玩，共產主義只宜在種族單一和地形遼闊的地方，在傳統專制主義異常強大的國家玩，在人民奴性十足的國

家玩。到了緬甸、南美、非洲叢林這些複雜的地方就玩不轉了。蘇共在高加索、阿富汗，中共在西藏，古巴在南美非洲，都吃盡了苦頭，切·格瓦拉在舉手投降之前，身邊只剩幾個隨從。

玩陀螺者的另一個忌諱，是在陀螺轉速已經很低的情況下不要強越陡坡。阿富汗除了複雜之外，還有深厚的宗教力量。宗教是人心堡壘，最難征服的。攻城易，攻心難。

中國知識分子雖說是明儒暗道，已有兩千年歷史，其實主要還是唯物唯利。佛學傳入中國一千多年，並沒有征服之；基督教傳入四百餘載，也沒有征服之。所以五十年代共產黨掃蕩他們也很容易，沒費多少力氣。

法輪功突然崛起，能轉瞬間贏得大批知識分子的心，甘願為之坐牢，乃至家破人亡，中國自古未有，東方自古未有。而且在高壓嚴打之下，還能逆流而進，功力日增，從者日眾，更令世人刮目。而這，還僅僅是個序幕。很有可能，不是別的，而是法輪功奠定東方文明復興的倫理基礎，正如基督教在西方。

共產主義好比烈火，當它熊熊燃燒的時候，的確曾經把一切都化為灰燼，所有的抵抗者或者投降，或者被消滅。最典型的就是柬埔寨，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共勒緊中國人民褲腰帶的大量援助支援下，波爾布特一夥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最野蠻最血腥的共產黨匪幫，六百萬柬埔寨居民竟然被屠殺了二百萬，1/3的國家人口！想一想都令人驚悚！

與民族精英領導的法西斯主義不同的是，共產主義是由一群愚昧和野蠻的造反農民領導的，先天就是弱智畸形兒，為了維持自己「一貫正確」的虛假形象，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消滅所有比

他們高明的競爭者或潛在的競爭團體，那就只有殺人或把人抓進勞改隊奴役。這就使它長期困於內在的敵人，有心無力對鄰國發動侵略戰爭。

而正是由於它對鄰國，尤其對美歐沒有來得及造成太大的危害，所以西方對它的罪惡感受不深，而在這個時代，畢竟是西方主導流行文化、新聞媒介和一般的價值標準。

按照中國的五行說，金木水火土，前者克後者，環環相剋。中華民國是金木，人民是水，共產黨是烈火，農民武裝是赤土。由於民眾道德水平低下，金木難支，終被火土燒壞，中國遂成炎炎赤境。

老子晚年張大嘴問他的學生：你看看我的牙齒在哪裏？他的學生說：全都掉光了。老子接著又問：那你看看我的舌頭呢？學生答：幾乎和年輕時一樣，一點也沒有老。老子說：這就對了，剛強者難久，柔弱者長存。

宗教收拾人心，以柔克剛，正是克火之道，總是令共產黨無可奈何。共產主義在全世界，較少是被戰火毀掉的，更多是被宗教和人心瓦解的。

阿富汗聖戰者拖垮了蘇共，而波蘭天主教則頂開了共產主義世界的第一個缺口。團結工會只是前線政治力量，沒有波蘭天主教的深厚和持久支援，波蘭民運的情況應該和中國當代民運的情況類似。

瓦文薩並不比魏京生更聰明更能幹，但是他有波蘭天主教會這個巨大後盾給他提供源源不斷的支援，教會的倫理和道德平台確保人心凝聚，所有人都在上帝的目光注視下，不至於像中國的

唯物主義民運這樣胡鬧一氣沒有底線。

教會資金保障了波蘭數千專業民運活動家妻女無饑寒之苦，教會和信徒的問寒問暖確保了這些家庭無精神孤立之苦，連續十年堅持下來，終於瓦解了波蘭共產黨，第一張多米諾骨牌終於倒下。

專制政體到了後期，必須十分講究平衡。比如晚清，慈禧太后像走鋼絲一樣在列強、各支漢軍、滿貴各派、以及其他各種勢力之間巧妙周旋，不斷以退為進，才歷經風暴，把政權維持下去。

而蠢豬般的溥儀父親，根本不懂此中奧妙，竟然想要威風抽鞭子，在並沒有強敵壓境的情況下，三鞭子就抽倒了好不容易才風平浪靜的清國大陀螺。

作為共產黨人，鄧小平雖然天分有限，不能看透共產主義對人類的根本危害，但他三上三下，歷經磨難，尤其在江西勞改四年，雖然沒有大徹大悟，但終究憑直覺認定，必須回頭了。所以他在掌握政權之後，雖然年事已高，雖然摸著石頭過河，他還是採取了慈禧太后的辦法，小心平衡，步步退讓。

對於宗教力量，對於台灣西藏，對於民運，鄧小平在總體上都是步步退讓的，以撫為主，以壓為輔。我對此體會很深，因為儘管我從八六年起就全力從事反共活動，但多半也只是受到警告和阻止，就是被抓進監獄，也沒有亂按罪名，也還是從輕處理，而且在獄中也受到一點優待。

對於黨內反對派，鄧小平也不抽鞭子，總是得過且過，從不把人抓進監獄。中國這隻大陀螺在鄧小平手裏越轉越慢，他的年

齡也實在太大了。南巡講話之後，他只能把所有問題留給後人解決了。

在毛澤東時代，一鞭比一鞭狠，連抽幾十年，幹部群眾都像驚恐的羊群，中國大陀螺非常好抽好轉。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整個社會的演變趨勢是形渙神散，陀螺轉速越來越慢，勉強維持運轉而已。

畢竟，大部分中國人現在是靠自己的頭腦和雙手掙錢吃飯了，而不是單一看著共產黨幹部的臉色吃飯了，在這種情況下想把陀螺抽得飛轉是不可能的。

江澤民對於世界潮流和中國大勢懵然無知，卻一心一意想玩鞭子過把癮。一鞭子抽倒了楊家兄弟，一鞭子抽倒了基督教呼喊派；又一鞭子把陳希同抽到監獄裏，再一鞭子抽倒了喬石，一九九八年又一鞭子把民運抽得落花流水。

江主席不禁躊躇滿志，一九九九年他又輕率地把大鞭抽向法輪功，就像蘇聯紅軍輕率地進入阿富汗那樣。

現在看到法輪功在台灣日益強大，他又惱怒地要把鐵鞭揮向台灣，有點瘋了。

一九四九年共軍打敗國民政府以來，中共鎮壓大陸任何一支政治、宗教力量都易如反掌，都是幾個小時，最多幾天就可以搞定。鎮壓四五運動、八九民運都是幾個小時就成功了，其餘只是掃尾工作。但是法輪功不然。

我在廣州勞教隊的時候就對別人斷言，如果一年之內中共抽不倒、搞不定法輪功，那就永遠也搞不定了。現在看來，確實如此。

儘管江主席像安德羅波夫一樣諄諄告誡部下，要克服避戰厭戰情緒，但是實際情況卻是，所有黨政軍幹部都厭倦了，都膩煩了，都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了，也看不到有什麼必要，都在默默抵制。當然，老人家的面子誰也不能不給。

阿富汗是蘇共的泥潭，而法輪功則是中共的泥潭。阿富汗拖垮了蘇共，法輪功也會拖垮中共。

中國這隻大陀螺已腐朽散亂不堪，共產黨這枝鞭子更加腐朽，後者吃不了力，前者也抽不動了。所以抽法輪功這一鞭子，已經快馬加鞭抽了四年多，不僅沒有抽倒他，他反而日益強大起來。共產黨卻一天比一天腐朽，一天比一天衰弱。

三國演義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這個大前提下，人心所向，誰也擋不住中國大陸極權專制瓦解的根本趨勢。鄧小平雖然鎮壓「六四」，對這個大趨勢還是基本把握住了，不為已甚。

而鄧小平死後，中央天天喊加強黨的領導，其實只是加深黨的腐敗，加快共產黨瓦解速度，為最後崩潰創造更充分條件而已。

子曰：政者正也。不改變害人累己的共產主義野蠻思路，不進行自由民主新思維，不理解工業文明與民主政治的必然關係，不以誠心善意待天下，不以親和公正待天下，老是抱住鞭子不放，老想抽倒別人，老想抽服大家，最終必然累倒自己！

何苦來著？真要死纏爛抽到底，中國大陀螺轟然倒地，摔裂成幾百塊，再惡戰幾十年，大家同歸於盡，徹底毀滅中華不可嗎？



第十二章 老核桃樹

我的一生都在囚禁中度過，
從一座監所到另一座監所。

其實我僅僅想要，
自己選擇的生活。

我的一生都在掙扎中度過，
那堆積如山的鐐銬啊，
無論我掙斷多少，
總有人更狠勁的打造！

我的一生都在期待中度過，
儘管我滿身傷痕一無所成，
依然期待漆黑的天空，
閃出一道裂痕！

——〈牢中吟〉一九八七年十月

核桃越老越堅硬。苦難、傷害、侮辱只會使老核桃樹更堅強。北方的嚴寒，南方的暑熱，雜草的包圍，都不能使他窒息。

風刀霜劍嚴相逼，在核桃表面刻下了深深皺紋，但損害不了核桃內在的果實，反而能刺激他更深入的思想。

在人類近代史上，我最佩服的英雄之一，就是安德魯·傑克遜，那個長得像核桃樹幹似的堅韌的傢伙，被美國人稱為「老核

桃樹」。據說他在年輕時曾與人決鬥二百次，至少幹掉過幾十個喜愛惹事生非的孬種，當然自己也多次身負重傷。

他在第二次美英戰爭中，召集一支民兵，在一堵矮牆後面，頑強抵抗強大的英軍，最終使英國人徹底地、永遠地放棄了征服美國的想法。

他總是那麼倔強，即使後來做了總統也不改變，為了捍衛他的國務卿的聲譽，他幾乎單槍匹馬抵抗整個華盛頓上流社會的群體詆毀。他寧可抱著老煙袋乾躲在白宮廚房裏抽煙，也不肯去附庸風雅，與那些貴族周旋。

我真的很希望，中國能有這樣一片老核桃樹林，本著誠正和信仰，倔強地生長，不怕監獄，不怕圍攻，什麼也不怕！

我自己當然願意，站在這片核桃樹林裏，堅持到底。後面這些文章，就是在我堅硬的外殼裏面，包裹著的一些果實。

114 · 花落知多少？

每次靜下心來默思我的經歷，我都有一種鑽心之痛。我們這一代，被耽誤的太多了，被傷害的太多了，被剝奪的太多了！

在共產黨專政的漫漫長夜裏，多少心靈的花朵悄然凋謝，多少深刻的思想失去蹤影，多少美麗的愛情變成傷心！

在紅色恐怖的歲月裏，多少人被活活餓斃，多少人被折磨致死，多少人被殘酷奴役，多少人忍氣吞聲，如螻蛄般苟且偷生！

夜來淒風苦雨，花落知多少！

多少心血凝結的書稿被壓在櫃底，再被一把火燒掉；多少美麗的花朵被粗暴踐踏，多少美好的事物被野蠻摧毀！我們失去了

多少青春，我們失去了多少激情！

遇羅克用他年輕的生命，作為反對「血統論」的祭品；王申首以他短暫的人生，再一次證明共產黨的殘忍！林昭以她激烈的思想反抗暴政，表現了中華民族最後的血性。還有更多更優秀的思想者，甚至沒有留下一文半稿，便被剝奪了年輕的生命！在不知不覺中，我們失去了多少精英！

對於鐵幕下可憐的中國人而言，讀萬卷書，幾乎都是有毒的垃圾；行萬里路，山河處處滿目瘡痍；訴胸中言，總是被抓進監獄；行正義事，死無葬身之地！

為了生存，人們不得不蠅營狗苟，像蛇一樣狡猾，像蛆一樣鑽營。夜幕下群魔亂舞，撒旦狂歌，掩蓋了多少悲苦的心靈，扼殺了多少激越的生命！

長江流淌著我們民族的眼淚，黃河訴說著我們民族的悲哀，在我們過去的這個世紀，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我們更加不幸！更讓我們傷心的是，直到現在我們還看不到任何光明！

115 · 心靈之痛

李洪寬有天給我打電話，說民運界盛傳我和魏泉寶是因為不軌而被勞教三年。而我手裏，既有勞教決定書，又有復裁決定書，兩書都沒有類似概念，都是確定我因非法入境獲罪。許多人卻認為我不軌，拒絕出力營救我，好像我不屬於政治迫害。而像高瞻這樣對民運從無一點貢獻的敗類倒被熱捧成民主鬥士，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充分說明了民運墮落到何種地步，實在讓世人難以理解。

似乎我們冒著那麼大的危險，只是為了不軌，難道在紐約不行嗎？如果有人願意到任何地方的勞教局看看材料，或者有空給勞教委打打電話、查問一下，就會知道，九八年之後勞教隊既沒有不軌者，也沒有偷渡者。這兩種人現在僅僅罰款，根本不再被勞教委定勞動教養，這兩種人我在勞教隊三年裏一個也沒見著。

任何人去司法部諮詢一下就可以知道，二十年來偷渡出境的中國人數以千萬計，而因為偷渡而被勞動教養三年的人全中國恐怕只有四個：陳破空、魏泉寶、王庭金和我。至於從國外偷渡進入大陸而被勞教三年的人，五十年來全中國也只有兩個人，那就是魏泉寶和我！

後來我和陳破空通電話才得知，當年陳破空兩次越境被抓，被勞教兩年也是被這個陳老闆賣了的。只怪王炳章幾年不搞民運，一搞起來就想搞大，才把我們送入虎口。陳老闆是個精明的香港生意人，但是他太貪了，各方面的錢都要撈。而為了把我們賣個好價錢，露出了太多的馬腳。賣了之後感覺很賺錢，以後還想接著幹，所以不得不詆毀我們，何況還可讓共產黨再追加一筆詆毀費，一舉兩得。

而且返回祖國這種正當的、正義的行為也根本不違法，是我們固有的權利。但是這種權利被共產黨非法地、蠻橫地剝奪了，難道我們無權以實際行動去爭取這種權利嗎？我們做了無數流亡者一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我們英勇壯烈的義行反倒被視為違法，這些人的立場究竟站在哪一邊？

居然有一些人認為這樣做違法，若按照這個邏輯，當年企圖翻越柏林牆而被擊斃的東德人是活該，那些開槍者根本不該受到

審判；中國民運人士也統統是違法犯罪分子，因為中共制定的憲法開宗明義就說，所有中國人都必須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所以，指責我們違法的正是表面搞民運，暗中擁護共產黨領導的人。

即使克林頓風流成性，而且有實證，共和黨因此大舉討伐，民主黨和美國人民依然堅定支援克林頓。何況共產黨誣衊我們，根本不給我們一點點為自己辯證的機會，而是一下子捂進監獄，連一句話都不准說，一捂就是三年。連傻子都能看得出來，這種方式純粹屬於政治迫害！

更何況，捉賊捉贓，捉姦捉雙，共產黨何來一點兒實際證據？這些年共產黨辦理的處女賣淫案還少嗎？更何況，這是因為政治需要在最高命令下定的案子！

我在申訴書裏憤怒地質問中共，我究竟是不是中國公民？你們如何確定我的身分？假如我是中國公民，那麼我就有權返回祖國，政府阻擋我入境以及現在關押我都是非法的政治迫害行為；假如中共認為我不是中國公民，那就應當立即驅逐我出境，因為勞動教養條例很明確，只適用於中國大陸公民，連台灣香港澳門的人都不適用。中共政權在歷史上也從來沒有給一個非大陸公民勞動教養過。

關於我們的一派胡言當時竟能左右人心，足以說明民運的問題。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敵人鬥敵人，揀最反動的狠狠地打！這是共產黨的一貫策略。

大陸民運的特務比例應該還要更高，如果將來我們能夠像現在東德一樣查實了，會令所有人震驚。看來，海內外的特務和小人能夠很輕易地操縱大陸民運。怪不得共產黨那麼藐視民運。

幸虧我和魏泉寶還沒來得及大幹一場。否則留下顛覆罪證，共產黨還不依法判我一個長期徒刑？甚至在我們行動時，當場擊斃我們？

我們是偷渡進入大陸，不留任何存根，不留任何線索，如果途中被敵人幹掉，丟進海裏餵魚，也會無聲無息，不會留下任何證據，任何人也找不到我們曾經進入大陸的證據！

環顧海外民運，二十年來有幾個人敢這樣幹，敢這樣把自己置於這麼危險的境地？

對中共專制政權一次捨死忘生的衝擊，受了三年凌辱囚禁，反而不如什麼也不幹，在紐約過安全舒適的日子，指指劃劃，嘀嘀咕咕。看來這民運真是不能幹，就是幹也不能衝鋒陷陣，否則真是白白送死！而且死有餘辜！

以後誰還願意像我們這樣幹呢？
在街頭我曾發出無畏的吶喊，
在獄中我與專制惡魔苦苦鏖戰。
出獄後我不顧重壓，
一次又一次向沉悶的天空射出利箭！
而每當我冒著矢石奮勇衝入敵營，
後面竟還有枝枝暗箭！
孤身獨戰的我真是悲傷絕望啊，
天地竟然如此淒涼黯淡！

——〈悲傷絕望〉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我深信，在正義黨成立之始，中共已確定這是最危險最反動的組織，必須動員各方面的力量，予以全面圍剿，予以迎頭痛擊。而王炳章、我和魏泉寶又是特別瘋狂特別危險的傢伙，更要迎頭痛擊，以儆儆尤。

在我被釋放後的兩年裏，我始終被中共當局認定是恐怖分子，嚴密監控，嚴密防備。

在魏京生的幫助下，我幾次到北京與美國大使館和移民辦公室聯繫返美事宜，身後都跟著一批便衣。而且他們既不像是公安部的，也不像是安全部的。他們特別年輕，軍人味道十足，我猜測他們是總參情報部的。後來幾次偶然的交談證實了，他們是典型的部隊大院口音，他們竟然始終不知道我是哪裏人，只知道我是危險的恐怖分子！

他們一個監視組有八、九個人，男女搭配，還有專車在我前後調控。除了一兩個領導我辨認不出，其他人都打過無數照面，我一下火車就能認出他們，因為連我上廁所他們都跟著，我去浴池洗澡他們就站在我的左右。

在北京站人多的地方，我最多一次辨認出六個便衣在我前後左右，對我的監控幾乎比勞教隊裏還要嚴密。我一住下，他們也就住在斜對面，我一出門就有至少兩個人緊緊跟隨。在王府井東安市場人群密集的地方，我曾多次在拐彎處疾走，試圖甩掉他們，結果都是徒勞的，他們如影隨行！

看來他們的確是把我當成恐怖分子嚴密防範的。同時這也是最明確的警告：放老實點，你的一切都在我們掌握之中！而且我真的患了恐懼症，想一想吧，你解小便的時候都有人在旁邊注視

著你！所以我也不能再搞什麼陰謀，那豈不是有故意連累他人之嫌？我現在的活動範圍一般在我住處方圓五百米之內，幾戶鄰居都對我特別注意。

116 · 勞改後遺症

勞改是可怕的，彷彿是地獄旅行。中國勞改隊比但丁在《神曲》裏描繪的地獄還要可怕得多，尤其對於異常孤立的政治犯。除了生存的艱難，肉體的折磨，疾病的摧殘；還有精神的苦痛，心靈的煎熬，靈魂的悲愴。

沒有朋友，沒有同志。只有兩種人類渣滓：赤裸裸的禽獸和冷酷殘暴的專政機器，在這兩種禽獸的包圍下簡直無法保持正常的人性。不知不覺就中毒了，不知不覺就麻木了，不知不覺就殘廢了。

有一次洪哲勝告訴我，很多台灣人不信任大陸人，認為他們是喝共產黨的狼奶長大的，獸性太多，人性太少。初聽令我驚訝，後來仔細反思確實如此。在很多我們沒有意識到的地方，我們的確是像野獸一樣無知無畏。

說中國是禮儀之邦簡直是白日說夢，當今世界最無恥最無禮的種族已經非中國大陸人莫屬。我們在這種豺狼當道野獸橫行的環境裏長大，獨能出淤泥而不染，保持高雅純潔嗎？恐怕難乎其難！

以我的經驗，在勞改隊被折磨三年，出來後還得三年才能恢復，勞改後遺症很複雜。

首先是焦慮症。

中國勞改隊不是南非監獄，曼德拉始終受到人道待遇：可以閱讀全世界的報紙雜誌，可以與世界各地的朋友通信通電話，可以會見朋友，每周還可以和妻子同居一夜，僅僅是單純的監禁——身體活動區域限制而已。

而在中國勞改隊，你完全是抓來的奴隸，你沒有任何權利，你每天在恐怖和威脅下苟活。這樣久而久之便會患上焦慮症，出獄後不知所措，不知所以。抑鬱不平、怨恨他人、喋喋不休、一觸即跳、沒完沒了。

我們沉浸在沒人感興趣的激情裏，沉浸在自我肯定裏。的確，我們付出了巨大犧牲，在政治荒漠的大陸社會裏始終堅持理想，以獻身般的熱情矢志不移。

但我們出獄後首先面臨的冷酷現實是，中國人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幾乎沒人理會我們，沒有人憐惜我們，沒有人愛護我們，反而是一些特務和小人在處心積慮地尋找和創造一切機會來攻擊我們。這是我們根本沒有想到的局面，等我們意識到這些的時候，我們已經莫名其妙地身敗名裂了。

在勞改隊一年接受的資訊可能還沒有在美國自由生活一個星期接受的資訊多，我們無法處理，不能及時反饋，也會招致埋怨。

其次是自閉症。

勞教隊奴隸生活方式的絕對要求是你不能決定自己和他人的任何事情，甚至不允許你進行任何思考，每天二十四小時的每一分鐘裏都替你安排好了，連撒尿都必須經過批准。你只要像牛馬或機器一樣絕對執行命令就行了，否則就毒打你，用暴力威脅你

的生命。

政治犯當然會全力抗拒，但只能坐在那裏在思想裏抗拒。抗拒勞動改造，抗拒思想改造，抗拒變成猿人，抗拒變成動物。

習慣上抗拒一切，敵視一切，最後就變成了與世隔絕的苦行僧，像中古時代歐洲坐在柱子上修行的修道士一樣，只能坐在角落冥想。久而久之養成自閉的思維習慣，出獄之後聽不進去任何話，也不想聽別人說什麼，更不可能與人交流互動，這樣豈能搞什麼政治活動？

我在廣州勞教所裏仔細回想自己多年來的一言一行，發覺的確有嚴重的問題。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出獄之後，很久都還陷在一九八九年時的狂熱情潮裏，沒有耐心聽任何人陳述，也讀不進去任何書和文章。不能連續寫一百個字以上，莫名的煩躁令我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事情上。總是心煩意亂，總是一事無成，後來就陷入幾乎癲狂的境地。

一九九二年以後我企圖從這種狀態下擺脫出來，結果從滴酒不沾轉入嗜酒成性，每天必須要喝一瓶白酒，然後興奮起來，窮吹濫侃，直到精疲力竭才能入睡。

一直到一九九三年我才感到有所恢復，誰知一九九四年又被抓進去勞教三年。一九九七年出獄不久，一到美國我就忙個不停。在家門之外我是個活躍的民運人士，每天獨處室內我又在更嚴重的煩躁抑鬱裏掙扎。

十幾歲的時候我一天能讀一本書，回頭可以向別人複述讀過的內容。三十幾歲卻不能讀書了，也寫不了字，幾乎寫不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每天我坐在一把從大街上撿來的破椅子上，沒

完沒了地抽煙喝酒，幻想怎樣摸到中共要害穴位，一個猛子扎進去，四兩撥千斤，一舉推翻共產黨。除了饑餓時不得不去買上一大塊三明治充饑以外，什麼事都是能拖就拖，不了了之。

這種心煩意亂的生活我幾乎無力擺脫。

二〇〇一年再次出獄後，我決心把一切都置諸腦後，平心靜氣，治療我的勞改後遺症。儘管新中國累計可能有數千萬這類患者，卻沒有一個醫生會治這種病，只能自療。

其實這也是中國社會嚴重的問題之一，那些嗜血如命的慣匪和現在全國城鄉的黑社會頭目和骨幹幾乎全是監獄培養出來的，都患有嚴重的勞改後遺症，但是無人治療他們，他們也根本意識不到自己有病。

我每天下棋散步睡大覺，心如止水。與朋友閒談也不再爭長短，世事無常，聽之任之。一年多之後，我果然感到有所恢復，首先是記憶力恢復了很多，不再拿東忘西；思維也連貫了，不再斷續；特別是能坐下來完整地讀一篇文章，甚至寫一篇文章了，我特別滿意。

願天下坐過共產黨監獄的人，特別是政治犯，都正視監獄後遺症，想辦法自療好。然後一切從頭開始！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

來日方長！

117· 逃亡惡夢

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在夢中被追得走投無路，突然驚醒，起身呆坐良久，驚魂也難安定。只有下床開燈，抽一根煙，恢復鎮

定，擺脫恐懼感。

最多的夢中逃亡是我在空中飛，後面有一群怪物窮追不捨，有毒蛇，有老鼠，有野豬，還有豺狼，怎麼也擺脫不掉。它們青面獠牙，十分恐怖，明顯是要吞噬我，而且他們數量太多，我不能轉身與它們搏鬥，根本沒有一點勝算，只有逃亡求活命。

我的雙臂總是十分吃力，有時像翅膀，有時像滑板，而有時仔細看看，就是兩隻赤裸的手臂而已，根本飛不起來的。這樣一想，我就開始直往下墜。而地面上滿是血污和垃圾，我的眼一黑，就嚇醒了。

還有就是在胡同裏轉來轉去，處處都有殺氣，都讓我望而卻步。但是後面有魑魅魍魎追擊，我又不得不逃，只有硬著頭皮，假裝若無其事的樣子，吹著口哨，腳下盡可能快地穿過去。

在巷口轉悠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是中共特務，或是民運叛徒。而且很多面孔我似乎都見過，甚至很熟悉，卻想不起來他們的姓名。這讓我感覺更危險，更心驚肉跳。為了不暴露出來，我還必須保持表面平靜。

最讓我恐慌的是，我記得帶了一支槍，摸遍全身卻怎麼也找不到，我便反覆回憶，到底丟在哪裏了？怎麼去把它找回來？

還有就是逃亡在荒郊野外，簡直就像喪家落魄之犬，還被追擊，我慌不擇路，鑽進了一大片雜草叢，那草叢比人高得多，我竟然鑽不出來了。既沒有食物吃，也沒有水喝，累暈了只有坐在地上喘粗氣。想找回頭的路，也分辨不清，白累一場。

慢慢地天黑下來，風聲鶴唳，無不驚心。也不知道附近有沒有野獸，會不會一下子就撲過來咬斷我的喉嚨。儘管又暈又累，

我卻根本不敢睡覺，手裏緊緊攥著一根木棍，時刻提防著。

我的腦子裏還始終納悶，我並無罪惡，那些人究竟為何要窮追我不捨？絕望已極，看來只有一死了之了。又怎樣死呢？這時我就在絕望中醒來。

這也許是在恐怖高壓下，所有試圖反抗暴政，從事過地下民運活動，後來又在獄中遭受過殘酷折磨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曾經歷過的內心驚恐。這是勞改後遺症的病症之一，也不能指望醫生治好，只能自療的。

自从我從事民運以來，常做這些惡夢。這些惡夢對我的健康損害極大，因為睡醒之後，我的頭腦很久都停留在模糊的夢中情境裏和恐懼感覺中，要過很久才能擺脫。

好容易擺脫逃亡惡夢之後，又感覺頭腦裏空蕩蕩的，身體也疲憊不堪，好像我已經累壞了，好像這個世界對於我而言，除了惡夢什麼也沒有。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能擺脫這些惡夢，才能有安甜的睡眠。第二天起床後，能夠精神飽滿，給親人一個熱情的問候，然後去做一份工。

118 · 失憶症

大約九歲起我開始嗜讀，無論逮著什麼書，都要一讀到底。然後有好多天那些文句都還清晰地停留在腦子裏，可以隨時向別人複述。特別是小畫書，我幾乎可以一字不漏地背給人家聽。一直到十六歲之前，我都保持這種記憶力。

西單民主牆被關閉，校園民主運動被壓制，使我的思想和感

情遭受到嚴重挫折，從那以後，我的記憶力就開始緩慢下降，那時我只有十七歲。

給我更大打擊的，是一九八七年十月在廈門看守所連續五天的絕食絕水。而真正給我致命打擊的，還一九九四年八月在看守所開始的，連續二個月以上的斷續絕食，和隨後幾個月的厭食。那真使我耳聾眼花，記憶力十毀其九。

從那以後，大部分事情我都記不住。跟人家約好時間見面，轉身就忘得一乾二淨，令我失去了很多朋友。鑰匙老是忘記帶，好多次只有撬門，最嚴重的一次是我新婚之日酒席之後，幾十個親戚同學朋友要鬧新房，但是鑰匙又弄丟了，幾個同學想盡了辦法幫我砸鎖撬門，累得渾身是汗。差不多二個小時之後，快到後半夜了，大家才入內，也無興致鬧房了。

至於丟東西、丟錢，褲子釦子忘記扣，更是老常事；弄得我老是檢查，反覆檢查，出了門、上了街還要摸一遍，到人家門口還要最後檢查一遍才敢敲門。看到我這些小動作的人還以為我有精神病。即便我謹慎如此，還有好多情況下忘記扣釦子。

更讓我尷尬的是，當我給別人講一件事情的時候，講了上一半卻忘記了下一半，別人在等著，我卻愣住了，甚至連剛才自己說了什麼也根本想不起來。所以有好多年我都不敢輕易開口，尤其是我在美國的那一年。

還有熟悉的名字，人名、地名、物名都會隨時卡殼，怎麼也想不起來，甚至過了好幾天都想不起來，好像我的記憶被牆壁擋住了一樣，無論如何，就是想不起來！

我從初一開始學英語，學了十年左右，到了美國我很想學好

英語，但是我幾乎連一個單詞也記不住，無論我念多少遍，背多少回！

所以我幾乎得出結論，我被共產黨摧毀掉了，這輩子幹不了什麼事了，還不如找個機會，跟共產黨拚一次命，同歸於盡算了，這樣也許我還能體現一點剩餘價值。至少，我要給共產黨一個沉重的教訓，使他們明白，以後不能隨便迫害人，尤其不能捏造侮辱人的罪名迫害政治犯。上可殺不可辱！

說實話，我一九九八年底毅然返回祖國，這也是原因之一。

在勞教隊裏拚命似乎太不值，儘管我每天都對那些野獸般行兇作惡的隊長們恨之入骨，恨不得立刻衝上去用牙齒咬斷他們的脖子，制止他們犯罪，但我還是忍住了。我決心把我的生命用在該用的地方，不到最後關頭，不命有所值，我還要保存住。

其實就是釋放我以後，我也沒有機會拚命，共產黨對我盯得太緊。我憎恨的大魔頭，安全保衛都很仔細，像我這樣的平民百姓，一生也沒有機會接近他們。他們的心裏也很清楚，像我這樣受盡殘害，懷恨在心，決心報復的人，在中國實在太多了！所以他們永遠不會走到人民中間，永遠也不會允許中國人民像美國人民那樣，擁有捍衛人性尊嚴的自衛武器。

最令我奇怪的是，共產黨好像很清楚我的內心活動，令我懷疑，是不是我在勞教隊裏，睡熟時說的夢話都被記錄下來了？

地方當局平時雖對我嚴密監控，但並不步步緊跟，但是只要我到北京，就有一個監控組，至少八、九個人，不分白天黑夜，對我步步緊跟，走到哪裏跟到哪裏。其實我並沒有什麼明確的「打算」，但他們就是不放心！

但是最近兩年，當我慢慢地心平氣和一點，內心仇恨的烈焰減低一點，我驚訝地發現，我的記憶力竟然恢復了許多，當我執意考慮一個問題時，竟然也能想出許多與此有關的事，並且寫成一篇文章。

當然許多事情的確切日期和細節，我實在回憶不清楚了，或者記錯了，希望我的讀者能夠原諒我。當然我也盡量迴避這些我不能肯定的細節。

記憶力減退到這種地步，加上我過去主要搞地下民運活動，那時絕不能記筆記的，再加上八年坐牢，我幾乎有十幾年沒有看書寫字了，導致我提筆就忘字，好多字怎麼也寫不出來，幾回字典一查，我就沒有信心再寫下去了。記得在紐約時，洪哲勝博士和劉賓雁老師都曾認真地向我約稿，並付給我優厚的預約稿酬，我卻一篇文章也寫不出來。

所以我得特別感謝拼音輸入軟體。有了這種智慧化寫作方式，我可以在詞庫裏找到大部分字詞，真的可以嘗試寫文章了。頭一篇稿子受到好評之後，我也就建立寫作的信心了。至少現在，我可以寫文章表達我的思想和感情，就不用不著考慮跟敵人拚命了。

因為我現在相信，我活下去還是有點用處的！

119 · 失眠症

除了水和食物之外，人體最必需的也就是睡眠了。睡眠不好，人會無精打采，心煩意亂，不能集中注意力做任何事。久之還會影響健康，身體的免疫抗病功能會下降，特別容易受各種病

毒感染，慢性病也會悄悄發展，成為不可治癒的痼疾。

在勞教隊裏，最痛苦的還不是豬食，或者喝不上水，而是長期睡眠不足。一般每天只有五至六個小時的睡眠，所以總是感到困倦，有氣無力。時間久了病就多，頭腦也混混沌沌的。

我本來就患有神經衰弱，經過勞教隊六年折磨之後，更是嚴重到可怕的程度。無論想什麼辦法也睡不著覺，而到了需要出門做事的時候卻睏得睜不開眼。

很多年裏，我的睡眠幾乎沒有任何規律，每天想睡的時間是不斷變化的。有陣子非要到上午八、九點鐘才能入睡，晚上七、八點鐘才能睡醒，如果強制自己不睡，很快就會感冒咳嗽生病，情況更糟。

早上喝茶、喝咖啡，晚上喝牛奶、喝酒的辦法我都嘗試過，不僅沒有效果，還使我染上了茶癮、酒癮。不喝越來越濃的茶，起床後就一點精神沒有；而不喝越來越多的白酒，就再也不能入睡。

後來我仔細觀察，我的失眠症也有一個規律，就是每天的入睡時間差不多都比前一天晚一個小時左右，差不多一個月左右一個迴圈，也就是徹底顛倒一回。

後來我就順其自然，進行微調，盡量把握生活規律，吃飯喝水都有計劃。一直到兩年之後，我才能控制自己，建立比較有規律的睡眠。

120·死撐硬抗：十五種病—十六次絕食—十七座監所

頭幾次絕食是由於義憤。當我被憤怒絕望的情緒所左右，

精神瀕於崩潰邊緣的時候，我就以絕食抗議，抗議殘酷，抗議暴政。事實上，在監所，這也是一個中共奴隸唯一的抗爭手段。除此之外，你別無任何辦法爭取一點點應有的做人的權利。所以在我八年被囚禁生涯中，我先後進行過十六次以上的絕食。

在社會上絕食會得到人們一定的同情，但在監所卻被視為抗拒改造行為，屬於嚴厲打擊對象，你絕食的時候照樣得幹活，照樣得出操，照樣得排隊，絕不會允許你躺在床上休息。

老臭蟲梁永勝多次在大會上痛罵：「他媽的有人想以絕食來威脅我們，真是瞎了狗眼！我們還怕你死掉？大不了我花三百元拉你去火葬場燒掉。你們的命也只值這三百元錢！凡是敢絕食的，給我狠狠地打！讓他死得快一點！」

每次絕食的時候，總有好心的人來勸我：「唉！說句心裏話，在這種地方，我們只擔心不給吃，哪裏還敢絕食？死了還不是白死！」

記得在紐約時，有人攻擊民運人士，說這些人都因為有病而保外就醫，怎麼一出來就好了？我當時氣得要死。這些沒良心的人哪裏知道，在勞改隊被關七、八年以上，大部分人渾身都是病，出來後都是硬撐著。有病說給別人聽，又怎麼樣？誰還會同情你？幫助你？詆毀你踩你還來不及呢！

二〇〇一年我出獄之後，到處看病，我仔細統計了一下，驚訝地發現，我患有十五種病。

鼻竇炎，在廣東患的，劇烈頭痛有時也因它而起；鼻炎，這是廣東地區病，北方人在那裏勞教三年，反覆患重感冒，十之有九必得此病，長年累月鼻涕不斷。慢性咽炎，也是廣東地區病，

極難治療，沒法除根，只要一發燒就和支氣管炎一齊發作，每天都要吐很多痰，無論用什麼抗菌素都得用好長時間，過一段時間又犯；慢性支氣管炎，我小時候得過，長大後好了，在美國一年都沒犯過一次，在廣東勞教隊卻靠住一個月犯一次，發燒、咳嗽、吐痰，還得照樣一天幹十六小時活。

以上四種病都會隨著一般感冒而復發，交織成併發症，十分難受，不治還不行，必須長期大劑量使用抗菌素，一次血檢的時候醫生提醒我，我血液裏藥物污染太嚴重了。

慢性結膜炎，一九八六年在廣州收容隊得的，不治之症；慢性角膜炎，也是一九八六年在廣東收容隊得的，也是不治之症，以上這兩種病害我過去十七年裏點了至少一百多瓶眼藥水。爛牙，我在獄中先後爛掉三顆，都是爛到牙根，只能拔掉，另外八顆可補，滿嘴沒有一顆完整的好牙，很多東西都不敢吃。

慢性胃炎，一九九四年我就因為長期絕食而患，但後來好轉，但在廣州勞教隊又復發，迄今未癒，胃疼讓人渾身無力，什麼活都沒幹卻老是感到筋疲力盡；慢性腸炎，這種病更麻煩，也是不治之症，就是長年累月有氣無力，拉稀，吃東西要特別小心，任何東西都不可多吃，食物越單調越好。前列腺炎，監獄常見病，我估計是冬天久坐不許動，凍腳，營養不全，腎虛而致，一天要小便十幾次，煩死人。

關節炎及風濕痛，在蚌埠看守所睡在水泥地上所致，後來在南湖勞教隊又加重，到廣東勞教隊潮濕的地下車間更厲害，逢到陰天雙腿麻酥酥的，有時會疼得無法入睡，必須起床走一會兒，也是不治之症。

神經官能症，頭痛，我經常頭痛，特別是在勞教隊的時候，能連續疼一個星期，很長時間我都以為，我長了腦瘤；至於失眠，更令人痛苦，每天的入睡時間都會後退一個小時左右，一段時間就要徹底顛倒一次。植物神經紊亂，我的身體經常失去控制，無論睡眠，還是飲食或情緒都難以控制；末梢神經炎，這是我八九年在看守所患的，也是監獄病，嚴重時極痛苦、極恐怖。就在我寫這些字的時候，我的腳趾頭還在抽搐疼痛，已經十三年了，也沒好，我也不指望它好了，中醫要我天天按摩腳，堅持幾年也許會好，我哪有那種耐心？

現在的醫院十分可怕，我的病又都是慢性病，醫生總是讓我沒完沒了地做檢查，無論我怎樣問，化驗員一般不告訴我檢查結果，醫生也不告訴我檢查結果，只含含糊糊地說我有病，需要吃藥，吃很多藥。問他吃了這些藥能不能治好病，他說不一定，再問他就不耐煩了。

一會兒說我可能有肝炎病，化驗完了又說需要化驗我有沒有肝炎抗體，然後又要給我注射疫苗，儘管我一開始就告訴他，我在廣東勞教隊被關押了三年，如果該有肝炎早就染上了。我們車間經常有肝炎患者、肺結核患者，他們照樣幹活，幹少了一樣挨打。而且隊長就安排他們坐在我的左右，我對這一點倒沒意見，因為這兩種病只要家裏交三千元保證金，是有可能保外就醫的，但我就是傳染不上。

我也沒錢治病，出獄之後，我反覆考慮，自查醫書，發現這些病都是頑症，一般醫生也治不好。我也看過一些中醫，開給我的那些草藥不僅難喝，效果也不明顯，氣得我先後扔掉幾大包。

我決定硬抗，省錢留著吃飯。二年過去了，我的大部分病狀都沒有惡化，反而減輕了。後來我分析，這主要還是得祖先蔭庇，遺傳給我較強的抗病及反撲能力。我的祖上，都是活到九十歲左右。

我雖未老早衰，但遺傳基因不會病變吧。堅持抵抗下去，我們就能得勝！

「你起來吧！以你精神的勇氣，去克服你的疲病。只要你神完氣足，不為形役！」——但丁《神曲》

回憶一下，我竟然在十七座監所裏被關押過。其中廣東最多，民政局四所，公安局一所，司法局二所；然後是安徽，民政局一所，公安局二所，司法局二所；廈門兩所，北京一所，武漢一所；另外還有香港一所。

121·致洪哲勝：

感謝你對中國大陸十三億人民命運的深沉而持之以恆的關注，這都是你的血肉同胞，與你血脈相連。記得第一次見到你時嚇了一大跳，你在台上展開一幅畫：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但是聽了你的演講之後，我沉默了，我低頭了，大陸人對不起台灣人。在文明時代，任何人都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台灣人不例外，台灣人有權決定自己的一切，有權選擇自己的命運！所以後來我願與你為友。

我常常奇怪，在美國的一些人拚命反對台獨，他們自己有權拒絕受共產黨的統治，逃往美國享受自由獨立的生活，台灣人就沒有這個權利了嗎？就必須捆綁在共產黨的戰車上了嗎？

說實話我並不贊成台灣獨立，因為台灣人目前是全世界上最優秀的華人，血濃於水，他們有義務有能力承擔拯救全世界華人的使命！今天讀了你的來信，我感慨而寫下文以向你陳情。

無言的淚：

我生於中國大陸，長於中國大陸，一切的思想感情也都圍繞著中國大陸。為她而生，為她而死。

我在清華的同學，現在大部分都在美國過著富裕而優雅的生活。可能只有我，二十年來一直顛沛流離，一無所有，屢遭監禁，受盡苦難。

僅僅因為，我愛這片土地。我為這片土地和人民貢獻了我所能貢獻的一切：青春、健康、愛情、學業、愛好，最後只剩下一副多病的軀殼，我仍然決定奉獻他，直到死亡。

愛是一種無法迴避的生命傾向，你注定要為此而生而死。我們的父母，我們的祖宗，為了子孫的繁衍發達，不是已經貢獻了一切嗎？一個種族，一個國，一個家，沒有這種感情，能延續嗎？

愛是一種生存方式，你可以抱怨你愛的人視你如草芥，踐踏你、羞辱你，但你依然要為他們而奮鬥而努力，如同你的孩子在你的懷裏拉屎拉尿，你會厭棄你的孩子嗎？

我在清華上學的時候就立志要做：愛和勇氣的化身，人類良心的捍衛者。

所以我才能承受這麼多的苦難，才能在命運召喚我的時候毫不猶豫地放棄在美國的優裕生活，反身衝進中國大陸苦難的泥潭，才能歷經苦難而不改初衷！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我深信：終有一天真理會戰勝謬誤，正義會戰勝邪惡！當代民運歷經曲折，到一定時候就能匯集成為一股不可壓制的力量，把中國人民從苦難和墮落的深淵裏拯救出來！

每念及此，我無言的淚便會悄然而下，布滿我傷痕累累、未老早衰的臉。

回想中國大陸百年來爭取民主自由的血淚歷史，何人能不流淚歎息？無論道路多麼曲折，無論感覺多麼蒼涼，不管我們個人的下場多麼悲慘，我們必須走下去！別無選擇！

因為這是人類歷史上最艱巨的事業！也是十幾億中國人最重要的事業！救人一命，尚且勝造七級浮屠，救十三億人呢？

十七年來我一直是大陸民運的一名前鋒，一名實踐探索者，我一直在用我堅硬的頭顱去抵擋共產主義鋼鐵巨輪！用我病弱的身軀去肩抵手推足蹬共產主義巨輪！

曾經有好多次，我都可能走上別的人生道路，但是冥冥之中，彷彿有一隻上帝之手又把我推回到民運這條路上來，而且一個勁兒地把我推向與黑暗勢力鬥爭的前線。我沒有選擇餘地。

當代大陸民運，三次躍身衝擊中共，三度判刑勞教的民運人士，總共只有幾個，我是其中之一。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堅硬冷酷無比的共產主義鋼鐵巨輪的外表裹上了一層橡膠，有了一點彈性，沒有把我的腦袋碾碎，沒有把我的身軀碾碎。

122 · 後記 · 我的戰壕

我的戰壕不是槍林彈雨的火線，而是痛苦不堪、如火爐般煎

熬的監獄——看守所、勞教隊、收容站。我是一個自由戰士，為民主而戰，為正義而戰。

沒有薪水，沒有獎金，也沒有傷殘保障，我只有熱誠的信念。沒有夥伴，沒有朋友，沒有任何溫暖，我只有在黑暗中在寒冬裏獨自苦戰。只有冷酷的鐵門鐵窗，只有鬼哭狼嚎的地獄慘叫，只有喪失人性的野蠻看守與我相伴。

我只能遙想高牆以外的世界，是不是有了什麼變化？我的同志們，我的朋友們怎麼樣了？世界民主潮流已經衝到什麼地方了？還有多久才能夠衝到中國？

聽到波蘭團結工會在參議院競選大獲全勝的消息，我足足高興了一個星期；聽到獨裁者齊奧塞斯庫被處決的消息，我忍不住喜極而泣；聽到柏林牆被推倒了，我忍不住也揮拳痛擊囚禁我的牢牆，直到我的雙手腫痛起來。

牢牆卻紋絲未動，依然固執地囚禁著我。

我的戰壕是蚌埠看守所18號囚室，骯髒污穢，黑乎乎的牢牆上布滿了鼻涕和血污，凝結成一層厚厚的黑膠，不知沉澱著多少年的罪惡，不知曾有多少人血濺四壁。

我的戰壕擁擠不堪，每個人無論白天黑夜，所能分配的地盤不足一平方米。我們像一群豬一樣，痛苦地哼哼著，長年累月地互相仇恨、互相撕咬，為了一點吃的，為了能平躺下來睡覺。周圍全是我的敵人，每個人內心裏都希望，今夜死掉幾個就好了，自己也許就可以吃得飽了、睡得下了。

我在那個貓耳洞臥守了兩年，沒有屈服。

我的戰壕是南湖勞教處一所五中隊，奴隸勞動營。我在一群

悲愴的靈魂

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牛馬樣的奴隸中間，在棍棒的驅使下終年累月地勞作，在烈日的暴曬下採茶，在寒雨肆虐、衣衫盡濕、索索發抖中採茶。

完不成任務，還要挨打，飽嘗電棍、拳腳、板凳、被板打在身上的滋味。吃的睡的比牛馬還要差，連水都喝不上，幹活比牛馬還要辛苦。

我在那個糞坑蹲守了三年，也沒有屈服。

我的戰壕是廣州第一勞教所六大隊二車間，一座地獄般的地下工廠。那裏有邪惡無比的老臭蟲，有殘酷至極的麻蠅皇帝，有踢人如踢球的飛毛腿。他們像虎豹一樣兇惡，像豺狼一樣嗜血，像惡魔一樣殘忍。

我坐在那個骯髒的、氣味刺鼻的、恐怖的地獄裏堅守著我的陣地。以我內心深處對人類熱誠的愛，抵禦著圍繞我吼叫、恐嚇、毆打的魑魅魍魎。

我在那個深淵苦熬了3年，還是沒有屈服。

我的戰壕是我母親給我的一間破舊的危房，結束了八年的勞改生活之後，我發現自己一無所有，僅有十幾種病纏身！又沒錢治療，只能硬抗！

我心裏也是傷痕累累，被出賣、被誣衊、被羞辱灼傷了我、重創了我。

但是靜心休養一段時間之後，我覺察到，我還有一樣東西沒有被毀掉，苦難、囚禁沒有摧毀她，病痛、流言惡語也沒有摧殘她，那就是我的靈魂！我激越的靈魂，我不屈不撓的靈魂，我驕傲自信的靈魂，元氣仍在，毫髮無損，依然生氣勃勃，和我十六

歲時一樣！

有了她，我依然能夠傲然搏擊命運，不管命運多麼悲慘！

有了她，我依然能夠橫眉冷對專制，不管專制多麼強大！

有了她，我依然能夠熱情擁抱世界，不管世界多麼蒼涼！

處於嚴密監控中，搞民運組織活動難以有作為，老是雞蛋碰石頭，一頭衝到監獄裏去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鬥爭方式。我決定轉而寫作。

於是我買了一台舊電腦開始寫作，這台586的機子毛病重重，老出故障。更主要的是，自從八九年入獄之後，我差不多有十多年沒有看書寫字了，我的雙手又被手銬銬傷了，只有左手中指可以敲擊鍵盤，其他手指用不上，如果勉強著用，速度反而更慢。

電腦發展太快，這麼多年耽誤下來，我也不懂了，有時候找一個字都要費半天工夫，好容易寫出來一點，仔細一看，錯別字連篇，句子也不通順，意思也不連貫，把我氣得要死。統統刪掉重來。

這一切都在考驗著我的意志。有好多次，我都傷心地放棄了。我的記憶力因為十多次絕食，被毀損最嚴重，許多事根本想不起來。不管是拿著筆，還是面對鍵盤，我常常是腦海一片空白，不知從何下手。磨菇半天，好容易寫出幾句，卻又無以為繼。

我在小屋裏團團亂轉，像一隻困獸，我坐下來接著寫，寫幾行字又站起來，反反覆覆。最後終於寫出一篇稿子，然後反覆地看，反覆地修改。我堅信，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

我肯定自己不是一個笨蛋，我自幼聰穎，喜歡沉思默想，十六歲時參加七九年高考，在蚌埠考區萬名考生中一舉奪冠，現在居然寫不好文章，豈不令人恥笑！在我的觀念裏，一個真正的自由戰士應該什麼都能幹，既能戰鬥，又能寫作，又會幹活。

不幸的是，斷斷續續寫了幾個月也沒有寫出一篇我自己能滿意的文章，直到有一陣子我被計劃生育委員會逼得走投無路、怒不可遏，一口氣寫出了六千多控訴文字，我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我明白，我終於衝破了心理障礙，閘門終於被我撞開，我心中的滔滔江河從此可以流淌出來！

我確立了我的第一個目標：寫一本記述我從事民運及勞改經歷的書！看了我的那篇〈拯救生命〉，安琪給我來信鼓勵，陳破空也給我打來電話，建議我寫出自己獨特的經歷。

二〇〇三年九月底，我終於下定決心寫出這本書來。

洪哲勝博士看了我開頭寫的三節之後，就斷然向我約稿，他領導的民主亞洲基金會給我出版！

尤其令我感動的是，洪哲勝還兄長般細心地指導我怎樣使用電腦，怎樣計算字數。他還把他自己寫的回憶錄發給我看，以給我啟發，鼓勵我寫下去。

我開始了狂熱的寫作，不分白天黑夜，只要腦子裏有念頭，趴到電腦上就寫。有一首歌老是迴盪在我耳畔：「我是一名戰士，命運是疆場。我從不遲疑，總是猛撲上去。我唯一的恐懼，是失去鬥志。」

寫那些風風火火、東奔西走、如夢如歌的激情歲月，我會

激動的流淚；寫那些悲慘的、地獄般的囚徒生活，我會傷心的流淚。我就帶著眼淚寫，一直寫到眼淚流乾，寫到手指麻木，寫到雙腳冰涼。有時我會連續寫十多個小時，不吃不喝，一直寫到渾身發抖、頭腦枯空、癱倒在籐椅上。

很快我就累病了，支氣管炎、咽炎、鼻炎、腸胃炎、末梢神經炎一齊來了，胃痛、胸痛、頭痛、足痛一齊折磨我，令我咳嗽連連、涕淚交流、衰弱不堪。

王庭金晚上來看我，他懷疑我患了肺結核。因為我在廣州勞教隊後期，飛毛腿隊長特意安排一個肺結核病人坐在我左邊，一個肝炎病人坐在我右邊。王庭金力勸我去檢查一下，我只好到醫院裏拍了X光，驗了血。上帝保佑，沒發現什麼要命的病。

我的太太和母親也勸我休息，她們知道我的身體太虛弱了。但我哪裏肯。我始終有一個最大的擔憂，就是當局在我還沒有寫完這本書之前，又把我抓進監獄。

當局始終認為我是一個反動透頂、極端危險、容易衝動、爆發力極強的正義黨衝鋒隊長，公安部更認為我是一個恐怖分子，甚至是負有使命的中央情報局特工，才會不顧一切地放棄美國生活，一頭衝進鐵幕，衝進共產黨牢房。他們不斷叮囑地方當局盯緊我，看牢我，隨時準備狙擊我，把我按倒在地上，用繩子捆起來。

與中共鬥爭近二十年下來，我知道對手的思路和習慣，只要上級命令下來，為了保住飯碗，他們隨時可以給我按上任何一個罪名，送進監獄。為了敲詐一筆罰款，他們都能抓出一大群「賣淫」的處女，還有什麼冤案假案他們辦不出來？

在恐懼感的驅使下，我哪裏還管什麼病痛，只要還有一口氣，我都要寫下去。我要與時間賽跑，我要與效率低下的專制機器賽跑，我必須在他們出手截住我之前衝到終線。

不光擔心人被抓，還擔心書稿也被搜走，每寫一段我就拷貝到軟碟上，藏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這樣堅持寫下去，病情居然也慢慢減輕了，這樣花了一個半月，我終於寫出了《悲愴的靈魂》草稿，二十多萬字。精誠所至，金石為之開！

這都是我切身的經歷，十幾年來始終盤旋在我腦海裏，就像監禁歲月雕刻在我臉上的皺紋，站在鏡子面前就可以一覽無餘；就像殘暴打擊在我身上留下的傷痕，想抹也抹不掉。

然後就沒日沒夜地修改，這比寫草稿還要艱難，因為我畢竟是初寫者，毛病一定很多，很多問題我自己很難看出來。

我只有勉強自己反覆地修改、磨礪，大段地剪裁。鍥而不捨，金石可鏤！

這段時間還有兩個中共特務纏著我，老是打開我的電腦說是幫助我，下載一些我不懂也不需要的東西，弄得我的文件經常丟失，電腦也頻頻生病，至少上百次突然自動關機。嚇得我每寫幾行字就要多處保存，害的我浪費了大量激情，焦躁不安。

後來我終於有所覺悟，憤然趕走了他們，奇蹟發生了，我的電腦再也沒出毛病！現在我不允許任何人碰我心愛的586。

剛剛出獄的安徽民運領袖王庭金生計沒有著落，家小嗷嗷待哺，我還得絞盡腦汁幫忙，到處找朋友捐助。

我的小天使才十個月大，我經常要一手抱著她，一手繼續

打字，久而久之，她竟然以為按鍵盤是做人最有趣的事，比任何玩具都更吸引她，一有機會她就使勁伸手按鍵盤，弄得我哭笑不得。害怕她把文件弄丟，我只有趕緊關機讓她玩到滿足。

修改期間我又病了一場，又是那幾種病痛一齊發作，但是我咬緊牙關堅持著，一邊吃藥一邊斟酌每一章每一節，絕不能功虧一簣！

幸虧癡情愛我的太太全力支援，感謝上帝！修改了一個半月，堅持到二〇〇三年耶誕節那天，我的書稿終於誕生了。三個月的眼淚沒有白流，這是一本淚水之作；三個月裏我幾乎都在生病，這是一本病痛之作；三個月裏我都在驚恐之中，這是一本驚恐之作；三個月裏我瘦了十幾斤，這是一本血肉之作。

其實這是我的青春生命之作！是我過去二十多年裏，以我的信念、勇氣和獻身精神，在這塊苦難深重的土地上，拚盡全力耕耘，留下的道道犁痕！

我按捺不住激動，在聖誕之夜把她電郵給了洪哲勝。然後我忍不住親吻了一下586的額頭，謝謝你，我親愛的586！

我自信在我的戰壕裏，我是一個堅韌不拔的戰士，能夠承受任何屈辱，能夠忍受任何苦難，能夠迎接任何挑戰！

我沒有什麼，只有堅硬的頭顱，只有頑強的思想，只有激情、夢想和熱愛！

只要有一口饅頭吃，我就能戰鬥下去，直到我的祖國從共產主義腐惡專制下解放出來，直到與我血脈相連的同胞們獲得自由！

張林 二〇〇三年聖誕夜



【全球發行網】

香 港 : Amy Chu

Tel: 852 25199881/852-91288505 Fax: 852-24882584/852-25199554
Email: amy@epochtimes.com.hk

印 尼 : TEJA MUSTADJAB

Tel: 62-31-70991785 Fax: 62-81-23501077
Email: afuks@telkom.net
Address: JL TENGGILIS MEJOYO SELATAN II/8
(here means "2/8") SURABAYA, INDONESIA

新加坡 : Winnie Tai

Tel: 65-90057194 Email: daife@myrealbox.com
Address: BLK 13 DOVER CLOSE EAST #18-214 SINGAPORE 130013

加拿大溫哥華 : 楊先生

Tel: 1-604-728-8239 Fax: 1-604-738-8079
Email: young@wisejourney.net
Address: 3218 East 43rd AVE Vancouver B.C. V5R 2Z9

英 國 : Lily Li

Tel/Fax: 44-121-6246454 Email: uk@epochtimes.com
Address: 105 Kings Road, Kings Heath, Birmingham B14 6TN UK

德 國 : 袁小姐

Tel: 49-40-41354064 Fax: 49-40-4102932
Email: min.ye@epochtimes.com

法 國 : 王泓/張建中

Tel: 33-1-42041527/33-6-12092226 Fax: 33-(0)1-42046439
Email: xlzsr@nerim.fr

日 本 : 宮本香子/福澤邦夫

Tel: 81-3-336-83896 Fax: 81-3-336-83896
Email: info@hakudai.jp
Address: Kitasuna 5-20-8-209, Koto-Ku, Tokyo 136-0073, Japan

澳洲雪梨 : 陳芳芳

Tel: 61-2-85686188 Fax : 61-2-85686166
Email : epochtimes@optusnet.com.au

澳洲墨爾本 : Helen Chen

Tel: 61-4-10349058 Fax: 61-3-86250099
Email: lfhchen@ziplip.com
Address: The Epoch Times, L1/249 Forest Rd, Hurstville NSW2220,
Australia

新西蘭 : Xiao Lin Chen

Tel(Fax): 64-9-5775088 Ph: 64-21-1799836 Fax: 64-9-5768691
Email: epochtimesnz@extra.co.nz
Address: POBox251165 Pakuranga, Auckland, New Zealand

台 灣 : 洪月秀

Tel: 886-9-26139415 Fax: 886-2-27160761
Email: boda_tw@msl.epochtimes.com.tw

〈 創作系列 〉

悲愴的靈魂

作 者：張 林
編 輯：王 茵
版面構成：葉致芸
出 版：博大出版社 Broad Press Inc.,

總 部

Address : 2520A Wyandotte Street Mountain View, CA
94043. USA

全球總代理：美國博大書局(New York. USA)

TEL : 1-888-268-2698 FAX : 1-718-460-4039

<http://www.broadpressinc.com>

E-mail : support@boradbook.com

經銷商：彩舍國際通路

地 址：台北縣中和市建一路87號5樓

TEL : 886-2-22267768 FAX : 886-2-82267496

華文網網路書店：<http://www.book4u.com.tw>

新絲路網路書店：<http://www.silkbook.com>

橋大門市部：台北市南陽街7號

TEL : 886-2-23310234

國際書號：ISBN 1-932674-19-5

定 價：新台幣 330 元

出 版：2005年5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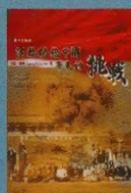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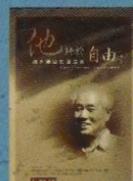
BOSTON PUBLIC LIBRARY



3 9999 06439 876 9

WITHDRAWN

No longer the property of the
Boston Public Library.
Sale of this material benefits the Library.



九評共產黨 / 大紀元系列社論 (附有聲書)

九評共產黨 (英文版) / 大紀元系列社論

他終於自由了——趙紫陽世逝風雲錄 / 主編：博大大

二十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 / 主編：何清漣

穿越生死 / 作者：王玉芝

紅朝謊言錄 繁體版 / 附光盤

文殤 (上、下) / 作者：袁紅冰

自由在落日中 (上、下) / 作者：袁紅冰

格庵遺錄破譯 / 作者：正浩

為你而來 / 作者：澤農·多爾奈基

中國現代化的陷阱 修訂本 / 作者：何清漣

法輪功給中國帶來的挑戰 / 作者：丹尼·謝特



當代大陸民運，三次躍身衝擊中共，三度判刑勞教的民運人士寥寥無幾，張林是其中之一。

近二十年，張林一直是大陸民運的一名前鋒，一名實踐探索者，
他一直在用他堅硬的頭顱去抵擋共產主義鋼鐵巨輪！
用他病弱的身軀去肩抵手推足蹬共產主義巨輪！

曾經有好多次，張林都可能走上另一條人生道路，但是冥冥之中，
彷彿有一隻上帝之手又把他推回到民運這條路上來，
而且一個勁兒地把他推向與黑暗勢力鬥爭的前線。他沒有選擇餘地。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張林深信：終有一天真理會戰勝謬誤，正義會戰勝邪惡！

在這本書裡，張林以他的民運生涯和監禁勞改生活為視角，
從這文明荒漠裡，從刺人的野蠻荊棘裡出發，
從勞教隊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發，
從當代中國人與人之間的本質關係出發，
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角度出發，
從各種角度剖析了中國共產社會的奴隸制本質。

ISBN 1-932674-19-5

00330



9 781932 674194

定價：NT \$330元

W7-AQW-966